

## 序 言

李之钦同志是一位老教育家，陕西延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名誉校长。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担任过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延安大学任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文教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等职。1958年调任甘肃师范大学校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其他老干部一样，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1973年调甘肃工业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李之钦同志今年已是八十岁高龄，他在党的教育战线奋战了近60个春秋，为国家培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对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虽已退居二线，但仍时刻关心着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他一方面整理、总结过去工作经验，一方面研究教育改革中的新问题，写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汇集成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收集了李之钦同志自1939年至现在写的37篇文章，约30万字。在这些文章中，有7篇是讲陕甘宁边区教育情况的。这对总结老区教育经验、编写老区教育史是很珍贵的资料，有些还可供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借鉴。有近20篇是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从事教育、党政领导和大学领导工作的指导意见和经验总结，其中关于办好师范教育的内容占较大的比重。这不仅明确了师范教育在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反映了作者对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视和经验，

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还有6篇是对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江隆基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作者曾和徐特立、江隆基同志一起工作过，对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论哪一类文章，都是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教育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意见。由于作者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所以许多文章具有理论色彩。但又不是空讲理论，而是理论联系实际讲明道理。因此，使人读了很受教益。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不仅是作者从事教育工作60年的真实写照，而且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基本面貌，对我们总结教育战线的历史经验，深化教育改革，为四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辛安亭  
1988年2月

# 目 录

## 序言

代绪	( 1 )
社会教育指导团工作纲要	( 32 )
张家畔妇孺冬学	( 43 )
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 48 )
试谈普及农村教育问题	( 52 )
对于过去教育上经验主义的批判	( 57 )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 66 )
革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	( 72 )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 78 )
加强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	( 83 )
关于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问题和今后 意见的报告	( 96 )
论目前加强县教育领导部门工作的重要性	( 106 )
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	( 111 )
重大而光荣的事业	( 114 )
欢迎青年献身人民教育事业	( 121 )
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总结教育经验	( 124 )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	( 141 )
培养提高师资的几点意见	( 151 )
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而努力	( 161 )
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171 )
记延安大学战时生活和陇东随军工作情况	( 177 )
《辛安亭论教育》序言	( 185 )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工作回顾.....	( 187 )
农村学校教师的培训及分配问题亟待解决.....	( 215 )
普通教育要积极贯彻“三个面向”.....	( 218 )
回顾我在甘肃师大工作的主要经验.....	( 220 )
简谈高师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 234 )
略论江隆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教育思想.....	( 248 )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	( 254 )
略论徐特立的教育本质、对象和目的观.....	( 286 )
徐特立教书育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 301 )
试析徐特立的教学论.....	( 312 )
徐特立的课程与教材论初探.....	( 337 )
徐特立论教师和学生.....	( 349 )
<b>附 录</b>	
掌握客观规律是做好工作的关键.....	( 367 )
比、学、赶、帮的辩证法.....	( 371 )
赵普和吕蒙正荐贤二、三事.....	( 380 )
简论唐太宗的用人与纳谏.....	( 382 )

## 后 记

## 代 绪

本人系陕西省延长县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一个农民家里。童年上私塾，慈母早逝。1923年入本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一面上学或教书，一面参加革命活动和进行党的工作。1935年本县土地革命开始，即全部投入革命，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现在，约六十年。因此，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一生。

## 春 雨 初 沐

1925年，我是延长高小三年级学生。延长县是一座古城，隋代称延安，依山带水。高小位于城中偏东。高小校长朱幼康，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位校长。在朱校长的主持下，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既重教学，又搞课外活动。这年，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上海工人顾正红等的“五卅运动”惨案发生了，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汹涌浪涛，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延长虽地处群山僻壤中，远在西北高原，然而革命的火焰，很快照亮了县城，首先起而响应的是高小。在校长的组织和领导下，我们准备上街游行示威，唤起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搞好游行，先在高班学生中，挑选出几个能讲话，又有魄力的同学组织游行，并向群众宣传。挑选出的几位同学中有我，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热情很高，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对帝国主义是什么货色一无所知，只略略知道帝国主义向我国倾销洋货，亡国奴当不得等；因此，先得在校长和教师的辅导下，练一练兵，整一整队伍，准备准备讲稿，然后再出发。我们自己起草了宣

传稿子，请老师们修改，然后背了又背，练了又练。全校同学忙成一团，有的剪裁旗帜，有的执笔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等等。约准备了两天，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从街东到街西，又从街西到街东，游行示威。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观看青年们的游行。街上设了几个宣传站，我们的讲演站，设在城中县教育局的大门口。每个站都有听众，倾听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屠杀上海工人顾正红等，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等。“出师胜利”，胜利完成了游行示威和宣传鼓动的光荣任务。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也大为提高。

因为延长是山区偏僻小城，游行过后，也就泰然无事，人们都正常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活动，高小也照常上课。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三民主义，一概无闻。至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听过。1925年冬天，学校还未放寒假，一位县城内住家的刘生谦先生，由北京旋里。他是知识分子，在县城有点名气，他一回到县城里，就往来于学校之间，宣传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孙中山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三民主义。听了颇觉新奇。在学校组织下，刘先生作了几个晚上的讲演，讲述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大家听了之后，对三民主义虽不甚理解，但略知了点梗概，对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向往，从此也给我打下了向前进的初步基础。

## 讲坛初试

1925年冬天，我们高小毕业了。同学们有的去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升学，有的去绥德上省立第四师范，或去西安深造，也有回家教书的。我虽想升学，但由于家境不够充裕，未能如愿。1926年初，我们的校长朱先生，聘我到城里当初小教员，先在文庙女小，后转到高小初级部任级任教师，每月薪金十元。这个初级

部小学是六年制，两个班，共两名教师，各教一个班，每班三个年级，进行复式教学。设国语、算术、常识、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一个教师全教这些课，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这种复式教法，比较复杂，开始不会运用，实践久了，也就懂得一些门道了。当一个小学教师，颇不容易，要具备各种知识和技能，要会教，也要会导，尤其管理学生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重要的是，要和小学生打成一片，爱护他们，循循善诱。对这一套我起初很陌生，个别调皮学生书念不好，不免要训斥他几句，有时还要打几下。没有学过小学教学法、管理法和儿童心理学，加之传统教学的影响，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虽然这样，但是，当时和以后，先生和学生还是很有感情的。“严师出高徒”，这是一个重要教学规律。当然，严是严要求，并不是要去打学生才叫严。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传到陕北各地，也传到我们延长。共产党在各地成立组织，国民党组织也在各地成立。我县高小也征收国民党员，于是我也就登记了。这时加入手续很简单，填一张入党表就行了。不久，学校召开延长国民党区分部成立大会，会议由朱幼康校长主持，延长石油厂经理赵次庭作北伐军胜利的形势报告，接着选举产生了区分部执行委员会，约十余人组成，我是执委之一。会议闭幕之后，还举行过几次宣传北伐军胜利的报告会。以后又在县区成立“天足会”，广泛宣传妇女放足；成立农民协会，反对恶霸地主。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入冬后，绥德省立四师先后派马瑞生、冯景翼二人来校视察和宣传。他们向全校师生讲述了国内职工运动情况。这些活动，为高小进一步革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 四师的学习和斗争

省立第四师范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也是一个极尚俭朴

的学校，为贫寒家庭出身学生所向往的教育场所。我想去这个学校上学，于是辞退了高小初级部教员的职务，于1927年初与同乡同学数人考入四师。一踏进校门，就给人一个生气勃勃的感觉，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在学校里的共产党人，都是半公开的；因此，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某某人不是，都为大家所知晓。校长常汉三、教务主任罗端先、训育主任韩叔勋都是共产党员，还有许多教师如蔡南轩、何寓楚、雷五斋等，也都是共产党员，至于学生中的党员更是不少。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就作为当时学校的国文教材讲授。经过教师讲授以后，学生不但领会了宣言的内容，而且宣言本身也被背诵得烂熟，同时提高了同学的革命热情。在这半年内，北伐军胜利的战报捷传，学校几乎每天都用布告牌公布战况。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北伐军打“丁泗桥”等地的最激烈的战斗。学校图书馆的进步书籍刊物甚多，供同学们阅览。同学们争着借阅《共产主义ABC》，最受欢迎的是《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还有高尔基的《母亲》等等。四师不但有革命的理论宣传，而且有革命的实际行动。几乎每个礼拜天，同学们（有时还有教师）要到绥德附近的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并组织农民协会。有一次，我们数十位同学在大热天气，步行到绥德城外数十里的义合区农村去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1927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那天，我们一部分同学和教师，去城郊附近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在回来的途中，大家都挽着裤腿，脱了鞋袜渡过小里河。一回到学校，就听到了李大钊同志被东北军阀张作霖绞死的噩耗，全校愤怒了，城内震动了。当即召开全县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四师师生是主体，声讨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大会上发言的有教师，也有同学。会议开得十分庄严激烈。这时候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由于陈独秀的投



降主义路线，蒋介石的叛变日益明显。“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接踵出现，但是，这一恶化的革命形势直到放暑假，尚未传到四师。

暑假，我回到离绥德二百六十华里的家乡，不久，就传闻四师被封闭。心里想，下学期能否去学校？正在徬徨之时，学校通知下学期仍旧开学，希望同学们按时到校。我到校之后，看到原来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一些教师不见了，去向不明。来了新任校长柳砚琛、训育主任高莘野、教务主任陈新庵（是否共产党员，记不清了）。后来几任教务主任象卢俊卿、李卓如等，都是共产党员。在教师中仍有一部分党员，如青萍、刘文衡、苏醒民、傅浮沫等。学生人数稍减，党员还不少。我在暑假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活动，仍在学校中起作用，但是，转入了地下。昔日的革命空气，大大降低了，进步书刊被禁止了，进步活动也大为减少，革命转入低潮。1928年上半年，学生活动逐渐抬头。为了了解陕北一些中等学校情况，我和数同学曾去米脂二中串联，联络感情，互通情报。在二中蹲数日而返。不久，大概在农历四月间，学生的罢课运动发起了。起因是：因罢考而引起罢课，实际上是冀图把校长柳砚琛赶走。在举行罢课之前，我的记忆是：为了统一行动，党秘密地召开了小型会议，讨论了罢课的目的和方法，要求大家要处之泰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惊慌失措，要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止。学校当局，一再命令学生复课，都被学生拒绝。当局一技不成，又来一技，秘密指派训育主任高莘野去高双成的旅部求援。高的旅部就在学校后面的山顶上。高莘野上坡搬兵时，被学生发现，预计必有事变。果然，高双成开出一营队伍，一时间把学校团团包围，迫使学生复课。然而，全校学生若无其事，仍坚持罢课。约包围两天两夜之后，当局见无效果，于是下令封闭学校，命学生在两小时之内全部搬出，这时学生用绳索捆自己的行李，准备出发。同时，军队为

了监视学生出城，从学校大门口起分成左右两队，一直排到绥德南城门外。学生背着行李，高喊口号，说说笑笑，从军队排行中间走出南城门外。我们出了南城门外，暂住关内客店。党布置任务：回乡做农民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等。同时，又不停地派同学混进城内，发传单、贴标语，以反对当局封闭学校的反动行为。从此，学校停办半年之久。

1929年春，四师启封，开学了。我和我县几位新同学仍来母校学习。到校学生约一百余人，很多原来的学生未到。家里经济优裕的学生，早已转学他校，或者投入到革命实际活动中去了。这时候校长仍是柳砚琛，教务主任是共产党员卢俊卿，训育主任换成一个国民党员魏某人。开学后除部分旧同学外，还来了一批新同学，一些新教员；因而，革命活动还未组织起来，学校还不活跃，只是照常上课。时隔不久，在党的领导和教务处的安排下，成立四师学生会。先由我起草了学生会章程，教务处审查同意，柳校长看完后，也免为其难。接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我被选举为学生会主席。按会章规定，设立了讲演股、壁报股、游艺股等。每股都选定几位同学负责。壁报股，结合时事和学生活动，按时出刊。讲演股，隔一个时期召开一次讲演会或辩论会。有一次讲演会，一位姓白的女同学得第一名，我其次。大概就是这一次讲演会，会前学校确定发给优胜者以书籍奖品。奖品由教务处购买。书籍运到了，学校迟迟不发，问其故，答曰：校长说这些书籍都是进步书籍，不让发给。本年，校长经常住在绥德城内杏树圪塔他的家中，不常到学校视事，原因是学生闹事伤脑筋。因此，学生会派了以我为首的十二个同学去校长家里交涉，要校长来校发奖。这次，校长完全向我们让步，没说两句话，随着我们来到学校，将奖品如数发给应受奖的同学。斗争胜利了；游艺股，不定期地演出节目，或者召开简短的晚会，节目都是选取有进步内容的。记得演过几场《复活的玫瑰》。我不但指导演

出，而且亲自参加演出。我曾扮演过《复活的玫瑰》中的李若愚这个角色。从此以后，学生每有较大的活动，都是在学生会的领导下进行。绥德城外几十里有个合龙山，是我们较大活动的常用场所。立三路线的传达在这里。记得宣传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有一次，绥德县国民党党部通知学校，要全校学生参加他们召集的群众大会，我却带领学生去合龙山活动，以资抵抗，他们也无可奈何。1929年暑假，同学们带着宣传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的任务回县。我家离县城七十华里，为了完成所负任务，我就去县城内第一高小召开宣传成立反帝拥苏大同盟会议。只召集了一些教师，把意思讲了以后，就匆匆地离开学校准备回家。反动县长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通知县公安局捕我。公安局长是我初上高小的校长朱子明，他为人好，又与我属师生关系，故拖延不出了，估计我已离开县城，才派丁来高小寻捕，落了空。回报县长，说李某早已出城走了，未能捕到，哄骗县长交了差。就在这一年，四师成立了学生军，我任大队长，白如冰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学生军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操练，也讲军事知识。军事教官是高双成的参谋张筱丛，和我关系很好。他的政治背景如何，在学校成立学生军的用意如何都不了解。但是，未听到他有过什么反动活动和言论。1930年初，校长柳砚琛，觉得主持四师实在头疼，再也不愿呆下去了，就和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换防”，他去榆中任校长，马来四师任校长。马济川系共产党员，所以对学生的进步活动很放手，极力支持。因我仍为学生会主席，接触也比较多，常常在他指点下进行工作，搞学生会的活动。因此，学生会很活跃。他瞧不起国民党县党部，绥德县长对他也要让几分。就在1930年上半年这一学期，由四师学生会发起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邀请陕北各中等学校派代表来商讨成立事宜。榆林中学、延安四中等校都派来代表。我校选我和吴志渊等为代表。会议议定组成人员和初步设想。吴志渊被选为陕北

学生联合会主席，我为秘书长，学联会址设在四师。暑假我毕业离校后，学联活动如何，不得而知。四师每学年每学期都照常上课，所学功课，除教育学外，按师范教育课程说还比较齐全。但是，一般说来，学生重文轻理。因此，学生文科知识还好，革命知识较多，而理科知识就显得较差。当时有个顺口溜：“ $x+y$ ”有何用哉！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缺陷。

## 重上讲台被逐

1930年下半年，我受聘于县立高小。这是一个比较早的县立学校，也是建立党组织较早、具有革命传统的一所高小。有几任校长都是共产党员，教师也大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校长是朱天民，教务主任是王志匀，我为训育主任，还有几位教师。学生三个班，不到一百人。

我到学校，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党的组织。毕业回县前，四师党的负责人苏醒民，通知我和李志公去绥德城外龙尔湾开会，在会上苏给我们的任务是：回县后整理延长高小党的组织。据云：延长高小党组织有问题，上级党与它掐断关系已有半年了。因为该组织的几个负责人互闹意见，甚至拿党的文件互相告密等。要我们回县后，不与他们发生党的关系，并且设法将党的文件从他们手中要出，悉数火焚，以免泄漏党的秘密。同时，先把好的学生党员组织起来，教师党员要考查后吸收等。我们回县后，先摸了一下情况，确定在开学之后，再按党的指示办理。接着将所有文件都弄来，一齐火化。开学后，先摸了学生党员的情况，分析了哪个较好，哪个较差，然后确定初步吸收对象。接着召开党员会议，选出支部负责人，成立了高小党支部委员会。

我担任训育主任，还教授三年级一个班的国文和体操等。高小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作风纯朴好学，吵嘴打架的事情没有，很

守纪律。因此，训育主任的事情不多，经常的工作，主要是教学活动，一礼拜至少有18节课，还有国文作业批改。我除使用校定国文课本外，常常选教一些有进步内容的文章，藉以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后来听说新来的县长很坏，我便在行动上和教学上较多注意，但警惕性不高。一次，我正在给学生上课，教《张子房出秦论》一文，快到下课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位“不速之客”，站在学生最后排听讲，我不知道是谁，没有理他，下课铃响了就下课。事后知道是新来的伪县长王俊杰。他经常暗查学校的情况，不通知就来校窜来窜去，也常常在学校周围偷听。据说，他在西安来延长上任前，曾有延长城内在西安的某人，找他反映过高小情况，说高小有共产党组织和活动。因此，他一来延长，就十分注意高小党的活动和一些教师的行动。

寒假到了，三年级学生要毕业，学校决定举行毕业典礼，邀请县长和县教育局局长光临指导。会是在一个下午开的，开会时，校长不愿当主席，要我当，我只好免为其难。宣布开会后，先请县长讲话。他大意说：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作事，要有牺牲精神等。教育局来了一位督学，也讲了话。校长不讲话，最后我不得不说几句。这就闹下了乱子。其实我并没有讲什么太露骨的红色话，只是说了几句勉励同学，要好好进步，现在有新思潮，牺牲要有代价等。问题恐怕就在最后一句话上。该县长听了之后很不高兴，说我和他唱对台戏。毕业会餐之后，拂袖而去。事后对别人讲李某是共产党。接着通知校长辞退我，并要我离开延长。于是，校长就解聘了我。

## 旅京上学、斗争种种

1931年春，我和友人张棠离家去北京。初到北京，天地两生，先寓居骡马市大街延安会馆，找组织联系。为了便于在北京

立足，必须找一个安身之处，遂决定先去北京弘达学院补习功课，待暑假考学校。弘达学院在西城，延安会馆在外城，相距较远不便去上课，遂迁居西单皮库胡同，后又转至李哥老胡同。暑假考入北京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同时考入的还有吴志渊同志。辅仁宿舍收费昂贵，我们缴不起，只好在辅仁附近找民房；但是，那时候的北城比较荒凉，很多民房都是土炕，不堪住宿，遂又搬至沙滩，沙滩离辅仁很远，常常是步行去，步行回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寇节节进攻，不上几天，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又占领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扶植溥仪筹组的“满州国”傀儡政府。接着日寇又向锦州方面推进，蒋介石命令几十万军队不抵抗，完全退入关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愤恨国民党、蒋介石的节节退让、不抵抗主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北京各大学紧急集会，游行示威。上海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北京大学开会讨论去南京示威、请愿，在此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多数学生坚决主张去南京示威或请愿，有少数学生，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坚决反对去南京，更反对去南京示威。在北京大学三院教室中开过几次很激烈的辩论会，一次辩论会进入高潮时，全场喊出一片“打”的声音，有几个反动学生觉得不妙，有的从门上溜出，有的从窗口跳出。最后，主张南下请愿的胜利了。我当时住沙滩，常去参加北大的这些集会。当时，京津其他各大学，也纷纷组织学生，南下请愿。这就吓坏了蒋介石。请愿队伍到南京后，他先则欺骗说：政府正积极准备抵抗，实际却在暗中准备镇压和屠杀请愿学生。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电令驻北京的张学良，阻止学生继续南下请愿。正在这时候，辅仁大学学生也组织南下请愿。我们去学校参加了动员和组织会议，确定了去南京请愿和出发时间等，大概是十月

某一天，辅仁同学都到前门车站集合，还有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在车站，准备南下。当一列火车不等学生上完就要开动的时候，学生们挡住了它，纷纷上车，可是，火车不开了，司机也溜走了。学生一再抗议，火车仍是不开。不得已就下车，坐卧车轨。如此几日几夜，坚持斗争。同时，辅仁还分批组织同学，坐乘手压车，往来于东车站与永定门之间，监视有无北来的火车，以便挡住，乘车南下。我几次参加押车活动。可是，北来的火车，到丰台站就停了。学生多次派代表到车站办事处交涉，但他们逃之一空。有一天，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忽然有人大喊：敌人的飞机来了、轰炸车站，这一下，车站的秩序大乱，大批学生离开车站，急避飞机，就在这个瞬息间，列车开跑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为当局要开走火车而造的谣言，学生们上了当。这时候，除少数学生手执小旗，喊着口号去丰台，打算在丰台乘车南下外，大批学生觉得现在去南京不可能了，于是就各回原校，相机再南下。这次罢车，几日几夜坚持斗争，虽未达到南下目的，但是，表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决心，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大概在1932年初，北京大学世界语学会，组织世界语学习班。那时，我仍住在沙滩西老胡同十五号。这个院子，原系“共进社”的社址。院内住陕北同乡五、六人。除个别人未参加世界语学习外，其余均参加了。上课在北京大学红楼内，教师是北大学生傅浮沫等，傅曾在绥德四师当过国文教师，共产党员，我们熟悉。世界语教材印刷很醒目，内容很进步，很大一部分是讲当时国内红军活动和苏维埃发展情况。我们大概学习了几个月，就掌握了世界语阅读。北大世界语学会，不但组织学习班，而且组织集会，进行抗日活动。活动是秘密通知，会议不定期，地点不固定，以避免敌人的破坏。常常是先通知在这里开会，临时又改在另一地开会。有一次原通知在和平门外北师大开会，我们

到北师大后，临时又改在北河沿北大三院开会。我们很快又赶到北大三院。上午，群众挤满了三院，院中间放一桌子，作为讲台，集会开始了，学生登台讲话，激昂慷慨，接着标语、传单飞扬。一学生讲话刚完，另一学生上台，大批军警迅速开进院内，一时将大会冲散，有的群众越墙逃走，有的从后院跑出，有的上楼躲避，大约被捕八、九人。我们上楼躲避，幸未被捕。之后，被捕学生有的被保释，约1931年冬或1932年初，延安会馆召开年会。延安会馆系陕北延安府十县旅京学生和人士寓居的地方，这里住房便宜。当时会馆的馆长是马文生，系北平大学学生，非共产党员。会馆的大权，由马派掌握。在年会上，大家提出改选会馆的领导。为此引起斗争，斗争甚为激烈，几乎要打起来。当时发言最激烈的有白坚同志，白系共产党员，在北京作党的工作，我与他有联系。斗争的结果，改选了馆委会。馆委会下设各股，北大学生马玉林和我负责经费管理股，我们曾到银行办理过经费存款手续。我以后未再去管。

陕北旅京学生中，当时还作过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听到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来京，住在他的公馆（报纸胡同或铁狮子胡同），便商量去敲他的竹杠。于是派出有我在内的十二个代表找井岳秀交涉。到他的大门口，大门紧闭，叩了几下，出来听差，问来由，我们答，要见镇守使，他把我们引进客厅，刚坐下，井岳秀就出来接见。他身穿长袍马褂，甚为客气。我们讲了旅京学生生活困难，缺乏学费，要求拨点经费等话。这个人非常滑头，也非常吝啬。我们陈述完毕，他就大讲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的生意不景气，赔了钱等。我们力争，他巧辩，良久无结果，我们不欢而散。还有一件事是：陕北旅京同学，在某学院组织了一次演戏晚会，演的内容是反映偶像崇拜。演出中间，发现陕西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在场，不知道他如何知道陕北旅京同学就在这里演戏，混进来了解进步学生的活动。当发现周在场的时候，大家哗然起



来。有的喊把周学昌撵出去，有的喊打。结果，周学昌在群情奋激中，抱头鼠窜。

## 合法斗争

1932年我辍学旋里，因故未能重上北京复学。1933年秋又去高小教书，原县长已离任。因我在县有共产党嫌疑，女高不敢聘请。男高校长朱子明，虽列身绅士林，但敢冒不韪，聘我到高小当国文教员，一直到1935年夏。当时，延长设有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委员刘逢五，此人从表面上看，还不很反动，但是，我为了能够隐蔽，在县上立足，所以特别注意言行，相机进行合法斗争。县长是杨天章，此人从表面上看，与前任王俊杰不同，很愿意接近高小教师。县政府每有宴会，必请校长，有时也有教师参加，愿意和教师在一起玩乐，而对于老绅士，则较疏远。他的政治背景如何，我们始终不清楚。

1931年下半年，朱幼康、朱天民、李会友三人被坏人告密，说他们是共产党而被捕。被捕前，朱幼康是延长石油厂科长，朱天民、李会友分别为县一高、二高校长。他们被押送至榆林，狱中表现很好，朱幼康更坚强，1933年下半年他被大赦出狱回县，不久任县财务科长。就在这时候，南梁红军根据地派赵振华来延长，整理恢复党组织。朱幼康、朱镜清、朱天民和我被通知参加接头会，当会选出朱幼康作支书。会后，部分了解了乡村党、团情况，未与南梁党建立起经常联系。1933年延长种大烟，县府、党部、军队三方面因种大烟分赃不均，县府被党部告发。朱幼康因烟案株连，与杨天章县长一同被押解去西安。当时我曾写信给陕西禁烟局长张筱丛（张系我在四师的军事教官，曾与我有过书信来往），请其斡旋，营救朱幼康，朱出狱以后，据说1937年在西安病逝。

1933年县教育局助理员是刘葆瑛。此人不学无术，花花公子，为县上最大绅士刘襄丞的儿子。凭借其父亲的权势，当了县教育局助理员，领导全县的教育工作，实际上是“尸位素餐”。但是，他侵吞教育经费，却是能手，恶迹昭彰，群情激愤。我们乘此机会，联络男女两高小的同人，设法推倒刘葆瑛，另找贤能接替。我们的斗争，是从清查刘在教育经费上的帐项入手。经过清算，确知刘贪污教育经费两千余元，真凭实据，刘无法抵赖。接着就具文呈杨天章县长撤销了刘葆瑛县教育局助理员的职务，退出贪污赃款。县府委任了朱子明为县教育局助理员。朱子明曾几任高小校长，是教育界的老前辈，颇孚众望。他虽属绅士之列，但无恶迹，为人正派、廉洁。因此，我们拥护他接替教育局助理员职务。

当时，延长县长杨天章、绅士头目刘襄丞和国民党部刘逢五三方有矛盾。杨天章看不起国民党部，对老绅士也有些疏远，但较接近年轻人。这样，党部和老绅士对杨县长不满。老绅士对国民党部也并不太瞧得起。刘襄丞大权在握，为全县总团总。李明五当时为高小校长，想推倒刘襄丞自己当总团总。他同县长、党部都有来往，与刘逢五活动倒刘襄丞，我参加了此活动，是用合法斗争形式，即写呈文控告刘襄丞，详细陈述他的罪状。杨天章接受了控告，撤换了刘襄丞，同时委任李明五为全县总团总。这次斗争，实际上是县长、党部和我们三方联合推倒了刘襄丞。该刘在1935年5月刘志丹攻开延长县城后，在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上被镇压。新任的县长董公绶和承审也被镇压。新来的党部指导员刘星南下落不明。城破前，我们的活动已被党部察觉，我们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内，如果延长县城再迟打开一个时期，我们就会被逮捕了。

## 县城解放之后

1935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红二十六军攻破县城，延长解放

了。我们几次给红军政委高岗汇报延长城内的情况。高小停课了，有些教师参加红军，有些学生参军或回家。我和董耀卿随高岗去六区进行地方工作，宣传红军政策。接着组织决定留我参加即将成立的县苏维埃政权工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谭生彬任主席，我任县政府秘书；第二次县苏代表会之前，我又调任县教育局长。我虽担任教育工作，但是，许多动员、组织工作都参加。县政府文字工作，如作大会记录、工作计划、出布告、下通知等，几乎为我一人全包。因为，我那时在县苏干部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工作虽然很杂，但是大体说来，在县约半年时间，主要有这样几项活动：一个是主持或参与了几个较大的群众集会，如参加筹备欢迎红军大会以及其它群众大会。大会由高小校长朱天民主持。主席致欢迎词后，刘志丹同志作了长篇讲话。之后不久，志丹同志又来县城，我们又组织了第二次群众集会，请志丹同志作了宣传红军政策和安定民心的报告。我主持了大会，随后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久，又主持了第三次大会。这次大会斗争了一个有几条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后由县委书记白如冰讲话，遂即处决了这个反革命。这三次大会都是全县性的赤卫队大会，每次都有好几千人。其次是领导恢复并新开办了全县的学校，初步实施了社会教育。过去，全县六个区，每区设立一所初级小学。县城内设立了一所男高，一所女高，男高附设初级部。六区甘谷驿设第二高小。起初人们都忙于搞革命，学校都停办了，经过一度工作，初小全部恢复，并且新成立了几所列宁小学。市镇和一些大村庄，还设立了一些认字组和夜校。高级小学因师资缺乏，没有恢复。当时教育较乱，沿用一部分旧课本、旧杂志。我们编印小报，作为辅助教材。同时，在做中心工作时，对学校进行了视察和指导。再一个是分工负责成立区、乡苏维埃政权，恢复各地党、团组织。我在五区帮助成立五区政府，召开了群众大会，选举产生了政府负责人，代替了旧政权。在土

地革命之前，全县党、团组织，几乎都停止活动。此时就必须结合政权建设、土地改革、赤卫队组训，以及其他各项组织动员工作，整顿恢复各地党团组织，以便作为核心，领导各项工作。我在我家所在地四区，帮助进行了这项工作。

## “梨园”岁月

1935年冬，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召开各县教育部长汇报会，会议由该部部长彭飞主持。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徐特立部长，亲自给我送来一纸聘书，要我担任该部第三科科长。当时，陕北特委拟调我做党的工作。由于徐老不让，所以拟回县交代工作之后，即去部报到。由于西北工农剧团（原为列宁剧团，属陕北领导）归中央教育部和中央宣传部领导（教育部管行政，宣传部管业务），教育部第三科主管社会教育，剧团属社教范围。因此，我向徐老提出去剧团帮助工作，加强剧团领导。经徐老同意，即去剧团，并正式担任了剧团党政领导职务。以后危拱之来剧团任主任，我任副职，兼支部工作。在剧团工作约半年多即离去。

剧团，主要是剧务工作。我常常因剧务上的事情，去找宣传部长吴亮平同志请示，也请团外同志写剧本。成仿吾是我们剧团的常客，他热心剧团，常来剧团指导，在演出时，还常常自愿在台上帮助我们维持舞台秩序。雷经天曾给剧团写过剧本，并亲自导演所写剧本。但是，剧本多数还是由剧团自编的，主要是短剧和活报剧之类，紧密结合形势。舞台布景、道具和服装，都很简陋。编导人员和一般演员，文化程度很低，我是最高的，还有几个中学毕业或肄业生，其他只识少数几个字。全体同志（包括我在内）既未受过戏剧教育，也很少戏剧实践，大都为门外汉，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因此，排练比较困难。好在演出剧目的剧情都紧

凑，所以，每次演出还是很受人们称赞的。

我们的演出，主要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央礼堂演出，供机关工作人员看，也常去街头演出；一是到各县巡回演出。在礼堂演出多场，每场座无虚席。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临场观赏，这对我们鼓舞很大。由于剧团在瓦窑堡时间较短，只巡回演出一次。这次由瓦窑堡出发，经永坪、延长城、交口、延川城、文安驿等地，又回到瓦窑堡。每到一地至少演出一、两场，均受群众热烈欢迎和接待。我是既当领导，又当演员，曾扮演过陶錫山、殷汝耕等反面角色。不演出，就指挥后台活动。

我们全国人员，同吃、同住、同行、同演出，没有特殊待遇；因此，团结一致。在瓦窑堡时，工作比较稳定，生活不宽裕。1936年春末，随中央撤离瓦窑堡，转到子丹县。途中不论领导干部、一般演员，也不论大人、小孩和男女，都是自带行李、粮袋以及一部分化装衣物、道具。队员个个还肩扛红缨枪，日行数十里。到子丹县后，中央机关住在县城里，由于城小人多，挤不出住房，我们剧团就住在离城十里的堰上。每次进城演出，都要先派人搭好舞台，然后抬担道具去演出。有时演完节目已深夜，又要带上演出用具，踏黑上山返回住址。说苦也确实很苦，但是大家以苦为乐，从没有一个叫苦的。

## 统战春秋

1936年秋，我带了一名新文字干部去陕甘工委工作，任教育部长。后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省委成立，刘景范和罗迈分别任主席和书记。罗找我谈话，要我任省委秘书长，我说担任不了，未就职，仍任省府教育部长。省委、省府住址，由洛河川逐渐搬至宜君县之店头镇。这是“西安事变”后因形势的变化而转

移的。我虽名为教育部长，但是教育工作却做得不多，主要做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需要加强统战工作。

大约在五个月的时间内，我先后对国民党中、宜、洛、甘四个县的县长做**统战**工作。当我们陕甘地方先头部队由严家沟转移到距甘泉县城约五里的地方时，就暂时停留，做甘泉县长的**工作**。同行者省军事部长曹力如驻城外，我进城找县长。这次统战的目的，主要拟打通关系，做到我方人员能在城内通行。城门内外，戒备森严。我到县政府，得到县长的较为热情的接待，经谈判，县长允许我方少数人员在城内出入。谈判结束，还设宴席招待。但是，该县长表面客气，思想顽固。由于我方机关、部队要继续向南推进，于是就离开甘泉。途中，我担任先遣队的负责人，既是先遣队，又是宣传队，一路书写标语口号，宣传党的政策，扩大红军影响。当先遣队到达目的地——店头镇时，该镇正在演戏，我即藉机登台，讲述“西安事变”及事变后的形势，讲述我陕甘省政府机关、部队转移本地的意图，要求镇民安定，不要惊慌。待大部队到达时，全镇人民安堵如常。

来店头镇后，奉省委、省府嘱托，即进行中、宜、洛的统战工作，先去宜君县。去宜君的**目的**是打通关系，建立我方联络站。我到县城后天已晚，住在一个小店里，随员将介绍信送到县政府。次日，该县长即邀我去县府面谈。县长系陕北人，比较开明，态度尚好，交谈结果，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为开展宜君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宜回来稍事休息，奉省政府之令，又去洛川县谈判收编中、洛交界土匪事宜。在洛川县，我方有工作基础，已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我到洛川县后，住八路军办事处，通过办事处去找该县县长，交涉所带任务。谈判也比较顺利，商定了收编的若干原则问题。

较为棘手的是中部县的统战工作。该县长是陕北人，外滑内

奸，比较顽固。我几次远道去做他的工作，彼此熟悉了。有时我去县府找他，不待传达，直冲而入。他有时请我吃便饭，我也就不客气地领受，但是，统战工作却进展缓慢。直到我最后离开陕甘省府，只达到双方人员可以来往，我可以去该县高小走走。至于成立办事处等，仍在继续商谈中。

在教育工作方面，此时我只做了两件事：开办新文字干部训练班和帮助店头镇第二高小工作。我由子丹去陕甘省时，徐老只给我带一个新文字教师，名叫贺敬轩，他是军队转业干部，在徐老新文字训练班毕业，文化程度很低。我们到陕甘工委后，和工委书记欧阳钦谈论开展新文字工作时，他和我辩论，似有不太赞成的意思，不过，最后还是确定新文字训练班设在下寺弯。我那个助手和我都是教员。课程就是一门新文字。既重教，又重练习。训练班结束后，派回各县进行工作。

店头镇设有宜君县第二高小。我们到达后，就和二高校长联系。拟和校长来往交谈中，逐渐改变学校的教学制度、教学方和某些不适当的课程和教材等，没有采取大改大动的办法。于是，该校在正常上课的情况下，进行了某些改革。二高的工作，是在统战工作之余进行的。

## 边区教育厅的八年

1938年春，我到边区教育厅工作，先管社会教育，后管国民教育。较长期担任厅内党的组织工作。除去赴固林县负责征收公粮和到马列学院学习的一段时间外，在厅工作近8年。主要工作如下：

1、每年一次冬学工作。派人员成立冬学，并视察冬学工作。1937年，我在鲁迅师范临时工作约半年，领导和教学于新设的师范班。入冬接中央教育部通知，要我带领师范班同学，去关

中分区开展冬学工作。这是边区首次较大规模地开办冬学教育。我们到延安中央教育部接受陈正人副部长开办冬学的指示后，带着冬学课本，直去关中分区马家堡，然后派员分赴分区所辖三个县——新正、宁县和淳耀，开办冬学。这里有些地方没有办过冬学，因此，动员学生入学，就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工作。还有筹备校舍、桌椅，以及教员住宿吃饭等，都要安排好，因此，颇费周折。好在我们带去了教员和课本，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准备，简陋的冬学也就办起来了。对三个县的冬学工作，我作了巡回视察和指导。这次开办冬学，成绩较好。特别对大规模地办冬学，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为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和1939年，延属分区十县，继续开办冬学。其他各专区也继续照办。延属十县分东地西地两片加强领导。1938年我在西地负责，39年又在东地领导。这两期冬学，教育厅仍供给课本，并派有教师，由各县具体筹办，我们负责巡视督导。这两期冬学不但数量有较大发展，而且教学质量也有提高。以后几年开办冬学，大都由各专县自己负责，教育厅具体指导，并供给课本和一部分教师。这时，各县都有了办冬学的经验，教育厅的社会教育指导团员，均已分住各县，专门督导，所以冬学工作成为各县的正常工作。

2、注重师资培训。1938年在延安城内首次举办了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我担任了此次训练班的领导。后因敌机对延安的轰炸，教育厅搬至安塞县陈家砭。次年春我在陈家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办了一期社会教育干部训练班。我既主办，又讲课，周扬厅长作了报告。在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教育厅社会教育指导团，我任团长。以后由我写出《社教指导团工作纲要》，并分派团员到各县督导工作。1939年暑假又在延安桥儿沟举办第二次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我去讲过社会教育课。往后几年，大都为教育厅通令各专县自己举办。有时，教育厅派人员视察。1940年我在庆阳专署当



教育厅教育特派员约半年，兼代了一段时间的副专员。其间举办了一次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三八五旅旅长兼专员王维舟，热心教育，亲自来训练班指导工作，对于办好训练班，起了重要作用。

3、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当时教育厅很重视总结经验，各专区、县每年至少要给教育厅作一次工作总结报告，特殊事情，作单行书面报告。教育厅在此基础上作出全年或半年工作总结。有时候在每年一次的县三科科长联席会议上作总结或安排工作。总结中，表扬先进学校、先进教师，鼓励他们搞好工作。1943年，边区教育进行改革，到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时，改革进入高潮。文教大会前后，我们集中力量总结和编写改革中所出现的典型学校、典型社会教育、典型人物。我写过《张家畔妇轮冬学》等文章。为了开好文教大会，教育厅分别派出几个调查研究工作团，系统周密地调查边区教育状况。我带了一个小组去关中赤水调查。此次调查，对开好文教大会，起了一定的作用。

4、具体指导。教育厅对于具体指导各县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各专区、县三科给教育厅的报告和请示，一般都要给书面批复。具体指导，还常常派出人员巡视指导。这样的作法，有助于教育厅对下情的了解，密切上下级的关系。

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各解放区的模范，领导中心，一切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等，对于各解放区都有影响，教育工作也是这样。

## 延安生活

1946年10月，我去延安大学，担任副校长兼党总支工作，分工主管思想政治、党务、人事和总务工作。约半年时间，当我对学校工作开始熟悉、工作刚上轨道时，蒋胡匪军大规模地进攻陕甘宁边区，矛头直指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大学全体人员，在几天紧张的坚壁清野之后，于1947年3月14日整队出发，离开延

安，转移至安定旧城。在这里经过休整以及精简一部分老弱和年龄较小的学生之后，又开拔转移。先拟向北，东渡黄河，后接林伯渠主席命令，要延安迅速西向。学校进到子丹县境之后，辗转陕甘边境各地，最后转到子丹县之义镇川。学校驻在曹家圪塔和张河弯两村，一面休息，一面开始上课，还帮助群众开荒种地。学校暂时得到安定。

一天，前总政治部负责人马文瑞（西北局组织部长）通知，令学校选一批师生成立随军工作团，在收复区进行减租反霸工作，这个团由我负责，约四五十人。我们由住地出发，背着行李、粮袋，有的扛着长枪，向陇东前进。当我们到达环县境内时，马文瑞又指示先到曲子县搞一段收复区工作，待大军打开环县，回师收复庆阳之后，参加接收庆阳的工作。接着，我们便和曲子县委刘泽西书记接洽，确定去本县天子、土桥两区进行收复工作。这些地区经过敌人蹂躏之后，乡村政权和党组织都垮了，有的干部、党员投敌了，有的土地被地主夺回去了。因此，我们着手恢复乡村政权，审查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重新分配被地主夺去的土地，召开大会，批斗反攻倒算的地主和投敌叛变分子。两区工作尚未完成的时候，我解放军攻克了环县城。但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改变了收复庆阳的计划，挥师北上，去榆林地区作战。此时敌人向环县方向集中，有包围陇东之势。在此情况下，曲子县通知我团，迅速撤出陇东，以免被敌人包围，撤不出去。我们马上调集两区队员，向东北方向出发，兼程到了吴旗县。因找不上前总，我们只好在吴旗、定边一带辗转，每到一地，即帮助群众秋收。以后得知延安已东渡黄河。在弄清其东去的路线后，我们就决定回校。约经10余天的行军，我团胜利回到了总校所在地——山西临县吴家沟。回校以后，才对收复区的工作进行座谈和总结。

接着，一个重大任务又来了。陕北各地经蒋胡匪军烧杀劫掠之后，一片荒凉，人民缺粮严重，到1947年底，有40万灾民陷于

冻饿之中。于是，党和政府决定从山西太行太岳给陕北运输十万石救灾粮食。延大接受了组织师生运粮的任务。第一批约200人（以后增加至400人），由我和刘端棻（教务处长）同志领队。1948年1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在雪花纷飞中出发了，向山西南部隰县前进。到隰县后，我留总站工作，大批师生去隰县琼香镇办事处，后兵分两路：一路汾西线，一路赵城磊上线。每线都设有许多小站，延大师生就在这些站上工作，负责收粮、过秤、缝口袋、起运、安排运粮群众的食宿及牲口饲料等，以保证将粮食从汾西、磊上运到黄河东岸各渡口。太岳、太行来粮，大都车运，而从磊上、汾西西运，多系人挑。有些较大的站，每天约有1000辆车送粮来，再由5000民工把粮运出去。因此，工作十分繁重。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所负的运粮任务，广大师生的思想、工作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回校后，我在全校大会上作了运粮总结报告，肯定成绩，指出缺点，表扬了一批成绩优异、表现很好的师生和集体。这时正值我方收复了延安，学校准备搬回延安，遂派人回延筹备迁回事宜。

## 进修马列主义

1948年，因我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全国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这一胜利，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党校（沿用延安马列学院名称）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因此，我被抽调去马列学院学习。我们一行五人，由我领队，于1948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奔赴河北平山县的马列学院。我们经过绥德，东渡黄河，绕过太原，由平遥、榆次经石家庄，于9月底以前到了学院所在地。

马列学院在一个小村里，一切都很简陋，住的是集体宿舍。入学学员都经过测验。全校学员108人，设1个党支部，10个党小组。

组。党小组就是学习小组。我们是第五组，10个同学，我当组长。从入学到毕业，人员未曾变动。1951年7月毕业。院长是刘少奇，曾到学院作过重要报告，学习时间约三年，没有寒暑假，实际等于四年制大学。学院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近代史、中国革命问题和写作等课程。教材是马列著作，也有教师自编的。教师有杨献珍（教务长）、艾思奇、王学文、何其芳等。

学院的教学是单科独进，一门学完再学另一门。大体是先学哲学，次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史、中国问题。由远到近，由抽象到具体。写作课穿插在中间进行。教学方法是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提纲挈领讲课，带启发性、引言性和总结性，不是逐章逐节的讲，而是按单元讲。大量的时间是让学员自己阅读，自己钻研，并进行小组讨论，偶然也有大会讨论。强调学习理论，既提高理论水平，也注意联系实际。

我们在毕业之前，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给人民革命大学作报告。我在军大作过几次社会发展史的报告，可以说是毕业实习。一是每人写了一本中共党史，作为毕业论文。

这是我第二次进马列学院。第一次是1941年，那次只学了半年就结束了。而这次是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问题，因此，收获较大。

## 一身二任

1951年8月，我到中共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工作。1952年中央任命我为西北教育部副部长，但因讨论改部为局而未到职。以后西北教育局成立，国务院任命我为局长，从此一身二任。因教育局是兼职，故未住局办公，只管大事，主持局务会议等，日常

工作仍在西北局宣传部教育处。

1953年初，西教局和有关单位组成教育调查团，由我领队，去咸阳进行调查研究。先调查了咸阳县教育状况，然后重点调查了周陵中学。这次调查研究有书面总结。这个总结被转发全国，供各省参考。1953年和1954年由西教局主持，召开了一次高教会议和一次大学校长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中央高教部杨秀峰副部长亲临指导，并作了重要报告。第二次会议由我作报告。两次会议都很重要，是在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

西宣部教育处主管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着重调查研究，参加有关思想政治方面的活动。1952年，我参加领导了西北大学教师思想批判运动。同时，写出了《西北大学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等数篇有关思想政治方面的文章。1954年以西宣部名义，由教育处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西北区高等学校政治思想状况、问题以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苏联，结合过渡时期，发表了数篇有关的理论文章，如读《中国社会主义各阶级的分析》、《学习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等。同时，还作过多次有关《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怎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专题的报告。所有这些文章和报告，对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都起了一定作用。

## 中央宣传部教育处

1954年10月我到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文教处工作。初设部和处，工作未开展，年底又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任处长。教育处分为高教、教育两处，中宣部教育处如同西宣部教育

处一样，管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普通教育中完成这些任务。

调查研究，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除研究各省报告材料外，还出外系统地调查研究。单就我来说，我曾到津沪一带调查过两次。一次是调查了解普通学校贯彻执行“全面发展”方针的情况，一次是在江苏调查发展农业中学的状况，并写出了《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方针》、《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等论文，在杂志或报纸上发表。为了克服中等学校中忽视政治的倾向，加强党对普通学校的领导，经调查研究，还写出了《克服中等学校忽视政治的倾向》和《党的领导是办好中小学的关键》等论文，亦在报纸上发表。

## 甘肃师大的八年

1958年10月20日，我到甘肃师范大学，接替前院长徐劲同志的工作。因徐未及时离任，故我于1959年初才正式视事，当时学校实行“党委制”，学校内外工作多由书记出面，校长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1962年约春夏之交，正式兼任党委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

1959年春，中央召开大学学校院长会议，师大由书记去参加，回来作了传达。本年又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反右倾会议精神，全校批判了两位同志。1960年甘肃正在困难时期，省上要学校自给一部分粮食，因此，在甘南、山丹办了了两个农场。我去视察过，未发现较大问题。结果，死了数人。总结经验，用人不当。这年，学校传达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又开始摘“右派”帽子。在1962年，传达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的讲话。以上几个传达，除反右倾外，都带有纠“左”精神。1961年，王世泰书记带领省委工

作团，住校一月多，清理左倾，平反了毛、徐等人的问题，处分了个别人，决定调出一领导人。这些活动我都参加或由我主持。本年高教六十条下达，我在全校传达，并组织学习。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作了检查。会后，我详细传达并组织学习了大会文件。在1959年到1962年这一段时间内，我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总结师大工作，精神是纠“左”，但仍有“左”的辞句。同时期我常去中文、历史等系听课，藉以熟悉教师，并指导教务。

1962年师大开始实行高教六十条，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1963年学校进行“三反”运动。大概是这年省民盟通知，在校教师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系批判了一些教师。从1963年起，三次派出文科师生和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为了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首先加强了党委、校委的领导班子和各部、处、室的领导，同时，强调搞好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达此目的，在学校每一次重要活动中，都强调教学质量，不能打乱教学秩序。1963年，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当即对各系的教学方法和活动，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作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我们除提出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外，还强调提高教师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我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作了培养师资的报告。我们还意识到，办好师大的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人员的科学知识水平。因此，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学习业务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经过数年的努力，师大教学秩序上了轨道，教学、科研质量有所提高，学校工作纳入正轨。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这种正常秩序就被冲垮了。

## 甘肃工大的十年

1973年，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马继孔任甘肃工业大学校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任两委副职。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下半年马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工大职务。之后，马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卸去工大书记，由我担任。1978年底马调江西，1979年春我兼任校长。

从1973年元月我到工大上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我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工作的。1973年9月马继孔书记有病（1974年5月马病愈上班），我主持两委工作。当时甘肃省委布置“五反”运动，工大开始进行，由于派性干扰，党委每次开会，有的负责人就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在党委之内，会议开不好。1974年2月我因病住院（1974年5月出院上班），由胡乃耀主持学校工作，开展了较长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论水浒”的运动。中间，有的负责人把运动拉向批判党委书记。此时工宣队二次进校，“手术队”不久也进校。

1971年，“四人帮”把持的全教会，据说工大派人参加了。会议《纪要》对学校有较大影响。什么是《纪要》我不了解。过去教学实行的“老三段”，在《纪要》的影响下实际上被冲破了，按所谓“结合典型产品组织教学”进行教学。这个方法我不懂，仅怀疑它恐怕要削弱基础课教学。1974年全国理工科教材会议后，学校取消了物理教学，把基础课教师分到各系，认为这有利于“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当时，还高喊“以干带学”，提出一年级学生搞设计，强调开门办学。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基础理论教学。还有什么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所谓“上、管、改”。学生对学校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未尝不可，但其用心是使学生矛头向上，造党委的反。



1975年，省教育局组织了学习朝阳农学院参观团。迟群一伙炮制了一个“学朝农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所谓经验。洗恒汉指示兰州大学立即搞了一个十二条“对着干”的经验。我们当时不主张这么干，不得已也搞了一个五条“对着干”的经验。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完全否定“文革”前十七年。他们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四人帮”在《纪要》上加给知识分子的罪名，工大也有影响；但是，我们没有划分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在运动中一涉及知识分子问题，就比较慎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倒台，中央提出拨乱反正。工大紧跟中央，也开展了拨乱反正运动，进行揭、批、查。1977年7月结合揭开洗恒汉一伙的问题，工大联系实际，揭发了学校几个负责人的问题。同时，对于“四人帮”炮制的《纪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清查了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落实政策，平反了许多人的问题；结合批判“两个凡是”，展开真理问题的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高了大家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造成的取消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矛头向上、和党委唱对台戏等现象，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准则”的宣传和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依据这一精神，我们认为，需要把工大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并以教学为主的位置上来。因此，1979年4月，学校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对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转移的条件已经具备。主要标志是：对“四人帮”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查清；校内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也已查毕；对“两个估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落实改革的工

作已基本结束。于是确定学校工作重点开始转移。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我们突出抓了恢复教学秩序、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基础部等工作。恢复各科基础课教研组，改善基础课教学；加强实验室的工作和基本建设，提高实验质量；为保证教学，加速解决教师住房和改进伙食等工作；特别重视了师资队伍的培训，尽量争取到校外、国外进修。鉴于青年教师业务水平较低，特为他们办了脱产一年的进修班。还办了英、日、法、俄四个外语学习班和液压技术、弹性力学等几个专业进修班。为了加强科研工作，校内成立了科研处和石油化工等几个研究室。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与此同时，我们提出并着手进行校、系、组三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建设。在三级组织中，较快地选拔了一批较为“四化”的年轻干部，参加了领导工作。

## 退到二线之后

由甘工大辞退职务到甘肃省政协，虽然一年多，但是，担任副主席只有几个月。因为在省级单位，所以参加省上的活动尚多。1984年2月担任西北师院名誉院长的荣誉职务之后，参加省上的活动就少了。学校的活动，也只是参加一些较大的集会。1984年去北京参加过一次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座谈会。1985年2月在西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编辑委员会成立会。这两个会议都很重要。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很丰富，现在教育上的许多作法，当时都有雏形。因此，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大量编写，广为宣传。

出外参加活动是偶然的，而经常的则是读书、写回忆录和学书法。读书，偶有心得，就写一点。写过《简论唐太宗的用人与纳谏》、《唐太宗的政治思想》、《赵普、吕蒙正荐贤二、三事》、

《见贤思齐》等；回忆录写了《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工作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等；邀写的有《农村学校教师的培训及分配问题亟待解决》、《普通教育要积极贯彻三个面向》、《简谈高师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书法，练学正楷，也习草书。正楷，年轻时学欧阳询，近几年来学颜真卿。草书，青年时学过王羲之，近几年博学诸家之长，尤慕王羲之。两种书法，均不拘泥于字帖。每日临池，不敢懈怠，不是想有什么成就，成一家之体，而只是想通过书法以自娱，乐度晚年。

# 社会教育指导团工作纲要

(一九三九年)

## 一、社会教育指导团的性质

(一) 社会教育指导团是专门指导并辅助各县社会教育的实施。各县社会教育虽然经过很多的努力，但仍不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了确实执行社会教育、进行消灭文盲的教育起见，特组织社教指导团，分别出发各县，集中力量进行工作。

因为它负的责任很大，所以本身应该有它的单独性和专门性。它的单独性和专门性是这样：社会教育工作、消灭文盲工作是它单独的专门的工作，完成这些工作，才算尽了它的责任。各团员不能自动离开职务或者接受他人的调动。

社教指导团员要努力进行社教工作，但不能包办代替各地工作，要有计划地指导并辅助工作。因为一手包办或以身代替，不但工作不好进行，而且不能培养出好的有单独领导工作能力的干部，还可能养成下级进行社教工作的依赖性，相反的社教指导团员也不要依赖下级，听从下级的自流。

(二) 社教指导团的流动性。社教指导团分若干组，在直属各县的各区、乡轮流指导社会教育工作。

社教指导团到某县时，要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区各乡各农村各识字组织中去，进行领导并辅助社教工作，不准留住机关或者某些地区，逃避深入群众的实际工作。但在某些流动的过程中，应该有些适当的固定性。绝对避免事务主义、无中心、无原则的忙碌。

(三) 社教指导团是直属教育厅的团体，与各地教育机关或其他团体，只能在工作上取得密切联系。社教指导团是直属教育厅领导下进行的进行社会教育的团体，它在工作上、活动上要受教育厅的领导，不得受其他团体的支配。但是，社教指导团在执行教育厅总的领导和总的工作方针下，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自动订出工作计划、工作制度、工作方式，进行工作。

社教指导团与县、区、乡政府要取得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共同讨论工作，不要因为自己是单独进行社教工作的团体而骄傲自大，与政府负责者或教育负责者隔离。这样是不利于开展工作的。但在互相帮助、互相商讨的工作进行中，要尽量避免工作上的依赖性或俯首帖耳的倾向。因为远离和依赖都是不利于工作进行。

## 二、社教指导团员的具体工作任务

(一) 扩大消灭文盲的宣传。宣传消灭文盲教育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不进行消灭文盲教育，就不能提高广大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不能提高及坚定群众在持久抗战中的认识与信心。

宣传材料要具体，首先根据当地群众生活习惯、对识字了解的程度和有无疑虑。用群众自己的经验，说明我们消灭文盲的意义，不要开口就是一大套道理。

宣传方式要灵活。懂得群众心理与习惯，先由群众的生活方面说起，不要一开口就是抗日呀！上前线呀！不但引不起他们识字的兴趣，反而增加他们的疑惑心理。另外，多用口头的个别谈话的方式去宣传，利用群众集会去宣传，让消灭文盲形成一个群众运动。

(二) 整顿及健全社教组织。要整顿并健全社教组织，就要先检查一下过去的工作。有哪些识字组、夜校、半日班上课，组员、学员实数有多少；有哪些不经常上课，组员、学员人数各有多少；有哪些根本是空架子，不能进行工作，困难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查出原因，对症下药，探求改进的办法。

### 1、整顿及充实识字组

(1) 充实原有识字组。没有经常上课的要经常上课。

(2) 建立模范识字小组，使它对其它组起模范作用。模范识字组的条件：

(甲) 全体组员经常上课。

(乙) 组员识字多。

(丙) 组员能单独发展新组员。争取完小，模校领导的识字组，为模范识字组。

(3) 利用小学、儿童团、少先队以及各地方机关和团体的俱乐部，扩大宣传，说服文盲识字，特别着重青年妇女的识字。

(4) 训练小先生。帮助完小、模校、普通小学培养训练小先生，组织小先生工作团，有计划地教识字组、夜校、半日班。

(5) 选用坚强的识字组长，固定教学对象。

(6) 教学新千字文，由文盲到半文盲（识五百字的）念第一、二册，由半文盲到非文盲念第三、四册。

### 2、整顿及充实夜校（本年社教的中心工作）

(1) 保证原有学员经常到校，尽量吸收成人、青年男女入学。

(2) 开始识字的每天平均要识二个字，已经识过字的每天平均要识五个字。

(3) 教学新千字文，按识字多少，适当地分配给一、二、三、四册，并应分班教学。学员识够500字左右的，可允许毕业，并转入夜校高级班（完成1,000字）。

(4) 尽量帮助完小、模校办夜校，争取学校领导的夜校为模范夜校。

### 3、整理及充实半日班

(1) 保证原有学生经常到校上课。

(2) 半日班的学生如能按时到校，可随同小学生上课，如果不能时，可由小先生教，教员从旁指导。

(3) 尽量推动小学开半日班。

4、建立民众俱乐部。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如市镇区乡政府、完全小学、模范小学所在地，建立民众俱乐部。已经建立起的民众俱乐部，应尽量帮助进行工作，充实它的内容。在俱乐部里定期报告时事、通俗讲话，并准备一些娱乐器具、乐器、象棋等，有计划地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提高群众的识字教育。

5、充实已经设立的民教馆，建立新的民教馆（或室）。已经建立起的民教馆要设法充实内容，推动工作的进行。新建的民教馆，必须设立在人烟稠密的市镇。民教馆应办的事情如下：

(1) 设立图书报章阅览室，图书报章要通俗适用。

(2) 开办夜校。

(3) 领导识字组。

(4) 开办妇女半日班。

(5) 定期出版墙报。

(6) 设立代笔问字处，代民众写信，回答民众向来不识字、不明白的问题。

(7) 开晚会，定期举行晚会，演戏、唱歌、通俗讲话。

(8) 备置各种乐器，各种游乐器具。

(9) 规模较大的民教馆，可设主任一人，干事一人，规模较小的，只设干事一人，管理本馆一切事务。

6、识字组、夜校、半日班、俱乐部、民教馆等组织虽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工作——为消灭文盲而努力，一定要固定教学对象，并且切实考查学员识字有多少，有计划地教学新千字文，有目的地完成半文盲与非文盲的教学。

7、识字组、半日班、夜校的领导，除过直接教学的由团体内人员负责而外，特别要抓紧建立领导系统，当然全乡的识字

组、夜校、半日班，由乡文书负责，但为加强领导起见，需要选出行政村的社教领导人，由各识字组长、夜校教员、半日班教员共同选出。该领导人对乡文化要负责，对各社教组织要时刻抓紧检查。乡对区负责，区对县负责，县对教育厅负责，建立严格的领导系统，推进社教工作。

8、开展自我批评，争取广大的群众到社教组织中来。

(三) 每个团员每到一工作地区，要负责教学员识字或者教识字少的组长，由组长再教组员，时刻督促检查进行工作。这是每个团员中心工作之一，一定要有信心地去完成。

(四) 督促并帮助县区乡政府、各地小学进行消灭文盲的工作。县区乡政府、小学校，往往因自己的工作忙碌而放弃消灭文盲工作，或者消极怠工而不去作消灭文盲工作，社教指导团员要积极督促并帮助其进行工作，时常巡视并检查。在教学上、工作方式上、教育计划上都要直接协助。

(五) 培养当地领导社教工作的人员和干部。干部决定一切，特别在今年的消灭文盲任务中，干部更有重大的意义。没有很多的热心社教工作的干部，消灭文盲工作很难完成。过去进行社教工作，在农村中没有培养出很多很好的领导社教工作的人员，即各级教育负责人也大都忽视社教工作，因此，使社教工作不能很好开展。今后进行社教工作，特别是今年消灭文盲的重大任务，指导团员必须注意培养当地领导社教工作的人员和干部，使下边的社教工作者确实能够名副其实地领导社教工作，完成任务。如果忽视当地社教人员和干部的培养，便不能巩固已有的社教组织，若指导团离开，组织便有停止的危险。这是指导团工作的重要一环，需要极大注意。

### **三、社教指导团的领导工作**

#### **(一) 领导原则**

1、民主集中制：各种工作都要经过大家讨论，在会议上决



定。在决议之前，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是问题一经会议通过后，大家就得服从议决案。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议决的问题，负责人有集中执行的权利。如果有意见，应该向组织上建议，但在未得到组织上的决定之前，仍应当服从议决案。执行议决案不应该消极怠工或向群众自由宣传，破坏议决案和领导人的威信，妨碍工作的进行。

2、抓住中心工作：在领导工作的过程中，要按工作的需要分出若干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需要分出主要的与次要的，即抓住这个时期工作的重要环节，紧张地去执行和努力完成，并配合需要的若干工作，围绕在中心工作周围去一并完成。

在执行中心工作的时候，要注意没有计划的东拉西扯的事务主义的毛病。因为力量注意到小的方面，琐务方面，而放弃原则的中心方面的努力，就不能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

另外，在执行中心工作的时候，要反对一般化的平均主义的作风。因为一般化的平均主义的领导方式容易分散力量，使工作不易推进。

3、配备适宜的干部：工作环境有好坏，有难易，干部能力有强弱。在分配工作时若果不注意这些问题，必因干部不适宜于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产生许多困难和障碍，终因不能克服困难、打破阻碍，而妨碍任务的完成。因此在明确分工时，必须根据某些地方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配备适宜的干部，用战斗的精神，通过复杂的工作过程，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

在分配工作时，了解某些具体环境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干部的审查、熟悉，更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合理地分配干部。我们要反对不审查干部，不熟悉干部，不了解某些工作地区具体情况，而盲目地无计划地分配干部工作。

4、具体的领导：一切形式的公式主义，如平均主义，千篇一律主义、教条主义等，都是具体领导的反面。所谓教条主义，

就是对不同的时间、环境、事情和不同的人，都按照一定的样本公式、同一的口号、同一的方法、同一的态度去对待。

具体的领导，要反对那种一定的样本公式与缺乏空间性时间性的领导方式。具体领导不是放弃总的任务，也不是背诵总的方针，而是在总的方针与任务下，把他们运用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就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地方、人群、时间、空间，灵活地采用不同的方法、态度，完成总的工作任务。

具体领导的条件，首先要细心地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了解干部，了解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建立巡视制度，细心研究下级报告，不愿意了解下边情况，不细心研究下级报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要坚决反对。

根据巡视的结果，下级的报告，举行工作检讨会，注意讨论工作中的优缺点、经验教训，作出正确简明的结论（作计划时注意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传达下级，督促辅导下级工作的进行。

具体领导与事务主义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事务主义往往陷于狭义的实际主义的泥坑，迷惑了方向，失去了前途。具体领导则有一定的方针，一定的中心工作，利用具体环境，配合适当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

具体领导与那种机械的过分集中的甚至于代替下级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各地区要有能独立工作、不怕负责的干部，方能推动工作的前进。而机械的方式，代替的方式，过分集中的方式，则束缚下级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养成工作上的依赖性和等待性。这样对工作有很大的妨害。

5、有系统地检查工作：这可以推动工作的前进，保证任务的完成。第一，可以识别干部；第二，可以分析领导者本身的优缺点；第三，可以考查工作计划的正确与否；第四，可以揭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原形。

能够使检查工作有效，了解工作执行的程度，必须：

(1) 检查工作不光是看报告，主要的是在工作地区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方式，是不能检查出工作中的实际的好坏的。

(2) 检查工作要成为经常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然后才能及时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如果是偶然的或者事情发生以后再去做检查，那么工作已经受到损失了。

(3)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工作检查要适当地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效的检查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彼此的工作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整齐步伐一致向前努力完成任务。

6、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自我教育完成工作的一种有力的武器。我们的教育干部和教育工作者，要使工作达到高度的效率，必须实行自我批评，坦白地、勇敢地揭发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共同细心地研究错误或缺点的来源，具体讨论改正错误及克服缺点的办法，虚心地改正错误，从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并保证错误的改正。指导团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培养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

自我批评，不是攻击或打击某一个同志，更不是随便给某一个同志加一个不适当的帽子。而是要站在正确的工作立场上，为了工作任务的完成而执行自我批评。即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

7、工作纪律：领导工作，一定要有工作纪律，因为它可以加快工作的速度，可以教育干部，可以完成工作任务。如果没有工作纪律，不但对于工作任务不能很好地执行和完成，并且不能发挥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凡有积极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者，一律要表扬奖励，消极怠工、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一律加以批评。凡是违反群众纪律，破坏政治影响的工作者，都要开展斗争，以便改正他的错误。

## (二) 工作方式

1、根据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要建立社教指导工作团小组集体讨论制度。由小组长召集会议，计划工作，解决问题。因为集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计划工作，解决问题，比一个人或很少数人的意见要好得多。一个人或少数人解决问题，有时只能看到一面，而多数人容易看到问题的各方面，因此，解决问题比较周到，计划工作也比较圆满。

执行各种社教工作，各指导团员要有明确具体的分工，如某人担任某项工作或某处工作。工作分配如果不具体、不明确，就不容易实现工作计划。有了详细的讨论，具体的计划，而没有具体明确的分工，容易犯事务主义的毛病。

工作一经议决，分工已经明确，就当执行，执行就要有人负责。因此要建立社教指导员个人负责制度。没有个人负责制，工作上就会出现散漫的、自由主义的现象，不容易求得开展。

2、根据民主的集体讨论制，就应建立下列各种制度：

(1) 建立每月召开社教指导员的小组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工作计划、工作布置、工作检查等问题。

(2) 要有小组和个人的社教工作计划。这些计划应该分成若干时间和段落，并且每次计划要根据自己的总任务、时间的长短、主观的力量、客观的情况来决定。没有工作计划，必然弄得乱七八糟，变成散漫的无政府状态，收不到好结果。

3、布置工作：在区乡级干部和教员联席会议上，布置及讨论在指导团小组会议上关于社教工作的决定，求得各方面的推进和联系。特别注意在区乡级青教会、乡级青年俱乐部会议上布置工作和经常的工作联系。

有计划地和识字组及夜校、半日班等社教组的直接负责人发生密切关系，时常给他们布置工作，想些推进的办法。

4、建立严密的经常的报告制度：根据工作的计划以及工作

实践的结果，应该按时报告工作组，组员报告组长，组长汇集报告团长，团长报告教育厅。报告的目的是把下面和组员工作进行的实际状况，次第上达到上级机关，使之明了下面的真相。因此，写报告不只是要有条理，并且要详细，多举具体事实、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都要具体详细地提出。对于数目字，应该据实报告，以少报多是最要不得的。不合实际的报告和流水帐式的报告，都是没有用的废纸。

5、工作检阅：要正确了解下面工作的好坏，依靠报告，依靠巡视检查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作按时的检阅夜校识字组等学员识字多少、精神活动的集体检阅。检查可以增强学员学习的情绪，推动工作的前进。检阅要有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在每一个中心工作完结后，在群众容易集中的地方举行。

6、检查工作及检查方式：第一，要在区、乡级政府团体会议上，小组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检查。第二，在检查工作时，应该真切地找出工作好坏的主要原因及经验教训，作为以后工作的参考。第三，检查方法要采取会议或个别谈话。第四，不要片面去检查和了解，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用在社教和群众组织中。

7、建立经常的轮流巡视制度：各社教指导团员，每月要轮流到自己工作地区内的社教组织去工作，不能固定留住某处，任凭识字组长的报告而放弃巡视。

#### **四、社教指导团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一）认识环境：工作者到某一个地方去工作，先要认识该地方的社会环境，如政府对于教育工作的推行程度，群众的文化水平及一般人情风俗等；另外还要认识该地方的自然环境，如地理、交通等。

（二）了解干部：了解工作地区的教育工作或负教育责任的人员的性格、能力、工作情绪、工作困难情形以及干部本身的一些问题。

(三) 深入群众：有了认识环境、了解干部的初步基础，就要深入群众，接近群众，注意生活大众化，懂得该地习俗，能给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

(四) 工作同志要有说服教育群众的精神，反对强迫威吓。经过我们的说服，群众能够自觉，工作更容易进行。如果强迫代替教育，命令代替说服，工作不会开展，相反还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五) 虚心接受政府干部及群众的意见。走入新的工作区域的工作者，往往一时不容易将该地方情形弄清楚。而政府干部是当地的领导者、工作者，他们对于那里的情形熟悉，实际经验丰富，工作上一定要征求和接受他们的宝贵意见。另外斯大林说：“不但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社教工作者一方面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社教工作一方面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尽量地采纳群众意见，不要一手包办。

(六) 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不为困难屈服。作工作一定要有信心、积极性，吃苦耐劳，自始至终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为完成任务而奋斗。

# 张家畔妇轮冬学

(一九四四年)

## 一、官办转民办，坐学转轮学

张家畔是靖边县城所在地，全城100多户人家。去年6月间，张家畔的妇女，由区政府指定名单，成立了一个妇女识字组，共31人。三天或五天集中上一次课。但大家都不愿意，害怕识下字当公家人。姚聚祥的婆姨说：“我一个人，顶不了一天！”加之没有教员上课，又值农忙时期，所以不久就停顿了。

10月初，冬学教员柳勉之同志到了张家畔，她同三个识字组长，串门子拉话成立冬学事情。在拉话中了解到她们的家里活儿很忙，除带娃、做饭、推磨、滚碾、做针线外，还兼开磨房、豆腐房和种地，离不开家，怕误生活，还怕“念了书当公家婆姨”，“不服家庭里面教管”，又认为“死婆姨女子识了字不顶事”。基于这些情况，他们就商定公办转民办，并用多种形式教学。

17日召开家长会议，宣布原来官办识字组要转民办，实行各种形式教学，不误工、不误活，就能识字。大家一听很高兴，当场自动报名参加轮学的就有几十个妇女。公推文教英雄折立舟等八人为教育委员，领导全街识字教育。依照大家的意思，按地区、职别划分六个小组，各组自己选出组长，两天后，各组都开始识字了。他们一面教字，一面扩大学生，后来发展到50名，占全城成人、青年妇女的98%。

他们采用什么办法扩大妇女参加识字？

1、教委主任折立舟，经常拄着拐杖，挨家宣传识字的好处。崔连子不让婆姨去识字，折老就去劝他，他很相信折老，所

以就让婆姨上了轮学。教委陈三元、李海应、赵坤等人，不光督促自己的婆姨识字，并且把附近的妇女也说服来了。苗泽信的妹子16岁了，在轮学里学习很好，教员常夸她，她很高兴，就把她二姨张培连的女子也劝入轮学了。

2、苗泽信的娘，原先不让女儿、媳妇上学，教员就常常去找她拉话。从拉话中发现她爱讲仁义道德，爱名誉，爱说“古庙”，于是就同她拉“孟母三迁”，“岳母教子”，后来她也允许媳妇、女儿天天上轮学，叫她们称教员为大姐姐，并时常对教员说：“要不是你住在区政府，我一定让发莲（女儿小名）跟你住，黑夜好多教她识字”。杨待诒原先也不让婆姨识字，有一次两人吵架，婆姨吵着要离婚，教员给调解和好了，于是他就给婆姨订了本子，让她识字。

## 二、采用了六种教学形式

1、早饭后，教员去上街郝保湾家里，附近的妇女带着书本、沙盘到郝家来，大家坐在炕上学字，没事学一上午，有事先回去；午饭后，教员去下街马金花家里，临近的妇女来这里上课。

5个妇女白天没空，夜里来教员住处学习。这样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轮流教学的形式，是基本形式，包括29个妇女。

2、7个妇女住在识字组长李海清家附近，她们要她教，每天教一次，不论上午下午，有空就教。有时集合在一起，有时个别教。

3、单人独户和娃娃太小不能离家的3人，由识字组长上门去教。

4、8个妇女家里有人识字，又不愿出门，则由家里人教。3人以上组织家庭识字组，教员、组长按计划10天检查一次。

5、一家有两个妇女参加识字，只有一人来轮学，回去转教给另一个。集中教的时候，没有顾上来，由“小先生”回去传授。

6、总结考试，或读报、讲卫生常识时，按上下街集合两组，



分别进行。

### 三、教什么？怎样教

识字是她们的主科，用的妇女识字课本是县委宣传部编的，念完以后，接着就念教育厅编的识字课本。依各人的需要又教给卫生常识，以怎样养娃娃和王大嫂养胖娃娃为教材。或读有关课本，或以《群众报》、《三边报》和《靖边报》为课本。

一般的教学方法是由简到繁，由近及远。数字是用拆字、部首、象形、看图、实物、猜谜识字等方法进行。为了能应用学会的字，就以互相通信的办法，作为练习。初学者要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教，但学会100字以上，懂得笔顺的人，多念些“白歌”，便于自习。这是教员的教法，另外还采用了两个办法，学生教学生。

1、小先生制：妇女有的不敢教别人，怕人说自己逞能，有些又不愿别人教自己，妒忌别人。因之首先在思想上说服她们，把帮助别人与虚心学习定为学习模范条件。开初展用了对偶制，如大的教小的，情意相投的互相教，亲戚教亲戚等。以后互助成了习惯，才确定选举小先生，规定小先生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辅助教学。

2、互相考问：互相考问分两种，一种是小组长、小先生考组员；一种是组员之间互相考。这对于提高学习情绪，十分有帮助。如有一次下街组长余惠敏、上街组长李兰英考组员，评判结果，上街不如下街，急得李兰英险些儿哭出来，此后，他们更加努力督促组员学习。又如杨梅英考王凤英，把王凤英考住了，别人说，“王凤英比梅英大，还让梅英考住了，真该操心才好”，凤英以后更加努力了。

互相考试后，大家掀起了识字的热潮，进步很快。卫生常识教学是从当地婆姨生娃娃的旧习惯出发，进行新法接生的教育，宣传医药效能，反对巫神和迷信。读报是又讲又读，内容是有关

生产、识字、卫生等消息，也讲八路军如何打胜仗，鬼子如何杀人放火，国民党反动派如何造成河南的灾荒等等。

· 教学成绩一般都很好，如李海清一月半识字550个，能写448个，苗招招过去在完小念过三个月书，这次参加轮学1月零20天，识字600百多，会写383个，她们都会写简单的借条、领条和信件等。

#### 四、妇轮冬学生了根

1、妇轮冬学在人们的心里生了根。这一点对于妇女教育特别重要。过去，家长们不放心，或不愿她们识字，她们自己也觉得“死婆姨女子上学不顶事”。有些愿意出来识字的，也遭到社会上的讥议，说她们“失撒”（放荡之意）。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一般都懂得了识字是好事情，公家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把人往好路上引。

她们在古历十月二十三日以后，进行过一次募捐运动，在运动中提高了积极分子的热情，并募得了20多万（边币）文教经费，除一部分作了奖励费以外，还留下一部分作文教基金，这就为妇女识字打下了物质基础。腊月十五日举行奖励大会，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群众的认识，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分子。如过去认为识字是负担的李凤英、马桂英等8人，自动要求组成一个小组，由余惠敏每天教一上午（过去是个别教，或家长教）。又如在奖励大会上，奖励的14个妇女和9个男子识字模范，10个班长、教员和一个模范家长苗老太太。李兰英当场代表上街10几个组员向余惠敏组提出了响亮而恳切的挑战条件：明年（指一九四五年）要做到三点：（1）自动到轮校去学习，（2）每人每月至少学100字；（3）人人纺线线、讲卫生。请折老、刘汉英评判。

2、人力上打下了基础。教员在工作中早就注意了帮助和培养积极分子折立舟、张风楼、刘汉英等人（也注意培养组长），经常表扬他们，一切通过教委会去办，请教他们，把他们当上

级，使之感觉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加强责任心。如在开教委会或组长联席会议时，折老说：“我们教委是东家，柳勉之是我们请的掌柜的，组长们是股东，大家努力工作，才能有成绩！”

在募捐时，由折老带领教委5人，男组代表2人，妇轮代表2人，逐户进行。由于募捐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情绪，所以腊月十五日的奖励大会成了群众的集会，一切都是在教委联席会上决定的。开会时，完全由教委组长负责布置、招待及主持会议，锻炼了他们（她们）的办事能力和兴趣。他们亲身感到自己有职有权，责任心更强了。直到教员最后离开那里时，他们还表示要把妇女识字坚持下去。

为了让轮学扎下根，教员走后仍能照常办下去，所以教员就于返延安前一星期，集中精力把组长、小先生（共7人）训练了一次，除学字以外，教妇婴卫生常识、唱歌、教学法及思想教育（团结互助，耐心虚心……）在训练期间，她们每天都来教员住所学习。经过一、两个月学习、培养及最后一个礼拜的训练，她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条件。小先生中最多识字1500—1600，会写简单信件、账、便条，笔算加减，珠算单位乘法。组长中最多识1000字左右，最少的500，并且都是纺线能手（识字组长即妇纺组长），为人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

柳教员早就想把轮学工作找一个当地人代替，事先物色完小高二级学生王秉新。王22岁，绥德人，抚属，曾在预备班念过书，国文程度很好，秧歌队吸收了她，并任副组长。柳教员有意使她接近各方面的人和事物，考验其能力和作风。临走前，即提议由区政府供给食宿，请她出来担任轮学工作，恰巧她的丈夫调往草地工作，完小搬家，她又闲着。教委会在县府教员联席会上得了特等第一奖，也切望把工作坚持下去，留不住柳教员，也想另找一个人出来继续办，三方面均同此心，王即应允出任工作。这个工作以后究竟坚持下去没有？这可由折立舟、李海清等8人于今年4月14日给柳勉之同志来信中的一段话找出答案。

“我们的妇女轮学，自你走后，大家仍然照旧进行，只是有个别的学习情绪低落，这大概是暂时的，以后会慢慢克服。”

# 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一九四五年)

两年以来，边区国民教育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了不小成绩，这不但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且主要的表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农村和农民，摸索到了一些联系群众的方法，以及创造出若干适合农村和农民需要的教育形式、制度和内容。这些成绩的获得，初步打下了开展群众教育的基石。我们要发扬它。这里，综合介绍下面几个问题，供各地教育工作者参考。

## 一、形式和方法切合实际

盐池位于边区西北部的一个角上，气候较冷，人家分散，牧畜业和秋庄稼在农业上占很重要部分。那里的大人娃娃，夏秋两季忙，春冬较闲。因此，该县五区一乡三个行政村，就创造了因时制宜的季节教育。每村办了一个春冬学校（他们叫春学，定边叫半年学校），三校共18人，古历正月开学，到放牲口时散学。秋庄稼上场后再上学。娃娃们春冬念书，夏秋做活。这些学校是由劳动英雄牛天业倡办起来的，他热烘烘地到处劝说学生，和人家商议。有些群众不放心，带着怀疑的口吻说：“我们念书倒可以，可是到放牲口时，娃娃们要放牲口，你能保证的话，我们就念”。牛天业自己不敢做主，就找区长商量，区长说：“可以保证回去，不做公家人”。他带着胜利的心情跑回去，给大家一说，学校就办起来了。

定边城东约20里的黄蒿梁，是一片荒凉的沙漠，算是全县人口最稀的地方。有10个小村，共41户，186口。小村星布在沙漠起伏的避风洼里，相距各五六里。人们主要以牧畜和卖黄蒿为生，捎带种点地，没有念书的习惯，更找不到几个识字人。区乡政府

也向来不注意这里的文教工作，认为是无法办教育之区。可是，那里的人民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下，需要文化。自去年提出民办公助政策以后，黄蒿梁的群众不甘心落在人后，因此，就自动地创造了因地制宜的教育形式——轮学。聘请了高福当轮先生，转村上门教学，每月每户轮教二、三次。高同志教学耐心，群众喜欢他，冯占发的婆姨说：“难得这样好的教员！”参加识字的青年男女、儿童共131人，自去年10月25日起，至今年2月底止，最多的识了500字，最少的也识了80个。

定边五区六乡姬原村民小，吃水远，柴禾缺乏，今夏又天旱，形成荒年景象。学董们希望娃娃回家抬水拾柴，帮助家庭生产，因此，学生纷纷退学，学校更加困难了。教员看到这种情况，便和区乡干部、校董及家长商议，把学校形式改变。以校外男女儿童为对象，把全村23个拦牛羊娃娃组织起来，每天中午、下午认一会儿字。再把字写在小木牌上，带到山里，一边拦羊，一边识字，由念过书的娃娃教学。这样以来，学生数目增加了，比原来扩大一倍。村民大家称好，学校巩固起来了。

延川东阳区玉家河一带，人口多，土地少，很多人兼做着流动的小生意，因此，他们需要文化，愿意供娃娃念书。可是那里有的是民小、普小，没有完小，娃娃把初小念完，就只好回家。因为那里离县城70里，过三架大山，道路小，交通不方便，要娃娃们去完小念书，柴米就供不上，因此，限制了娃娃们深造。

模范合作社主任傅天佑，也想叫自己的娃娃上完小念书。他去年在延安开会以后，就打算在玉家河普小附近设一个高级班，解决大家的需要。在一个集上，他找了许多有念书娃娃的家长商量，得到同意的就有18人。今年春初开学时，到了20多名学生。因为该班是初创，所以一切都还困难。学生自己收拾破窑洞作教室和宿舍。县上给派了一位教员，还准备找一些公粮作经费。因此，这个班就搞起来了。

以上介绍的四种形式（其它分散形式，同志们已经熟识了，这里不再介绍），都是新近的试验，特别提出来，供给各地参考。但是介绍这些分散形式，并不是要各地死板地搬运，也不是否定任何适合具体情况的集中形式，而是借以帮助大家多多注意创造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具体形式。我们介绍玉家河高级班创立的意思，也并不是说完小要分散办理，而是说有必要与可能时，为了适应老百姓的需要起见，少数分散办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 二、教学能顶事

“不怕娃娃上学，单怕娃娃荒芜”。这是一般群众对子弟上学的态度。好多次的经验证明，那些教员能忠诚于群众子弟，教得好，娃娃能识下字，解开道理，没有不受到群众的爱护和关心的。反之，家长不愿意供书，学校便不能巩固。我们现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延市场家湾小学当初成立时，某些家长还有点解不开，出一点钱，认为是负担，不积极送娃娃上学。但是当教员把一部分学生从懒惰、顽皮教育到勤俭识礼，从不识字教育到能帮助家庭记帐、算帐写信、打条子时，家长们对学校的态度就根本上起了一个变化，自动地帮助教员修学校、做鞋子、缝衣裳。一个学生的祖母，从来待人很冷淡，不大方，但由于娃娃学的有了成绩，所以，她也自动地关心起教员来了。

延川延水关普小教员李嘉德同志，教学认真，学生进步快，学董说：“自革命以来，调换了16位教员，学生不进步，我们供书没信心。今年李先生实实在在把小孩往好教，这半年识下的字，比以前教员教一年还多”。因此，今年一开学，学生就自动到校。教员每月米薪4斗，但学董为了爱护教员，让每个学生每月还额外送给教员3斤白面，并经常请他吃饭。在缝夏衣以前，每个学生又给了教员斤半棉花，让他缝单衣穿。

## 三、群众自己办学

靖边席麻河民小，去年是个全区集中的普小，学生家有远至80

里的，送柴送米很困难，学校经常发生柴米荒。后来在家长会议上决定，转成民办，分三处经营，席麻河是一处。这样一来，群众认为学校是自己的，儿童入学也方便，因此席小于今年2月开学时，就有27个儿童自动报名入学。在家长会议上，选出高登士等五位家长为管理委员，管理学校。大家动手补修院墙，裹泥窑房。有的家长还送给锅缸，合作社也送给学校一个篮球。他们不但办理目前的事情，而且打算以后的办学基础，在36垧地上，栽培了1,300多株沙柳，估计三年内可以全部解决烧柴问题。县政府拨给20垧学田，由家长们长期种麻子，建立学校基金。又种洋芋2垧、瓜菜1垧，保证学生每年蔬菜自给。还打算秋后，由管委会抽出一人，专搞营业，争取学校经费自给，并救济贫苦学生。

盐池侯建功，把办学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他今年正月间，联名聘请罗敬德去他家教书，当罗去后，别人又不愿意办，但他对教员说：“你只管放心，我给咱办”，父子三人把自己三间房子收拾开，泥好，又对教员说：“你在家里给咱收学生，收东西，我出去给咱办”。他把自己的儿子领上去劝学生，娃娃引娃娃，大人劝家长，没几天，就劝下8个，学校就正式成立起来了。以后学生陆续自动入学，一直增加到18名。学生都在他家吃饭，不雇伙夫。以后学校搬到月儿圈，18个学生在他家吃了20天饭，他什么都不要，只勉强留下学生的吃粮。学校虽然搬走了，但他对学校仍极关心，经常去月儿圈看有什么困难。对教员说：“你有什么困难，只管说，难不住学校，有我一人来当。”

这两个例子，都是说明一个问题，即老百姓愿意办学，能办学，而且能办得好。这点，我想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的。但是，如何才能使校董会长期发挥它的作用？这值得继续研究。杨家湾小学的经验是这样：首先区乡政府对学校的领导不要过分干预，当巡视学校，或指示某件工作时，必须经过他们，虚心倾听人家的意见，启发他们负责去做。在做的中间帮助和提高，以加强其责任心。其次，教员也要尊重他们的领导，处处要把他们当上级，经常汇报工作，请他们到学校来指教，并商量学校一切事宜。

# 试谈普及农村教育问题

(一九五〇年)

我们要在一切方面胜利，政治、军事基本上胜利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还远远赶不上这两个胜利，农村教育更差。为了迎接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上规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对于这一新的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我们要十分重视，特别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更要用严肃的态度对待。

要顺利进行普及教育事业，必先要教育真正作到为人民服务。农村教育要直接为农村人民服务。

在农村教育实施上，应当根据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办学。农村人口一般分散，不象城市集中。然而，就是农村，也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别。大致可分山区、半山区和平原地区。平原，一般地宜办集中的学校；山区和半山区的村庄，宜小集中或分散办学。不宜采用“一个行情到处使”的办法，要因地、因时制宜。

## 一、依据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学校形式宜采取多样化

原西北解放区的农村，一般地分散。但有的十分分散，有的较分散，有少数的却比较集中。在此情况下，就创造出许多不同的教育形式。大体上可分类如下：

普通小学。儿童整日在校读书。各县都设立，城市和大村较多。学生人数各地不一，多的每校50—60名，特殊的400—500名，一般的在20—30名左右。

季节学校。有春学、冬学之分。这是属于社会教育的形式。西北地区，旧历冬春之际，天气寒冷，农事不太忙，加之农村有



设立冬学的传统习惯，因而政府届时大批开办，入学的很多，除儿童外，男女青年占不少数量。

时校，分早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组等。这都是按人口分散的特点，并照顾农民的生产需要而设立的社会教育形式。其组织很普遍。

这些形式，得到人民的拥护，大家交口称便，可供新解放的地区参考。

## **二、在教育制度上也要灵活多样**

要适当地规定学制。城市学制可长些，但农村就要短些，原陕甘宁边区学校就采用这个办法，苏联也是这样。我以为颇适宜。另外还可视经济文化增涨的情况而变通办理。社会教育方面，在情况许可下，因教育形式类别不同，也需要分别规定一定的学习期限。否则，定一个大致的要求（如识字1000字、学会算盘等）也就够了。

在假期上，陕甘宁边区曾采用年假、忙假（秋收和夏收假）和暑假。星期制也不一，有的采取七天礼拜制，有的采取集日制（多行于城镇小学，集日那天儿童回家帮助生产），以便于儿童参加家庭生产。这种按具体情况，规定假期制度的方法是很好的。

## **三、教学方针、方法很重要，应该紧密地联系实际**

教学要与农村当前的具体政治任务相联系。譬如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人民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加强生产，提高文化。那么小学就要以文化为主，并从教文化上教生产知识。有些小学，要多注意儿童的基础知识的教育，以备提高。目前一般的社会教育中，以教生产知识为主，并在此基础上教文化。倘若生产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应以教文化为主，并联系生产知识，进行教育。

儿童教育，要学校、家庭和社会配合起来进行。他们一部分时间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在家庭。因此，只有教员的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家庭教育的配合。家长经常维护教师的威信，引起儿

童的尊敬，激发其努力学习。西北老区曾用此种办法进行儿童教育，值得提倡。

教学要由近及远。不论儿童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都应如此。应该是教学上的一个重要方法。所教知识，应是与儿童生活有具体联系的东西，孩子们容易懂，容易消化。比如教地理课，可由本地地理教起，到区、到县、到省，然后到全国。这样逐渐提高儿童的知识。再如，教成年和青年学文化，先从他们自己的姓氏、名字、本村村名等学起，继之授以新百家姓；庄稼人念庄稼杂字；小商人学算盘、学记账、学打条据；妇女们学针工、线工，学妇婴卫生等。如此循序进行，会收效很大。这些方法，既适用于儿童教育，也适用于成年和青年的社会教育。这些方法，也是西北老区进行儿童教育和成年、青年社会教育的成功经验。

#### 四、要加强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很重要，无论新老解放区的农村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新区思想教育比老区重要，成青年的比儿童的重要。

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不论小学还是社会教育，都要强调“四爱”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四爱”是：

**爱国家**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与过去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不同，它刚刚诞生，还未完全消灭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还帮助蒋介石，同时又挑动世界新战争。因此，农村教育要经常使人民了解新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祖国的繁荣，就是自己的幸福。激发人民热爱祖国，并接受党和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号召：提高警惕，不让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国土。

**爱领袖** 毛主席是人民自己的领袖。他的伟大的名字，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里。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儿童们一开口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为人民谋生存”。老太太们听说毛主席的军队来了，就赶快地去慰问；农民们日日辛勤地耕种自己分得的土地，口里

常念念不忘地说，这是毛主席给他们的，吃水不要忘了打井的人。工人们积极生产，支援前线。这些都是热爱领袖的具体表现。

但是，在农村教育岗位上工作的同志，还要系统地向人民和儿童讲述党和毛主席热爱人民的故事，使之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并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光辉旗帜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爱人民** 加强工人之间、农民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团结，工人阶级是领导者，工农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大多数人的友爱、互助、团结象钢铁一样，那么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们。农村教育工作者要经常教育成青年和儿童，使其知道工人、农民在国民经济建设上的功绩，并热爱他们。积极宣传农民要爱工人，工人要爱农民。使之同心同德，把自己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搞好。

**爱劳动** 能积极地参加建设新国家的一项事业，就是热爱国家的一个具体表现。农村学校和社会教育，要热烈地向农民宣传努力生产，增加收成，并教育儿童和青年热爱劳动，认识劳动是高尚的。同时，经常参加和参观农村的各项生产活动，养成劳动习惯。

**加强国际主义的教育** 宣传天下工人一家人，天下农民一家人，天下工农一家人的思想。经常向农民报导苏联人民热爱中国人民，并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消息，启发群众热爱苏联，向苏联学习。

思想教育，可以结合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也必须结合各种科学的、业务的教育和教学进行。思想教育不单是教育领导者的责任，而且是每个教员的义务，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课外活动进行。

### **五、教师是完成教育任务的物质力量**

我们的事业大了，需要知识分子很多，农村的教师，向来就是供不应求，他们在农村更加宝贵。因而，实施普及教育之时，

首先需要大家重视农村教育，尊重农村教师的劳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关心他们的生活。下层教育领导机关的同志，一定要作好这些工作，保证农村普及教育的实施。

农村教师既缺乏又文化程度偏低，因此，既要办好初师和中师，培养新生力量，又要设法提高现有师资水平。开办暑期教师讲习班，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此外，如果能够把农村游散的知识分子尽多地集中起来，加以短期的训练和改造，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

### **六、领导是成功的钥匙**

实施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是由平原到山区，由城镇到乡村。重视市镇普及教育工作，照顾大村庄，并逐渐地注重各个农村的教育。加强小学的领导，稳步地推行社会教育。

学校可采取公办、公私合办和民办等形式。搞好公办，大量开展公私合办和民办。在农村较富裕的地方，提倡民办和公私合办；在较穷困的地方，可设立公办或公私合办的学校。这样，在普及农村教育，可以发挥公私两方面的力量，不可不重视。

“干部决定一切”，上级教育领导机关，必须及时培养和训练下级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以及领导工作的能力。如此，方能胜利地达到实施农村普及教育之目的。

# 对于过去教育上经验主义的批判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

我们教育的实施，是以从实际出发为原则的。今天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在此新形势下，文化教育事业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

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比之过去已是突飞猛进了。但是站在国家经济建设要求的立场上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要急起直追，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但要把教育事业顺利地展开，使它能起到所应起的作用，我觉得批判教育上的经验主义，正确地掌握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教育方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经验主义是障碍教育发展的绊脚石，不把它搬走，教育工作是不能顺利前进的。但我们反对经验主义，并不是反对教育上的各种宝贵经验，此点必须分别清楚。

那末，经验主义在教育上的表现是怎样的呢？我想就下列的几个方面发表一点意见，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商榷。

## 一、教育上经验主义的第一个表现是盲目性

教育上的经验主义者不重视调查研究，他们以为自己有很“丰富”的教育经验，对工作非常熟悉，对地方上的情形也了解得“无微不至”，因而就主观地作出结论说，不必进行调查研究我也清楚。因而在确定教育方针、政策和实施办法时，就仗恃着自己那一点实际工作的朴素经验干起来。这样的干，有时也可以干出某些成绩来，但这是盲目的碰过无数次钉子的结果。经验不提升为理论，就是盲目的东西。

他们对于本地情况确实比较熟悉，也实实在在有些工作经

验，这是不能否认的。但这种情况和工作经验是一时一地的，是昨天的。昨天的情况不是今天的情况，昨天有用的东西，今天不一定有用。此时此地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于彼时彼地。因为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而且经常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经验主义者不懂得这一条极浅显的真理，因而就以一时一地所熟悉的情况以及零碎散乱的经验作为万古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处使用。这真像列宁所说的是何等十足的孩子稚气啊！

这种偏向，根据我的经验，在本地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本地老教育工作者中，表现得较严重。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工作久些，而且有土生土长的长处，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不必调查研究我也很熟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因此，在纠正这种偏向时，我以为本地教育工作者应该特别虚心地考虑这一点。

调查研究是应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也是如此。在中央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之后，大家都热烈地响应中央的决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了。在教育上也强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在进行中收到很大成效。于是老气横秋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得不去进行调查研究了。但是他们的调查研究，却往往是形式主义的。这里举出下列两种情况：

第一，光调查不作深刻的研究。例如过去召集某些教育会议时，在会议之先，为了把会议开好，于是派出若干调查调研组，分赴各地进行文教重点调查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得许多材料，可是调查回来之后，只草草率率地研究一下就算了，并未认真地加以研究，从其中找出工作的规律。

第二，盲目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任务是为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经验主义者是不懂得这点的。他们盲目地进行调查研究。例如过去召集某些教育会议，或平时派人做视察工作时，担负调查研究或视察工作的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出去要注意什么问题，调查些什么东西，准备解决什么问题，则是比较模糊

的。他们是盲目的出去，又匆匆的回来。因为是盲目的出去，所以在出去之后见啥就调查啥。从学校所在地的人口、劳动力、畜力、土地、收获量、负担、人民生活水平、风俗习惯等等起，一直到学校本身的各方面止；从学校历史到现状，从学校的各项制度、经费、教职员、课程、教导方法、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一直到每个学生的成份，年龄、性别、程度等等，无所不包。这样的调查方面不为不周到，因为是从历史发展上了解现状，从社会环境中了解学校本身。但是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却并不明确，结果变成了为调查而调查。调查可以详细，也应该详细，但调查必须有目的，有中心，无一定目的和中心的调查，虽调查得很详细，也是徒劳无益的。

## 二、经验主义在教育上的另一表现是狭隘性

关于狭隘性的问题，这里提出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阐述。

1、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是说，当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完成任务。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所要牢牢记住的一个原则。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地执行了这一原则的地方，教育的成绩就大。例如过去实行农村教育，其内容和形式都要从农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在这个原则下，下面创造出很多具体办法：学生认字先从自己的姓名和村名等开始，妇女识针针线线等字，农民学锄镰铧耙等字，做买卖的学记账和打条据等等。总之，都从自己接近的东西学起。这样做是容易学会，而且能够用得上。再如完小教地理先从本村本区本县的地理教起；教历史先教本地的革命历史故事；教国文先教如何打条据，如何写信，如何写总结报告等等。这些教育方法都是很好的，因为它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并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从实际出发，并不是停止于狭隘的农村实际，还必须做逐渐提高的工作。上述那些方法，只能作为农村教育的起点，而

不是它的终点。所谓只能作为它的起点而不能是它的终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在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逐渐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参加学习的各种成分的学生，不但要他们认识几十几百甚至几千日常所需的单字，而且要他们学会使用，并渐渐增加其他一般知识。完小里不但要教本地地理，而且要有系统地教授本省本国并渐及全世界的地理。教其他课程，也必须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可是有些地方在执行前述方法时，不但把它作为教育上的起点，而且作为教育上的终点。老是唱一个调子，上半年是如此，下半年也还是如此，甚至今年是如此，明年也还是如此。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教育的效能。

2、学校应向学生进行生产教育和教导他们从事劳动生产的实际活动。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进行这样的教育，可以养成学生尊重劳动的观念，培养他们的群众观点，并使他们亲身体验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伟大意义。我们过去是这样作的，今天和以后也还要这样作。

我们进行生产教育，在经济上也起了极大作用，增加了教育经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因为学校进行生产教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生产热忱，并通过学生，又把学生家庭和一般群众的生产活动也带动了起来，增加了解放区的收成。

但在进行生产教育中，也曾出现不少的偏差。首先是在某一个时期，教科书中生产教育的课文太多，几乎整本中堆满了生产篇幅，一部小学国语读本，简直就是一部生产工作手册。其次是把生产教育一般化。城市学生的生产劳动习惯，较之农村学生缺乏，故应加强生产劳动的思想教育和实际活动。而农村学生一般比城市学生有更多的劳动习惯，故不必特别强调学生的生产思想教育和参加实际生产活动，而应该加强基本的文化教育。但是过去进行生产教育时，不管城市学校、乡村学校，都是一般的要求和进行。这是不适当的。第三，向学生进行生产教育，一般讲应



着重思想教育，并适当地辅之以生产实际活动。但是有许多学校却是轻重倒置，为了增加经费收入，偏重于让学生参加生产实际活动，把学校变成一个工厂。在总结工作时，学生的生产成绩很大，但其他学科的成绩则很不理想，这是在生产教育上表现的狭隘性。

3、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态度问题。我们了解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是为了批判它、扬弃它、不能作它的俘虏。“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脱离实际的教育方法，则不能很好地开展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广泛地开展改造旧教育的工作，因此对旧教育的了解，更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去在老解放区作教育工作的一些同志，从不注意了解和研究资产阶级的教育，只抱着鄙视的态度，简单地否定它，把自己关在小屋子内，进行自己的教育工作。

这种作风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使我们的知识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眼光不锐敏，是非分不清。明明人家拿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我们解放区实行，但我们一些同志还认不清楚，甚至跟人家跑，作人家的俘虏。这点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在今天提出来仍有益处。

批评旧的，建设新的，这是一种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一切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武器。今天改造旧教育，实行新教育，是一个很迫切的任务。要从改造旧教育中学习，从学习中提高新教育。反对保守观点，打开大门，放亮眼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旧教育，或对它不熟悉，那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具体的改造工作。

总之，一切事物都是联系的发展着，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不变的东西，我们的革命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就不能把教育工作人为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让它不变化（联系）不发展。这

是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而狭隘性的特点恰恰是违反这一规律的，它把事物的联系割裂开来，凝固地看事物的发展，以部分当全面，以保守为能事，以无知当有知。这是提高教育的大障碍，必须彻底克服。

### 三、经验主义在教育上的再一个表现是教条性

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不同，前者把经验当成教条，后者把理论当成教条。但是不论经验主义教条也好，理论教条也好，都是把自己的条条作为唯一的尺度，不看情况，不看历史条件，不看对象地运用。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经验主义者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指导工作，不从本质上看问题，割裂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当确定本年度学校数目时，则以累进的办法确定学校的数量。他们以为去年办了那么多，所以今年当然应该办这么多，按比例增加。诚然，确定学校发展数目，应该以去年的数字作参考，但这不是主要的，而真正的并且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是：人民的经济生活、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等发展的情况。但这一点对于经验主义者却是不重要的，他们只以逐年的比例来安排。再如城市人口集中，文化程度较高，其他条件也与农村不同，因而容易开办学生比较集中的学校，学校制度也易于正规化。而农村人口分散，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且生产忙碌，因而宜于开办分散形式的学校，教育制度也要十分灵活。但经验主义者忽视这种具体情况的区别，把城市办教育的经验搬到农村里使用，不适当地强调成立乡学和区学。学生不入学，就实行强迫。当发生了这种倾向，并提出分散的农村要办分散的学校时，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不但在分散的农村办分散的学校，而且在大村庄和城镇也强调办分散的学校。于是分散的学校林立，使领导上不能兼顾，降低了教学效能。前一种倾向是把乡村当成城市，把乡村与城市等同起来；后一种倾向是把城市当成乡村，把城市与乡村等同起来。不是典型的教条是什么！

总之，教条主义者看不见事物有什么差别，任何东西对他都是一样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失去了锐敏感，新出现而有前途的东西他们看不见，旧的东西合法存在也不及时纠正。总是墨守成规的干，此时此地用此种方法工作，彼时彼地也用此种方法工作，今年是如此，明年也是如此。这一点与教条主义者有共同点。这就使教育工作陷于停顿的状态，长久地保持低级的水平。一般化的工作作风，是工作发展的敌人，必须时常注意纠正，应极大地发挥教育上的创造性。

#### **四、经验主义在教育上的又一表现是事务主义**

事物主义者并不是不做工作，而是不会做工作。对工作无远见、无计划、无重心，哪个应该先做，哪个应该后做，哪个应该多做，哪个应该少做或不做，弄不清楚，只是本能的忙忙碌碌的工作。事务主义盲目性的表现就是如此。以下举出两种情况来详细谈谈。

1、过去教育领导上表现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不论教育行政部门也好，学校行政也好，经常吵着和忙着经费问题、干部问题。自然，这两个问题在教育行政上是很重要的，不能说干这两宗事情就是事务主义。但问题在于有些教育行政负责人经常忙于这些问题，而忽略了教育上的根本业务——教导工作，教导部门的干部很不健全，而事务部门的干部则叠床架屋。在会议上讨论经费、干部问题多于讨论教导工作。这就是领导方面的事务主义作风。当然，经费和干部问题对教育工作有很大关系，若得不到适当解决，会妨碍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是一种轻重倒置的作法，必须纠正事务主义的作风，加强教育理论的学习，加强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研究，总结经验，提高教育工作效能。

2、因为有些学校行政工作用事务主义的方法去作，所以反映到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事务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的特点就是忙乱，忙乱表现在学生的会议特别多。学生很

多时间化费在无味的“讨论”和“检讨”上。这种忙乱的作风，不仅表现在大中学校中，而且表现在小学中。应该予以纠正。

以上就是我对经验主义在过去教育上的几个重要表现的阐述。这足以说明经验主义在教育上表现的严重了。这些表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主要的有下列三点：

首先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它的基础是个体小农经济。个体小农经济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进行的无计划分散的简单再生产。基于这样的生产关系，就产生出农民意识上的盲目性、保守性和狭隘性。我们的教育工作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并且许多教育干部出身农民家庭，因而很自然地就把小农的思想反映到教育工作上来了。

其次，由于教育干部只是单纯地从事教育工作，并未认真地开展系统的教育研究工作，他们有工作的习惯，但无研究的兴趣。虽然经常有工作总结，但总结并不深刻，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因此，使他们经常保持在经验的水平上。

再次，许多教育工作者文化水平很低，各科常识极其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更是贫乏。因此，他们不但没有研究教育工作的兴趣，而且缺乏研究教育工作的能力。

教育上经验主义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些。以下再略谈克服的办法。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不同，但其危害工作则一。因此，我们要坚决克服教育工作中的经验主义。树立科学的工作作风。克服经验主义的方法：第一，积极地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养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是应该受教育的”，这是非常对的。从学习理论上克服经验主义，是治本的办法，大家应该深刻领会这一点。

第二，加强教育政策的学习。我们教育政策的教育，往往不

能下达，很多下层教育工作者不了解。因此，实际活动常与政策脱节，常常不自觉地违犯政策。进行政策教育时，要教育工作者彻底了解政策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具体执行政策的方法。

第三，改造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改造思想要从改造工作入手。把工作的优点和缺点弄清楚了，思想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若泛泛地谈搞通思想，那是不够的。

最后，要按级具体指导工作。下层教育工作者，知识和能力都很不够，靠他们独立地提高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各级教育领导机构，必须特别注意具体领导，帮助下级分析问题，解决困难。这样做才会更有益于工作。

克服经验主义是个长期的任务，不应该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但也不应以此为藉口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

#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一九五二年)

毛主席曾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了正确的估价。他在1939年所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区别。这个指示很重要，它是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是治人的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因而毛主席屡次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这也就是毛主席对中国知识分子估价的一个方面。

毛主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估价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除少数民族败类外，其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实起过重要作用。解放三年来，全国知识分子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做了许多工作，西北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少数一部分忠实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效忠而不要说外，其他广大知识阶层，也还是有很多弱点和缺点的。因此，毛主席又作了另一方面的说明。他在《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特点的描绘，为各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表现所证明。解放前夕的西北，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挽救其灭亡，曾对西北知识分子横加毒害。因而，解放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很不健康，多少阻碍了自己的进步。但是，经过三年来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今天大规模的思想改造之后，他们的政治思想已大大改变了。

由于我们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看法，所以历来就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即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今天来说更为重要。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西北区三年来遵循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以及在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之下，对知识分子作过许多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获得了不少的成绩。知识分子面貌也为之一新。

首先，三年来我们西北分别举办过几次寒暑假学习会，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如去年有80%以上的中学教师和70%以上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寒暑假学习

会。今年中学教师及一部分小学教师规模更大、更集中地参加暑期学习会，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批判，收效很大。参加的中学教师共5,879人，占全体教师人数(6,986)的82.7%；小学教师共23,679人，占全体小学教师人数(62,660)的百分之37.8%。今年冬季争取其余未参加过学习的教师全部参加学习。这样就不同程度地批判了旧思想，接受了新思想，从而提高了政治觉悟。

在今年春季“三反”运动的基础之上，西北各高等学校也开展了热烈的思想批判运动。时间约5个月，这一思想革命的自觉的教育运动，受到教师们的热忱欢迎。这是解放三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因而他们进步很大。参加本次思想改造学习的高校教师共1134人，除少数因故未参加者外，其余全部都参加了，运动轰轰烈烈，始终如一。

解放以来，经过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过的知识分子将近万人。这对西北的各项建设事业，有重大的作用。

其次，动员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革活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等。这些运动对于没有经过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们具体认识了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因而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土地改革中，体会到地主剥削农民的残忍，农民有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具体地知道了不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就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因此，有人说：参加一次土地改革，等于熟读十年书。“三反”、“五反”运动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启发，认识到我们党是真正反对贪污浪费的，而且能够反好，过去国民党是做不到的。对于共产党员犯了贪污错误的一样受到处分这点，尤其感动，认为我们党真正大公无私。因此，他们进一步体会到党的伟大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惊人才能。

第三，动员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实际工作锻炼了他们。参



加实际工作的锻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因为国家各项建设的突飞猛进，西北某些经济设施的兴工，大大地教育了他们。譬如，全国物价稳定，治淮工程竣工、天兰路通车、社会就业解决等等，使他们深刻感到共产党真有办法，真是为人民办事的。因而，态度大大地转变了，由以前根本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转变为“真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赞扬了。于是，许多教师工作积极了，改变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拿一分薪金做一分事”的雇佣思想。许多老教师异口同声地这样说：“我虽然年纪老了，但要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到底”。

思想改造有两方面的意义，这就是肃清反动的思想，批判落后的思想，而建立进步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特别是今年的大、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批判，给各种反动思想如买办思想、封建思想（反对土地改革）等以粉碎性的打击，使他们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反动思想对新中国的危害性，从而划清了敌我思想界限。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利于人民事业的坏思想，如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超政治超现实的思想，单纯技术观点，宗派主义等，也给了严肃的批判，从而又划清了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某些落后思想，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同样给了适当的批评。这样作对于人民事业是有利的。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大量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表示了高度的忠诚，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感到这样作是对的，既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又有利于巩固人民事业。如果说，过去有许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或不太知道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而现在却比较明确了，并且已经粗具了运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说，过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我们党还不了解而采取观望态度，而现

在已经在理智上确切了解到我们党确实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因此而靠拢了党，迫切地要求党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以求得不断进步。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大批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发现了一批确系有知识、有技术，并且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和小学教员都有。他们将会对人民事业起更大的作用。我们今后更要多多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以发挥他们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智慧和作用。

这些成绩的获得，新的面貌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第一，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有正确的政策和方针。正确的政策和方针是思想工作胜利的前提，这是基本的。但是，当正确政策和方针确定之后，就要依靠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的正确执行，没有这一条，同样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因此，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与正确执行政策和方针，是我们西北三年来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中，西北各级党和领导干部特别注意了统一战线工作，尽量吸收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中的进步教授、专家、名流，参加领导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完全自愿原则下，一部分同志带头批判了自己，因而大大推动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也邀请并动员了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一齐投入到运动中，因而，更壮大和加深了运动的阵容和深度。这也是获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改造和要求进步，因而才能使思想改造工作形成热烈的自我活动、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运动。没有知识分子自己的觉悟和努力，要获得思想改造工作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西北三年来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证明了下列几个问题。这些

问题，也是我们领导方面和全体知识分子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一，知识分子是完全可以改造的，而且一定会进步。只要我们从爱护的立场出发，反复讲清政策，讲清思想改造的具体方针，以及国家的迫切需要和知识分子自己的前途等，并采取和颜悦色与真诚相见的态度，根据不同对象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出适当的要求，杜绝简单急躁、以改造者自居、或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态度，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完全可以变成他们的自我教育过程。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真正收到思想改造的最大成效。正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才收到显著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坚持，并补充新的经验，贯彻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中。

第二，今后应将短期的带突击性的集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经常的以在职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经验证明，学习会、短期训练班等方式，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有极重大的作用的，但要巩固成果，并继续提高，则光靠这种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之上，加强经常的在职学习。否则，“一曝十寒”，会减弱集中思想改造的成果。而且今后应该多注意正面的政治理论教育，如毛泽东思想、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当前各项重要政策、国内外形势等教育和学习。通过正面教育解决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和政治认识问题。

第三，参加各种实际运动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有力方法之一。实际斗争是最好的教育。知识分子亲身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活动，既进行了思想改造，又巩固了改造的成果。改造与巩固完全相结合的方式，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有效的办法。因此，今后应给知识分子以更多的参加实际活动的机会，特别要给学校教师们更多的机会。

总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几年来的工作只能说是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方面仍要及时抓紧这一工作。而知识分子自己，也不要骄傲自满，认为已经改造好了，必须进一步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政治和学术相结合，教学 and 实际相结合，继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完成人民所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

# 革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问题

## ——在西北大学毕业生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二年)

大家就要毕业了，我讲几个问题。

### 一、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人材，你们毕业出去工作，给国家增加了一批力量。大家经过四年的学习，具备了较高的科学知识。解放几年来，你们在许多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干部决定一切”，这是苏联提出的口号，后又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在苏联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没有人材，没有技术，是不能建设好国家的。要能胜任工作，光有知识不行，还要有政治思想觉悟。你们大家政治思想上有提高，但是人生观的问题不一定已经解决了。要出去做好工作，还必须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人生观问题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得了，不是讲一次话、读几本书就能解决的，必须有较长期政治理论的修养和实际革命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解决。

### 二、人生观和阶级性的关系

1、什么是人生观？概括讲来，就是人对人生和社会的总看法。人们对人生和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旧社会时的读书人，一般说来，大都希望由小学、中学毕业混张文凭，给旧统治阶级服务。有钱人家子弟读书，还想望上大学、留洋，取得更高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也为旧统治阶级服务。《儒林外史》讲读书人追求秀才、拔贡、举人，甚至状元等等。他们的人生观，就是作官。佛教徒认为生、老、病、死四苦，看破红尘，

想成仙成佛，皈依如来佛。尼姑当女和尚，终身不嫁。五家坡薛平贵回窑，王丞相的女儿王宝钏守寒窑。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人生观。另外，《水浒》上讲梁山泊的108将起义，反对地主封建势力，进行革命。他们提出“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等，这也是他们的人生观。

2、人是社会的人，同时是自然的人。因此，在阶级社会，人是有阶级性的。因为人离不开自然界，所以也是自然的人。因此，人是社会的人，又是自然的人。没有单纯社会的人，也没有单纯自然的人。人生存在自然界，离不开大地、日、月、星、辰，还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殖传宗等等。人生存在社会上，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由此产生出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革命等关系，还有亲戚、朋友关系。

3、人生观和阶级性是统一的。什么阶级的人，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比如地主阶级，对农民要剥削，他们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穷人受苦受穷是天命决定的。“杀不了穷人，当不了财主”，这就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和人生观。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利润、再利润”，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与金钱的关系。法西斯蒂的人生观，就是“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也是这样。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也是他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还有蒋介石、四大家族，多年来反共反人民。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这也就是蒋介石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道德和人生观。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反人民的人生观。

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与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有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与大生产联系，大公无私，一无所有，它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它的科学的人生观，即共产主义的

人生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多年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员舍己为党，为人民，就是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有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即共产主义而斗争。

### 三、青年要建立革命的正确的人生观

1、什么是革命的正确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祖国，这就是革命的正确的人生观。从事工作，要有“磨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不论把自己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应一样工作，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同时，还要建立远大的理想，即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青年要有这个理想，要向这方面学习和努力。

2、如何建立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这里讲两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观。有了正确的宇宙观，才可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青年人要使自己的人生观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人生观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而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阐明了这一规律，提出唯物史观理论。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由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社会性的统一来代替）。马克思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剩余价值的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马克思又研究了法兰西革命和空想社会主义，阐述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已由苏联历史所证明，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前途，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作保证，亦将会被证明。

因此，青年的人生观，必须符合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建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努力。这样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反之，都是不正确的非革命的人生观。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才能建立起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

(1) 幻想和理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于幻想，想这想那，想入非非。在思想改造时，有些同学暴露出一些幻想，幻想发财，拾黄金，晚上就梦见拾到黄金；有的幻想将来当“专家”、“教授”，把屋子收拾得如何好，布置得如何漂亮，象花园一样。你们在毕业分配工作以前，也一定有各种各样想法，也许很具体，很微妙。但是，分配不如意，将来工作不满意，就可能发牢骚，甚至悲观失望，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幻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就富于幻想，他们幻想革命一个早上就成功。但当时局一逆转就悲观失望，离开革命，中国过去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对小资产阶级的这种特性有过精彩的描述。当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情、敏感、积极、有知识，这是好的一面，我们绝不能全面否定。

幻想是弱者的表现，因为他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工作规律，怕做艰苦的工作，因而以幻想代替现实，以满足其虚无的欲望。无产阶级有理想，没有幻想，他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以革命斗争实现其共产主义人生观。我们要以理智代替幻想。

(2) 自由与纪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遵守纪律、服从统一领导不自由，只有个人行动，才是自由。有些同学感到毕业统一分配不自由，按个人的欲望分配就是自由。个人完全自由，对国家、对大公则是不自由，对人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毕业统一分配，对人民事业最有利，是人民的自由。你们是人民的一分子，因此，应该说对自己也是自由的。在旧社会，从学校毕业后国家不管分配，自己去找职业，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并不

自由。找不到职业，就只有饿肚子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找不到职业，是司空见惯的。侥幸找到职业，为旧统治阶级服务，要服服帖帖。我看这才是不自由。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中，没有找不到工作而饿肚子的现象。

什么是自由？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事物发展规律，懂得工作规律，遵循这些规律办事就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不懂得事物发展规律，只凭主观想象，“瞎子摸鱼”，就会到处碰壁，那才是真的不自由，这点大家要深刻理解，做个真正的自由人。

(3) 个性与共性。这里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毛主席说个性有两种，一是建设性的个性，一是破坏性的个性。我们要发扬建设性的个性，克服破坏性的个性。因为前者与共性一致，适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工作的客观要求。亦即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是建设性的。在共性的原则下，应当尽量发挥个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者则需要克服。

无产阶级不但主张发展个性，而且把发展个性同解放个性紧密结合起来。譬如地主压迫农民，不能发展农民的个性，发展生产力。而我们目前就搞土地改革，推翻地主统治，解放生产力，发展农民的个性。正因为农民的个性解放了、发展了，所以劳动英雄层出不穷，生产力也不断得到发展。工人阶级个性解放了，工厂生产的发展，更是十分明显的。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受压迫的尼姑、妓女的个性，在新中国的今天，也都解放了，他们找爱人，组织家庭，或者参加各项工作，正在发挥她们固有的个性和积极性。因此，个性的解放和发展，必须服从共性的、集体的解放和发展。

大家懂得了上述各点，所谓兴趣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只要忘我地为人民事业服务，一切工作都会做出兴趣来的，做出成绩就会更有兴趣。如果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即是本来有兴趣的事情，也会感到没有兴趣。



(4) 学用一致问题。我们的教育要与实际联系，要学以致用。这是我们的教育原则。大原则可以这样说：学教育的出去搞教育，学理工的出去搞理工，学其他的搞其他。但是，目前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不一定分配得那么恰当，完全适合自己的所学。因为第一，国家各项建设虽然要有计划地进行，但是计划工作才开始搞，不一定做得很周到；第二，旧社会是“僧多粥少”，今天是“僧少粥多”，各方都需要人，不敷分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工作不一定能做到完全合理。当然应当力争基本合理。将来条件具备时，可能做得好些。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将来合理的东西，今天不一定合理；今天合理的东西，将来不一定合理。这就是唯物史观的观点。“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所谓辩证地看问题，就是这样。大家能这样地认识和处理问题，我想你们对人生观的问题，就有了较大的认识了。当然，还要努力修养。目前对待毕业分配，就是最好的考验。

#### **四、如何修养革命的人生观**

1、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认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在理论上要有一个很好的修养。

2、重视实际锻炼。实际最能考验人和锻炼人。你们要在艰苦的实际锻炼中磨炼自己，建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在实际锻炼中，可能碰许多钉子，但是，“吃一堑，长一智”，在长期的实际锻炼中，革命的人生观就会巩固地建立起来。

3、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提高认识和思想进步的动力，如果大家能很好地经常地使用，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大家一定会进步很快。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革命人生观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

## 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一九五二年)

一

衡量一个政党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并忠诚地为人民、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看它能不能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历史，特别是解放三年来国内许多建设和措施与对外政策的一系列的行动，都充分证明了它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我们党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它不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而且因为它在经常的革命实践中，能充分地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断地修正错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我们革命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掌握这一武器，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二

我们鉴别一个工作部门，或一个工作人员工作的好坏，不是从一些官冕堂皇的计划出发，而应从它（他）们的工作实践来考查，这当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能不能认真地贯彻执行党

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也是衡量一个部门和一个同志工作优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能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部门与单位，就会有充分的民主，也就能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作就会生气勃勃，因而成绩也就很显著。没有或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部门和单位，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已为许许多多的客观事实所证明。由此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愈充分，愈适当，工作就愈能发展，愈能收到成效。反之，工作就裹足不前，甚至会遇到重大的失误。这是工作发展的必然现象。

谈到个人工作和修养方面，不论理论修养，道德修养，能否工作好和修养好，也都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没有或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人，工作自然是做不好的，而想把自己修养成一个品德优良、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较高知识的人，也是困难的。没有或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他必然是骄傲自大，甚至目空一切。这样的人，就很难会有较快的进步。骄傲是进步的敌人。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要求得不断进步，就必须去掉骄傲，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得出上面说到的类似的结论，即批评和自我批评较多的人，他的进步和发展也就会较快，反之，他的进步和发展也就会较慢。这也是个人能否进步的必然现象。

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然是我们一切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思想进步的重要方法。因而，各个方面都要重视、运用和掌握它，不应该忽视，忽视了就可能犯错误。

### 三

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有计划地进行。当前，障碍我们工作发展的而且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不是别的，就是官

僚主义，压制民主，以及保守思想，故步自封，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全国解放之初，我们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接受了大批的旧人员和旧官僚，而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方面，我们则几乎原封未动地接收过来。三年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改造工作，并进行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官僚主义远没有肃清。而且，因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还大量的存在，比如广大小生产的存在，交通不便，文盲多，机构多而层次复杂等，因此，官僚主义还在不断地产生，并且在我们的许多工作部门起作用，妨害工作的顺利进行。官僚主义使工作不深入，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不重视安全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甚至政治上麻木不仁，高高在上，遇事熟视无睹；命令主义，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给批评者以报复和打击。官僚主义的具体实例，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为了节省笔墨，这里不一一列举。

保守思想，故步自封，与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违背。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就是从实践上对保守思想的有力批评。在我们国家的生产建设中，有许多光辉的事例，实际上起了批评保守思想的作用；但是，保守思想仍在各个工作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保守思想目前的表现是看不见新鲜事物，固守陈规，按老经验办事，不积极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不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吸收新鲜血液。保守思想妨碍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必须经常进行对保守思想的批评。自然，反对保守思想，并不是要大家超越现实条件，盲目冒进，而是要有步骤的积极的开展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因此，在批评保守思想的同时，也要防止工作中出现的急躁情绪，使之正常发展。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盲目性、无计划性。

一般表现是多头领导，乱布置工作，忙乱现象等。在学校里，不是以教好学好为主要任务，而是教员、学生兼职过多，“会议主义”，多头领导，组织机构重重叠叠，乱拉教师、学生做许多不应当做的所谓社会活动等，使教师、学生负担过重，甚至疲劳不堪。这样，不但教师教不好，学生学不好，而且久而久之，连身体都搞垮了。这些，就是学校中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各方面注意，并及时纠正。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是与计划性和革命的秩序性相对立的。我们要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大量培养各种科学技术人才，为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服务，就不能不严格地批评和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并代之以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工作。

#### 四

要顺利地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注意克服妨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各种障碍。第一，经常进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使大家不但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而且在理论上确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第二，领导者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及时地在适当场合，进行必要的、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同时，热烈欢迎和鼓励同志们对自己的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第三，同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并且要给敢于大胆提出批评的同志以不受打击和不受报复的组织保证；第四，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批评自由”，不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由。也不要使批评和自我批评非政治化和非原则化，处处责难，事事批评，使人人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第五，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简单的否定错误，而是要深刻的分析犯错误的历史条件和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改正错误的有效办法。如此，方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消

极的，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五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是，我们祖国将要在1953年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这一伟大建设的过程中，在各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党和政权的职能，同时也要极大地发挥每个同志的创造能力和无穷的智慧。光有前者，而没有后者，要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上下左右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 加强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

(一九五三年初稿，一九八六年修改)

高等师范教育在我国的各项建设中，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要是低估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就会造成错误，损害国家的利益。尽管党历来就重视各级师范教育，但是，人们不重视师范教育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例如西北地区许多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不愿意报考师范院校，而愿意报考理工科院校；师范院校的一些教师不安心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前途不光明，没出息；领导者不重视师范教育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政府在分配学生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调配干部到高等师范学校工作时，就有不少的困难。这种情况研究起来，有种种原因。但就目前看，主要有三条：1、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不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新中国仍有反映。2、片面强调和宣传工业重要，因而，大量城市学生要求上工业学校，农村青年男女要求进工厂。他们考不上工业学校，不但自己灰心丧气，还要受到家长的斥责。3、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宣传不够，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低。所有这些，大大影响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影响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

## 二

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就目前国家需要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西北地区也是这样。

1、需要大批教师培养人才。我国已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个伟大的经济建设，象征着我国繁荣昌盛的前途。而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源源不断地供应人才。没有大量的人才培养和供应，要胜利进行经济建设是困难的。我国目前极端缺乏各类知识人才。国家在工业、农业建设方面，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以迎接工业、农业建设的高潮；普通学校要大力发展也需要大量教师。这些专业人才和教师的重要来源要由各类高等学校、中专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来培养，而这些学校所需要的教师从哪里来？培养各类学校教师的重担子，就不能不主要地落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身上。为此，高等师范教育办得好坏、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就直接影响各类中等学校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间接地影响国家培养建设干部和人才计划的落实，从而影响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2、需要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程度，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我国逐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的人民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我国在过渡时期中，要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要使分散的个体农业、手工业逐渐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要实行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不注意提高农民、手工业者的文化水平，改造将是很困难的。列宁说：“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都识字，没有足够的知识程度，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去阅读书报，没有做到这一切的物质基础，……我们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这里所说的没有文化就不能达到的“目的”二字，就是不能达到全体农民个个有觉悟的参加合作社，也就不能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列宁的这些论点中，充分看出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对过渡时期的重要意义。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有赖于广大的、大大小小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来进行。而这些知识分子，不少就是由各级师



范学校这些“母机”培养的。因此，高等师范学校办得好坏，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着过渡时期各项改造工作和建设事业。

由此可见，高等师范教育在我国、在西北各项建设事业中，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

### 三

明确认识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明确认识了高师教育的重要性，不等于就可以把高师办好。要把高师办好，必须把这次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的各项重要决定付诸实行；而要获得成绩，其关键在于明确认识当前高师教育工作的主要环节，也就是说，它主要任务是哪些。不明确认识高师工作的主要环节，虽有尽善尽美的决议，也是不能收到应有效果的。我们西北各级教育领导部门以及在高等师范学校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明确认识当前高师教育工作的主要环节是什么。

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就在于抓住工作的主要环节，坚决贯彻下去。当前高等师范教育工作的主要环节是哪些？根据这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的精神，我认为是下列几个问题：

1、会议确定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方针是：“在整顿、巩固现有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大力予以发展”。这是一个主要环节。我们西北大区、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深刻地理解这一方针，以便正确地掌握它。高等师范学校的全体领导同志，也应对这一方针有深刻的认识；以便作好本校工作。

今天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规模与客观需要很不相称，规模小、需要大，西北亦然，这是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必须逐步克服。克服的办法就是：一则有计划地大量发展新的高等师范教

育；二则是接收过来的解放前的高等师范教育的摊子并不好，要整顿巩固，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这就是整顿巩固、有计划地发展高师教育的方针。这个方针的精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既要求发展高等师范教育，又要求防止盲目的发展；既要求整顿巩固高等师范教育，又不能保守不前。也就是要求在既防“左”又防右的精神下发展高等师范教育。这次高师教育会议批评了“左”和右的不正确思想和作法，既批评了只强调需要、发展，而忽视整顿巩固、有计划有准备的发展；又批评了只强调条件、质量而不顾需要的倾向。中央文委习仲勋副主任说：“客观需要，但主观无力而硬要发展，叫冒进；主观有力，或者可以积极准备力量，但强调主观困难而不去作，叫保守。两者都是不对的，都是机会主义。”我们各级教育领导部门，必须好好掌握这次会议精神。同时还要充分认识贯彻高师教育工作方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要明确认识“左”和右的具体表现和区分主、次。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认识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客观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一个时期总有一个主导方面，因而在贯彻执行时，还必须抓住各个时期发展动向的主要方面，即主要矛盾。不能在同一时期不顾实际情况，害怕既犯“左”又犯右的错误，提出既反对“左”又反对右；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如果这样作，就叫做无的放矢，引起混乱。事物的发展不是平均主义的，因而领导方法也不应当采取平均主义的方法。这就叫做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这样的认识，才有力量。

2、进行教学改革，是具体贯彻方针提出的整顿巩固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关键。整顿巩固和提高高师质量的工作，必须抓住教学改革，这又是一个主要环节。教学改革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即一方面要扬弃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同时

又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教育改革的过程，就是“破立”、“止行”的更替过程，也就是提高高等师范教育质量的过程。我们要明确认识并牢牢抓住这个环节。

我国现在正处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起就开始了这个过渡。这个过渡中表现出复杂的斗争关系和更替关系。以思想领域来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斗争和更替过程。就文化教育思想来说，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更替问题。因此，教学改革的具体方向和方法，就是要坚决地学习苏联，以苏联文化教育的先进经验为榜样，并科学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亦即以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落后的文化教育思想。当然，这种改造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要稳步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成；但也不能保守不前，稳而不进。

改造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思想，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必须采取批判、改造和吸收、利用的方法。对一切反动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体系，要彻底批判和坚决抛弃，决不能持容忍观望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但对某些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或部分还有用的东西，要加以吸收改造，使其能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对某些宝贵的资料和可用的技术性的部分，还应加以使用，绝不能抛弃。列宁说：“要把旧时学校坏的东西与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应该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常常不能掌握列宁所教导的这一条原则，容易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有些人还有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去年的教师思想改造，提高了我们教育干部和教师识别是非的能力，对于我们的教育建设是有很重大历史意义的。但是，不能估计过高。目前对于旧文化教育

和旧教师的某些方面,仍有一概否定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然而,我们也要防止不分好坏地一概肯定,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一个高度领导艺术问题。真理是最具体,最实际的,我们必须善于掌握,既不偏,又不倚。政府教育行政领导部门需要如此,学校行政领导也应如此。这就叫作正确的政治思想领导。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然而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向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我们大家应以列宁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格言,铭记在心。虽不能至,但要心向往之。

3、大力培养与提高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高等师范教育工作方针明确规定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等都是重要的任务。但是,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教师,要完成这些任务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重要环节。今天我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比较差,较高水平的教师是不太多的。今后五年内,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大约需要8,000名左右的新教师,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无论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领导部门、还是高师领导方面,都应坚决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住培养和提高教师力量这个环节,有效地贯彻执行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的精神,顺利地改革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如果放松这一环节,就会使自己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并在政治上、事业上犯严重的错误。

培养新教师,是解决教师缺额的根本途径。关于培养新师资的办法,会议确定两条具体途径,一条是各高等学校都要肩负起培养助教的任务,努力解决本校所需要的师资。为此,要求配备得力校长。有了好校长,就能不断地培养出所需数量的师资;另一条是培养研究生。要求条件好的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的系科举办研究班,培养各高等学校所需教师,这是解决教师缺额的两个重要渠道,均应重视,不要偏废。但是,也不能放弃用其他有效办法解决师资问题。我们西北区各学校都应订出具体计划,进行

这项工作。

培养新师资虽然是解决教师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对于提高现有师资，也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上边已经说过，我们今天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是量少质差。量少，要用大量培养来解决；质差，要用提高的办法来解决。

关于提高现有教师水平的问题，会议提出：加强现有教师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科学与教育业务的学习，逐步改变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其教育理论水平。就是说要通过本校的各种教学活动、学习苏联、轮迴讲学、组织学术讲座、交流教学经验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学习政治理论，要改变其观察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讲，就是要改变其旧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学术观点、教学观点和教学方法，这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是我对高等师范教育当前几个重要环节的认识。我们西北各级政府教育领导部门，必须有意识地抓紧这些环节，坚决贯彻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精神，我们各级党的教育领导组织也要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什么叫做政治思想领导？我想就是要抓紧这些环节，并在督促检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地完成这些主要任务，这就算真正地实行了政治思想的领导。

#### 四

为了加强中央教育领导部门的统一领导，并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性，明确领导关系，分工负责，各有专管，以发挥上下领导机构的领导作用，是很必要的。此次高师会议确定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原则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的确定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出发，不

这样，就不能把高等师范学校管好。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地贯彻执行。如何统一领导？如何分级管理？

首先，师范学校的设置和师资培养的分管问题，会议提出两个具体实行办法。第一，高级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师范学院的发展与设置，由大区统一筹划，中央核准；初级中等学校教师的培养、师范专科学校的发展与设置，由省市筹划，大区核转中央批准。

为了贯彻大区筹划，中央核准的这条原则，我认为中等学校师资的供应，应逐步做到由地方自给，中央统一调剂。由于全国各地教育发展很不平衡，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分布也很悬殊，因此，中央的调剂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今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原则上虽由各大区和省市协商统一分配，但中央调配是很重要的。应注意将毕业生调向师资比较奇缺的省市，将数量较足、质量较高的省市的师资，调配一部分到师资数量缺少、质量较差的省市去工作。这样，就会使全国教育达到较为统一平衡发展的目的。

第二、中央教育部门和地方教育部门的业务分管问题。按会议精神，中央统一制订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展计划、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以及组织编审教材和交流教材等。大区、省、市主要分级管理经费、人事、教学业务督促、检查和指导。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央管教学，地方管行政。既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作用，又要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提高高等师范学校的领导效率。但是，所谓中央管教，地方管政，我认为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教育行政——经费、人事等要为教学服务，而教学又在经费、人事工作的直接保证下才能完成任务。因此，我们在具体进行工作时，应当灵活地运用原则，既有专责，又要联系。决不要机械地认为中央管教而我管政，所以遇到教的问题也不管，我想这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两

者不可分割而一揽子抓，这同样是管不好的。

关于“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有些学校对于统一领导很拥护，但对于分级管理颇有意见，不愿意归大区或省市管理。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全国所有高等师范院校都由中央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况且许多师范院校就在大区、省市设置，若大区、省市不管，困难很多。有些具体问题，中央也无法解决。只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认真去做，我想大区、省市不会管不好的。习仲勋副主任说：有些学校不愿意归大区管。现在和过去不同，过去条条下达，现在归大区支配经费，中央离学校很远，不如地方就近解决问题快和好。大区会更加关心学校，只会加强领导，不会削弱领导。经验证明，不取得当地党政的领导，工作是搞不好的。

## 五

高等师范学校本身的具体领导，对于教育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四年来，特别是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以后，就西北地区来说，校、院长的领导加强了，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能程度不等地抓教育，领导工作也比过去具体了。但也有缺点，一般地讲，政治思想领导不够，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有意识地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首先，在全校团结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教学改革。全校团结与否，是学校办好与否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西北地区来说，各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不少新老教师之间有矛盾、不团结，新教师认为老教师落后，不进步，看不起老教师。老教师则认为新教师年轻，骄傲自大，缺乏知识，因而也看不起新教师。不仅新老教师之间

有矛盾、不团结，就是老教师之间、青年教师之间也有矛盾，也有不团结的现象。一部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不正常，学生不尊重教师，要求过高过急，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当然，教师方面也确实有缺点和弱点，有的没有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把功课教好的精神，反而有对抗学生正确意见的情绪。因此，造成了复杂的互不协调的现象。问题不在于这些矛盾和不团结现象的存在，而在于学校领导对这种情况是采取积极的、正确的态度解决呢？还是采取消极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或其他不合理的办法处理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今后学校本身团结与不团结，应该是衡量学校政治思想领导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校院长应首先要做好这一工作。而要做好这一工作，对于具有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的教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不能简单抛弃，而应当依据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教育改造他们，使之逐渐建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一个较长期努力的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在作风上，要提倡青年教师尊重老年教师，虚心学习老教师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也要提倡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肩负起培养青年教师的光荣任务，发挥老教师的才能和积极性。老教师自己也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克服缺点。青年教师也要加快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水平，努力克服自高自大、不务实际的缺点。彼此尊重，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顺利地进行教学改革，并提高教学质量。在团结的基础上搞好教学改革，在教学改革中搞好团结。在师生关系上，要发扬“尊师爱生”的风气，强调学生要老老实实地向教师学习，并接受学校的纪律教育。教师努力教好功课，就是爱生的具体表现。

其次，校长负责制要和集体领导相结合。我们的高等师范学校如同其他高等学校一样，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的。但是，校院长



应当尊重集体领导的原则。集体领导是我国领导的重要原则，我们党的领导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集体性。而集体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依靠的不仅是某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经验和能力，而主要是领导核心的集体经验和能力。这点，对于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十分重要的。

校长负责制与集体领导制不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而是有机的统一体。校长负责制，应是集体领导下的责任制，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不是集体领导下的责任制和民主基础上的责任制，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校长负责制，而是“个人领导制”，或“家长式的领导制”。这种领导制就会降低对工作的领导水平。斯大林在说明为什么不能靠个人决定问题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一个人的决定，从来是或者几乎从来是片面的决定。在任何领导机关里，在任何集体里，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领导机关里，在任何集体里，都有发表错误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检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当中，几乎有九十个决定都是片面的。”中国有句老话说：“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失，必有一得。”可见集体智慧的重要性。因此，要真正贯彻校长负责制，就必须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建立高师校级领导核心，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校长和这个领导核心，必须与全校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大开群众的言路，“察纳雅言”，以丰富校长和领导核心的智慧，增强领导力量。没有学校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和通过各种形式向学校提出的意见，就不会有真正的校长负责制。只有不断地发扬民主，才能不断地提高校长的领导水平。

再次，政治领导要与业务领导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政治领导业务。而政治领导又必须结合业务来实现其领导作用，即结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研究等教学活动来实现

自己的领导。政治领导不结合业务进行，是空洞的领导，没有力量。业务工作亦必须在政治领导之下进行，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业务问题，进行业务领导。没有政治领导的业务是无灵魂的业务。因此，政治和业务不能分家，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但是，我们有些校院长和政治工作同志，常常把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对立起来，管政治领导的不管业务领导，管业务领导的不管政治领导，或者既管政治又管业务，但两者不结合。这些领导方法是片面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改正。然而政治和业务结合的领导方法，是较高级的领导方法，一时不容易掌握，不能要求过高过急，应当逐渐学会。

最后，加强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实行政治和业务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是不是要取消单独的政治理论学习呢？不是的，不但不能取消，而且要加强。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正是为了要把政治与业务更好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处理自己的业务。但是，有人却持另外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不愿意学习政治理论，藉口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只进行业务学习而取消了政治理论学习，这是不对的。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是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密切党群团结的根本问题，不能不重视，无数的经验证明，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抓好了，就可以把学校办好，办得有起色，否则，就不是这样。今后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必须采取长期的、系统的、按部就班的方法，按照中央的规定，认真地做下去。

目前，西北地区高等师范院校许多教师的实际状况是，不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低，而且业务水平也不高，不适应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因此，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业务和与业务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的学习，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在这两方面不断地提高教师，才能完成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政策中所赋予高等师范院校的光荣任务。全体教师动员起来，采取

各种不同的形式，自觉自愿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教学业务。校院长要以身作则，学习政治和业务，并认真地抓紧这个重要环节，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

高等师范学校党组织的工作，对于学校的整顿巩固和有计划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党组织，是党在学校中直接联系群众和联系教学实际的基层组织。因此，高师的党组织应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扩大自己的工作面，除做好自己的组织工作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外，要更多地去作本单位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和本单位的教学改革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团结全校教师做好教学工作，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积极参与并领导好全体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科学的研究与业务学习。完成了这些任务，也就完成了学校党组织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党员不能自以为特殊，把党组织的作用当成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指挥群众，而要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之中，凭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不断提高的业务能力来影响群众，帮助群众进步，同时，使自己也得到进步。

## 六

我以为党和政府本来是很重视高等师范教育的。但是，解放初，党政领导机关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各种社会改革方面（这是完全必要的），因而，对各级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有些放松，这是我的认识。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渐加强了对教育、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面领导。西北地区的党政领导也是这样。希望高等师范院校的负责同志，要经常向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汇报学校情况，提出问题，争取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此，西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就会指日可待。

# 关于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 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一九五四年)

## 一、政治思想工作情况

四年多来，我们党在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和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检查，绝大多数教师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不仅在立场上、观点上，而且在态度上都有了一些改变。这样，就使我们西北区高等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经过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和实际运动的锻炼，绝大多数学生也在思想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对为人民服务逐渐有了认识，而且对为祖国建设而学习也逐步有了认识。

在绝大多数师生政治积极性和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的基础上，党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和影响增大了，党、团的组织也扩大了。根据1953年11月份统计的材料，在西北区11个高等学校中，已有党员671人（占西北区高等学校师生员工总人数14,460人的4.69%），团员4,7748人（占西北区高等学校师生员工总人数14,460人的32.8%）。

这些新气象的出现，表明我们党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中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取得成绩的原因，首先是我们党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以及西北区各高等学校党员负责同志的积极努力。

由于我们党在西北区高等学校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并在工作中贯彻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致使绝大多数师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显示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实在令人可喜。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这些成就。因为，它只不过是初步成就，对于人民和国家建设的要求来说，显然是很不够的。因此，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继续努力。

同时，在我们目前的政治思想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主要表现在围绕教学工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团结全体教师，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他们有着过高过急的要求。这样，便使教学改革的进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研究和理解教学改革的性质。因此，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全面地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就需要努力钻研业务，掌握业务；就需要加强对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领导，进一步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全体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全体教师教学工作的质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

## 二、政治思想工作中的问题

目前，我们党在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1、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在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团结问题，即新教师与新教师、老教师与老教师、新教师与老教师的团结问题，突出的是新老教师的团结问题。表现在新教师对于老教师采取了不尊重、不礼貌、不客气的态度，认为老教师进步慢，没有自己进步快。还表现在新教师对于老教师采取了不热情、不诚恳、不虚心地向老教师学习的态度，甚至在教学工作中发生了困难也不积极主动地协助老教师去

克服，认为这是老教师的工作，与自己不相干。而老教师呢，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怀疑党现在团结知识分子，以后就不团结，就要抛弃知识分子，所以对教学工作信心不足。加上新教师对于老教师采取了一些不好的态度，使老教师感到寒心，从而不愿去培养和提高新教师。

产生新老教师不团结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新旧思想的矛盾，即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这里并非说新教师的思想都是新的、进步的，而老教师的思想都是旧的、落后的）。当然，我们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亦有偏差，即对教师有团结而没有批评，或有批评而没有团结。表现在对教师的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在鼓励新教师时，无意中就流露出改造老教师的情绪，加上他们对新教师教育不够，这样就使新教师发生了自满情绪，甚至新教师说自己再过两年就要超过老教师。表现在对教学业务水平较低而思想进步较慢的老教师有轻视、厌烦的情绪，甚至有不愿接近和简单抛弃的想法，以致使老教师和我们有了距离，对教学工作的情绪不高，不愿培养和提高新教师，甚至有离校他去的想法。有的老教师说，“等红色专家培养出来以后，我们就该告老还乡了。”

2、对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的问题。在目前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专业思想问题，其中，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对于自己所学专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甚至于对什么是专业也不了解。表现在他们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重视理工，轻视师范教育，认为学理工“吃香”，学师范“没有出息”，甚至认为住师范学院“太丢人”，“没有前途”，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考上了师范学院，出去“羞见亲朋”；他们愿意学本科，不愿学专科，认为专科“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出路”、“冤枉”，以致学习上产生了被动情绪，甚至借水土不服而要求转学、转系，有的闹转学没有达到目的，竟然哭了起来；他们愿

意学重工业，如电机、机械，不愿学土木、水利，认为土木、水利不是“工业”，将来毕业以后，“当泥水匠”，满腹牢骚；他们不愿学采矿专业，认为现在学采矿专业，将来毕业以后要“充当国家过渡时期的牺牲品”。

与上述专业思想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学习中的盲目急躁情绪和学习纪律松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好认识不足。他们在学习中的贪多、贪快，凭兴趣钻研理论，认为超学时是学习积极的极自然的现象，要求加课、加钟点；他们在和教师的关系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教师要求过高，对有缺点的教师的态度简单生硬，不尊敬，不客气，甚至公开欺侮和辱骂教师，认为教师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课堂上随便发问、递条子；他们对西北地区、对学校设备也有意见，认为西北没有东北好，学校设备条件太差；他们消极不满，不上课、不自习，即使上课、自习，不是迟到，就是早退，随便说怪话，说什么“生在中国没有自由”，“只能上一个大学”，“国家设置专业是陷害青年”，甚至要向中央高教部提出控告。

上述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专业思想问题，基本上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学生过分强调个人的志趣，认为自己所学专业没有与个人志趣相结合，同时，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也不明确。此外，我们对于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不够，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一般化，即一般号召多，深入研究少，批评多，正面诱导少，大报告多，个别说服少，特别是对于专业思想问题特别突出的学生，缺乏经常耐心的说服教育和必要的批评。在师生关系上，我们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学生推动教师搞运动的想法，对教师的意见重视不够，以致教师反映“领导上重视学生的意见，不重视我们的意见”。

3、围绕教学工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在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忙乱问题。其中，又主

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校、院的领导方面，事务主义作风相当严重。如在校、院的领导会议上，系统分析研究教学上的重大问题和有关共同认识的原则性的问题少，而谈具体事务性的问题多。

在教学行政领导方面，会议频繁，而且每次会议布置的工作都比较多，教学计划不切合实际。

在工作方法方面，根据中心工作抓重点、搞典型、及时总结推广等，做得很差。

在系的领导方面，多数系不能将教师组织起来，也很少系统地研究系上一些较重大的问题。学生反映“系主任是法西斯专政”，并公开在课堂上说，“苏联教材错了！”有的系竟提出要在系内成立“党团小组”的问题。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高等学校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认识不足，对教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教学改革必须依靠全体教师这一点不明确，是由于我们对主观条件缺乏正确的估计；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围绕教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方面做得很差，甚至离开教学工作而孤立地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在不管教师对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方面努力与否，也不管教师对教学工作努力与否、服务得好不好，而主观片面地对教师存在着过高过急的要求。

4、健全马列主义教研组的问题。目前西北区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加强了马列主义教研组和教学小组的工作，但在教学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有如下两个问题：

师资问题。现有政治课教师数量少、质量差，不能适应教学需要。从数量来看，除西北师范学院勉强开齐“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课程外，其他学校均不能全部开齐，其中以“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最缺。从



质量来看，一般业务水平较差，多以客观主义态度讲授马列主义，个别教师在立场、观点上尚成问题。如有的教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某一国家内胜利的结论，和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结论，认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错了，就是列宁错了。这样，教师在讲课时不探求事情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表面上的引证，是大错而特错的。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讲，“地主中有一部分人还有良心，他们对农民的剥削要少一些。”就现有教师的政治情况来看，问题也相当严重。如现有的17位教授、副教授中，除党员5人及政治情况较好的2人外，其他十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均相当复杂。讲师、助教的政治情况一般较好，但个别人的政治和思想问题也相当严重。

领导问题，部分学校对于政治课教学工作尚不够重视，对于政治课教师的任用不够慎重严肃，使一些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人担任了教学，而且对于马列主义教研组主任和教学小组长的任用也不够慎重严肃，使一些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人担任了教学领导工作，以致学生反映，“我们要求有经过革命锻炼的教师来教政治课。”

政治课师资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还是非常缺乏的，而能够胜任的教师为数就更少了。我们西北更加如此。但也决不能因此而使一些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人担任政治课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

5、加强领导问题，在目前各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工作被动、对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保证教学工作等方面做得不够，而且还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党内关系上。某些党总支领导同志之间搞得不团结，各行其事，各有主张。党总支内存在着分歧意见，很久得不到解决。甚至在党外会议上，党员之间因认识不一致，而往往争吵起来，不得下台。党外人士反映，“党员还不团结，如何领导我们。”

党和行政的关系上。有些党总支或多或少地有代替和领导学校行政的现象。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试建政治辅导处一年多来，做了不少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协助学校进行教学改革方面有一定的成绩，但在工作中或在某些问题上，却有程度不同的干涉行政、不重视行政领导和包揽代替学校行政职权的现象，甚至有代替党驾驭行政之上的现象。认为党员作校长才能实行校长负责制，不是党员作校长，就不能实行校长负责制。更严重的还有脱离群众的倾向，教授、学生反映，“我们怕政治辅导处，怕政治辅导处人事组。”

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上。某些党员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简单急躁，使党外人士难以接近，影响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党外人士反映，“虽然党员工作积极，但我们与其共事不愉快。”甚至有的同志对党外人士不是以党的政策去对待，而是以强迫命令、粗暴的态度去对待，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严重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党总支对党的工作不够重视，党总支内很少有人全面考虑党的工作，学校的中心任务也很少放在党内讨论，甚至党总支负责同志有不安心工作的情绪。这是由于对党内的思想工作重视不足，民主生活不健全，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由于党总支与行政的关系不明确，以党总支代替了行政的职权；是由于党与政治辅导处的关系不明确，政治辅导处对本身任务、对校长负责制、对行政各部门的关系不明确；是由于党组织成员平时对党的政策学习和认识不够，对党员进行政策教育不够，对党内存在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和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未能及时而有效地进行解决。

### 三、今后意见

培养足够数量和具有一定质量的高级建设人材，保证国家总路线的贯彻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这是高等学校在过渡时期

的基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需要我们西北区各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在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时，切实作到下列各点：

1、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教师的团结，特别是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对老教师采取正确的态度，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能力，并努力培养大批新的师资。

为做好这些工作，首先要求我们西北区各高等学校的党员同志特别是党员负责同志，必须认真学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全面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从而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改变以往对老教师采取的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充分发挥全体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达到教好和培养大批新的师资的目的。为了要使党的这个意图成为每个教师的意图，可以通过学校中的民主党派、工会组织等来加以实现。

2、加强教职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为做好这件工作，首先要求我们西北区各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好好地将教职员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工作担当起来，并帮助教职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

3、重视对学生进行热爱专业的教育。

各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应把对学生进行热爱专业的教育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作为长期的经常的重要教育内容，使学生彻底了解每个专业在建设中的意义，了解它的丰富的知识内容，从而热爱自己的专业，达到学好和为祖国建设服务的目的。为了要使党的这个意图成为每个学生的意图，可以通过学校中的政治课、青年团、学生会等组织来加以实现。

4、应该围绕教学工作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应该离开教学工作而孤立地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各高等学校中的党组织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对老教师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如通过教学工作、教学思想、学术思想、业务学

习等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应以斗争的方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之充分发挥在教学方面的积极性，并在这当中帮助他们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各高等学校的党员同志必须努力钻研业务，虚心地向老教师学习，以便掌握业务，达到新老教师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办好高等学校的目的。

5、有计划地整顿政治课师资，培养和提高政治课师资，逐步开齐政治课，并加强对政治课教学工作的领导。

在整顿政治课师资方面：对目前政治课教师一般应给予帮助，使其逐渐提高教学效果，但对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且教学观点错误的教师，应停止其教学，调换其他工作。

在培养和提高政治课师资方面：对现有未任课的助教，各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使之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能够讲课，并继续在西北大学举办马列主义研究班。

在开设政治课方面：各校今后应根据师资条件，逐步开设政治课。除西北师范学院应继续加强教学工作外，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均应争取在今年开齐政治课，其他五校均应在今年增开一门新课。

在加强对政治课教学工作的领导方面：各校领导同志应特别重视政治课的教学工作。在目前师资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应首先抓紧对马列主义教研组的组织与领导，充分发挥集体力量。今后任用政治课教师和教研组主任等，必须报经领导机关批准。

6、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党的工作。

各高等学校党组织的任务以及与学校行政的关系等，需要加以明确。

学校党组织的任务是：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计划和上级党组织的各种决议，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教育工作，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在师生群众

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协助行政组织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保证学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经常注意和了解师生群众的政治、思想情况以及他们的情绪和要求，并及时向上级机关和学校行政反映；关心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并组织师生群众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另外，领导学校中的青年团、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对学校中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应经常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领导各民主党派在学校中的基层组织，同时也还应有必要的具体指导，如及时交代政策方针，向他们提出具体要求，帮助他们布置工作和总结经验等，但要避免机械地去规定他们活动细节，或对其生活内部加以直接干预，以至形成包办代替。

学校在行政上为校长负责制。学校中的党组织虽不同于党组，但是党组织必须十分关心学校行政工作，经常研究学校行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组织党员和群众积极保证行政计划的实现。对于学校行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党组织有责任提出建议，说服行政负责人采纳执行，但不得作硬性的决定。党组织与行政负责人方面意见分歧而又一时不能取得一致时，应执行校、院长的决定，同时分别向上级反映，请上级解决。

目前西北大学的行政领导干部加强了，原设立的政治辅导处可逐步向校长办公室过渡。在过渡期主要应做好两件工作：指导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主持学生的毕业鉴定和审查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至于研究解决教学工作中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指导全校的社会活动、规定社会活动的时间，则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西北工学院原设立的政治辅导处，应继续存在，其任务为：指导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主持学生的毕业鉴定和审查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帮助教务处研究如何在教学工作中贯串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上述任务，西北工学院政治辅导处仍可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关于指导全校的社会活动、规定社会活动的时间，则以教务处为主，商同政治辅导处办理。

至于青年团（学生会由团委领导）、工会以及民主党派工作，都应由党总支领导，政治辅导处不应代替支部的领导。

# 论目前加强县教育领导

## 部门工作的重要性

(一九五五年初稿，一九八五年修改)

我国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三年了，三年的成绩很显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改造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一个重要部署。为了配合这个部署，党中央公布了毛主席的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国家的文化教育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实现，必须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文化教育任务。三年来，全国文化教育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无论从培养建设人才方面、还是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方面来看，都还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在配合工业化并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新形势下，在培养技术人才和提高农村人民文化水平方面更感到不适应，需要我们加倍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有三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必须加以纠正。一是说，人民缺乏文化同样可以成立农业合作化；二是说，人民缺乏文化根本不能成立合作社；三是说，先学文化，随后建社。人民缺乏文化，虽然可以成立合作社，但要巩固、发展和提高则是困难的。然而我们也不能等待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程度提高之后，再发展合作社。同样不能眼看着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而不紧跟着办好文化教育事业，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这是关系着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

展，巩固与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大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文化革命，要全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搞好农村的普通教育，加强扫除文盲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是今天我国农村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对这一点，许多同志应该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必须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措施，努力完成文化建设的任务。

国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安排好之后，各级教育部门、特别是县教育领导机关工作的好坏就有重要的意义了。我们要迎接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涨而来的农村文化教育建设的高潮，“以满足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国家、地方培养干部方面的需要。”要实现这个要求，“各省市、各县应该加强对所属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在加强领导工作的同时，加强各级教育领导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县教育领导机构的建设，这是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县的教育领导部门，是领导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机构。它工作的好坏和机构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教育领导部门的指示和决定，从而影响着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也影响着五年建设计划和农业合作化任务的顺利实施。

目前，县教育领导机构的规模、工作、制度和人事配备，总的讲来，除少数县工作较好，干部较强，机构较健全外，大部分县工作不够好，干部不健全，问题较多。有的县属学校多，仅中等学校就有几十所，小学更多；有的县却只有一、二所中等学校，小学也较少，相差很悬殊。但是，不论学校多少，一般也都是在县人民政府，或单独设科，或联合设科，而联合设科的县较多。最不合理的是，学校多而联合设科。单独设科的工作情况较好，但是，也因人员不健全，或者常常被抽去几人做中心工作，留机关的只有个别人。这个别人除应付日常事务外，很难分出力量出外视察学校。文教卫生联合设科的工作情况就更差，因为工

作多而杂，分工后力量分散，每项工作只有个别人应付门面。这样的县的教育领导机构，怎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迅速加以改变。不改变，就谈不上加强县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为了改变这种不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状况，我认为必须较快地加强县教育部门的建设。

1、县政府必须设置专门的教育科，教育干部的缺额，应该迅速设法补齐，领导人员尤应提早配齐。特别要重视学校多的县份人员的配备。补充配备干部，主要由县上自己调剂。此项工作，首先县党、政领导要重视，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在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的原則下，逐级下派一定数量的教育干部，健全县教育科。在干部配备上，要特别注意挑选政治上好，又有一定的教育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绝不能滥竽充数。

2、建立正常的工作和业务制度。为了使县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工作正常化，必须建立经常的教育业务工作，克服只顾中心工作，不顾教育业务工作的偏废现象。要搞好县教育工作，必须建立县教育领导部门的业务生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考虑中心工作，不兼顾教育工作，是不正常的，是完全错误的。教育部门的工作和中心工作，应该很好地结合，全面照顾，各得其所，不要顾此失彼，不应当以中心工作代替教育业务工作。而今天许多县仍存在偏废现象，中心工作一来，党政领导部门就统一安排所属各部门的同志去参加中心工作，而不照顾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因此，许多县教育部门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长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甚至一年中有一半时间不做业务工作，使教育业务几乎陷于停顿而无人管理的状态。不少学校问题很多，得不到及时解决。同时，教育行政工作者也因为经常不在本部门，感到工作生疏，无处着手。这如何谈得上积累经验，研究问题，加强领导呢？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



重要的是不少县的党领导人不重视教育。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建立正常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使教育工作正常化。

3、提高县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水平。加强县政府对教育的领导，除健全教育行政机构、制度和配备人员之外，重要的问题是，还要不断地提高教育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县教育领导同志，要积极研究农村新的生产关系，研究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同时要学习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这对于开展本县教育工作和提高领导水平，有直接关系和重要意义。不加强对农村新的生产关系的了解和研究，不对教育事业做调查和探讨，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也就不能作好本县的教育领导工作。今天，我国农村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正在由旧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富农以及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向新的半社会主义（亦即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在这种农村新形势下，对一切工作都应有新的认识、新的安排和新的做法，农村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应当如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如何进行文化教育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还缺乏经验，对县教育领导机构工作的同志来说，恐怕不但谈不上什么经验，就连足够的认识都没有。当前，应结合本县农业合作化开展的情况和问题，详细研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学习和研究教育方针、政策以及一些有关的教育理论，及时提出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措施，以开展工作。这是提高工作水平、业务水平，以及进一步开展教育工作的关键，各县务必重视。不确立这种学习和研究的领导作风，就不能适应新局面，就不能办好农村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就不能满足合作化中人民对文化教有的要求。县党政领导同志要认真领导和督促自己下属的教育工作部门的同志，树立重视农村实际、研究教育业务的作风。上级教育领导部门，当然也要及时供给下级机关一些有关材料，并且在学习和研究的方法

上给以指导，以收提高之效。

4、与轻视教育和轻视知识分子的旧思想作斗争，为了作好农业合作化新高潮中的农村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克服县教育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服轻视教育的观点，与轻视教育工作的现象作斗争。今天，虽然有些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开始重视教育工作，但是，不重视或轻视教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着。上述只抓中心工作而不管教育工作就是最典型的表现。由于不重视教育工作，所以把一些思想作风不好、或犯过错误的干部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员塞进学校，有的甚至委以要职。也由于不重视教育工作，有些地方经常抽调教育干部、教师去做其他工作，而置学校于不顾。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大大小的干部，对教师不尊重，瞧不起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不是干部，不可靠。这些轻视教育与教育工作者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普通干部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应坚决纠正。由于一些领导的轻视教育，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干部、教师，对于本职工作无信心，这些当然也是不好的，应当加以克服。我们应当批判轻视教育、轻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这是长期的任务，要持久地做下去，风气不正，战斗不止。而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首先也应当改变自己不安心想教育的思想，积极作好自己的工作。若要人家不轻视，自己先得不自弃。在批判轻视教育工作的同时，县教育部门要考虑、规划全县的工作，并且有计划地派遣干部到学校中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学校中的各种问题，把领导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县委和县政府对教育部门的重视和领导，是加强县教育工作的关键。县党政领导在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其他工作的规划时，对于全县教育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安排；在考虑中心工作时，也要考虑教育工作。使全县教育工作较快地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以适应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胜利完成党在农村中的主要任务和其他任务。

# 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

(一九五八年)

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对于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有重大的作用，这是实现农业技术革命的一项重要步骤，也是文化革命的新形势。技术革命需要文化革命的配合，文化革命如果跟不上去，技术革命就要受到阻碍。现在广大农民亲身体会到，要提高劳动效率，光靠力气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文化和技术。河南省农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搞四，五，八，文化技术不能差”；“工业化，农业化，离了文化不能化”，生动地反映了文化同生产、技术改革的关系。因此，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新形势，教育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目前，大量举办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农业中学，把大量的高小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吸收到农业中学读书，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一定农业生产知识的初、中级技术人员，以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技术知识，这对于解决生产上一系列技术问题将起重要作用。

解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级学校在校人数也有了很大增加。但是，从1953年暑假以后，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人数却却年年增加。他们升学和求学的欲望是很强烈的，其中一些已经回到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的毕业生，更迫切要求继续提高文化水平，许多学生家长也为此表示焦虑。过去，党和政府对这些毕业生是关怀的，一方面尽可能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多招收一部分学生；另一方面号召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到劳动战线上去，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并尽可能地组织他们自学。这样做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不可

否认，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毕业生求知、升学读书的愿望。许多小学毕业生年龄较小，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困难；而且随着农业的发展，又要求农村青年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之，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就可使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各地就不会再感到小学毕业生对教育工作的冲击和压力，还可以大量发展民办小学，提前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在较短的时间内消灭农村的文盲，从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and 农业生产的发展。

过去，我们的中等教育主要是靠国家投资兴办普通中学，不鼓励创建民办的职业学校。这仿佛人身上只有一条腿，要大步前进就有困难。目前出现的大批民办职业中学，就使我们的中等教育增加了一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快，走得好。因此，很好地发挥这两条腿的作用，就可以使我国教育事业很快地发展起来。本来，类似农业中学这样的学校在各地早已出现。但是，由于一部分教育工作者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只应执行所谓单轨制，即只办普通中学，而不应同时办职业中学，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实不论单轨或双轨，只要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都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我们就要办；反之，凡是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不爱劳动，不论是单轨或双轨，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我们就都反对。

农业中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之一，教育和生产结合，教育和政治结合，亦即毛主席所说的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原则。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在有利于政治和生产发展的原则下，对学科的安排要进行适当的选择，要分别轻重缓急，也要因时因地制宜。普通中学的课程同职业中学的课程可以有区别。在棉产区的农业中学和水稻产区的农业中学，生产知识的课程也应有所区别。各地农业中学的学制、课程、教学计划，不要强求一律。

农业中学是职业中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受到农民和农村的高小毕业生的欢迎，因为这种学校设在学生的家门口，可以不脱离生产，可以做到学习和生产密切结合，不增加家庭负担，为不富裕的农民子弟提供念中学的机会，学到发展农业生产的更多的本领。这种学校是建立在群众需要和自觉的基础上的。大量举办农业中学，师资的配备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各地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潜力，组织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干部和农业技术干部去做教员；另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高等师范院校和农学院的工作，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迅速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并且帮助农业中学教师提高。

农业中学和普通中学都是中学教育，它们的共同任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农业中学的优秀学生，也能到高一级的学校读书，培养成为更高一级的科学技术干部。但是，也应该指出，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它和普通中学担负的任务不同。过去中学教育只注意发展普通中学，没有大量举办农业中学是不对的。但是，在大量发展农业中学的时候，如果忽视了普通中学，也是不对的。必须在发展民办农业中学的同时，加强对普通中学的领导，改进普通中学的教学工作，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如果忽视这一点，对于今后高等学校的质量将会发生不良影响，将使高等学校失去较高水平的学生的来源，并可能妨碍我国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注意的。

农业中学的创办虽然比较容易，但需要做很多工作。巩固问题，关键在于有计划地培养农业中学的教师，并且帮助现有教师提高。目前，农业中学是与农业生产水平、农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中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教师条件、学校设备的要求也将逐步提高。领导者在思想上应该有这种预见，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农业中学的教学水平。

农业中学在若干地区虽已有了一些发展，但是还很不普遍，当前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凡是有条件的地区，要大力发展，已经办起来的，则要努力办好。

# 重大而光荣的事业

(一九五九年)

今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即将来临，甘肃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也将要在全中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部署下举行了。

在招生考试之前，高三毕业同学把升学问题提到了自己的思想日程上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升学问题的考虑就越来越频繁，这是很自然的。经过较久和深刻考虑后而肯定下来的志愿，不但会加强专业思想，而且，学习起来也会信心百倍，学习得更好。反之，遇事随波逐流，不严肃对待，就会收不到好的效果。

据我们了解，毕业同学对自己的升学问题的考虑，大约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已经确定了报考这类学校，而不报考那类学校；一种是究竟报考哪一类学校尚举棋不定，这山望见那山高；另一种是在升学还是就业上打圈子，有的干脆不愿升学，要去就业。显而易见，三种态度都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迫切需要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和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不是需要成百成千的人才，而是需要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才。因此，由国家辛勤培育了多年的高中毕业同学，不应当首先考虑就业，而应当坚决报考高等学校。高考在即，时不再来，机不可失，高三毕业同学中至今仍未确定下自己的志愿者，应当赶快确定下来，不应再犹豫了。第一种态度，就已经决定考学校这一点来说，是好的，但是，其中一部分同学的见解并不完全正确，他们只愿意报考理工科，而不愿意报考师范。我们应当具有全局观点，国家的每一项事业，都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因而，愿意考理工科当然是好的，但是，不愿意报考师范的思想，则是不

对的、片面的。

解放十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去年以来，由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教育事业更有了飞跃的发展。小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学的发展，中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全部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就是因为它重要。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在民主革命阶段中，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配合了党的各项斗争，推翻了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起过并将继续起很大的政治作用、建设作用和教育作用。教育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但是，教育要有人来办，要有教师。由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所以，教师的培养也就越来越迫切了。因而，培养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就有更重要的意义。而要发展各类师范院校，培养大量师资，就非得有它的原材料——高中毕业生的源源供给才行。

我们党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因而也就重视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师范教育。今天，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是一个很大的队伍，高等师范、师范学校在各类学校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仅就这个发展情况看，为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所望尘莫及。但是，由于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教师数量的不足和质量的需要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减弱教育工作，就会大大削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不重视师范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低估教师的作用，就会损坏教育事业，从而大大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此可见，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事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是最崇高的事业。

与过去旧社会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个本质上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旧时代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则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如果说，旧中国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的社会地位不高，那么，今天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则是十分光荣的。不应当以历史类比的形式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低估和看不起今天的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

那末，高中毕业的同学们是越来越爱好教师工作和师范教育，还是越来越不爱好呢？我看，总的趋势是由于党的重视，大家越来越认识了它的重要性。这表现在，年年有不少高中毕业同学报考了高等师范学校，而且下决心当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他们以国家的需要为志愿，以党的需要为志愿，报考师范学校，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不仅因为教师被人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认识了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千千万万有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在教师的培养下才能成长起来的。没有教师，就没有这些有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看法完全正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说这些同学的思想真正搞通了，也代表了不少同学的心愿。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据我们看来，对师范教育和师范工作有明确认识的，虽然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人还不能说是很多。对师范教育和教师工作有不正确认识或不完全正确认识的人，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些同学认为：“考师范学校前途不大”，“教师工作困难，动不动还要受批判”，“功课优良的同学考师范可惜”，“教师工作费心血，不容易看出成绩”，等等。

这些错误的说法，本来已被客观事实或者正在被客观事实所否定，但是，既然有这样一些说法，那末在高考前夕，就值得提



出来讨论一下。

考师范学校，前途究竟怎样？本来，这个问题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的师范教育，应该说，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是有前途的。师范教育是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也是有前途的。这个三段论式，我想不但在形式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它代表的客观内容上也是正确的。因此，不能设想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某些事情者有前途，而做另外一些事情者就没有前途；当然也不能设想，做社会主义的一切事情都有前途，而偏偏从事社会主义的师范教育、教师工作就没有前途。只要个人的理想、志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发展结合，那末社会主义有前途，自己也就有前途。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前途，自己想另来一套个人的前途，那确实是没有前途的。说这些话的同学，大都有类似的想法：前途就是个人的名誉地位，“当不成专家”，一辈子做一个教师，既无名誉，又无地位，没有前途。其实，如果抱着个人主义的想法去寻找前途，那不但师范学校没有前途，考任何学校也都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个人要有前途，就必须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愿望，再加积极的努力。这样，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光明前途。

我们反对利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各种观点，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它与社会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名誉地位。为党和国家所器重的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他们被选入代表民意机关中代表民意，能说不是他们光荣的名誉地位吗？有人说：“入师范学校得不到什么，做不成专家”，这也是错误的。一天到晚只想当专家的人，恐怕在什么岗位上都得不到专家。然而，只要勤勤恳恳、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为人民学习、为人民工作，也许不想当专家，而恰恰可以成为专家。如果能抱这种态度做人民教师，又为什么不能或不可以成为人民的教育家呢！

“教师工作困难，动不动还要受到批判”。教师工作有困难，也费心血。与教师工作一样，哪一种事业没有困难、不费心血呢？我看，人间是没有这种工作的。不克服困难，不费心血，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马克思说，科学道路上无坦途。我们把马克思的话引伸一下说，一切工作无坦途，尤其是社会主义事业无坦途。我说一句老实话，怕困难的人，终究又能得到什么呢！

但是，当教师就那么困难、那么费心血吗？当教师，比任何事情都困难、都费心血吗？我看不见得，一个害怕困难的人，害怕费心血的人，无论作什么事情，都是无法战胜困难的。相反地，一个不害怕困难，不害怕费心血的人，无论到什么岗位，他都能够战胜困难。因此，怕困难是弱者的表现。实际上，当教师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或者说，并不是比任何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困难的。

再说受批判，这并不是什么不光荣的事情。如果说，自己身上带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污臭而不受到批判，这有什么光荣呢？如果受到批判，去掉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污臭，又有什么不光荣呢？为什么那样害怕呢？自然，批判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我们赞扬的是以理服人的批判，而反对的是以力服人的批判。应该明确，批判为了使人进步。

所谓“受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是教师才受批判，他是专家或工程师就不受批判。在我们的社会里，只要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人，都应当受到批判，需要受到批判。过去有些教师受到批判，就是因为他们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并不因为他们是教师的缘故。因此，不应当把教师和批判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好象教师就一定要受到批判，而且，也不应当把批判和困难截然分开，好象做困难的事情，就不应该受到批判，因为教师工作困难多，所以有缺点也不应当受到批评，让其缺点自由发展。这样的结果，既不利于国家事业，也害了自己。这不

是从原则上看问题，不是从辩证方法上看问题，而是非原则性的、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因此，问题不在于工作上有困难与无困难，而在于有无值得批判的地方，如果有可批判的地方，就应当受到批判，否则，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不是很明显的吗！

“教师工作费心血，看不出成绩”，这有部分道理。因为教师工作是对人的工作，是意识领域中的工作，而这种工作确实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成绩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铁棒磨锈针，功到自然成。只要一点一滴去工作，终究会看出成绩来的。而且，事实上做一分工作就会有一分成绩，做十分工作就会有十分成绩，工作做得越多，成绩就越来越大。只要我们做了工作，并且对广大人民有利，就是非常光荣的。

“功课优良的同学，考师范是不是可惜”？从这个问题的提法看，好象师范是低下的事业，或者说，程度低的人学师范就行了。不能这样看。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因而，从事各项事业的人，也无什么高低之别。教师是培养人的工作，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怎么能认为是低下的事业呢！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目前，高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高等师范也是如此。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是提高中学教育质量的关键。为了办好中等学校，就必须办好高等师范，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而对于提高高等师范教育质量有重要意义的是考生的质量。我们希望功课好的同学来报考高等师范，这不是屈材，不是可惜，而是高等师范学校所必须要求的。程度低些的同学来报考，我们也十分欢迎，只要够得上录取的标准，我们当然是会录取的。但是，有些同学认为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任务大，成绩够不够没关系，反正是可以录取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师范教育和教师工作，是光荣而重大的事业，它能使人朝气蓬勃。由于教师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国家建设人才，桃李满天

下，所以，教师自己也就会感到十分愉快和光荣。但是，有些教师以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前途，说什么教师象一支蜡烛，照亮了人家，毁灭了自己。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学生的前途完全错误地对立起来，而不认为把学生照亮、学生将来给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为光荣，为愉快，反而认为是毁灭了自己，这是何等的错误呵！应该说，教师工作照亮了人家，也就等于照亮了自己，因此，教师的工作是十分光荣的，也是十分愉快的。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一齐站在党的教育战线上，为培养千千万万的国家建设人才而努力吧！

# 欢迎青年献身人民教育事业

——致应届高中毕业同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〇年)

同学们：

在你们将要毕业、离开母校、更换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我怀着满腔的热情，想和你们谈报考高等学校的志愿问题，这是大家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有些同学对高等师范教育有不正确的或不全面的认识，所以我想就报考高等师范学校的问题，和同学们交换一些情况和看法，这也许是有益的。

由于国内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师范教育被推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必然的。生产的高潮，必然引起文化的高潮。目前我国的文化高潮，在生产高潮坚实的基础上已经汹涌澎湃地到来了。几年来，各类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教育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目前需要的教师数量很大。因此，师范大学对于解决师资问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党和毛主席对师范教育一直是重视和关怀的，从教育方针的制订，到教学改革提出，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今年，又要给甘肃师范大学分配更多的学生，这是党和国家重视与关怀师范教育的标志。这对于我们师范教育工作者、以及已经受师范教育和将要考入师范院校的同学，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如果我们轻视师范教育的思想，那就辜负了党对师范教育的热切期望。

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重视，在甘肃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甘肃师范大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为把甘肃师范大学办成一个

名实相符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而努力。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甘肃师范大学得到了深入的贯彻。由于实行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由于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由于学生重视专业，勤学苦练，教学质量得到了空前提高，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的大中学校教师、科研人员和理论工作者，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这些同学在修业期满后，将一批一批地走上光荣的工作岗位，千千万万青年学生，将在他们的教导和抚育下成长起来。作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对于这种动人心弦的情景，哪能不万分地兴奋和愉快！那能不感到十分光荣呢！

历届高中毕业同学，由于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已经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报考师范大学的人数与年俱增。同学们，今年高等学校的考期将近，你们正在反复考虑自己的升学志愿，我们全校教职员和同学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欢迎同学们报考我校，并且正在热情地为即将考入我校学习的新同学布置较好的学习环境。

但是，还有少数同学对党极为重视的高等师范教育，仍持有某种陈旧的、不正确的看法，比如有的同学说：“当教师太辛苦。”有的同学说：“成绩不好的才被分配到师范院校去。”等等。“当教师太辛苦”，这话并不完全错，因为教师确实有点辛苦。但是，问题在于一个被党培养了多年而高中毕业的同学，因为害怕辛苦不愿报考高等师范，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这些同学应当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辛苦的教师，还有什么教育可办！大家还能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吗！一个人民教师能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能为青年一代的成长而辛苦，这不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恰恰是一种光荣，一种骄傲。再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哪一件不辛苦呢？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青年是愿意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还是愿意当

庸庸碌碌的混世人？实际上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一个有共产主义宏图大志的人，并不知道辛苦是什么，在他们身上，辛苦就是愉快、就是光荣。反之，一个未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当教师怕辛苦，从事其他事业又何尝不怕辛苦呢！怕辛苦的人是搞不出什么事业来的。一个充满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人，对党的所有事业都不一定会满意，也许今天满意的事，到明天就不一定再满意了。发展的结果，必然一无所成，甚至会毁灭自己。因此，在我看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辛苦不辛苦，而在于思想观点、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这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深思。至于说考试成绩不好的才被分配到师范院校，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实际上，这是那些不愿报考师范院校的同学的一种借口。报考师范大学的同学的成绩，固然有较差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差，而且也不是每门功课都差。如果说，考师范大学的某些同学在某些知识水平方面相对地差一些，那么考其他大学的某些同学，在某些方面也未必不存在差的现象。某些同学长于这方面，某些同学短于那方面，这是报考各类高等学校所有同学的必然情况。因此，说成绩不好的同学才被分配到师范院校，认为这些同学没出息，是十分错误的。

问题不仅在于认识和观点上的正确与否，而主要在于如何对待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观点。每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都不是直线的，而是经过曲折道路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学对于错误观点改正得快，有的改正得慢，个别的也许长期不会觉悟。但是，只要能认识错误，立即改正，并依据自己主观情况，实事求是地填报志愿，服从组织的分配，那也是无可指责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坚持错误的看法，则是很危险的。

我这些看法，也许是不妥当的，把它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 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总结教育经验

(一九六〇年)

## 一、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

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是高等学校三位一体的重要工作。但是，教学仍应是学校的基本任务。所谓教学是基本任务，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应被忽视，也不意味着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完全要围绕着教学进行，为教学服务。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特别加强。科学研究要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应围绕教学，进行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的研究，这是它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能忽视。但还应当进行为发展生产服务的科学研究，这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生产劳动，也要坚持进行。生产劳动应当尽量结合专业进行，这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学用一致的原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对专业教学无直接关系而与思想教育却紧密相联系的其他生产劳动，也必须适当地进行。

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等雨论”和“冲突论”都是错误的。经验证明，教学只有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大大得到提高。不重视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和生产劳动而侈谈什么提高教学质量，则是很困难的。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教学和生产劳动为它不断提出研究课题，并不断研究解决这些课题时，才能获得很快的发展。生产劳动也是如此，教学和科学研究对它也是有意义的。为生产直接服务的科学研究，可以解决生产上的科学技术问题，帮助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生产劳动无直接关系而有间接关系的教学，则可以提供学生生产劳动的某些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基础，有利于生产劳动。

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



以因系科专业性质的不同而各有其特点。经验证明，理科方面的物理、化学、生物三系，一般地讲，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都完全可以直接结合进行；地理、数学两系，在某些方面教学和科学研究二者可以直接结合进行；在另外一些方面，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可以结合进行。在文科系科中的政教、中语、历史、教育等，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可以结合进行。至于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虽也可以结合进行，但从业务知识内容上说，并不都是很直接的。在业务和政治思想相结合的意义上来讲，也是直接的结合。这样就可以看出，文科和理科的三结合形式是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的。

就师大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总括为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完全结合与不完全结合，内在结合与外在结合三种。

直接结合。所谓直接结合的形式，就是指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的课题直接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形式，实质上难以分出三结合中那个是教学，那个是科学研究，那个又是生产劳动，而只能看出这种形式是教学，也是科学研究，也是生产劳动。生物、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些现场教学，就属于这种形式。关于间接结合的形式，则是从专业性方面看是结合的，但在具体的课题上则是不完全统一的。例如地理系的冰川考查，生物系的野生植物调查等，这种形式在三结合的形式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值得重视。直接结合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是，这在目前实践中还不是很多的。因为教学的单元、教学的具体过程，比较难于和科学研究项目的具体过程、以及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活动的具体部署完全地、恰到好处地配合在一起，完全地、恰到好处地对准口径。实际的执行过程，总会表现出差前错后，完全对准口径的还是少数。至于那些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有些则难以与教学过程直接配合，这是不言而喻的。本来不是那么自

然、有节奏的直接三结合，而是机械的拚凑，则是不适当的。

完全的结合与不完全的结合。这也是在我们实行三结合的过程中得出来的一条经验。无论是问题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我们认为都应当称之为三结合，所谓完全的三结合，它的特点是：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共同结合在一起，它的形式不论采取直接结合也好，间接结合也好，均应谓之完全的三结合。如果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方面作到了这样的三结合，应该说已经实现了三结合。倘若认为间接三结合不叫作三结合，则是不适当的。当然，满足于此种三结合，而不再寻求更多形式的三结合，也是错误的。所谓不完全的三结合，其特点就是：教学、科学研究和同类专业采取了间接结合的形式，而在科学知识上生产劳动与教学、科学研究则无直接联系。如果，就政治思想（生产劳动对学生思想的改造和锻炼）和业务（教学、科学研究）关系而言，则这种结合，也必须叫作完全的三结合。而这种三结合，是我们应当特别提倡的。

内在的结合和外在的结合。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所谓对立的，是指它们间的差别而言，这种差别不妨碍它们的结合。所谓统一的，是指它们间的共同而言。这种共同就是它们能够结合的内在条件。内在的结合，是就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而言。三结合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也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是说，教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学研究也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都必须与无产阶级政治相结合。这是教学、科学研究联系政治实际的一个方面，也是它们内在统一的一个方面；这也就是说，教学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也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它们在生产劳动这个实践上结合了起来，这又是教学、科学研究联系生产劳动实践的

一个方面,也是它们内在统一的一个方面。这种内在的结合,或叫作内在的联系,如前段所述,有的表现为直接的,有的表现为间接的;也有的表现为完全的,有的表现为不完全的。不管它们的表现形式有多少不同,它们的基本实质则是一样的,即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它们的内在统一性,还表现在理论性、科学性的关系上。这就是说,教学理论、科学理论和生产理论虽各有特点,但它们有理论上、科学上的共同因素,即理论上、科学上的统一性。所谓外在的结合,就是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组织、制度和时间分配上,有一个统一的合理的安排,使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不能不提到它们的机构问题。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领导机构,应当健全起来,三者机构的设置,主要问题不在分别设立、还是统一机构,而在于三者的有机联系,以我校情况看,应当加强三者的联系,这有利于三结合。各系有关组织,也应相应地健全起来,以便利上下左右的协同动作。教研组的工作应大大加强。为了加强科学研究,本校已经和正在建立几个科学研究室(所),教研组和科学研究室(所)应有很好的分工和协作。关于时间的安排,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又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人说三结合有矛盾。其实三者安排得好,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安排得不好,也确会出现一些矛盾。本校在这方面已根据中央精神,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但也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还有一个社会调查、生产实习、教育实习等,是否应计入生产劳动时间内的问题,现在各系作法不一致。一般地讲,这些活动不应当计入生产劳动时间内。但其中确有属于生产劳动成份者,亦可酌量计入,以便确保三者的有机结合。

## 二、课堂教学为主

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教学的过程有备课、课堂教学、实验、辅导、习题课等等。在这一过程的各个环节中,课堂教学则是主要环节,它对教学成败起着决意定

义。但教学的各个环节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教学的形式也有多种，如课堂教学、现场教学、教育实习、生产实习以及有关教学的某些社会调查等。在这些形式中，课堂教学也居于主导地位。但它们间也是处于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中。这本来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但在教育大革命过程中，曾一度有些学生不重视课堂教学，他们不适当地强调自修，课堂秩序有些紊乱，目前这种情况虽不太突出，但也不是无一点问题。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目前强调以课堂教学为主，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课堂解决问题，是贯彻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的重要问题。一些教师至今在这一个问题上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看法，有些属于认识上的模糊，有些则属于原则上的分歧。有两种偏向，一种是要求课堂上解决所有问题，另一种是强调课堂上不能解决问题。要求课堂解决一切问题，这不但是做不到的，而且是不应当的。过分强调课堂教学，就是只看到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教学环节的积极作用，忽视了矛盾的其他非主导作用。强调课堂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对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的重要性、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是错误的。但是，所谓“课堂解决问题”，在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同年级是否应有不同要求等问题，有研究明确的必要。所谓课堂解决问题，应该说是要求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能够当堂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各科的基本知识、原理、原则、概念向学生讲解清楚，而且使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基本领会。能够做到这点，就算课堂解决了知识问题，否则就不是。另外，在教学中正确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必须加强的，求得每堂有每堂的收获。各科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也必须十分注意。当然，通过课堂教学，要完全地和最后地解决学生思想上的问题，则是困难的。

因为还有一个实践过程，通过实践，才能完全解决思想问题。至于不同年级是否有不同要求，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这里没有原则上的相异问题，只是对他们讲解的详或略而已，高年级从简，低年级从详。

以课堂教学为主，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教学过程的其他环节，相反，必须加强备课、实验、辅导等方面。只有加强了这些环节，才能真正从内容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表现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形式。当然，加强课堂教学，也必然会促进其他教学环节的加强。它们的作用是互为因果的，用形而上学的因果观看待教学各个环节，则是错误的。

备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对于课堂教学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在课堂上教好课，首先要备好课，不备好课而空谈什么以课堂教学为主，则是无济于事的。备课可以分直接备课和间接备课两种。为了真正把课备好，直接备课和间接备课均应给予同等重视，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所谓直接备课，就是要把每一堂课的内容备好。所谓间接备课，就是要教师们经常博览群书，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更要十分重视专业知识，特别是专业新知识的增加，要做到精。还要广泛阅读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其他邻近科学，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做到博。一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教师，不但备不好课，而且也教不好课。当然，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只图博而不求精，也是不适当的。

在实验方面，也必须加强。实验是课堂教学付之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对课堂教学起着验证作用、巩固作用，而且它还能大大促进课堂教学的质量。目前学校实验活动应该重视两个方面的工作，这就是：教课教师和担任实验的教师应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克服脱节现象。这不但对学生有益，而且对教师也是有好处的。旧时教师有一种恶习，不愿意担任实验课，以为这样作就

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这是有害的一种想法。当然，这种恶习是旧教育制度遗留下来的。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加以克服。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实验课的内容也应基本上统一起来，克服互不相关的现象。过去实验用大循环的办法，把实验活动孤立起来，形成与课堂教学完全无关的状态，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问题必须加以克服。目前两个方面的分别统一，固然在人力上、设备分配上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样做的方向是正确的，会给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实验质量带来好处，应当力求实现。

辅导工作对教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它与课堂教学比，是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既不应忽视，也不应不适当地强调。教师要积极主动进行辅导，采取“候诊”的态度是不对的，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学生对于辅导也不应该采取被动“防卫”，而要采取如饥似渴那样的求知态度，争取教师多辅导。这样的辅导一定会成功。对于少数学习困难的学生，应当加强辅导。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则必须强调课堂解决问题，而不应当强调对他们的辅导。因为强调不适当，一方面会相对地降低课堂教学的主要作用，造成学生的依赖心理。另一方面低估它的作用，也会间接地降低课堂教学质量，造成教师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形式如现场教学、教育实习、生产实习、野外实习和社会调查等，相反地，必须进一步加强。目前本校文理各系科，均应当在校内外积极地建立固定的三联基地，进行教育实习、生产实习，提高现场教学质量。固定的三联基地不但便于教学和实习，而且便于系统地创造经验和总结经验。其他各科的教学形式也应当好好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配合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 **三、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如何加强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里想就下列几个

问题给予阐述。

1、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加强基础课的教学，首先要解决什么是高等师范的基础课。什么是基础课，各方意见纷纭，没可一是。目前对基础课的了解大体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基础课的范围狭窄化，应该属于基础课范围的知识却不放在基础课内，这是不适当的；另一种是把基础课的范围扩大化，把不属于基础课范围内的知识却放在基础课内，这也是不适当的，应该放而不放，就会使学生的基础知识不足，妨碍对于提高课的学习，影响学校培养目标；不应该放而放，也会因课程负担重，影响学生对真正基础课的学习，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基础课与非基础课虽有一定的界限，但是不能把它们区分绝对化。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一般地讲，基础课就是培养一定人材所必备的、系统的基本知识。那么师范大学的基础课是什么？我觉得教育部所颁布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教育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门必修课程，广义地讲，基本都属于基础课。这样的说法，也许太简单了些，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具体明确，至于根据新的培养人材的需要，是否还要新确立若干基础课，也有加以研究的必要。至于在基础课内容方面添加新内容，取消陈旧重复部分，以及把一部分内容下放到中学、中师去，则是需要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我的意见，根据各科的内容，可以分作一般基础课（政治、教育、体育、外语）、基础课（数、理、化、语文）和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程）。这样的分法是否适当，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想是可以的。过去一般把数、理、化叫作基础课，所谓加强基础课，也就是加强数、理、化。这样的分法、叫法有道理，但从广义上来讲，似不完全。数、理、化诚然是基础课，而专业中的基础课程和公共必修科，也应属于基础课程范围。不这样理解，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说，德育、智育、和体育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必须具备的知识，不接受这三方面的教育，就不能得到全面发展，就不能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完备知识的、又红又专的教育工作者，也就不能使自己达到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的。因此，把专业必修科和公共必修科均明确叫作基础课是有理由的，也是很必要的。所谓加强基础课，应该意味着加强所有的基础课。当然，在作法上提出加强某一方面的基础课程，也是非常必要的。

教师一定要教好基础课，学生也一定要学好基础课。目前应特别教好学好数、理、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为了学好基础课，学生在专修基础课期间，应十分重视课堂学习、课外阅读和自习，也应该以有关基础的东西为主，不应过于分散；在基础课的教学上，教师要走“取法乎上”的路线，避免“取法乎中”。继续配备在政治思想上、业务上优秀的教师，担任最基本的基础课教学。在辅导和实验方面，也应特别注意基础课的辅导和实验。

当然，我们强调加强基础课，只是希望让教师教好基础课，学生学好基础课，并不包含把培养学生仅仅放在基础知识范围内，不进一步注意提高，不是的。我们不赞成这样一种说法，似乎综合大学应该充分注意提高，而师范大学只须注意普及就行了。应该说，不论综合大学也好，师范大学也好，均应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而只是在提高的方法上各有不同特点而已。我们的师范大学，要在普及（加强基础课）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讲授提高课），既要重视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在适当时候又要充分加强专业提高课的设置和教学。这就是说，要适当地增设专业、专门化，打破现有专业设置的框框，以提高师范大学的科学水平，使学生的知识达到既博又精，成为具有相当科学研究能力



的、胜任高中、大学教师职务的教育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

2、贯彻理论观点和业务观点、以及理论和业务相结合的观点。要加强以基础课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提高质量，必须贯彻理论观点和业务观点，以及理论和业务相结合的观点。不论人文科学的课堂教学，或自然科学的课堂教学；不论一般基础课的教学，或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也不论基础课的教学，或提高课的教学，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在业务课中有机地贯串与该课程有直接关系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应当更多地重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各章节；哲学教学要特别重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语教学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教育学教学要以毛泽东同志教育思想为指导。

教师讲课的基本观点只能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但是，在讲业务课传授正面知识、或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贯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观点时，应当以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而不应当采取客观主义、人云亦云的态度。对于悬而未决的某些纯学术性的问题，仍当用“百家争鸣”的方针解决；但在讲授时，除陈述各种不同观点之外，也应该讲自己的看法，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另外，在讲授业务课时还必须将业务知识中的原理、原则、概念等阐述清楚，使学生领会。讲“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这是过去教师讲授的通病。必须讲清楚“是什么”，而且也要讲清楚“为什么”。讲清了“是什么”，而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只能说是完成了讲课任务、传授知识的一半，或者还不到一半。当然，我们强调讲清楚业务知识中的原理、原则、概念，并不是让教师钻知识的牛角而放松基本知识内容的讲授。钻牛

角的办法是不对的，应当反对。

3、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教育革命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解决了理论要不要和实际相联系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根本分界线之一。

教学理论应当联系什么实际。毛主席说：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的知识。知识既然有两种，那么知识来源的实践也当然有两个，有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既然有两个实践，那么我们的教学理论就必须紧紧联系这两个实践。当然，学生的情况和中等、高等学校的实际也同样要重视。如何具体联系，要以每堂课的性质和内容而定，可以有所偏重，要反对教条主义的联系方法。

目前在课堂教学联系上，需要多加研究的是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方法，就是毛泽东所教导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认为，课堂教学具体联系实际的方法，可以采取这样两个，一个是用演绎法，一个是用归纳法。演绎法就是用基本知识、原理、原则解释有关的政治斗争、思想问题和生产实践；课堂教学联系实际的归纳法，就是以有关教学的政治斗争、思想问题和生产实际等客观事实，加以分析、研究、概括，找出其中的规律，以论证所教课程的内容。

这两种联系实际的方法，从人们认识的具体秩序来看，也是适当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时说：

“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

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毛泽东同志这里虽然讲的是由特殊到一般和由一般到特殊的两个认识过程，但是，也适用于课堂讲授由实际到理论、由理论到实际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两个具体过程。

在一个课时的教学过程中，两种方法可以并用，也可随着讲课内容的不同只用前者，或只用后者，但是，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只要能够结合有关教学的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讲清楚课程内容，就算基本上达到课堂讲授联系实际的初步目的。

4、教与学的统一。教与学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不论对教师的教课和学生的学习，以及对教师和学生自己都是如此。教与学必须很好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提高课堂教学的目的。如果是教师讲的一套，而学生想得又是另一套，不能统一起来，就不能达到提高课堂教学的目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教与学统一起来？

首先，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统一起来。从固定的意义上讲，教师是教师，学生是学生，他们是一对对立面。但是，在某些知识上，学生超过了先生，那么这个对立面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转化，这时候教师变成了学生，学生变成了先生。韩文公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话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有道理的。师与生，教与学，不是绝对对立的，因为，既然是教师，当然他有主导师的一面，而学生虽然是学生，但他也有师的成分。教师虽然是教师，但他在某些问题上不如学生，因此，就具有做学生的因素。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教与学、师与生的辩证关系，才能从理智上、实践上解决教学相长的问题，也才能够使教与学真正统一起来，达到提高课堂教学之目的。

其次，在因材施教的原则下统一起来。教与学是对立的统一体，而实行因材施教，则可以具体促成教与学的统一。因材施教能使师生意志统一，主客观统一，教与学趋于一个教育目标。因

此，我们必须把因材施教作为教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我们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应该是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因材施教，着重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应当从内容、形式两方面去了解，这就是说，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而施教，所以一方面可以因材施教之以适当的方法之教，一方面又可以因材施教之以必需的教育之教。由于大学生和小学生的年龄、知识、经验悬殊，因而在因材施教的施行上，应该有所区别。这里不谈小学生。我觉得在大学，应当着重内容上的因材施教，教师首先要因学生之材而授之以必需的教育。为了达到这个必需的教育的目的，因材施教之以适当的教学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轻重倒置，忽略内容而重方法。着重内容上的因材施教，可以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因学生之特长而施教，一个是因学生之特短而施教。所谓长和短，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德、智、体三方面为准则的。在这个原则下，学生特长于某一学科，应给予很好的发展机会；但对其特短，亦必须加强教育，使之能够全面发展，达到殊途同归之目的。

第三、在严格要求与责任感相结合的原则下统一起来。我们采取民主的、自觉的教学原则，反对惩罚制度；但是，我们不是放任主义者，在课堂教学上我们反对放任自流，主张严肃认真。教师对学生一定要严格要求，毫不苟且。要教师能够做到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解决教师的教学态度，建立为学生服务的责任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己而后能正人。”一个对教学有高度责任感的教师，他就敢于严格要求学生，而学生也就会为教师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从而努力于自己的学科。这样，教与学就统一起来了。己不正，也不能正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教师，他就必然不敢严格要求学生，而学生也就可能因教师的放任而心驰于他事。这样，教与学就分离了。因此，必须首先要求教师树立教学上的责任感，同时要求教师严格要求学生，两者紧密

结合起来，以达到教与学统一的目的。

5. 系统讲授与重点讲授。系统讲授和重点讲授是统一的课堂教学的两个方面。因此，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去理解，不能把它们机械地对立起来。关于在系统讲授和重点讲授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些教师说，做到系统讲授就做不到重点讲授，或者强调重点而忽略系统，为了重点突出就自找问题去讲。这实质上就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了。这是两种偏向，都是不对的，应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找出科学本身的系统性和关键地方，系统讲授与重点讲授能结合得很好，这当然与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经验的问题有关；但是，其所以发生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偏向，某些教师的教学态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要解决系统和重点讲授问题，首先要解决一些教师的教学思想和态度问题。当然，教师水平的提高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前一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促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有其前因后果，观念的东西也是如此。因此，在教授由客观规律所反映的科学规律时，就必须注意系统的讲授。所谓系统的讲授，就是讲清楚科学的规律性。不系统的讲授，就不可能清楚地表达科学的系统性和它的规律性。因而系统地讲清楚科学的系统性和规律性，是课堂教学的基本任务，绝对不能忽视。但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其关键地方与非关键地方。所以对于科学知识的讲授，也应当有主次和关键、非关键之分。而平铺直叙地进行讲授，则是违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也是违犯教学规律的。因而，重点讲清楚科学知识上的重要问题（也是规律问题），也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所谓知识的系统性，也包括重点知识在内，它们是对立的统一体；因此，“严格地讲，系统的讲

授也应该包括重点讲授在内。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机械的对立起来，才是完整的课堂教学的规律，才是完整的揭露了科学知识的规律，也才能完整地给予学生以完整的科学知识。

因此，教师必须加强课堂教学的计划性，真正建立为人民、为学生服务的观点，反对自由主义的教学思想和态度，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努力提高自己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专业知识水平，在系统讲授和重点讲授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大大提高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

6、加强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既可以加强学生对课堂讲授的理解，又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提高和加深是对立的统一体，如果学生经过课堂讨论加深了对课堂讲授内容的理解，那么同时就为学生进一步提高自己打下了基础，没有加深，很难有提高；同样，没有提高，也很难以加深。因此，所谓课堂讨论上的提高，就是在加深讲课的基础上提高，离开加深而寻求提高是很困难的。所谓加深，也只有在提高中才能加深，离开提高是不容易加深的。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毛主席讲的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所讲的是加深与提高问题，问题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毛主席所讲的辩证法的道理，则完全可以作我们讲加深与提高关系的指导，加深和提高并无什么绝对的界限。但是，有些教师对于课堂讨论加深、提高这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采取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或者说，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讲课内容的理解；或者说，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各执其一，这是不妥当的。加深和提高虽无绝对界限，但就相对静止的意义上讲，加深是让学生对本问题更清楚、更深入地理解，而提高则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更高的新的知识。

课堂讨论，既要加深，又要提高。一般地讲，加深是课堂讨论的基本目的，而提高是服从于加深的。但是，某一课题课堂讲授已经解决问题，没有再多加深的必要，那么，以提高为主也是十分必要的。

课堂讨论要围绕讲授重点进行，讨论最基本的问题。课堂讨论的形式，可以采取两种：一种是以班为单位讨论；一种是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两种形式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一般地讲，先在小组会上把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酝酿一下，俟较成熟之后，再拿到班级大会上讨论。这样，就会做到讨论会既有准备，又很精悍，效果也大。既非重大的、又非枝节的一般问题，通过小组会讨论解决就行了，不必拿到班级大会上讨论。当然，有些重大问题如果同学已经比较胸有成竹，也可以不必经过小组，直接提到班级大会上讨论。这样的课堂讨论，既可以避免烦琐，又可以多、快、好、省地提高课堂讨论的质量。

#### **四、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如何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应表现在哪些方面？实践经验证明，应当是这样的：

首先，教师要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必须具备几个前提，而最根本的是三个：即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观点和较高的业务水平；树立忠心为人民、为学生服务的教学态度。没有或缺乏这三个前提条件，教师要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主导作用是不可能的。这点，完全为我们学校在实行教师主导作用的过程中所证明。因此，目前一方面应当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同时又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教师更能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主导作用。在这三个前提条件中，决定的条件是第一个。学校教学实践证明，某位教师第一个条件较好，那么第二、第三也就比较好，反之就比较差。目前我校大多数教师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他们

们的主导作用，并且正在为确立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基本条件而努力，这点是好的。

其次，教师应当在多方面起主导作用。根据韩愈的说法，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这对我们有可取之处，但对今天的教师来说，似嫌不足。今天的教师应更多地起主导作用。根据我们的经验，总括起来，应有这样几点：①向学生正确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②正确传授科学知识，努力使教学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其养成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作风；④以身作则，培养学生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教师应当在这些方面起主导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凡教师的课堂教学、课堂讨论、课外辅导以及与教师有关的学生课外阅读，科研论文、作业、实习实验、考试考查、现场教学等等，都应当认真进行和参加指导。当然，应根据情况，有主次、有节奏地进行，避免一般化。因为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因而，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形式和场合就是课堂教学，教师应当经常抓紧这个环节。



#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

今天谈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讲过，但讲得不多。根据团委反映，今天在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虽然还存在民主不够的现象，但主要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所抬头，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所滋长，这种情况虽然只是在极少数同学中比较严重，但影响很大，今天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

##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根本的组织原则

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列宁经过向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列宁、斯大林提为民主集中制，我们则叫民主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其实，共青团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同样也是团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其他如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也都是如此。按照党委规定：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为了讲起来方便，先讲党的民主原则。

党的民主原则。党的民主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说各级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各级委员会的权力是由选举它的成员给予的。各个委员会要定期向各个代表大会，或全体大会作工作报告。党团组织必须听取党团员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民主。党员、团员权利的规定，也都体现了民主原则。要发扬党内、团内民主，充分调动党团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民主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上下级之间、领导和党团员之间的联系，才能保证党、团领导的正确，才能使党、团生活生气勃

勃。在发扬团内民主方面，现在有的团支部还做得不够。有些应该让大家讨论的问题没有充分讨论；对来自团员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没有认真研究和处理，一拖再拖，个别干部仍然简单急躁，态度生硬，使得有的团员怕他，不敢向他汇报，不敢和他接近。这样很不好。民主作风不够，就会妨碍团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影响到集中制。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这是前几年的经验教训之一。另外，有的团员也不大注意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在团的会议上讨论团的工作不热心，不大感兴趣。有人说：“讨论来讨论去还不是那一套，没意思。”“给支部委员会讨论去。”这个态度就不好。团的工作和团的决议你不认真讨论，怎能贯彻执行。

其次，讲党的集中制原则。我们在发扬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统一集中的原则。党的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不是为了削弱党的集中统一，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团的组织也是这样。所谓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说：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会议和党团员的言行，都必须按照统一的章程、统一的纪律进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因为党要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要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保持团结和统一。因此，必须有高度的集中原则。可见民主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为了更好的集中。在民主的过程中包含有集中。比如在民主讨论问题时，总要有人主持，并在最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便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可是我们学校有的人还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而一味追求民主，不要集中。有的人甚至把民主集中制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民主——集中——民主；讨论——集中——讨论。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讨论讨论，看是否正确。我认为是不正确

的。如果讨论是目的，民主只是目的，那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子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这实际上是无目的论。恐怕无目的地讨论下去，我们连饭都吃不成了。因为没有人干活，没有人指挥生产。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战胜强大敌人，更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古话：“作舍道旁，议论多而难成。”在大路旁边修房子，这个人说这么修好，那个人说那么修好，难以统一。还有一句俗话：“三个阴阳安不成一个鸡窝。”没有人把意见集中起来，统一认识，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不要说做大事，就连一个鸡窝都安不成。

可见，大家有必要进一步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弄清楚。民主和集中，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说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并不是说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有了集中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是说，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问题、决定问题时，往往发生矛盾和意见分歧。某些领导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以致集中过多、过死，就会损害民主的发扬，损害党员、团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反，如果过分强调民主，不要集中，那也会形成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总之，处理不当就容易执其一端，忽视另一端。所以说，民主和集中是矛盾的。

但是，民主和集中又是统一的。矛盾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根据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有两层意思：（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集中；没有集中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两者必然处于统一体中。在民主的过程中包含有集中，包含有共同的东西；而在集中的过程中也包含有民主。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两方面还会互相转化。比如在进行民主讨论问题时，充分讨论，这是民主；经过民主讨论并

分析研究之后，需要把分散的、无系统的、甚至相反的错误的意见集中为系统的、统一的、正确的意见，作出决定，见之于行动，这就是由民主到集中的转化；另一方面，组织的决议、指示，这是集中的东西，决议、指示下达之后，要同群众商量，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变为群众的东西，这就是由集中向民主的转化。象这样由民主到集中，由集中到民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说明民主和集中既是矛盾的，又是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的。

有的人看不到民主和集中这种辩证关系。他们把二者割裂开来，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有一个团支部今年选举时，候选人本来先由各个团小组提出，经支委会讨论集中，再发下去让大家讨论后才决定的。但是，在进行选举时，有的团员仍在选票上写了两个大字：“弃权”，并且认为团支部委员会提候选人就是不民主。这是一个偏向，即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支委会集中了各组的意见，提出了候选人名单，这是比较大的民主。而且，你可以选这些人，也可以不选这些人，另选别的人，这有什么不民主呢！问题是有些同志对民主有片面的理解，个人主义的理解，以为通过每一个人才叫民主，而通过大多数人不叫民主，这是错误的。这不叫正确的民主，而叫极端民主化。还有同志说：“过去民主太少了，现在应该什么都讲民主，让大家享受享受”。在学校里民主广泛一点是必要的，但是，不论大小事情，都要通过群众，领导无权决定，那我们什么事也作不成了。前两年民主空气不够，这是事实，是思想上的片面性，应该改正；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片面，走到另一个片面。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集中也可以这样说。大家可以认真地想一想：民主不是为了集中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民主而民主？开会讨论不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讨论而讨论？

民主和集中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矛盾的统一体。不能光讲

民主，不讲集中；当然也不能光讲集中，不讲民主。但是，构成一对矛盾，绝不是半斤八两，百分之五十的民主，百分之五十的集中。客观情况决不是这样的，必然因情况不同而有别。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的具体实施，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区别。比如战争时期、白区地下工作、和平建设时期、解放地区都有所不同。战争时期、白区地下工作，需要集中多些，民主少些；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解放区内，民主就多些，集中就少些。军队里边和我们学校不同，军队里边集中多些，命令多些，民主少些。当然，这些都是相对而言。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我想在我们学校里，民主要广泛些，集中就不能过多、过死。对于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要实行的很恰当，固然有一个认真与否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个领导有无经验和领导艺术如何的问题。我们应当力求改进，达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几个问题

当前在我校师生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认真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怎样。特别要教育广大师生弄清党的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反对封建主义、发展生产力，有其进步性。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喊这些口号就不应当了。修正主义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把民主、自由等奉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划清界线。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根本分歧在于：（1）思想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吹嘘什么“个性自由”、“绝对民主”等等。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个性自由、绝对民主呢？如果说有，只有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本家才有，而无产阶级、劳动

农民是没有的。而后者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上，把个人的民主、自由从属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利益。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它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2）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把民主作为幌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思想在我们国家传播，就会瓦解党的组织性、战斗性。而后者是为了发展集体主义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提高党的战斗力。（3）方法不同。前者是把民主和集中截然分割，以民主为目的，否认集中。这些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它们对人民只有剥削、压迫，没有真正的民主。而后者是把民主和集中辩证地统一起来，达到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

2、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目前，同学中的组织性、纪律性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人随便不上课，特别是不上公共政治课、教育课，认为政治课容易，不学也可以考及格。实际上是重业务、轻政治，或者政治、业务均不重视；全校的报告不参加，有的听报告时心不在焉，看小说，甚至早退；自习时间逛十里店，看电影、睡大觉，甚至谈恋爱，恋爱至上。个别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身败名裂，受了处分；家在兰州的学生，有些人星期六午饭后就回家，直到星期一、星期二才返校，别人批评他，他还理直气壮地说：“学习是自觉的，何必那么死，在家里自习不是一样吗？”我看他们如果再不听学校的指挥，就让他们上家庭大学去吧！每年放寒暑假后，总有一些人不按时返校，甚至迟到几个星期，借口这样那样。对这些人今后要严肃处理。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恶劣影响。

要解决上述问题，办法有三条：（1）加强纪律教育。我们

认为，纪律和自由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纪律和自由是矛盾的，因为纪律总是要限制那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体利益的个人的自由；但纪律和自由又是统一的。因为纪律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和正当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如果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有自由。否则就无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是和纪律无矛盾的。纪律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对任何人都存在，任何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应该遵守纪律。听说有的班级在整顿学习纪律时，规定了一些纪律要大家遵守，有的团员和青年就加以反对，认为“纪律是给小学生、中学生订的，大学生不需要什么纪律。”这是错误的看法，在这些同志看来，因为学生大所以就不应该有纪律，学生小就应该有纪律。这是不对的。当然，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纪律，应该规定恰当。对于自由，同学中也有不正确的理解。他们认为，不遵守纪律，不参加必要的集体活动，这就是自由。如果说这是自由的话，这只能是个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无产阶级所讲的自由。其实，正确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行动，去侵犯他人的自由，而是对于事物发展必然性的认识和按照一定的规律去行动，否则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自由。在学校就没有不上课的自由，也没有破坏纪律的自由。（2）严格组织生活，经常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说大家要民主的话，这就是民主。现在，有些人对批评很不感兴趣，明明自己有缺点，别人稍一批评，就说什么“这是压制民主”，“又是五八年的作风”。五八年有些班干部、团干部确实比较简单粗暴，这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我们要负责的。这种作风应当改正。但不能因此而丢掉批评这个武器，更不能因此而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批评也就没有进步。某支部有个团小组长工作不负责，支部批评了他，他就讽刺说：“人家是马列主义信徒呢！”当宗教的信徒未必好，那末，当马列主义的信徒有什么不好。在这位同学看来，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不香了，吃不开了。

现在确有那么一些同学，对政治不感兴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感兴趣，对毛泽东思想不感兴趣。认为业务是铁饭碗，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认为政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金饭碗（这里所谓金饭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并非把政治当作饭碗，作为闹名誉地位的本钱），永远打不掉的。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这个武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丢掉了就会迷失方向，看不清谁是现代修正主义，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看不清国内外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工作和教学中，也不会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进行，这是很危险的。（3）严格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按制度办事。我们学校已经制订了几十个规章制度，并已汇印成册。这些制度在考勤、考绩、学籍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今后要严格执行。违犯制度的就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和处分。该记过的记过，该休学的休学，该除名的除名。《告子》上有一句话：“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一个真理，必要的制度，是统一行动的保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

3、坚决按党章、团章办事。这一点也很重要。听说团里出了一些笑话：有个团支部把一个人团尚未批准的青年选为支部宣传委员；一个团员在选举团代会的代表时，在选票上竟写了两个团外青年。这都是缺乏起码的团章的常识。对团章不熟悉，或者不按团章办事。今后对党员要进行党章教育，对团员也要进行团章教育。在教育中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1）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按照党章和团章规定：个人应该服从组织；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组织的、集体的利益。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如有的毕业生不愿服从组织分配，挑地区，说：“宁愿东行千里，不愿西走一步。”有的人自己有个人主义思想，还要把它输送给别人，拉别人的后腿。如有的党团员表现较好；在工作志愿表上填无条件服从分配，但有的人在旁边讽刺说：假积极，不实事求是。试问，什么



是真积极？难道不服从分配是真积极？现在同学中还有部分人闹专业思想，这都是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的表现。（2）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者应该敢于领导，但要谦虚谨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耐心替大家办事，才能把工作做好。被领导者应该尊重领导，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就善意地、及时地提出来，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做好工作，不要过于挑剔。现在有的同学不大尊重领导，特别是不愿意尊重自以为能力比自己弱的领导。有个团员班主席，是调干生，年龄较大，工作能力较强，他因此就不愿向支部汇报，并说：“给你们毛娃娃（指支部委员）汇报有啥用。”还有一个团支委学习比较差，当支部要求一些团员向他汇报时，有的团员就当面说：“谁给他汇报呢！”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一些领导者的能力可能差一些，能力强的同学如果是真正强的话，就应当帮助领导改进工作。上述表现并不是强的表现，而恰恰是思想水平低的表现。另外，现在有些团干部不愿搞团的工作，大家委托他做的事他不愿做，或者工作拖拖拉拉，不负责任；或者怕得罪人，看到不良现象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都是不正确的态度。（3）正确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处理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制度和纪律多数人同意，但得不到自觉遵守，少数人就是不执行。他们认为“别人管不着，总支也管不着，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这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极端民主化是非常危险的；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过：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这

段话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在党内和团内都是适用的。

总之，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维护和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当前迫不及待的任务。过去，即西北局兰州会议之前，有些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民主空气薄弱，许多人不敢说真心话，党团生活极不正常。兰州会议之后，贯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了正规，但是，也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极端民主化、分散主义的苗头有所滋长。这实际上也是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坚决纠正。我国现在正在实行国民经济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作，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又要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必须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积极发挥各种组织、每个党团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带领广大群众一同前进，才能步调一致地顺利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 培养提高师资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三年)

有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教师的工作只能慢慢来。我们说：“百年树人”，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是说明培养人才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问题的另一面是：只要工作做得好，人才的成长就可能快一些，我们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过去的经验证明：各级组织对教师培养工作抓得紧一些，对教师要求严一些，他们的进步就快一些，否则就慢一些；教师对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工作与进修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青老关系等处理得好一些，他们的进步就快一些，否则就慢一些；教师自己主观努力多一些、虚心一些，治学态度严肃，治学方法科学，他们的进步就快一些，否则就慢一些。下面我分别谈谈这几方面的问题。

## 一、对各级教师要有严格的要求

这次学校制订的十年师资培养提高初步规划，对各级教师分别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这很需要。绝大多数教师对这些要求是欢迎的，认为有了这些要求，也就有了努力的方向。但也有少数教师觉得要求太高了，怕达不到，因而灰心丧气。可见对待同样的标准，有两种显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上进，标准高就加倍努力，有信心攀登文化科学高峰；另一种态度则是垂头丧气，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这后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健康的。我看不能降低要求。古话说：“严师出高徒”，对学生的培养是如此，对教师的培养也应如此。

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必须包括红与专这两个方面。又红又专是我们培养教师的根本原则，只专不红、只红不专都是我们反对

的。因此，对教师应该从思想政治和业务这两方面提出要求。

思想政治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完成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任务；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增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

现在少部分教师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红”的标准很容易达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很容易做到，现在主要是专的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真正理解“红”的实质。真正的“红”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不只是表现在口头上。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经得起国内外风吹草动的考验。有的人口头上很进步；但是，一遇到暂时的困难就怀疑党的政策、党的路线。你能说这种人是真心拥护党吗？有的人平时表面上还好，一旦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例如职务没有提升，工资没有提升，他就满腹牢骚，大闹情绪，你能说这种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可见要真正达到“红”的标准，是要经过艰苦的锻炼，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目前国际国内一有“风吹”，我们学校就有“草动”，关键就在于有些人的立场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至于世界观的根本改造，那更需要长期的努力。

我们还要看到，教师们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业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艰苦的科学实践。拿社会科学来说，它是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如果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业务，研究业务，那就几乎不能很好地解决任何一个带实际性的问题，甚至会发生理论上、方向上的错误。自然科学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能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自然发展规律，从而大大促进自己

的工作，使我们的科学水平和研究工作提高得更快一些。教师们也只有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教学，才能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下面谈谈业务方面的基本要求。

助教：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胜任一门课程的辅导、课堂讨论、习题课和实验课，经过一定时期后，可以担任部分或一门课程的讲授和指导教育实习、教学实习工作；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训练；能运用一种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讲师：具有本专业较深较广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练地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技能；具有独立担任一门课程的讲授和其他教学环节的能力，教学质量较好；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具有一定水平的科学论文或其他科学研究成果；能运用一种外国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争取掌握第二外国语（有些专业可以不要求第二外国语）。

副教授：对本专业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知识和比较丰富的实际经验；能胜任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学工作，成绩良好；有较高水平的科学论文或其他科学研究成果；能胜任培养研究生和助教的工作；能运用两种外国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有些专业可以不要求第二种外国语，对有的专业的某些教师的外语不作硬性要求）。

教授：对本专业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教学工作、培养研究生和指导青年教师工作成绩卓著；有更高水平的科学著作或其他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外语要求与副教授同。

上述基本要求是对我校不同职务教师的起码要求。现职教师凡是未达到本职务的基本要求的，应努力达到；凡是已经达到本

职务基本要求的，应以高一等职务的基本要求作为进一步提高的标准。各系、各教研组应根据上述基本要求，结合本系、本组所负担的教学任务和教师的现实情况，规定本系、本教研组不同职务教师的具体要求（也是起码要求），以保证上述基本要求的实现。每个教师则应根据教研组规定的具体要求和本人条件，订出个人进修提高的计划，并保证实现。

## 二、正确解决几个关系问题

第一，要正确解决红与专的关系，这是培养教师的方向，也是推动教师更快地提高的关键。“红”是什么，就是政治，就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要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这当然是努力方向。对于目前高等学校的师生，“红”的初步要求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完成阶级立场的转变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逐步达到上述“红”的要求。“专”是什么，就是业务，就是对本行业务有专业理论和实际知识，并具有运用这个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红”与“专”的正确关系应该是：以红带专，红专结合。所谓以红带专，就是要由政治指导业务。毛主席说过，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怎样实现“红”的要求呢？有这样几个途径：1、要积极参加当前重大的革命斗争和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时代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锻炼我们的最好熔炉。2、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这一学习，要密切结合学校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以指导自己的业务。3、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树立劳动观点和热爱劳动人民的观点。4、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

第二，正确处理教学、科学研究和进修的关系。一般来说，教学、科学研究和进修，对每个教师都是需要的，但三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高教六十条规定：“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好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把教学工作作为根本任务来完成。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中年和老年教师可多搞些科学研究。至于教师进修，我们要力争多送一些到外校进修，但由于名额的限制（上面统一分配）和学校工作的需要，主要还是在职进修，而通过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来进修。教学本身并不单纯是“输出”，一般说来，它对中青年教师也是进修提高的重要途径。

现在滋长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个别老教师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对立起来，有些青年教师把教学和进修对立起来，他们力求少担任课或不担任课，理由是教学任务重，妨碍了进修。其实这个问题处理的得当，双方是可以兼顾的。我们了解了一些成长比较快的青年教师，担任教学工作并未妨碍他们的进修，相反地还有助于他们的提高。物理系青年讲师余庚荪同志，就主要是通过教学工作培养起来的。他在1956年就开了课，教了三年半的普通物理，这是一门基础课。教学的过程，也就是打基础的过程。通过几年教学，他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接着，余庚荪同志又在1960年开了量子力学，在1961年开了原子核物理，这是两门新课，而且是提高课。教学工作的需要，逼得他多看一些书，因而提高也就快一些。由于余庚荪同志体会到教学工作是培养提高教师的最好途径，因此，他们那个教研组一个老教师都没有，余庚荪是组长，其他几个都是刚开课或开课不久的青年助教，在这种缺乏指导力量的情况下怎样提高呢？他们找到了一条好的办法：通过教学，依靠集体力量。每个助教开课都要经过预讲，大家提意见，不是预讲一两次，而是整个学期都坚持预讲，堂堂课都坚持预讲，持之以恒，直到教学效果基本稳定后才停止预讲。这个工作做

得比较扎实。几年来他们集体培养三名助教，现在教学效果都比较稳定。当然，这个组现在感到有一个突出的问题：科学研究关都没有突破，这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学校以后要考虑对那些过了教学关的中青年教师，适当地减少兼职，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多读点书，搞点科学研究。这对促进我校学术水平和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好处的。

第三，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涉及到党的教育方针问题，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我们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必须全面地执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所有教师足够的注意。现在有些理科系的教师偏重课本，忽视实验及计算技能，愿带理论课，不愿带实验课，不愿带教学法。文科系有些教师认为，搞调查研究还不如读两本书，不愿下乡，不愿到工厂。由党校调到政教系的一位教师敏锐地感觉到：我们学校同实际斗争隔一层。这当然有些客观原因，但我们主观努力也不够。

联系实际的问题，1958年比较注意，但作法上过了一点，一度忽视了书本知识的学习，这几年纠正了这个缺点。现在，应该在大家的思想上敲响警钟：不能忽视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实际，脱离生产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它在过去学校教育中有着深刻的影响，随时都要着重地防止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和脱离生产的倾向。

今后要加强实验课。有些实验课应规定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对实验课教师的要求，应该和同职务的教师要求一样，在培养使用和提升职务方面也应同等对待。

第四，正确处理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关系。老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一般都积累了较丰富的知识经验，所以，必须发挥老教师在培养提高师资工作中的作用。青年教师



应该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并且要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青老关系有些什么问题呢？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有些青年教师的主要毛病是自高自大，有的是多少学了一点东西就自高自大，有的是肚子里没存“货”也自高自大。说什么老教师没有什么，不过如此，教不出东西，挡住了自己的路，等等。这些同志，正如荀子所说：“不登高水，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他们不知道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而骄傲则是学习最可怕的敌人。有的头骄傲，正是因为他学习还没有“入门”，或者刚“入门”还没有升堂入室，不知道学问之大。上星期我召集了一个老教师座谈会，有的老教师说：“我系青年教师某×大有前途，可惜他最大的毛病是自高自大！”有的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以党员自居，在业务上以教授自居”，有的还不是教授就以教授自居。有些青年教师不愿意帮助老教师做些资料工作。有的老教师在谈到配备助手的时候说：“我们系里一些青年同志根本不会踏踏实实地帮你做些工作，他们都是教授！”这种反映值得所有青年同志引为警惕。还有个别青年教师对待老教师的某些缺点，不是当面提出意见，或者向组织反映，而是背后乱说，作为谈资。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影响团结，影响工作。

老教师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部分老教师对青年要求不严格，指导只是挂个名。这里面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思想问题是：有的人怕得罪了青年教师，明天骂自己一下，受不了。有的人则是不负责任，青年提高不提高，与己无关。也有一些老教师想严格要求青年教师，但是行不通，学校还没有形成这方面的浓厚风气和严格制度。他们觉得研究生比较听话，青年教师就不那么听话，你想严格要求，他还大不理睬。我看今后要形成制度，凡是青老之间建立了指导关系的，青年教师就要按老教师的要求进修。老教师也要严格要求，不能象现在这样，只点头，一笑就算了。2、有的老教师选择徒弟的标

准有些问题。老教师选择徒弟是可以的，但要有个正确的标准。现在有的人以貌取人，与自己相投的就培养，组织上分配的任务就不大愿意接受，这不太好。3、个别老教师只愿青年帮助自己做些工作，不愿把自己的东西教给别人，想留一手。这是旧意识。有的老教师把课程任务都压在青年身上，这对加速培养提高师资是不利的。总之，今后应该在青老之间建立新的师徒关系，以老带新，互相帮助，建立感情，共同提高。

### 三、树立优良的学风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应该努力树立理论与实际统一、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统一的学风。”这个问题今天大有强调的必要。前几年部分师生的突出问题是认真读书，这个问题现在大体解决了。现在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读书，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目前不少教师治学态度谨严，治学有方，成绩优异；但是，部分教师学风不正，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

第一，部分教师治学缺乏严谨态度，想走捷径，拣便宜。个别别人有剽窃作风。写文章东抄西抄，把别人的文章综合综合，就算是自己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上想“吃现成饭”。有的青年教师对老教师说：“我想研究个东西，请你把那里头的几个重点告诉我。”有的人连读书目录都不知道，工具书都不会使用，要老教师告诉他。这样怎能从事科学研究呢？做学问是一件艰苦的事，不下苦功夫、笨功夫是不行的。应该首先掌握本专业的书目，认真读书，做笔记，写心得，同时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长期积累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和提高，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请别人指导，反复研究修改，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东西。如果科学研究就是抄书，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想找窍门，走捷径，那样进步更慢，会适得其反。因此治学应当讲究方法。

第二，部分教师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研究问题不是从实际

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从原则到原则，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有的教师学教育不愿接触教育实际，到附中去美其名曰调查，实际上聊聊天就回来了。不愿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当然只能把教育学讲成条条学。有的自然科学教师不愿做实验。毛主席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这就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研究。

第三，有些人浮在水面上浅尝辄止。经常号召学生加强“三基”，自己却不加强“三基”。基础还未打好，就想上天，把自己挂在半空中。他们把专业知识看的很窄，有的人认为把课本多看几遍就行了，好象这门课的专业知识就那么多。不知道一门学科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作基础，要有较广博而坚实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经常了解这门学科所取得的新的成就。

上面谈的是学风问题，下面谈谈学习方法。目前学习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计划性不强，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这也想学，那也想学，贪多图快，想大口吃，一下吃成个胖子，结果引起消化不良。有的青年教师听了三门课，每周听十几节课；有的人自己每周教6节课，还听了14节课；有的人一周听了12节外文课，第一门外语还未过关就急着学第二门外语。结果两败俱伤。听老教师的课是好的，应该提倡，但这里面有个方法问题，有的青年教师年年听课，同一门课程听了三遍，现在还在听。我看方法不一定对头，不能为听课而听课，听了要消化，要慢慢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要学一点消化一点，循序渐进。什么都想学就什么也学不好。“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用两个拳头打人，还不如用一个拳头打得准，打得厉害。循序渐进，看起来慢，实际上快。

#### 四、加强对教师的检查考核工作

加强对师资培养提高工作的检查和考核工作，是保证实现规划、促进教师迅速成长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系各教研组应建立和健全检查考核制度。

检查考核的对象，以见习助教、助教、1960年以后提升的讲师为主，对于其他教龄较长的教师，也应通过检查教学，评审科学研究成果等方式进行。

对教师的考核，应该把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定期考核，一般一年进行一次，考核应本着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考察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工作表现和业务水平。

对教师的思想政治的定期考核，采取民主鉴定的方式。考核教师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立场、思想觉悟和世界改造等方面进步提高的情况。

教师工作表现的考核，是考核的重点，结合政治与业务进行。着重考核教师这时期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教学质量、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工作任务完成的情况。

教师业务水平的考核，采取考试或评审的方式。对见习助教采取考试方式，考核其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和教学工作的初步锻炼，对助教采取评审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着重考核对有关教学环节的掌握和熟练程度，科学研究能力的初步掌握。其他业务水平必要时也可进行考试。对讲师采取评审方式。根据领导平时的了解，群众反映和专家意见，考核其教学、科研水平。对教授、副教授，采取在自愿原则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请学术机关或学术会议加以评审。必要时亦可征求有关教研组的意见，以供参考。

考核时既要准确地肯定教师的思想政治进步、业务提高、工作成绩，又要恰当地指出存在的缺点和努力方向。对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的，应给予表扬、奖励；对于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应予批评帮助。检查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考核的结果，考核成绩应由导师和教研组主任签字，评审意见要经过教研组通过，报上级组织作为教师定职提升的依据。

# 改进教学方法 减轻学生负担

##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

— 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

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而且是关系到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大问题，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很明确。有的人认为不存在学生负担重的情况，而且谈起来还有情绪；有的人承认学生负担重，但认为学生的负担就是要重；有的人主张少谈教学方法，担心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会降低教学质量。总之，目前不仅教师在认识上有分歧，就是系和教研组的领导看法也不太一致。有分歧怎么办？首先要弄清分歧的性质。一般来说，这不是政治方向的分歧，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分歧就是矛盾，要解决这个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就需要采用讨论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 一、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及其后果

学生负担重不重，这是客观存在，只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就不难作出结论。从调查情况看，学生学习负担重的问题，在我校不是不存在，而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只是各系各年级的情况不尽相同罢了。一般说来，理科系的学生比文科系的学生负担重，有些班级特别是理科各系三年级负担过重，文科系少数班级负担重，个别班级负担过重。

理科如化学系三年级本学期开设六门课（其中有两门是实验课），每周22学时，课程门数不多，学时也不算过多；但由于课程分量重，教材内容偏多，偏难，而学生基础较差，加上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问题，课外作业较多、较难，因而学生负担过重。有一门主要基础课本来是化学系最难学的，而这一门课的任课教师又讲得重点不突出，脱离教本而另搞一套，其内容前后联系也交待不够清，加上教室大、人多，坐在后面的学生看不见、听不清，因而课堂效果不大好。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能当堂听懂大半的占15%，听懂一半的占50%，听懂少部分的占30%，有5%的学生完全听不懂。这就增加了课后复习和作业负担。另一门主要基础课课程分量本来就比较重，教师讲得快，赶进度，且又参用两种教本，加重了学生的复习任务。这个班的学生在自习时间内需要完成下列四方面的任务：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总结报告、习题作业和复习巩固。这四方面的任务，按上中下三种程度学生分别计算，每周需要时间如下表：

项目 每周学时数 程度	实验预习 报 告	实验总结 报 告	作 业	复习巩固	合 计
上等程度	4	5.5	8.5	25	43
中等程度	5	5.5	11.5	28	50
下等程度	6.5	6.5	14.5	30.5	58

这就是说，学生要完成学习任务，程度好的每周需要43学时的学习时间，中等程度的需要50学时的自习时间，差的学生需要58学时的自习时间。而现在学生每周全部学习时间为54学时，除了上课22学时和社会活动10学时而外，自学时间仅有22学时。要完成自习任务，程度好的差21学时，中等的差28学时，程度低的差36学时。由于时间不够，全班85人中经常开夜车的有21人，利用中午

休息时间学习的有24人，星期六晚上学习的有15人，星期天学习4学时以上的有50人。就这样，有些课程还没有复习好。

文科学生比理科学生负担较轻，但部分班级负担还是相当重的，如中文系二年级两班。其表现和原因：（1）课程门数多。本学期开了八门课，且有四门课有作业，每天需要增加两个学时的自学时间才能完成作业。（2）各科任课教师都有“扩张主义”，都想多占一点学生的学习时间。有的教师利用辅导时间讲课，有的教师在辅导时发现学生不复习本门课程，就采用质疑的方式向学生提问。学生停课劳动时，任课教师都抓紧这一机会向学生布置作业，并要求在劳动结束后考试。这样，学生在劳动期间比平时负担还重。（3）学生在学习上处于被动，全部学习时间及部分休息时间都被“瓜分”了。每天上午都有课；每周六个下午除两个下午有课而外，其他时间都被各种活动占满了；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也都被占完了（每星期一、三、五晚饭后唱红色歌曲，二、四晚饭后学普通话）；六个晚自习都是辅导时间。（4）学生社会活动偏多，安排不当。前几周评比成风，进行了七个方面的评比：卫生评比、文娱评比、体育比赛、壁报竞赛、作文比赛、评选红色宿舍、评选五好青年。这些评比大量占用了学生的自习和休息时间。中二乙班为了夺得文娱红旗，将近一半人参加了文娱演出，晚上跳舞跳到十一时，个别女同学脚跳肿了不能穿袜子，还要完成任务。各种写稿任务也很多，有学校广播稿、黑板报稿、学生会壁报稿、“五·一”、“五·四”壁报稿等，有些人每周要写一篇稿。还有各种学习任务，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党团课的学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学习，普通话的学习。该班学生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时，写了231000多字的发言提纲。班上各种组织也很多，全班48人中大大小小的干部就有42人。组织多，干部多，会也就多，每人每周一般要参加3个会。班上多头领导，团委、爱委会、学生会、系分会都直接

给班布置任务。这样一来，学生只好用下午的自习时间应付各项任务，哪有时间自习呢？

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造成了不良后果：

1、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的教师认为，学生的负担就是重要，负担重才能提高教学质量。物理系三年级的任课教师主张多给学生一些压力，因而教材内容多，分量重，习题也比较难。他们以为多压学生，教学质量就会提高，而结果适得其反。学期期终考试结果，有1人因4门功课不及格而勒令退学，有8人因2门课程不及格而留级。由于学生负担很重，有的学生失去了学习信心，申请休学。从各系调查材料看，凡是负担过重、材料过多的课程，教学效果都不好。当然，也不是负担越轻越好，负担过轻也会降低教学质量。目前主要还是负担过重而不是过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用矛盾论的观点看，正确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解决。

2、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凯洛夫教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片面强调了智育，忽视了德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目前学生课业负担重，同凯洛夫教育学的影 响不无关系。事实证明，片面强调智育，不利于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不利于提高教学的思想性，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不利于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例如历史系学生反映，有些教师教学中史料罗列过多，而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加以分析和阐明不够，因而有些学生学了历史，不知道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去分析历史。中文系有些学生虽然中国的、外国的古典东西读得不少，但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分析批判地接受，有的人甚至受了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学术思想的毒害，做了古人的俘虏。理科系的教师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也



很不够。这样下去，就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材，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3、挤掉了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目前许多学生学得死，只能应付作业、考试，跟着教师团团转，打被动仗，不能主动地进行学习，没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参考书。有的学生两年没有进图书馆。有一个班，有80%的人没有阅读参考书。学生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的教师发现某些学生在一、二年级时脑子还比较灵活，到了三、四年级脑子却呆板了。这很危险。我们不但要帮助学生钻到业务中去，还要使他们能够钻出来。如果学生钻不出来就是大问题。有的教师说：读书要死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书是要读的，而且有些书还一定要背，不读不背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死读、死背、死记。主张活读、活背、活用。死读书同刻苦钻研毫无共同之处，与活读、活用也无共同之处。刻苦钻研是要求学生树立雄心壮志，克服畏难情绪，在学习上下苦功夫，多思考问题，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学习，这同死读书不能混为一谈。

4、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毛主席号召青年人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学生负担过重，就必然影响到身体健康，影响到现在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让面谈到化工系学生负担过重，这个班有25%的学生经常失眠，有40%的学生经常头疼。有4人因病不能学习而休学，有14人因病不能参加劳动。外语系学生患神经衰弱的有25人，体弱多病的有30人。两项合计共占全系学生总数的16.8%。当然，有一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之于课业负担过重，但是有些学生健康不好，确与课业负担过重有直接关系。

二、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目前学生负担过重，教学不甚得法，严重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为什么存在这种情况呢？除教学计划有些安排不当、部分

教师水平不高、学生基础较差等客观原因而外，主要还是教学思想上的问题，表现在：

1、缺乏全局观点。毛主席一向告诉我们，无论是打仗或者干工作，都要有全局观点，只有局部观点，没有全局观点，仗就打不好，工作也做不好，教学也是一样。当然只有全局观点而忽视局部工作，也是不行的。问题是要全局在胸，不要用局部去代替全局。所谓全局和局部也是相对而言的。一个教师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这门课程对整个教学计划而言，是一个局部，当然对这门课程本身各个章节以及各个教学环节而言，它又是全局。因此，每个教师必须随时注意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有些教师在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没有考虑本门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专业课的教师强调专业课重要，公共课的教师强调公共课重要，谁都想多布置一点作业，多占一点辅导时间。这一门课程考了，那一门课程的教师也想考。有时几位教师同时布置一大堆作业，同时布置课堂讨论。教师这么做，想把本门课程教好，对学生负责，这从主观愿望上看是好的，无可非议。但就是缺少全局观点。教师没有考虑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学生不光是在学习你这门课，同时也在学习其他的课；你要对学生负责，别的教师也要对学生负责；如果各科教师都布置大量的作业和参考书，学生就必然负担过重，打被动仗，平均使用力量，结果就学不好。从这一点来讲，实质上并不是对学生真正负责。因此，教师要树立全局观点。同时教师在进行某个环节的教学过程中，要考虑这一教学环节同其他各个教学环节的互相配合，要体现全校一盘棋的精神，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事。

2、对少而精的原则认识不清。少而精是与多而杂相对的。所谓少而精，就是要教得少些、精些、好些。教师要很好地熟悉和掌握教材，在讲课中分清主次，突出重点、难点，把最基本的内容教给学生，让学生学到手。次要的少讲，无关紧要的不讲，

这是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有所重必有所轻，有所轻才能有所重。这当然有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的问题。思想、业务水平高的，就可以讲授得法，运用自如。思想、业务水平低的，困难就较多，因此，必须积极提高教师思想和业务水平。

有些教师认为少了就不能精，要精就不能少，因而怀疑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能否提高教学质量，主张多而精，广而精。有的教师认为：“少是相对的，精是绝对的。”由于对“精”作了绝对的理解，因而在要求上就脱离实际，求多、求全、求深。从教材的系统性、完整性上考虑多，从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少，结果是多而杂，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认为，对少而精不能作绝对的理解。所谓少，不是越少越好，不是要降低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水平。绝对的少不可能做到精。所谓精，也不是绝对的，是比较的精。不能认为多就是精，全就是精，广就是精。当然一定的全，一定的广是需要的。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真正掌握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此，教师要经常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地精选教材，分清基本内容和非基本内容，让学生把基本内容牢固地学到手。由此看来，减轻学生负担，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是一个积极的措施，不是消极的措施。它向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更低的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同提高教学质量，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少而精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

3、教学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严重。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脱离实际。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教学工作也不例外。对教师来说，要使自己良好的教学愿望成为现实，就必须了解和熟悉学生的思想状况、接受能力、现有的学习基础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深入钻研教材，组织好各个教学环节，然后进行施教。只有这样，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教

学工作才能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教学质量才会一步步地提高。

有许多教师教学态度很好，重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因而讲课有的放矢，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启发性强，能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受学生欢迎。这种良好的教学风气要大力发扬。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不同程度地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地进行教学。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

教学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必然表现为教学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有些教师除上课而外，很少接触学生，不了解情况。有的根本不愿意接触学生，他们坚持老传统，教书不教人。有这样一个例子：上学期有一个年级的任课教师主观上认为学生程度不错，因而各方面要求高，期中考试才发现有80%的人不及格。有的教师从想当然出发，认为自己熟悉的东西，学生也应该懂得，用教师的尺度去衡量学生，要求学生。当他发现学生没有学懂，就一味埋怨学生基础差，而丝毫没有想到自己思想上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有的政治课教师讲课，只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讲稿以外的话一句也不敢说。据学生反映，可能是他胆子小，怕讲得不对犯错误。我看还有思想问题或方法问题。这样怎能提高教学的思想性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活的革命理论，有些教师却把它讲成教条，这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其他专业的某些教师也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在教学中虽然也引用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观点和教材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老教师由于过去学习政治理论较少，现在为了提高教学的思想性，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一些问题，虽然在某些地方不免有生硬和牵强附会之处，但这种努力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对他们不能象对政治课的教师那样要求。当然，也需要注意改进。

另外，有些教师把活的知识讲得很死，一走上讲台就念讲稿，从上课念到下课，念的一字不差，有的人念到翻译句子时还结结巴巴。由于教师只念讲稿，也就造成学生上课抄笔记，课后看笔记，考试背笔记，笔记大搬家的现象。有些学生两节课要抄三千字左右的笔记。记得胳膊酸痛，目倦手劳。一位教师在听课时发现学生记的笔记很多，课后就问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记这么多？”学生回答：“我不记这么多，考起来怎么办？”这固然说明部分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还存在问题，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教师。有些教师就是要求学生多记笔记，多背笔记，笔记记得不全还要扣分。有的系学生反映：他们笔记背得熟的就考得好，否则就考得不好。这样下去，教师在教学上的教条主义，就必然造学成生学习上的教条主义。

再就是教学上的烦琐哲学。有的教师讲课内容多，材料堆积，罗列众说；有的不分主次，轻重不辨，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点象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讲课面面俱到，结果面面都没有讲好。例如，有的系个别教师分析一篇文章，讲了20多个特点，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个特点？我看不一定，特点太多了，满身都是特点，这实际上是抹杀了它最基本的特点，等于取消了事物的特点。还有一个教师，解释兔子这个词，本来一说兔子大家都会清楚的，可是他却说这是动物、长耳朵、短尾巴等，讲了一大堆废话。

总之，目前教学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已经严重地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活动本来是师生双方的活动。要搞好教学，光有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把师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努力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上面谈到了许多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教学工作没有成绩，搞得一团黑。应当看到，我们的教学工作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绝大多数教师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锻炼，政治上有很大进步，教学态度是积极的，在教学方法上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有的正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教学。所有这些，都是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利条件，也是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贯彻少而精原则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改变学生负担过重的状况，要克服教学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为把社会主义的师范大学办得更好而努力。

# 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在甘肃工业大学思想政治工作

###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我们这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集中开了三天，现在就要结束了。

这次座谈会，我们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听取了焊接教研室党支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介绍，讨论和分析了教职员思想情况，提出了改进和加强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少好意见。会后有关部门的同志要进行很好的研究，改进工作。总之，我看会议是开得好的，向前看的意见多，积极的意见多，畅所欲言，团结一致。

下面，我对目前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后，我校教职员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党内外的思想比较活跃。在学习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中，正在逐渐把思想和工作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广大教师钻研业务、学习外语的空气很浓，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广大学生勤奋学习，教学秩序稳定；学校建立、健全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制定了学校规划、教师工作量制度和教师培训规划，落实了教师六分之五的业务活动时间，制定了七九年科研规划。现在去课堂听课的干部逐渐多了。最近，基础课部和教务处组织人员深入课堂，对教学工作进行了检查，研究改进课堂教学。后勤工作在为教学科研服务

方面，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又做了大量工作，有显著的改进。以上的情况说明，我们学校的形势是好的，这是主流。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思想混乱和模糊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一些削弱，这些问题虽然是支流，也要引起我们重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这里再强调地讲一下。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原则，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共产党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一条，就是重视思想教育，提高人的觉悟。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光荣传统，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今天，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之后，思想政治工作同样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一点，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要有个明确的认识，不能认为工作重点转移了，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不能认为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重要了；不能认为政治机构的调整，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重要了；不能认为按教育工作规律办事，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重要了；也不能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只是领导和政治部门的事。今天，无论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来说，还是从思想领域的任务来讲，就是从我们这次座谈会上反映的教职员工的思想情况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是做了工作的，是有成绩的，通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绝大多数同志分清路线是非，振奋了革命精神，努力搞好本职工作。但也有少数同志有模糊认识，认为政治工作不“吃香了”、不安心，要改行，这种想法显然是不



对的。无论业务技术干部，还是政治工作干部，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任何一种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政治工作干部要安心工作，对政治工作要有光荣感、责任感。各级党组织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爱护他们的积极性。有的同志一提思想政治工作就认为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一提政工干部就认为是“整人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政工干部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三、进一步学习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学习邓副主席的报告，搞好四个坚持的教育，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根据邓副主席的报告和我校思想工作的实际，当前，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搞好四个坚持的教育。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坚持还是背弃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能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本世纪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四项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原则。但是，针对新形势下反映出来的问题，今天必须重新宣传学习这四条基本原则。在如邓副主席讲的：“如果不彻底战胜这些错误思潮，坚决正确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四条基本原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关于四个坚持的学习，邓副主席的讲话最近已发到学校，各单位正在分别组织传达。五月份政治部发了一个学习安排意见，在学习中，有的单位还抓得不紧，时间上没有落实，也没有认真地组织讨论。最近省委宣传部有一个关于干部学习四项原则的意见，学校宣传方面又搞了一个学习四项原则补充安排，准备在六、七两月进行。这次会议后，各单位的领导要认真地抓一下，落实学习制度，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组织好讨论，领导还要针对本单位的思想实际作必要的辅导讲解。通过学习，澄清模糊认

识，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进一步搞好。在对学生的四项原则的教育中，除政治课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外，各系和专业指导员要在星期四政治学习时间抓一下，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育，还要进行革命理想、道德品质、艰苦奋斗、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教育，结合开展向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雄模范学习。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对七六级毕业班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他们进行服从国家需要、听从组织分配、立志献身四化的教育，提倡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克服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思想。

#### 四、讲几点加强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党委、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党委拟两个月研究一次教职员工的思想情况；各系、部、处总支、支部也要经常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分析教职员工中的思想状况，针对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定期向党委进行汇报。各级宣传部门，更要主动地经常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拟按期给全校师生员工做形势时事报告，各总支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处的负责同志在六、七月份的坚持四项原则的学习中，针对本单位职工思想实际，可作一些有关辅导报告，不要老是等学校来安排。我们这次座谈会就是动员各级领导层层都来抓思想政治工作。

2、适应我校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深入群众，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中去。领导干部和政工人员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要深入到教研室、课堂、宿舍、食堂中去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具体帮助指导工作。对群众中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要善于及时做好引导工作。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学习焊接教研室党支部的经验，敢抓、敢管，树立正气，要克服回避矛盾、怕得罪人的现

象。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要注意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可能解决的实际问题，一时做不到的，要向大家解释清楚，逐步加以解决。

3、向焊接教研室学习。焊接教研室是一机部树立的先进单位、红旗单位，他们在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等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党支部起了核心作用，这次会上焊接教研室作了介绍，到会的同志一致感到很受教育，很受启发，表示一定要向他们学习，这很好。我们就是要在全校进一步地宣传焊接，学习焊接，支持焊接。学焊接，学什么呢？一是学他们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教学、科研中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教研室办成两个中心。工作有长远计划，对当前的任务又有明确分工，逐项落实，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保证了教研室工作的不断前进；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十分重视抓教师队伍和教工的作风建设，发扬了艰苦奋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齐心协力、兢兢业业、多作贡献的精神。同时还十分注意做个别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不断增强教工之间的团结；三是党支部领导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奖惩分明，发扬民主，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为了进一步向他们学习，我建议把他们的经验批转各单位，特别是各教研室，要认真组织学习，按期向总支汇报。

4、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作用。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又红又专、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政治理论课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文革”前十七年经验证明了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败坏了政治理论课的威信，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加之没有统一的教材，因此，目前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确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政治教研室的同志加强学习，多做研究，总结经验，听取学生的反映，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当前，各部门政治课都要结合学生实际，联系四项原则进行讲解。同时，我们政治课教师特别要注意既教书又教人，对一些学生不重视政治课的问题，要多做工作，严格要求。各系领导，各专业指导员，对于学生不重视政治课的问题尤应认真地抓。我看可以规定一条，政治理论课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予毕业。

5、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坚持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学校风气好不好，关键是党风如何。把党风搞正，发挥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全党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发生一点问题就不难解决。因此，要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各部、系、处总支、支部都要认真地抓党员的思想教育，在全校党员中加强党性、组织纪律性、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教育。学习中要联系各单位的突出问题，边学边议边改。

会后，请组织部对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以及党的发展工作做一个很好的研究和安排。

6、团委、工会、学生会要协助各级党组织认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今年团委在学生中开展了以“三好”为目标、以学习为中心的活动，“五·四”表彰了一批“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把这项活动坚持开展下去。团委、团总支、学生会、学生分会要发挥党的助手和纽带作用，经常了解学生中的思想状况，及时进行教育，并及时向党委、总支反映。目前，要准备好“两代会”，开好“两代会”。工会也要在抓教职工福利生活的同时，注意做些教职工的思想工作。

7、教师也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依靠各级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去做，还要依靠学校的全体教师去做，既教书、又教人，希望全体教师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提高革命责任感，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 记延安大学战时生活和

## 陇东随军工作情况

(一九八一年)

首先谈一下延安大学简况。延安大学位于延安南关西山半坡上，有五层土窑洞为教职员工住房，有三间窑洞藏书，多系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有一座比较简陋的大礼堂，为较大的集会和大报告的场所。

延安大学受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学校行政组织和人员编制比较简单。学校设教导处、总务处。教导处主管教学、思想工作和学生的生活管理。总务处主管总务、财务、伙食和生产等工作。学校原设四个班和一个部，即行政班、财经班、教育班、新闻班和一个高中部。以后扩大教育班为中教班和小教班，高中部分文科和理科两个班。以后改米脂中学为延大附中。还设了一个教育研究室。

学校设党总支和若干支部。总支、支部主管思想工作和干部工作，对行政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学校主要成员是：校长李敷仁，我为副校长，教导处长林迪生、刘端葵，总务处长贾治华、徐效达，高中部主任蔡子伟。其他主要教职员，就我能记起名字的有：曹建勋、钱维人、赵耀先、王云凤、张宣、马彬、芦白、向明、王哲时、燕斌、张逊斌、贺彬如、杨树等。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胡宗南匪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矛头直指延安，军情甚为紧迫。延大接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通知后，积极准备撤离延安，进入“枕戈待旦”时刻，待撤令一

来就迅速撤走。事先，我们在全校作了动员报告，向师生说明蒋介石、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暂时撤出延安，但是我们还要回来，一定能够回来，大家要积极准备。撤离前，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准备工作，一项是坚壁清野，决不使敌人得到一点东西，将贵重的东西、材料、档案等带走，带不走的的东西和笨重用具，一部分送往离延安四十里远的山沟埋藏。同学们和工作人员冒着春寒，不分昼夜拉的拉，担的担，背的背，不辞劳苦地完成了疏散埋藏任务。另一部分就地埋藏。我记得这个任务虽很艰巨，但在同学们的积极努力下，三天就完成了预计十天才能完成的任务。

在行军前，我们组织了行军指挥部，由李敷仁、李之钦、刘端棻、林迪生、贾治华等同志组成。学生、教职工也以班、部、处为单位，组织了行军领导机构，还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为后续队伍交涉驻地、筹办伙食等……。并成立了收容队，收容掉队的病残人员，每人发给一条粮袋，随身各带五天的粮食，以备急需。

接到西北局、边区政府的紧急通知后，延大师生、干部、工勤人员于1947年3月14日天亮前就整队出发了。每人背着行李和口粮袋，有的还背着枪支、手榴弹，骡驮马载，撤离延安。大概行军约20里路，天才大亮。我们的路线是向着东北绥德方向前进，拟东渡黄河入晋。我们不分昼夜地赶到安定县老城，队伍住在关里。城内一片瓦砾，少有人家房屋。接着布置学习，整休，打扫了街道，当地群众交口称赞。由于敌人向清涧、绥德方向进攻，恐来不及抢先渡河，因此，又接边区政府通知，让延大队伍向西转移。为了进军方便，我们在这里疏散了一部分老弱病残人员。随即向西到子长县，参观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地址和毛泽东主席住过的窑洞，还参观了陕北革命先烈谢子长陵墓，并和子长中学的学生教师会面。当时，王志匀同志在子长中学当校长。

敌情又严重了，我们队伍由瓦窑堡向玉皇岔前进。到安沟岔后，奉边区政府命令，改向西北方向进军。当晚过白庙岔后山时，西北风劲吹，人马摇摇欲倒，夜以继日地行军，队伍开到了志丹县境内且八镇，接着又抵达东华池的白马庙，暂时休整。这时，胡乔木同志来看大家，并讲了话。数日后，队伍又折回志丹县。县委决定延大驻该县西南义镇川。我们到义镇川后，分住在曹圪塆、张河湾等村。校委会决定在这两村之间的山上开荒种地，同时开始上课，并开会总结行军经验。不久，接西北局的通知，要延大组织一部分身体健壮、政治条件好的师生随军工作。当时，我们组织了两个随军工作团，一个由我带领，一个由蔡子伟带领。蔡团先出发，我团后出发，准备前往陇东工作。当时，学校生活比较艰苦，除学习和工作外，还开荒种地。没有菜吃，就动员大家去挖野菜，小米加野菜，颇开胃口。师生种下的谷子出土已经一寸多高了，敌情又紧迫了。延大又动员搬家，指挥部决定向白马庙——荔原堡进军。临行前，还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游击队，以便和敌人周旋。延大队伍出发时，群众送别，依依不舍。

延大奉命转移到白马庙——荔原堡。荔原堡属陇东分区的东华池地区，白马庙在荔原堡村中，延大校部就设在庙内。白马庙是宋代陕甘人民抗敌纪念古迹，庙外有古碑，碑文称荔原堡为宋代“韩、范屯军重镇”，想是北宋时韩琦、范仲淹抵抗西夏内侵，在这屯兵的地方。

夏天到了，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单衣布也领到了，全体男女同学一齐动员起来，男生收拾草灰染布，女生剪的剪，缝的缝，几天之后，全校人员，每人都换上崭新的灰色军装。当地的麦苗也渐渐地长高了，因为时时有敌情，群众忙着做战勤工作，顾不得锄草，我们马上把教师、学生组织起来，分组分村，帮助群众锄草，受到群众称赞，密切了军民关系。

当时敌军进攻陇东的情况是这样的，胡宗南匪军沿洛河北上，甘肃、宁夏冯家军队向陇东一带侵扰，东南和西南两股敌军渐渐逼近荔原堡。陇东分区后方负责人李握如同志，把白马庙区驻地的医院、回、汉队伍的家属队，以及延大的师生、干部组织起来，准备打游击，进行侦察联络，保卫伤兵和家属。延大担任华池、合水一带的侦察工作，故也参加了豹子川塬上的侦察联络工作。一股国民党军由洛河川窜进豹子川，袭击伤兵医院，延大动员全校人员，一面帮助医院转移，一面将警校搬到吴堡川。不久，敌情又趋紧张，指、挥部决定抢渡洛河，经吴旗镇北上延边，队伍过吴旗，又进入志丹县境，住桃林凹。得到消息说，我解放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战胜了敌人，在元城子击败敌人，大家十分振奋。此时，我们组织同学学文学，还邀请阳早同志报读“美国工本生活”，他言语质朴，内容丰富，对同志们启发教育很大。一天，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电报通知，命令延大转移三边分区，住张家畔，接着又接马锡五专员转来林伯渠主席电报，指示延大勿去靖边，从速东移，循大理河去葫芦洲。我即遵照指示进行，从新城县（靖边老城）到绥德，五百余里行军，晓行夜宿，约行两个星期，到达目的地后，又由绥德北上，经米脂、佳县，在炮声隆隆中渡过了滔滔黄河，驻晋绥边区临县吴家沟村。从此就结束了一段行军生活，开始了“三查”和教学工作。

由蔡子伟同志率领的随军工作团，约数百人，他们年轻健壮，生气勃勃。工作团先到荔原堡，在陇东分区华池、曲子、环县等县所属的荔原堡、宋家原、厚寨原等地进行建政反霸工作，在各地还抽时间帮助群众春耕夏耘。敌军所过之处，党政组织被打散了，许多土地被地主强收回去，并搜刮分子回来作恶。工作团到后，即重新建立区乡、村政权，经审查党质，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给农民分配了被地主夺回的土地，组织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并保



团胜利完成任务后，奉上级命令，从环县八珠原出发，追随延大本部，约半个月急行军，一同到达山西临县吴家沟。

以下谈天子、土桥收复区的工作和撤离的情况。天子、土桥是陇东分区曲子县的两个区。我带领的随军工作团抵达这里，进行建政、反霸和建党、土改工作。

1947年四、五月间，延大在志丹县义镇川接西北局通知，组织了两个随军工作团。蔡子伟同志带领的工作团先出发，我和行政班主任曹建勋率领的工作团也随之出发，均向陇东地区前进。我们这个团也由数十人组成，除我和曹建勋同志外，我现在能够记起名字的教师和干部有尚明、张宣、芦白、张逊斌、杨树、燕斌等同志，学生有罗润民、唐金榜、延晓、杨翊、张光、林彬、曙光、张仰文、张加凡、彭光训、张云、李英才、马逢英、杨子清、张进才、汤群等同学，还有总务处副处长徐效达和干部徐子清等同志，其他同志名字都记不清了。

我们团由义镇川出发，同志们和同学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袋，有十余位同学还背着长枪，夜以继日，汗流浹背，翻山越岭，向着目的地进发。我记得在行军途中，天气酷热，有时连水都喝不上，肚子饿了，啃着自己随身带的干粮。晚上投宿，都要经过紧张的找房、安床、铺草、做饭等工作，然后才能休息。夜里有时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天不亮就起床收拾行装，打扫卫生，饭后又匆匆起程。在这样的行军生活中，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是大家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唱着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信天游”行军，没有一个叫苦，也没有一个掉队的。

我们经过东华池、曲子到环县地界。在途中，大概是在东华池（记得不清楚），还同陇东地委、军分区张仲良等同志会面。地委派宣传部长宋养初同志接待我们，他跑前跑后，热情地为我们安排住房、动员牲口。我们到达离环县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庄住下，为了和前总政治部取得联系，就派张逊斌同志持信去找前

总政治部。前总政治部负责人马文瑞同志接待了张逊斌同志。前总指示我团先到曲子县搞一段收复区的工作，待大军打开环县、回师收复庆阳之后，参加接收庆阳的工作。我们接受指示后，很快把团队带到曲子县。到曲子后，和县委书记刘作西接上头，经我们说明前总政治部马文瑞同志的指示，商量之后决定我团去天子区和土桥区搞收复区工作。于是，我们就将工作团分为两部分：曹建勋、张宣、张逊斌和杨树等同志和一部分同学去土桥区，我和芦白、燕斌、向明等同志带一部分同学去天子区。我们团在收复区的主要任务是建政反霸，建党土改。被敌军蹂躏过的地区，乡村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都垮了，有的干部、党员投敌了，有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因此，我们着手恢复这些区乡的乡村政权，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审查党员；重新分配被地主收回的土地，打击、批斗反攻倒算的地主和投敌叛变分子。在做这些工作之前，我们先摸清了哪些是较好的党员和干部，然后和他们商量成立乡村政权，成立党组织，商量如何重新分配土地，如何开大会斗争投敌分子。天子区约搞了二、三个乡的工作。工作团部设在天子区政府，我除部署各组各乡的工作和听取汇报外，还亲自参加各村的建政建党和土地分配工作，参加斗争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投敌分子大会。在土桥区，主要搞了二乡和四乡的恢复政权和打击投敌分子等工作。四乡（即野狐子沟）是工作的重点，由曹建勋、张宣和区上的一位同志主持工作，在群众十分愤慨的情况下，打死了一个民愤很大的投敌分子。四乡的工作由张逊斌等同志负责，除进行恢复政权的工作外，也召开了大会，斗争了投敌地主分子。记得曾斗争过一个姓夏的投敌地主分子，并且将他的一部分家产分给了贫苦农民。

我们在天子、土桥工作约二、三个月，全区工作还未结束，就在这时，我解放军打开了环县，为了避开敌人主力，攻打敌人的弱点，改变了收复庆阳的计划，挥师北上三边、榆林地区作

战，这时，敌人趁机向环县方向进攻。在此情况下，曲子县委书记李正廷同志来天子区对我们说：敌人有包围陇东之势，先头部队已到马岭（庆阳、曲子交界处），你们要很快撤离曲子，否则要被敌人包围。于是，我们速派人通知天子、土桥两地工作同志迅速在天子区政府集合。土桥的同志接到通知后，星夜来到天子。在天子区各乡工作的同志也很快到达集合点。我们很快研究了撤离计划，拟定了撤离路线，准备了行装。次日天未亮，即起程向东北方向环县进发。这是因为怕敌人包围陇东，占领环县，打算在敌人未占领环县之前，冲出包围圈北上三边，紧赶我军主力。因此，大家不顾疲劳连夜行军，常常是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地赶路。当我们队伍正行进到环县城对面塬上时，天色将晓，接着黑云密布，雷声隆隆，霎时间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大家全身都被淋湿，四面不着村落。正在焦急时，山下处找到二、三户人家，我们就在这里宿营，大家就背靠背地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整队下山，背山面水的环县城已出现在眼前。因为大雨过后，环江大涨，我们沿环江北上，在沿岸北面不远地方和一小股政治土匪相遇，由于我们人多，又带有枪支、手榴弹，他们未敢动手。我们迅速强渡环江，经过一天的急行军，赶上了王世泰同志带领的部队，这才放下了心。我们拟经过盐池、定边、安边方向寻找前总政治部，但听说大部队已东去，而东去的路线、敌情我们又不清楚，于是，进退维谷，不得已就在定边县境一个记不得名字的村庄住下休整。那里的群众生活很困难，都吃窖水。三边的许多河水碱性很大，赤脚过河，脚腿有时被腐蚀脱皮。记得我们正在休整时，正在三边分区搞土改的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江隆基同志来看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些地方土改和敌人的情况。因为我们驻地距离三边分区专署所在地定边县城不很远，为了进一步弄清敌情和前总情况，我带了一个公务员去定边县城找三边分区专员吴志渊同志。在专署只住了一夜，宁夏马鸿逵部进袭盐池，专员公署即

撤出定边城，我也速返工作团驻地。这时传闻安边城被敌人占领，我们又由定边县退到吴旗镇。在城郊休整几天后，就组织全团师生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师生到金佛坪附近的几个村庄，帮助群众搞秋收。这个期间，我们又派张逊斌去找吴志渊同志打听情况。我们得知前总是赶不上了，经陕北东渡黄河回总校的路线和沿途敌情也搞不清楚，加之天气渐渐冷了，于是在吴旗镇住了一个多月。约在古历八月十五日前后，我们决定离开吴旗回学校。从吴旗出发，经靖边、横山县出大理河川，经过子洲、米脂、吴堡等县，东渡黄河，回到山西临县吴家沟延安大学本校。

至此，我们去陇东随军做收复区工作告一段落。延大行军生活也初次结束。回到学校，我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三查”运动和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不久又接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通知，要延大抽出一批师生，由我率领，去山西隰县组织运送救灾粮食，为陕北被国民党军践踏过的地区的四十万灾民运送粮食。于是，学校又迅即组织了200师生（以后陆续增加到400余人），由我率领去指定地点执行任务。

最后，要说明一点，延大战时生活和在陇东随军搞收复区的工作，时隔30余年，很多具体情节回忆不清。本文成稿，延大战时生活部分，参考了李敷仁同志的《忆延安大学战时生活》一文；天子、土桥工作和撤离的部分，主要采纳了张逊斌同志（张现为延安大学党委负责同志）为我提供的宝贵材料，蔡子伟同志带领的工作团在华池、曲子、环县等地的工作情况；主要吸收了康和厚同志的重要意见。在这里，深表谢意。

## 《辛安亭论教育》序言

(一九八三年二月)

辛安亭同志是我国一位有名望的教育家，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教育学会会长、兰州大学顾问。他于抗日战争初期来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负责编写教材，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甘肃省文教厅、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甘肃教育学院、兰州大学担任领导工作，我们前后接触不少，对他的为人与工作是比较了解的。他四十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全心全意为党的教育事业工作，无论负责教材编写工作或领导大学，总是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在延安的11年间，他亲手编写了小学各种教科书、农民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及教师读物、儿童读物等共计40余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11年间，他协助叶圣陶先生审定一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同时研究中小学的教学问题，写了许多有创见的文章，对新中国中小学的教材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学工作期间，他继续研究各种教育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年逾古稀，但欢欣若狂，精神焕发，积极工作，勤奋学习，壮志不已。他着力整理、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同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写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本书收集了辛安亭同志自1946年至1982年间写的29篇文章，约有20万字。这些文章涉及到教育工作的许多重要方面，有的是作者研究教育问题的心得，有的是本人工作的经验总结，有的是对教育家教育思想的介绍和评论，有的是对工作的指导意见。不论哪一类文章，都是言无虚发，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与

实际的结合上讲清道理，讲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使人读了很受启发和教益。

就教育的类别说，（一）本书对幼儿、小学、中学、师范、大学和特殊少年儿童的教育都有论述。特别是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教育，作者亲自做过十八个月的实验，写出了详密而具体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是很宝贵的，它对做父母的人及从事幼儿教育的同志会有很大的益处。对大学教学的改革和人才成长的途径，也有详细的探索与讲述。其中有些意见是作者对实际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参考外国的成功经验提出来的，这对我们为四化建设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质量的人才很有帮助。（二）对教材编写工作经验，本书共收集了作者的十篇文章，其中既有编写原则的归纳，又有对语言、插图、数字使用等方面的具体论述。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引用了大量实例，并从教学原则的高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因此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它不仅是教材编写工作的经验，而且是教学原则的具体论述。这是作者从事教材编写工作20多年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不务空谈的优良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些经验虽是几十年前的，但仍有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今天编写教材和通俗读物的同志、以及广大教师学习、借鉴。（三）对教育家的介绍。本书选入了作者对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以及当代外国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赞科夫等人的评论，特别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了较全面的深入浅出的阐述。这些都是他研究中外教育史的心得和见解，也很值得我们参考。

总之，我认为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而且对我们研究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史、总结建国以来教育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教育质量、为四化建设培养大批合格人才、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会起积极的作用。

#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工作回顾

(一九八三年)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建设从1937年开始，到全国解放约十二年时间，国民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国民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大类。国民教育在复杂曲折的道路中前进，办学经验十分丰富。许多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实施普及初等教育，有值得借鉴之处。因此，回顾并初步总述一下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是颇有意义的。

在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建设阶段的十二年中，我约有八、九年时间参加这一工作。当时对国民教育工作比较熟悉，但是时隔将近四十年了，国民教育的建设情况虽然脑际中还留有基本轮廓，但具体工作却比较模糊。现在借助一些材料，试将1937年到1948年我在边区国民教育岗位上所做过的以及所知道的工作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和热心边区国民教育的同志共同研究。

## 一、国民教育的概况和成就

(一)国民教育大发展。在旧社会，边区经济非常落后，主要生产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山多平原少，人口稀少，村庄分散，交通不便，封建迷信盛行，文化教育落后，知识分子凤毛麟角。但是内部各地的情形并非完全一样。绥德、米脂两县人口较稠密，读书人多，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与北京、天津联系较多，人民对于读书也较重视；清涧、安定、延川、延长以及关中几个县也还可以，读书人较多，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他各县就差了，其中陇东各县较差，三边最差。学校除几所师范、中学外，有小学120所。社会教育是一块荒地，文盲约占人口的99%。有些县份，100人中难有一人识字；华池、盐池等县200人中才有一人

识字。1935年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建立，人民得到解放，土地进行了分配，农村经济开始恢复并有发展，初等小学也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那时候革命活动比较频繁，苏区还不巩固；加之缺乏教师、课本、纸笔、经费等，小学虽有新建，但是条件很差，困难较多。

1937年初，陕甘宁特区 政府 成立（约在1937年和1938年之交，改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一年时间就成立了545所小学，学生10,396名。这是一个突飞的发展。1938年小学增至739所，学生15,348名。1939年再增至883所，学生人数上升到22,089名。1940年2月以后，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绥德的绥德、清涧、吴堡和安定、富县等，相继归边区管辖，小学骤增至1,341所，学生也增加到41,458名。若单就边区原有县区计算，学校是902所，学生则是26,911名，也增加了不少。1941年春，小学为1,198所，学生40,366名，学校和学生数略有减少。原因之一是三边、陇东各县有灾情，关中分区有军事行动，影响该地区的教育。但是，这时候小学教育的发展已达“饱和点”，有下降之势。1942年开始精简学校，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小学减到847所，学生40,845名。1943年提出巩固完小，提高中小，合并普小。经两年精简合并后，小学为923所，学生为30,845名。1944年强调联系实际，试行民办小学，小学略有发展，达1,090所（内有民办小学574所），学生33,686名。1945年学校发展到1,377所（内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34,004名（内有民办小学学生16,797名）。1946年因各县放松对民办小学的领导，学校减到1,249所（内民办小学940所），学生34,036名（内民办小学生15,373名），学生数保持原状。

边区在旧社会时就有高小，大致每个县一、二所，有的县三四所。老区因土地革命，高小都停办。1938年各县才开始恢复或新设完小。据统计，当时有12所五年制完小，学生只有200人。由



于党和政府的重视，领导、教育部门的努力，完小有了较大的发展，1939年为28所，学生820人，1940年，加新区高小合计53所（边区原有30所），学生为2000人（原有1,159人）。两年之内，学校和学生数都增加几倍。到1942年，学校数保持原状，学生增至2,218人。到1944年完小学生总数为18,116人。到1946年，完小发展到62所，仅高年级学生就达3,000余人。

边区在旧社会时就建立过冬学，但到1935年土地革命前，据我所知，这种教育形式就不存在了，其他社会教育形式没有建立过。在1935年和1936年土地革命时期，虽然也成立过识字组、夜校等，但因戎马倥偬，人们忙于分配土地，参加革命活动等，成绩不大。

从1937年起，边区开始大办社会教育。提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及教育是中心工作之一。于是在1937年冬天开始办学。当年办起619所，学生10,337人，初次取得重大成绩。1938年继续办冬学，共计723所，学生12,824人。为了和小学衔接，常年不断，特于冬学结束时，把其中的儿童转入小学，妇女转到夜校，成人、青年动员到识字组或夜校继续学习。1938年，夜校、冬学、半日校为1,558所，学生人数25,063名。1939年提出，本年消灭30,000名文盲。对于消灭文盲的标准、课程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社会教育组按期完成。本年识字组、半日校、夜校、冬学共发展到5,232所，学员为53,266人。1940年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为5,469所，人数为59,953人。1941年提出，社会教育主要用新文字消灭文盲，通过新文字学汉语。这一年仅夜校、半日校、冬学就发展到1,557处，人数为20,915人。从这些不完整的数字看，识字组织发展较快，对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起了较大的作用。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社会教育如同小学教育一样，到1941年有下降之势。到1942年，在精简精神要求下，取消了有名无实的识字组织，数字大大下降。但政府比较

重视冬学消灭文盲，因而收效也大，最有成效的是在1937年至1940年。

1940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后，提出民办社会教育，按群众自愿与需要办学，因此，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有所发展。但到1946年因放松了对社会教育的领导，不但未得到发展，而且逐渐下降了。比如1944年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共3,007所，人数30,113人，而到1945年组、校数降为1098所，人数降为10,297名，到1946年组、校数又降为913所，人数降为5,480名。从以上情况看，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国民教育却大大发展了，其成就是很大的。

(二)提高了边区人民的觉悟。首先是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如前所述，从1937年到1946年，小学和完小有了飞速的发展。在这些学校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们，受到了初等教育，不少完小毕业学生在党的号召下升入了中学和师范，受到了中等教育；在社会教育组织中学习的成人、青年和少年儿童，数量也有很大发展。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识了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据当时估计，边区文盲占边区人口的99%，至全国解放前，边区文盲约占边区人口的90%，这就是说，在十二年中边区大约消灭文盲10%。仅从消灭文盲这个角度看，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至于边区人民在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婚丧礼事等方面，也都受到了教育，养成了讲究卫生的习惯。其次，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在小学和社会教育组织的课堂内外，长期向少年儿童和成人青年进行抗日战争、减租减息、“三三制”、大生产等方面的教育，许多少少年儿童踊跃上学，站岗放哨，优待抗日军属，慰劳伤兵；成人青年踊跃参加自卫军，当兵上前线打日本，参加各种长短途运输队和各種义务劳动，缴纳救国公粮等等。这些事实说明，国民教育在提高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上起了较大的作用。虽然，提高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主要是靠党和政

府的各种方针、政策的施行和对人民进行的各种教育，但国民教育工作在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还是起到了自己应起的作用。

(三)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国民教育，特别是完全小学和社会教育组织对培养和提高边区革命干部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建设边区，迎接全国解放，准备了许多干部。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自1938年起，边区相继成立了好几所中学和师范。中学和师范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生来源主要靠完小供给。边区政府规定，每年要尽量动员完小高级班毕业学生升入中学和师范学校。在1941年以前，估计完小高级班毕业生有1,500人左右，其中升入中学和师范的约占2/3。各分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因毕业生各地多寡不同，学生的年龄不同，需要干部的情况不同，因此升入中学和师范的人数也有差别。到1944年，全边区完小高级班毕业学生逐渐多起来，特别是绥德、延属两地区尤多，升入中学和师范学习的约占1/2左右。边区保育小学每年的毕业学生除个别外，全部升入中学和师范学习。

社会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干部，主要是扫除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当时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中，有不少是文盲和半文盲，特别是区、乡一级干部更多。这些文盲、半文盲干部是扫盲的重点对象。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不了，越来越不利于工作。因此，每年都要把这些干部列入扫盲范围之内。比如1941年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政府规定：各机关团体的不识字的县一级干部，要抽时间入冬学或自动学习；各级青救会的干部，保证60%入冬学；妇联会的干部，保证50%入冬学；其他各群众团体，要动员本团体会员入冬学，保证到校上课，不能缺席。因此，社会教育工作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培养区、乡干部起了重要作用。

中学和师范毕业后工作的干部，以及当时的区乡干部，对于建设边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时，这些干部有许多被调到外省工作，又为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国民教育的性质和方针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实行的是国防教育。毛主席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施“国防教育”，因此，当时边区的教育称之为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因为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故实行国防教育，唤起人民起来抗战，是完全切合时势的。当时，不但陕甘宁边区实行国防教育，各抗日根据地也实行；而且在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号召全国也实行国防教育。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边区的国民教育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毛主席在这部伟大著作中，提出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当时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求中华民族独立；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90%以上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国防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抗日战争初期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而提出国防教育，突出抗日战争也是必然的。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民主，实行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既突出了抗日，又强调了民主，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论国防教育也好，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好，都贯串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个基本精神，边区的国民教育始终是按照这两个精神办学的。

关于国民教育为政治服务，在抗日战争初期，小学课程以政

治军事为中心。初小设常识课，高小设政治课，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上游击战争课，也进行减租减息、“三三制”、边区政策法规的教育，在国防教育时期，学生校外活动也都与抗日密切地联系着。学生编制实行军事化。如前所述，学生帮助自卫队站岗、放哨、查路条；每礼拜六实行优待抗属，为抗属担水、扫地、拾柴火、收庄稼；还进行慰问八路军的各种活动，如缝衣、补鞋、洗衣服等。在国防教育时期突出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活动，是完全必要的，充分体现出国民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方针，但是活动量未免太重了。当时的口号是：教材“抗日化”，不但政治课本、常识课本是如此，还贯穿在全部小学、社会教育是教材中，“三句话不离抗日”。而对于民主和基础知识讲得太少，对于边区人民日常所需要的知识，同样也讲得很不够。课本内容过于单调，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同样单调。在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时期，国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联系边区实际的内容多了，抗日的内容和活动减少了。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关于国民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在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方针时，在1942年边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之后，国民教育的内容多样化了。无论在课程方面和教材内容中，以及学员们的课堂内外活动中，都是如此，课内进行科学知识、文化知识、讲究卫生、破除迷信等方面的教育，更突出的是进行劳动生产方面的教育与活动。边区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劳动观点、劳动教育具体贯彻到教材中去，并且组织学生实际参加各种劳动。1940年，特别是1942年以后，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基础，即开展了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因此小学和社会教育强调结合边区农村实际，在教学中、课本中突出了生产。课本中编进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培养热爱劳动、养成劳动习惯的内容，同时学校内的劳动生产活动也大大加强了。学生种植各种蔬菜、喂猪等，在小学内普遍进行。有的学校还搞副业生

产、小手工生产，烧木炭、挖窑洞；有的学校还成立学生生产合作社，搓麻绳，制粉笔、扎扫把，做石板；女生捻毛线、织毛衣；以及为学校修操场、盖厕所等。总之，学校生产，果实累累，蔬菜完全可以自给，有的甚至每年收蔬菜几千斤，生产总值达10余万元（边币），对贫穷学生进行补助，充分体现了国民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针。但是为了改变过去教学和课外、校外活动的单一化，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使之多样化，联系实际，却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即对学生课内劳动的教育有些城市化，学生课外活动既多又重，社会活动也嫌太多。有的专区为了国民教育大革新，提出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四结合。这对于联系边区实际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却使学校活动过多，削弱了课堂基础知识的教学。

### 三、国民教育的发展阶段

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一）从1937年到194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国民教育着重学校、社会教育组织数量的发展，同时提出注意质量。由于侧重数量，如前所述，到1940年仅四年的时间，小学就由1937年的545所发展到1,341所，学生人数由10,396名增至41,458名。1938年开始建立完小，当时只有12所，学生300人。到1940年，学校发展到53所，学生激增至2000人。社会教育在1937年可以说从零开始，当年冬办起冬学619处，学生10,337名，到1940年，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发展到5,469处，人数为59,953名。还有其他社会教育组织如鲁迅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剧团等，都有较大的发展。

这个时期国民教育其所以迅速发展，总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解

放，生产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生活上也有了改善，有供孩子上学的主观愿望。

其次，旧社会时，就整体上来讲，边区文化教育落后，有些地区非常落后。但是有些地区多年来就有办教育、让儿童上学的传统。因此，政府一号召，学校也就办起来了。

再次，人民的负担较轻，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人民给政府交纳的救国公粮也比较轻，有力量送子弟上学。

又次，土地革命时的边区人民是有组织的，如赤卫队、妇联会、儿童团、少先队等，人民受过组织上的训练，受过战争的锻炼，受过各种教育，加之抗日战争开始后各种政治思想上的动员，人民政治觉悟较高，政府创办学校，人民就积极响应。

最后，当时边区政府提出实施免费普及小学教育，不强调集中办学。因陋就简办学，学校就易于办起。

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强调多方面改进学校工作，提出正规化、克服游击作风，从学校设置、管理，学生编制，课程设置，生活指导，学校设备，成绩考查，入学、休学、转学以及毕业费用到教职员等，都有规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培养、提高教师。这是学校质量的中心环节。当时边区虽然涌进来很多知识分子，但是分配作小学教师的并不多。加之学校发展很快，教师不但数量不足，而且程度偏低，比如1938年延安等十个县的845名教师中，师范毕业生213名，占25%；高小毕业生438名，占52%；老先生和不曾上过学校的白识字194名，占22%。由此可知，许多教师不但程度低，并且没有学过师范，不懂得教学法和管理法。基于这个情况，边区教育厅多次强调提高学校质量，培养教师是中心一环。这是非常正确的。培养提高教师的办法，主要有三条：①开办短期训练班，利用假期集中进行。教育厅直接主持办过几次教师暑期训练班；各专区、县也可

开办。②自学辅导，由厅供给书报、《边区教育》等，供教师个人阅读和集体学习。在农村以中心小学为主，主持组织附近各小学教师的学习。③保送学习。对服务年限较久、工作积极、力求上进的教师，保送高一级学校，如陕公师范部、边师高级部学习，以资深造。

2、提出学校正规化，克服过去残留下来的游击作风。过去的小学，很多没有课程表，没有黑板，不经常上课，学生忽多忽少，没有校牌、校训，没有表册，没有桌凳，等等。因此规定：学校要按教育厅颁发的课程表上课，要有学生登记册，一律按厅颁发课本上课，要有校牌、桌凳、黑板等，取缔《四书》、《三字经》等。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又规定测验编级，程度好的升级，程度差的留级；同时，实行集体教学和复式教学，克服个别教学，废除死读书。坚决克服残存的游击作风。

3、改进管理制度。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建立会议制度，讨论学校各项工作，会议有学生代表参加；学校领导对学生采取解释、说服、鼓励等民主方法，废除打骂，禁止体罚，对顽皮学生实行集体教育制度；学校普遍建立学生会，进行民主生活，自己管理自己，共同立法，共同遵守，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和学校工作的顺利进行。

4、课外和校外活动。当时很强调这方面的活动，因为，这是学校联系社会实际、培养学生自治能力、提高学生政治觉悟的重要方法之一。课外活动是多样化的，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如前所述，经常的活动有劳动生动、参加识字组工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等。

这一阶段，国民教育的主要特点是：①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得到迅速发展，是三个阶段中的最高峰。提高学校质量，建立各种制度，也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带有旧型正规化的色彩。②动员学生入学时，强迫命令逐渐发生。1937至1938年的两年中，学生



入学比较顺利，采取宣传鼓动办法，基本上无强迫现象。之前，群众认为学校给学生教的学非所用，他们要的学生不会；有的群众把学生念书当成当兵，怕当“公家人”；有的家庭经济困难，劳动力缺乏，不愿送孩子上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扩大学生数量，强迫命令入学逐渐多起来了。过去是宣传鼓动，以后变成宣传固定。1939年下半年边区政府正式提出实行普及教育，三年完成。认为普及教育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政治上的影响，并且认为普及教育有了根据和条件。1940年3月29日，边区政府公布了普及教育暂行条例，1940年12月，又公布了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儿童从8岁到14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除特殊情况者外，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并且决定经说服动员家长仍不愿送儿童入学者，视家庭情况处以不同数量之罚金。从此，强迫命令之风更盛。然而，强迫归强迫，从1941年下半年起，入学学生越来越少。

1944年10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教育代表对实施普及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有争论，一方认为当时提出普及教育是正确的，另一方认为不正确，各持理由。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则一致认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领导机械地搬用外国强迫教育的理论，瞎说“边区老百姓落后，不强迫便不能普及”。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正确的，当时在工作方法上确有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

(二)从1942年至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国民教育工作，主要是整顿小学，实行精简，提高质量。边区教育厅于1941年10月提出整顿小学，本年12月发出整顿小学的指导。1942年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教育厅提出精简小学，提高质量。所谓精简小学，只是精简初小。对于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则是加强领导，提高质量。

关于整顿小学、实行精简的办法，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

点：①审查现任教师，有多少合格教师，就开办多少学校；②凡确实做特务工作，破坏边区有事实者及思想落后，品行不端或无教学能力者，应一律辞退；无继任者，则该普小停办；③选择人口集中，交通方便，基础较好的小学，修理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领导，改为中心小学；④一般小学要有学生25人以上，有教员单独的教室、宿舍、游戏场所，教室要有黑板和桌凳，否则停办；⑤五里以内的小学，尽可能实行合并，五里以外者取消。

在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和小学大量发展的情况下，相继提出精简小学、提高质量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的情况是，①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发展很快很猛，不少学校名不副实，巩固率较低。有些学校开学时动员学生入学，快放假时还在动员学生入学，流动性比较严重；②教学经费比较困难，人民公粮的负担也很重。公粮征收，1940年开始加重，1941年和1942年更重了。1942年是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教育经费既微薄又供不上；③教师和课本都供应不上，短缺课本的现象很严重。

在整顿小学、提高质量的方针下，对小学进行了全面整顿。整顿结果，根据29个县的统计，1941年春季有小学1,195所，经过精简，到1942年小学只有723所，减少472所，占原有小学的39.5%；学生原有30,845名，小学精简后只有23,324人，减少学生7,521名，占原有学生的19%。在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偏向，精简过分。教育厅在当时只发指示，具体精简由各县自办。因此，不该精简的精简了，不该合并的合并了。精简的目的，是提高质量。凡是正确执行精简政策的各县，财力比较集中，干部配备加强了，也提高了教学质量；未正确执行精简政策的县，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在整顿、精简小学中，对于完全小学却是采取加强领导，提高质量的方针。边区党政以及教育厅，一开始就很重视完全小学的发展和提高。在第一阶段是这样，在这一阶段也是这样。到

1941年，完小已发展到53所，学生2,218人，以后更有发展。这一阶段完全小学以加强为原则，采取的主要办法是：统一学校组织机构，提拔品学兼优的小学教师和争取未来知识分子到完小工作；完小最低限度要有一个高级班，学生起码在20名以上，条件不够，成绩太差的酌情合并；两校距离很近，但人数皆多者，毋须合并；招收新生要实行考试；完小建立董事会，聘请当地有威望、热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主持；加强学生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和对生活环境的认识，利用本地的事物进行教学；集中物力、财力，依照可能增加的人数，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对于完小工作干部，加强配备，以政治和教学能力的强弱作为任用标准。对于中心小学，也是采取同完全小学一样的方针。1938年《边区小学法》中提出，在普小的基础上建立模范小学。同年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此后边区逐渐建立起了一批模范小学。模范小学就是要在普通小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对模范小学要求较严格，给予条件也较优。到1941年冬，又在模范小学中择优建立起中心小学。对中心小学的要求更严，根据各县不同情况，每个中心小学学生应在30—50名以上，校内设备也要齐全。特别主要的一条是，中心小学要起中心作用，即要组织附近小学教员对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进行研究和讨论，领导附近小学教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并推动他们积极改进学校工作。根据当时的了解，中心小学确能按照这些规定办，确实起了中心作用。

这个时期对社会教育的方针是：整顿巩固，充实内容，不求扩大。当时取消了有名无实的识字组织。1943年以前的社会教育组织，人数已大减。实际所减者，诸多是空架子。1944年，各地为了准备文教大会，对社会教育突击了一下，数字又增加了，以后又逐渐下降。

这时期继续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通过新文字学汉字，主

要是在每年举办一次的冬学中进行。为了整顿、巩固、充实、加强民众教育馆等社会教育组织，以及推行新文字，这时候着重对新文字和社会教育干部进行培训，同时强调完小、中小一定要办社会教育，每校至少办二个识字组或一个夜校，以新文字教学。

这一阶段国民教育的特点是：由于精简了许多条件差、学生流动多、教师不够格、困难大的初级小学，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完全小学、中心小学以及较好的普通小学之后，学校的条件改变了，领导干部加强了，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增多了，从而教学质量和学校质量有所提高；同时也向着联系边区实际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工作中仍然基本沿用第一阶段后期有一定人数、一定设备、一定制度、一定组织、一定活动的带有旧型正规化的作法办学，集中办学。冬学也强调集中办学，有些地区以区为单位，办中心小学和冬学。当时认为这样的集中办学，教学效果好。这也确是事实，但是，给学生入学造成很大困难，增加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当时在教学上试图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这是好的，但是教学内容上，把一些不适合边区农村而是适合城市的东西搬上讲台，因此，学非所用的现象仍然存在，某些学校仍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后期发展数量，改进质量，工作上有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话，那末这一阶段执行精简政策，工作上也有偏向，有脱离边区实际的毛病。其所以发生这些失误，主要还是没有了解边区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很好地估计主观上的力量。

(三)从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到1946年7月解放战争开始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国民教育改造的阶段。国民教育改造工作在边区文教大会前已经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4年4月《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导》发出之后，各县在教育上已有了一些转变，并取得若干经验，人们把这一年称之为改

造的一年。但是，实际上还是试办时期，或者说是改造的序幕。边区文教大会才算改造时期的开始。文教大会就是改造大会，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对国民教育改造，在前面两阶段工作的叙述中已经涉及到了，这里再集中阐述一下。边区文教大会对以前的国民教育作了详尽的、深刻的研讨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民教育改造的方针和办法。为什么要对国民教育进行改造？基本理由是：边区小学教育较之抗战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许多缺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教育建设中，特别是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措施，不能完全适合边区实际和群众需要。具体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在教育内容上，缺乏以边区人民实际生活需要的内容教育学生，相反地用了许多复杂的非农村所必需的内容教育学生，结果使学生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家长不满意，社会有议论，不愿送子女上学。

其次，在办学形式上，一个乡甚至一个区集中办一所学校，学生要离家住校，加重了家庭经济上的负担；又因家长长久看不到孩子，怀疑变成“公家人”了，不愿再送去上学。

改造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民办公助的方针。根据这个原则和方针，规定了改造的主要目标：

在小学方面，总的目标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民。新公民至少要学会1,500字和学会算术加减乘除，具有初步的卫生常识和政治常识，具有生产劳动的习惯。在办学形式、学制、教导等方面：分散的农村一般应以自愿的民办村学为主要形式，同时允许老百姓拥护的好的中小、普小存在；学校的学制不求一律，一般应废止正规的班级制和学期制，凡学完规定的教育内容即可毕业，但要保证三年内完成学习计划；在教导方法上，必须使学生深刻理解所学的内容，坚决废除打骂和体罚学生的办法，培养和

奖励学生的自觉自治精神；学校要联系实际，使学生从事家庭劳动和为社会服务（主要进行社会教育、办识字组、夜校）。

在社会教育方面，总的方向是进行不脱离生产的社会教育。其具体目标主要是消灭边区不脱离生产的文盲、半文盲，使他们能学会一千字，会念《群众报》，懂得初步的卫生常识；主要对象为四十岁以下的成人、青年男子，三十五岁以下的成人、青年妇女。扫盲要逐步进行，先着重消灭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与组织起来的农村积极分子中的文盲，然后为其他人。扫盲规定以三年到五年为期，争取在10年之内全部完成；县以下的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为识字运动的据点，成立各种识字组织。特别要重视冬学的作用，使冬学与平时的各种识字组织联系起来，以免一曝十寒。同时还要利用民间旧的集会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工作。

在边区文教大会确定改造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措施以后，边区各县国民教育得到广泛发展，人民办教育的空气甚浓。文教大会前小学1,090处（内民小574处），学生33,686名；文教大会后小学1,181处（缺盐池、吴旗两县）学生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1,377处（内民小1,057处），学生34,004名（内民小学生16,797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民办学校显著增加。这种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1945年上半年。在公小与民小的比例上，文教大会前民小约占边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大会后增至61%。1945年上半年复增至76%。民小数量所以增加如此快，除本身发展外，有大量的公小转为民办，较大集中的公小被分散为小型的村小。但是，小学发展不平衡，从各县情况来看，约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学校和学生都是向上发展的，一种是无论学校还是学生都逐渐减少；一种是一度上升后急剧下降，一种是一度下降后又逐渐上升。这在执行新的国民教育方针上是很自然的现象。

民办学校形式上多样化了。有一揽子学校，即娃娃的整日班，妇女的午校，成人的夜校；有按户轮校，按村轮学，冬春两

季学校，职业小学，妇女学校等，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劳动教育结合起来。

教育的内容结合农村实际需要。群众需要识字，就教他们日用杂字；需要记帐，就教他们珠算；需要应酬门户，就教他们写信、写条据、写契约、写对联；需要健康，就教他们卫生常识；需要儿女，就教他们怎样生养娃娃等等。这样的学校群众很拥护，在群众中扎了根。

公办中小、普小的教育内容也有改进。一般都加强了科学文化课程，增加了农村迫切需要的珠算、应用文等。若干学校还给学生加授植棉、防治病虫害等新的农业知识，并加强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鼓励学生帮助家庭生产，同时兼办社会教育，开展识字运动。

关于识字运动发展趋向和组织形式问题。先看数量的变化，文教大会前后一度上升，1945年以后，数量大减。文教会时，根据十六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参加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的人数总计为30,113人，而1945年后季，只有5,480人，比1944年减少81.8%，可谓大降。

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大都是读报与识字结合进行，教学时间随季节和生产忙闲来定，还有与生产队结合的识字组。学校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核心。新建立的夜校和识字组，小学生作小先生；乡政府兼做社会教育，乡长兼任识字组长，领导识字。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各县市民众教育馆工作大有进步，馆内活动充实，增加了报刊图书，有阅览室、游艺室；对外组织认字组，向群众宣传时事，为群众代笔，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等。这些作法，都是十分得人心的好办法，受到群众赞扬。

边区文教大会提出的国民教育的改造方针是正确的，但是文教大会之后，为什么国民教育出现数量大减？这主要是领导作风和一些同志对自愿和需要、对民办公助的认识问题。这点在下面

两章中详细论述。

这一阶段国民教育发展的特点是：改造国民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正确执行这些方针和政策的地区，国民教育得到了发展，教育内容和教育组织形式都能结合当时各地的实际和群众的需要、自愿，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但是，由于领导作风上的放任自流或强迫命令，使教育组织人数大为减少。由此可见，教育上的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固然关系教育的成败；而领导作风是否实事求是，对教育的成败关系也是十分重大的。

#### **四、需要与自愿原则的实施**

先说需要与自愿原则的提出。1944年10月11日，边区文教大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隆重开幕，计千余人参加。教育厅负责人致开幕词后，继由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徐特立同志讲话，还有李鼎铭副主席讲话。会议开到10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文教统一战线方针》——新形式联合旧形式、反对共同敌人、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进行工作的报告。毛主席说：文化统一战线的必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互相结合的必要，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应该是工作中的两个基本原则。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一定要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要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或历史教条出发。要因时、因地制宜。譬如陕甘宁边区与各解放区的指导原则是相同的，但是在陕甘宁边区适用的各项具体办法，如果不适用于其他解放区的战争环境，或不适应人口较稠密、文化较进步等条件，即不应勉强搬用。而应采取适合当地条件的办法。如果群众在客观上虽有此种需要，但在主观上尚无此种觉悟，则领导者与工作人员应该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自己的工作，使群众有了觉悟，因而自愿实行之时，才去实行，决不应强迫命令。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就只会流于形式主义而失败。“欲速则不达”，一切工作都是如此，对于改造群众思想的文教工作尤其是如此。毛主



席的这个文教统一战线自愿与需要原则的讲话，切中要害，引起了与会广大代表和干部的极大重视，解决了当时文教方面存在的方向和其他几个重大问题，当然也解决了国民教育中存在的方向和几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为会后改造国民教育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其次说需要与自愿原则提出的历史背景。我的体会是，提出需要与自愿原则的历史背景，概括起来有两点：一个是如前所说，当时边区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命令主义；一个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一句话，脱离边区实际，脱离群众需要。国民教育工作也是这样。国民教育不论在发展阶段也好，巩固阶段也好，都发生过强迫命令。发展学校、精简学校的数字都用摊派办法，由上到下，一派到底。用政治动员学生入学，变成了上门通知。有的人认为“边区老百姓落后，不强迫不行”。因此，在实行义务教育时，强迫命令多起来了。“先礼后兵”，不去上学就处以罚金。本来群众对上学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越强迫则顾虑越大。有的群众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不能送子女上学，却又不能区别对待。学校对于群众这样那样的意见，不能很好地研究，加以改进。而从教条论出发，办集中学校，搞正规化。因为强迫学生入学，其结果是造成不少学生到校不好好学习，经常发生流动现象。有些学校在名义上有多少多少学生，识字组织有多少学员，但是实际上在校生和来组织字的人很少；有的识字组织纯属空架子，有名无实。形式主义还表现在学校的一些制度和实际要求有距离。许多规定往往办不到，只起“装门面”作用，图形式而已。总而言之，不论命令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都是违反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原则，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而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实施，对于克服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对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决定工作成败

的关键。需要与自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化；但是，什么是需要？什么是自愿？需要与自愿的关系怎样？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在进行工作中也就情况各异。需要有客观需要与主观需要，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群众容易接受主观和眼前的需要，领导者能按照群众主观需要和眼前需要办学，群众就乐于接受，事情就会办得好些。群众不容易接受客观和长远的需要。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不是群众不需要，而是他们还没有理解到这种需要，这就需要领导者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说服无效，就等待群众觉悟。当时国民教育工作考虑群众长远的客观需求多些，而对于群众主观上的、眼前的需要则缺乏考虑，或者考虑得很少。边区文教大会之后，较多地考虑了这个方面。自愿，应该理解为自觉。自觉就是经过说服教育、劝导，达到自愿。自愿不是自发，也不是自流。抗战初期，群众自发办学的情况也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自觉，不是自发。因为虽然没有经过较多具体说服动员，但有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感召，才使群众较自觉地起来办学。要群众自愿，必须建立在群众需要的基础上，然后继之以说服动员。若动员无效，就只好等待。不建立在群众需要的基础上，让群众自愿是不可能的。

文教大会之后，由于对群众的需要认识不同，在国民教育改造中，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民办学校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是，小学总数下降了。办学形式多样化了，教学内容切合农村实际了；但是，学校有过于分散和较多注意群众眼前需要的倾向。民办学校多迁就群众意见，有死读书，强调背诵的现象；有的学校让学生早晚在家里学习，出现“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现象，家长不满意，偏离了文教大会的方向。

不同的认识，还表现在对“自愿”这个词的理解上。有的认为自愿就是自发和自流，说什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结果民办不起来；有的认为自愿办不到，“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

强迫民办。因此，文教会议之后放任自流和强迫命令的作风，在国民教育改造中同时存在。一时存在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不懂得按群众需要与自愿办学，一个会议之后，就要大家运用需要与自愿原则，从而避免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是比较困难的。后经上级教育部门一再纠正，情况才有了好转。到1946年，学校就比较稳定了。

### **五、民办公助工作方针的执行**

首先，谈一谈民办公助工作方针的提出。陕甘宁边区早年就有人民办学校的传统，私学、冬学就属于这种学校，不过不称民办，不同于我们赋予新内容的新式民办。1944年初，各地出现民办学校。当然，这种民办学校，不是我们后来所提倡的新的民办。但是，这些民办启示了边区教育要普及，就要走民办的道路。于是，1944年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提出民办的必要性和对民办公助工作方针的说明。各县接到指示后，就讨论如何民办，并着手试办，取得了初步经验，小学有了发展。到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时，正式通过了民办公助的工作方针，并对民办公助的内容、办法和实施作了详尽的决定。毛主席在向大会作的《文教统一战线方针》报告中指出：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都要告诉边区150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困难的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如教育方面，即不但要有比较集中，比较正规的中小学，而且还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内容的民办学校，并且要利用和改造旧的私塾。毛主席对于正规和非正规的办学方向的讲话，同样给了与会代表和干部很大的鼓舞，使大家对于开展民办有了充分的信心，对会后执行民办公助的工作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谈民办公助工作方针提出的主要根据和实行的可能性。民办最要紧的一个问题是：群众有没有力量，即有没有钱办学。如果群众经济上富裕了，生活上改善了，那么起来办学的可能性就很大；否则，民办是困难的。当然还有其他条件，如想不想办学，需要如何，等等；但是，经济条件是重要的。1942年边区最困难的一年过去了，在党的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下，1943年和1944年全边区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改善，机关生活也大改善。比如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16万石，而全边区年消耗粮食约160万石，有22万石余粮。这就是说，边区广大人民基本做到了“足食”，部分群众还有了余粮，经济活跃，“六畜兴旺”。在此基础上提出民办是完全适时的，是有较可靠的群众经济条件的。这是从群众这方面来讲的。从政府方面来讲，从1940年起，国民党政府停发了边区经费，因而边区财政很困难，人民节衣缩食。到1943年和1944年虽有好转，但要拿出许多钱办学，还是不可能的。多年的经验证明，政府一手包办学校是无法实现边区教育的普及的。只有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家起来办教育，方可实现这一伟大任务。

再次，对民办公助工作方针的理解正确与否，关系到民办公助的成败。民办公助，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国民教育工作上的具体化。它的含义，在边区文教大会的报告、决议中有明确的解说，对民办与公助的关系也有明确的确定。群众教育实行民办有两个意思：一是适应边区老百姓的情况和需要，目的在于发挥老百姓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二是老百姓自己出钱自己办学校，提高他们“主人翁”之感。但是，经费问题不是民办的主要标志，更不是唯一的标志。民办离不开公助，就是说离不开领导。公助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民校的各项具体帮助，主要是教师、课本的帮助；二是对民校教育方针上的领导。就是说民

小要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办学，民办与公助的关系，若作为一个领导体制来讲，可以说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即民主集中制，亦即在民主办学的基础上加强领导。民办能否健康地发展，关键在于领导。文教大会还确定，“民办”是当时开展边区群众教育的主要方向，而不是唯一的方向。某些有成绩或得到老百姓拥护的公办性质的普小，仍应继续存在和发展。

但是，如前边所说，和人们对于需要与自愿的误解一样，不少做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民办公助工作方针的理解有不少错误，他们认为，民办就是一切由群众自己去办，公家不去领导；公助就是强迫命令。因此，出现了民办办不起来，或者官逼民办，或者办起来不久又收场的现象。

当时群众教育大量实行民办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必须保留一批比较好的公办普小，使之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标兵，在民办学校中起模范作用，引导民办学校在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共同前进，也是必要的。在文教大会之后，一批公办学校转为民办学校，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但是曾几何时，民办又要求公办。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民办一哄而起，条件差，办不下去了要转公办；二是强迫民办的，过一时期群众不愿办了，要交公办。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有些领导把握得不很准，一会儿要民办，一会儿又要收回公办，因此，民办问题主要还是领导问题。公办离开领导不行，民办离开领导更不行。

所谓民办、公办，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大的区别。公办是大集体办，民办是小集体办。大集体和小集体，只是大小的区别，量上的区别。因此，要加强公办学校的领导，同样也要加强民办学校的领导。把民办看成是私人的，把公办看成是公家的，则是十分错误的。

## **六、国民教育的两重性**

我这里所说的国民教育的两重性，主要指小学教育中的完小

高级班和社会教育中的若干识字教育而言。本来国民教育只有一重性，并无什么两重性的问题。但是，根据陕甘宁边区那时候的具体情况，国民教育确带有两重性，就是指国民教育一方面是普通教育性质，负有提高儿童青少年和一般人民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负有为国家培养广大干部的责任。边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形式大开，许多抗战建国的工作要做，而那时候的工作干部不但数量少，质量也低，主要是文化水平太低。很多工农干部是文盲或半文盲，尤其在区乡干部中文盲半文盲很多。有的乡的文化干事、教育干事也是文盲。由于边区各项建设的发展，这种干部状况越来越不适应事业的发展，甚至阻碍事业的发展。而这些文盲、半文盲干部还非常保守，不愿意学习文化，说什么“不识字还不是一样闹革命”，“过了三十不学艺”，用“老黄历”办事，看问题。由于需要大量的干部和消灭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不但边区的大学、中学、师范和各种训练班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就连完小和社会教育识字组织也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

这里先从边区的完全小学说起。边区从1938年开始建立完全小学。党和政府以及教育部门一直很重视完小的工作，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充实设备。开始提出把完小改造成全县学校教育的堡垒，在全县学校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边区中学、师范学校相继成立之后，完小就成为这些学校学生来源的主要源地。因此，每届完小高级班毕业生都被动员去中学、师范上学。1940年，由于小学大量发展，需要许多小学教师，所以把完小高级班尚未毕业的学生当成一支重要的教师来源，这时候完小培养干部的性质还不太明显。1941年，教育部门估计，截止1941年高小毕业生总数有1500人之多，毕业生的2/3升入师范和中学，1/3服务于教育和青年工作。从这个统计看，完小高级班已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至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时，教育组的代

表就完小是否是干部学校的性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环县、合水、赤水、延长、甘泉、佳县等几个县历届高小毕业生的出路看，担任工作和升学的占总数的72%强，回家务农或经商的占20%。大家认为，有72%强的毕业生担任工作或升学，则完小高级班属于干部性质是毫无疑义的，完小的二重性很显然。当然各县情况不同，有些县的完小高级班毕业生因年龄小，不宜工作，升学的多，工作的少；有些县因学生年龄较大，工作需要，所以当干部的多。有些县因为特别需要干部，所以完小高级班学生还未毕业，就被调出工作，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边区文教大会正式决定：完小和师范、中学一样，均以培养干部为主；每个县至少办好一个完小，使之成为培养各县知识分子的场所。为此，要求完小高级班除教授具体的实用知识外，还须注意培养学生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毕业生要具有乡文书、合作社会计、村学教员等条件。文教大会决定中还说：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今天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了解，要完成长期建设边区的任务，没有一万到几万高小毕业、中学毕业程度的本地知识分子是不能设想的。1946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加强完小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争取三年内培养完小高级班毕业生2600人的任务。由此可知，完小在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中的重要性。它是干部学校性质是很显然的。

再说边区国民教育中的初级小学。初级小学，属于普通教育性质；但是，当时边区除绥、米等县以外，初小高年级学生年龄一般比较大，有的初小毕业后就参加革命工作。同时，完小高级班学生的来源主要靠初小毕业生。为了扩大完小高级班的招生，常常动员初小毕业生上完小学习。为了鼓励初小毕业生升入高小，边区教育厅曾规定，对贫穷高小学生在学期间酌情补助伙食费之一部分或全部。对于少数民族，如蒙、回等族儿童升入完小和中

学学习者，予以特别帮助和奖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培养大量干部。因此，边区初小，虽属于普通教育性质，但是部分的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预备性也很显然。

最后，说社会教育。这里主要说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识字，扫除文盲，属于普通教育性质。但是，也可进一步分析。在1940年以前，社会教育是对一般的广大群众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1940年以后，就强调扫除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那时候，县以下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中的干部，许多是文盲、半文盲，不利于工作进行。因此，强调扫除县以下特别是区乡干部中的文盲。1941年10月边区教育厅、边青教、妇联会、总工会、保安司令部《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中说：要把工作做好，必须识字。机关团体的县区一级干部，不识字的，要抽时间上冬学或自动学习新文字。并且具体规定了青教干部、妇联干部和工会干部入冬学学习的比例。从1941年起，边区大批县、区、乡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被扫除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因此，社会教育中的识字教育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也是无疑的。

## 七、国民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边区国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最基本的一条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归纳，可分下列四点：

(一)国民教育的发展要与生产发展相协调。在这一点上，边区国民教育的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937年和1938年，边区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这时国民教育发展比较顺利。1939年国难露头，人民公粮负担加重，以后困难愈多，负担愈重，1942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这时候的国民教育工作不是顺应经济上的困难，停止发展，着重提高教育质量，相反却强调发展，又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结果，群众不



愿送子女上学，有些小学徒有虚名。在党的大生产号召下，边区连续几年努力生产，到1943年粮食有余，六畜兴旺，于是1944年以后，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分析起来，与当时教育政策改革有关，而与人民有余力办学亦有关系。1945年先是民办学校发展，后来速减，这与当时边区特大旱灾、夏粮欠收有关，而当时某些领导放弃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总括这条经验是：从生产实际出发工作就顺利，否则就失利。

(二)国民教育要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兴办教育是好事，但不能光从一片好心肠出发，必须考虑群众的意愿。当时国民教育建设，领导上缺乏正确执行群众路线的观点。从良好的心肠出发，急于求成，考虑群众的意愿少，主观愿望多。因此，使教育工作受到一些挫折。经过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1943年和1944年才逐渐明确了按群众需要办学这个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国民教育的改造工作。

(三)尊重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边区山多沟深，平原狭小，交通不便，人口分散。这是边区的一大特点。兴办国民教育，必须因地制宜，顺应自然。一句话，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一点，教育领导部门的同志在口头上承认，但是在布置工作时却被忽视。开始举办国民教育时，虽然常常提出学校要正规化，但是没有强调集中办学，因此，尚能适应农村分散的特点，使国民教育顺利发展。及至以后强调集中办学，办乡学、区学，反其道而行之，这就违背了农村分散这个特点。结果越强调集中办学，学生流动性就越大，群众就越不满。这也是经过反复实践和成功、失败，再成功的经验教训，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办教育，必须由集中办学转变为在分散的农村办村学。

(四)关键在于领导，量力而行。一切工作的好坏，决定于领导。国民教育的建设也是如此。具体工作的领导是这样，战略性

的指导更是这样。从1937年起，国民教育采取发展数量、同时提高质量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缺乏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适当地放慢步子，则是一个失误。1941年采取精简初小、加强中小、完小的方针，也是适当的；但是没有根据边区自然条件采取适当分散形式，而是强调集中办学，则又是一个失误。直到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才拨正了航向，这是十分正确的。由此可见，领导的重要性，成败关键就在于此。

量力而行，就是按照主观方面的力量，有多少力量就办多少事。此孙子的说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时发展国民教育，从主观上讲有三件事很重要，这就是经费、教师、课本。这三个方面供给不上，必然影响事业的发展。当时国民教育经费由各县自筹，政府补贴，数量微少。普小设备，甚是简陋。学校自己生产搞得好一点，经费就稍宽余点。师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突出问题。教育部门虽然采取许多办法培养和提高教师，但始终没有解决好，数量不足，程度偏低。课本问题用了很大力量解决，三次大编写和修订，印发的也不少，但是发行数量与所需数量有较大差距，远远供不应求，加之边区印刷条件差，邮送不便，常常不能按时出版发行，待课本发送到各县各学校时，学校早已开学，给教师造成许多困难，耽误了教学。对这三项工作，因没有结合客观情况加以研究，处理得不够好，就属于未量力而行。

# 农村学校教师的培训及 分配问题亟待解决

(一九八四年)

农村学校教师的培养、提高和分配问题，是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普及初等教育的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决定改革和普及能否成功的关键。当前，我省中、小学教师不但数量少，而且许多人水平也差，要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和改革中等学校结构是困难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思想上、知识上，大量培养和提高。特别要重视提高和培养农村中、小学教师。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办好各级师范学校，要增加和办好为提高和培养农村小学教师所设立的地区师范学校。要办好师范院校，首先要解决许多认识问题。现在有这样几种认识，不利于师资的培养。（1）中师、高师办学指导思想不够端正，有一种偏向：师范大学向综合大学看齐，教育学院向正规大学看齐。师范学校培养目标，争论不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切合中学实际。（2）师范院校培养出的学生，不愿去农村学校。有的分配去了，但不去报到，有的学生刚一派遣，又被拦路截走，做了别的工作。（3）师范毕业生分配到农村中学，不安心工作。在农村待过几年的，又想跳出“农门”。（4）中学毕业生不愿意考师范学校，鄙视师范学校和教师工作。被师范院校录取的学生，有的一见录取通知书就思想负担沉重，愁上加愁。有的说，“路走对了，门认错了”，一入学校，就闹专业思想。这几种错误思想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我提两点意见：（1）提高农村

教师的生活待遇，改善农村学校条件。农村教师生活待遇，多年来一直低于城市，办学条件比城市更差。这固然是由城乡社会情况而形成的一种现象。但是，我看与领导思想上有意无意重视城市，轻视农村有关。既然承认农村学校教育重要，那么，领导上就应当较多地注意农村学校教师的待遇，重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建设。假若农村初等学校要大量民办，农民越来越富裕了，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搞好学校建设，当然不会成什么问题；国家集中经费用于公办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和建设好学校，也是可能做到的。（2）动员各种宣传工具，经常宣传师范学校的重要性，上师范学校和当教师的光荣。这一点，以往除教育刊物、教育报纸有些宣传外，一般报纸登载很少，要增加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宣传教育的重要，师范教育的重要，教师的光荣。同时批判轻视农村教育、轻视师范教育、侮辱殴打教师以及轻视知识分子的不良现象。各级党报能经常刊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意义更为重大。

其次，师范院校要大力挖掘潜力，扩大招生数额，大门开向农村。师范院校是否有潜力可挖？我看有潜力可挖。比如，有些学有造诣、身体较好的老教师，学力未能很好地发挥；不少教师未完全把精力用在教学上，而是用很多时间写文章；有些教师社会活动较多，等等。如果能把这些教师的力量全用或多用在校内教学上，其力量是有余的。教室和宿舍，其潜力也是可挖的。如果历年再逐渐增修一些教室和宿舍，逐渐加大招生数量是不成问题的。

师范院校的招生，可实行定向农村的办法。既然是定向招生，就应当多招收农村学生入学，毕业后回农村任教。但是，农村学生一般程度较低，达不到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决：一是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本来分数线高些比较好，可以培养较高质量的师资；但是，面对农村学生的实际，就不能不

适当地降低分数线。二是师范院校设立专修科或简师班，另定分数线，录取较低分数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去农村教初级中学。

第三，有计划地多设立中级师范学校。最少一个专区设立一至二所，有条件的县也可以设立，大力培养小学教师。今后必须把受过中级师范或初级师范学校教育的、懂得教学法、儿童心理和学校管理法的合格教师，派往农村小学，保证按农村普及初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完成任务。

农业院校也要挖掘潜力，大量扩大招生。农村许多高级中学改变为农业中学，需要大量的农业教师任教。现在农村这种教师奇缺，有些地方因为没有这样的教师，不能变高中为农中。有些改变高中单一化，成立农业班或设农业课，将原有教师培训几个星期，充任教师；有的请别单位农业专家兼任教师。这些作法都不失为一时的好办法，但是，只能解决燃眉之急，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农业院校除扩大本科招生外，是否也可以设立专修科或简易班，学制二年，招生录取分数线比本科降低一些。由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任教。农大本科，更应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农村来，农村去。

# 普通教育要积极贯彻“三个面向”

(一九八五年)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时代的要求。普通教育是基础教育，尤要注意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普通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才有坚实的基础，也才能更好地贯彻“三个面向”。当然，这是个新的课题，究竟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搞得快，需要不断地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 and 探索。目前如何在普通教育中贯彻“三个面向”，就我的想法，提出几点意见：

1、积极发展学校数量，加快普及义务教育的步伐。现在全国普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甘肃也是如此。但是，面向世界，其差距是很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本来就很发达，现在更加快了发展的步子。我国目前教育仍很落后，如果不急起直追，加快发展步伐，就难以贯彻“三个面向”的精神。因此，我想要贯彻“三个面向”，首先要继续克服轻视教育和轻视知识、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大量开辟发展普通教育的新门路；每年多投教育经费；大力发展中等师范、初等师范，培养普教师资，并继续提高其待遇，以加速普通教育的发展。落后地区更要发愤图强。

2、尽快改革教学内容，增加新的科学知识，贯彻少而精，提高教学质量。现在普通教育的课程和教学内容较多、较旧，学生作业多、考试多，校外活动少，学生负担很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要提高质量，贯彻“三个面向”，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想需要适当地精简课程和教材内容，大量压缩或取消繁多的校内活动和过多的作业和考试。腾出一定时间，在教学内容和学生课外活动中，加进并突出基础科学知识、最新科技知识的教学。

以我的理解，“三个面向”的根本点是要求提高科技知识水平，没有这一条，也难贯彻“三个面向”。因此，在基础教育上，就要特别重视最新科技知识的教育，使儿童早日打好科技知识的基础。边远、落后地区要努力赶上，不能甘居下游。

3、普通教育的办学体制急需改革，在农村要放手发动农民办学，以适应“三个面向”的贯彻执行。现在大力提倡各行各业办学，这个办法好，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城市成绩尤其显著，因而尤应提倡。但是，我国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民占人口的80%，繁重的普及教育工作也在农村。农村现在富裕起来了，交通方便，商业繁盛，需要科技人才，也愈来愈迫切。因此，光靠公办不行，需要强调农民办学，发挥农民办学的积极性。当然，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农民富裕程度也有区别，还需要国家积极支持。各级政府应分别不同情况，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在教育方针政策上多宣传指导，以巩固和尽快发展农村普通教育。

# 回顾我在甘肃师大工作的主要经验

(一九八五年)

我于1958年10月由北京来兰州，次年初，在甘肃师大（现在的西北师大）开始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约八年时间。这八年，我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教育大革命之后，以及反右倾斗争、三年困难中间工作的，工作比较棘手。回顾这八年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要以民主为基础进行工作

1. 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紧密结合，两者不可偏废。自1961年起，在校一级决定和解决学校重大问题的主要会议有四个：党委会议和党委办公会议；校务委员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学校的大事，由党委会议决定后执行，比如重要的人事任免、提职晋级、评定工资以及各种政治运动、教职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等；学校行政方面的大事，由校务委员会议讨论决定执行，有些报党委审查或备案。如学校预决算、年度计划、教学计划、招生和分配等。党委、校委各直属单位，日常需要解决和请示的重要问题，分别由党委办公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讨论解决。另外，经常召开的还有党委扩大会议，此会主要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是属执行性质的会议。开会时，首先提出议程，在广泛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由主持人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加以总结或作出决定，然后由各部、处、系在有关校党、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分别贯彻执行。我是主张并用这种方法主持会议的。这较之先由主持人发言，划定框框，让大家依样画葫芦的发言讨论为好。前者能集思广益，并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者则反是。当然，有些事也需要主持人先提出问题，或讲一下精神，



然后大家讨论。可视情况而定，不能拘于一格。这样做，既贯彻了民主，又保证了集中和书记、校长负责的精神。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保证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而不在形式。这是主要领导人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会议的主要目的。

2. 注意宏观领导，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和部门负责人的作用，使其有职有权。这是宏观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充分注意。所谓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就是各部门的日常业务由各部门自己独立组织执行，让其放手去干，发挥他们的才能，不要多加干涉。所谓注意宏观领导，其第二要义就是要把党委会、校委会开好，保证作出正确决定。因为这关乎全校工作的成败。同时，要注意学校情况发展的动向，通过调查、蹲点、听课、听汇报，以及参加系的工作会议、科学讨论等，发现问题，及时指导，或组织讨论解决。这种方法，对于身兼党政要职的领导人来说，是科学的，尤其重要。因为一个主要领导人精力有限，事无巨细都抓，免不了包办代替，使自己陷入事务主义圈子，对学校大事头脑不清楚，久而久之，还会使职能部门工作被动，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妨碍培养部门工作人员成为优秀的领导人才。大学好像一架机器，要能使得发动机一动全体各部件都动起来，才能收到统一的效果。如果一抓就动，不抓不动，或此动彼不动，则不能做出大的成绩来。纲举目张，这就是结论。

3. 领导之间要明确分工，各有专责，不搞越俎代庖。我初来师大，对学校情况很生疏，当时学校开始实行党委制，党委领导学校经验不足，摸索前进。因此，学校工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较突出。加之一个时期，上级提出大学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不提校长的作用。因而，校长无所措手足，说不到充分发挥校长应起的重要作用。1962年以后，学校党政领导职务由我一人担任，统一指挥全校工作。除总理全

校工作外，还分工主管宣传和教务两项工作。这种分工法是很必要的，其他党委和校委工作由其他负责同志分工管理。所谓总理全校工作，就是一方面通过党委、校委以及有关会议，主持讨论、安排、督促、检查和总结全校工作；另一方面发挥分工主管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他们去干，不越权行事。我认为重要的在于用人，既然用了人，就要相信人，使其有职有权，主要人除大事过问外，不要事事插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这种方法来领导，既可以团结干部，又可以发挥其才能。

## 二、要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

1. 以教学为主。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以教学为主。50年代后期，高等学校实行的实际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原则。我提教学为学校的基本任务。高教六十条明确提以教学为主，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当时也有不提以教学为主，而提以教学为中心的。近几年来，为了强调科学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高等学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提出来，使高等学校“建设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当然是必要的。

回顾起来，师大实行以教学为主，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实现的。首先，我的理解和做法是：教学主要是在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者中为主的，而且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要为教学服务。所谓教学为主，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应当被忽视，也不意味着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要完全围绕教学进行，为教学服务。教学对政治来说，政治是领导、是灵魂，政治不从属于教学为主的规定内。我是这样理解，也是这样做的。其次，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四者在活动时间上的安排，以教学为主。当时活动较多，除四者之外，还有军事训练、学农、学工，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等。为了各得其所，并突出教学，所以对各种活动的时间作了具体的安排。第三，教学为主还表现在，学校一切活

动都要围绕教学,并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进行。比如1962年“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上,我们向教师提出要求:认真备课,认真讲课,在教学上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附小、幼儿园教师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好祖国的下一代。又比如1963年学校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时,我们强调大学的特殊性,大学不按照经济、生产、行政部门一样进行,照搬照运,而要根据特点,把“五反”运动中属于经济上的问题,限制在学校后勤部门清查。其他教学单位,结合教学进行,以受教育为主。我们既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办,又不能脱离学校的特点。学校搞的是精神生产,增产主要应该是提高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出合乎规格的人民教师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因此,要求自始至终要抓紧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中心环节,决不能因为开展群众运动,放松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更不能打乱教学秩序。

2. 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所以特别强调教学质量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国家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中学教师;二是教育革命使教学质量降低了,学生程度下降了。因此,必须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经过数年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师大的教学质量、学生学习的成 绩 确实有所提高。回顾当时提高教学质量,主要采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发挥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师学术水平等五项措施。

(1) 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课堂教学应是学校教学的基本形式,若以社会教育形式进行,则失去学校教育的意义。1958年的教育革命,有把教学形式主要引向社会的倾向。这虽然在教学联系社会实际、师生到社会上锻炼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却大大削弱了,教学质量降低了。为了克服这种偏向,我们就特别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我认为教学过程有备课、课堂教学、实验、辅导、习题

等，但是，课堂教学则是主要环节，它对教学成败起着决定作用。教学形式也是多种的，如课堂教学、现场教学、教育实习、生产实习等，但在这些形式中，课堂教学也居于主导地位。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必须加强其他教学环节，如备课、实验、辅导以及课外联系实际等。在课堂教学上，强调在课堂讲授中基本弄懂所教内容，即要把各种基本知识、原理、原则、概念等向学生讲清楚，使绝大多数学生听讲后都能领会。

(2) 重视基础课教学。加强基础课教学，首先要解决什么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课的问题。当时对什么是基础课，校内各方意见不一。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不同意见和作法。一种是把基础课范围狭隘化；另一种是把基础课范围扩大化。前者使学生基础知识不足；后者使学生在基础知识学习上负担过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师大基础课的范围是：“根据各科的内容，可以分作一般基础课（政治、教育、体育、外语）、基础课（数、理、化、语文）和专业基础课（各专业基础课）。”这样的分法是否妥当，尚可研究。但是，对于当时统一基础课的认识，并加强基础课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8年后，我们强调教师一定要教好基础课，学生一定要学好基础课。要求师生要特别教好、学好数、理、化、语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要求学生在修基础课时，要重视课堂学习。课外阅读和自习，也应以有关基础课的教材和读物为主。同时，要求业务上、政治上最强的教师担任基础课的教学。我提出“在基础课教师方面，要走取法乎上的路线”，“配备在政治思想上、业务上优秀的教师担任最基本的基础课教学”。又提出在辅导和实验方面，也应注意基础课的辅导和实验。由于提出这些具体要求，基础课的教学确实有所加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强调加强基础课教学的同时，也要求教好、学好其他课程，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3) 教师在教学上要发挥主导作用。1958年教育革命中，反对“专家路线”，因而对专家的作用、教师的作用忽视了，出现了学生上课堂讲课，师生合编教材等现象。编教材，学生不是不可以参与；但是绝不能成为主流，更不能从而轻视教师在教学和编写教材中的作用。就在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我提出教师应在四个方面起主导作用：向学生正确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世界观；正确传授科学知识，努力使教学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以身作则，培养学生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为了使教师能充分做到这些，又提出教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观点和较高的业务水平；树立忠诚为人民、为学生服务的教学思想和态度。希望教师努力做到这几条，以便作一个合格的起主导作用的人民教师。

(4) 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学必须讲究教学方法，那种认为大学没有教学方法问题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不改进，就难以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建设人才。师大更应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对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我曾这样提出：“改进教学方法，实质上是教学思想的改革，是教育改革在教学领域中的继续深入”。以后相继在改革教学方法上提出这样几条：第一，改变照本宣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达到学用一致。在课堂讲授联系实际上，可用两个方法：一是演绎法，一是归纳法。演绎法就是用基本知识、原理、原则，解释现实的有关政治斗争、思想问题和生产实践等。从一个简短的教学过程来说，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归纳法，就是以有关教学的现实政治斗争、思想问题和生产实践等，加以分析、研究、概括，找出其中的规律，以论证所教课程

的内容，这就是从实践到理论。为了克服课堂上照本宣读，这样联系实际的讲授方法是可行的。第二，要重视因材施教。对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我着重提出：首先师大要把因材施教放在重要位置上，作为教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由于大学生和小学生年龄、知识、经验悬殊，因而在实行因材施教上应该有所区别。其次，要着重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所谓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因学生的特长而施教，一个是因学生的短缺而施教。学生特长于某一学科，应给予很好发展的机会；学生短缺那一方面，亦必需加强其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全面发展。一句话，教师要因学生的知识程度，授之以必需的知识教育。再一个是贯彻因材施教，要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去辅导，不应一般的说教。辅导应以个别辅导为主，集体答疑为辅。第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实行启发式教学。我曾提出启发式就是要引导学生自己用思想，善于思考，多研究问题，善于研究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要贯彻实行启发式教学，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必须改变注入式、满堂灌、死教、死读的传统教学方法。现在学生学得死，常常应付作业考试，上课抄笔记，课后看笔记，考试背笔记，跟上老师团团转，没有时间阅读课外书籍，研究新问题。有的教师说，读书就是要死读，就是要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反对死记硬背，主张活读和必要的背诵。要多思考问题，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学习。有的教师发现某些学生在一、二年级时，脑子还比较灵活，到三、四年级时，脑子就呆板了，这是很危险的。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结果，必然如此。要贯彻启发式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还必须反对教师课堂教学时只给学生讲“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这是传统教学、教师讲课的通病。我们的教学，不仅向学生讲清楚“是什么”，而且还必须讲清楚“为什么”，教学要能使学生在听讲之后，能“举一反三”。要应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教

师还必须经常了解学生的实际活动、学习情况、理解能力、现有的知识基础、长于什么、短于什么，思想状况等。然后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准备好教材，施以启发式教学。另外，教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要教给求知的方法。教师自己也要加强教学法的研究，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

(5) 提高教师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我们当时指出，培养提高教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是高等学校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关键。只有培养出大量的合格的又红又专的教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培养提高教师，起先我们比较强调红与专两者不能偏废。但在实际做法上，较重视“红”的方面。1962年之后学校执行高教六十条，教学和科学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因此，要求教师在政治上、特别在业务上更高更深。这时，我们在具体做法上，更注意了教师在学术上的提高，而且要求更具体、更严格。对于助教、讲师、教授都规定了较高的要求和奋斗的目标。在这样的要求下，数年间师大培养和提高了大批各类教师；在教学、科学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 三、要政治思想工作与理论宣传结合

1. 政治思想工作与理论宣传结合。政治思想工作和理论宣传，是提高教师和学生社会主义觉悟的两个渠道。这两个渠道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从根本上讲，理论宣传更为重要，当然也不能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两个虽渠道不同，但在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上则是一致的。第一，要系统地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曾讲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必须知道其来龙去脉。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学，不学就不知道毛泽东思想发展了什么。特别是马、列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一定要读。同时，我强调理论学习要有针对性。学习的目

的是为了提高认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了提高教学、科学研究质量。因此，在学习时要根据内容，联系自己工作、教学、学习以及本部门的情况和问题，详细加以思考。以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教学、学习。把学习理论与提高认识、改进工作、改进教学的过程统一起来。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第二，思想政治工作。学校的日常具体活动是多方面的，有教学、科研、人事、总务、生产以及组织、宣传、统战等工作。在这些方面，干部、教师、学生、工人会不断出现一些思想、认识上和具体工作上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除经常个别谈话、集体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外，还要针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作报告，提高认识，加以解决。如1962年下半年，在党、团内外，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所抬头，为了纠正这一倾向，我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报告指出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危害性，端正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

综上所述，理论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一个是从理论上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觉悟；一个是从日常具体思想上提高教师和学生的觉悟。也可以这样说：从理论上提高认识是“治本”，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是“治标”，“本固枝荣”。因而，两者缺一不可。从“本固枝荣”这个意义来说，理论宣传对于知识分子更为重要。

2. 通过教学活动做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通过教学活动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较之一般的、空洞的政治思想工作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结合在他们教和学的实践中的思想工作，会潜移默化，水到渠成。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寻求革命的道路的。我们通过教学活动，进行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师生思想政治觉悟，是符合列宁的这一论点的。但是回顾起来，这一正确作法还没有很好地贯彻。



3.掌握政治与教学的辩证关系。我当时的基本观点是：从总的来讲政治是领导、是灵魂，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这是一个原则，不能改变；但是，从学校的具体活动来看，政治应有双重性。就是说既有领导的一面，又有保证的一面，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我过去就是持这种理解来处理问题的。比如我们屡次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要通过教学等各种活动进行，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教学中去，做到一切工作中去，这就意味着政治思想工作要在教学任务和一切工作任务完成上起保证作用。因为教学、科学研究和一切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那么，担负教学、科学研究和一切工作的教师、科研人员与一切干部的思想和认识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一句话，教师、干部的认识提高了，工作中的问题解决了，教学、科研和一切工作自然就会得到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思想工作就保证了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完成。总之，从政治和业务的总的关系上讲，政治是灵魂，是领导；但是，从教学等具体工作完成上讲，它又起保证作用。

#### 四、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对知识分子首先要正确估计。要正确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必须首先了解和正确估计知识分子。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师大的知识分子有过几次较集中的估计，我们很早就指出：许多教师对于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部分进步较快的教师，感觉到党对学校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可以领导，在教学、科学研究、学术讨论上也可以领导；教师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党的领导，这些工作就难以搞好”。同时还指出：在党对教学、科学研究和学术问题上的具体领导，目前仍会有一些教师持半信半疑或将信将疑的态度，少数也还会有反对的，等等。时隔20多年了，回过头来看，在当时“左”的情况下，这个估计貌似正确，实际上没有完全反

映真实情况。1963年我们指出：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教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少教师在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方面有了显著的转变，教师队伍的政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党、团员在全校教师中所占的比例，与1957年相比，增加了46%（全校教师中有党员144人，团员88人，党、团员占教师总数的50%）。教师的政治质量，比1960年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说明师大广大教师几年来在不断地前进。这个估计，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实际的。同时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于学校知识分子还有过一个具体估计。大意是说：老一辈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少部分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在一个时期笼统地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自己否定自己前几年的工作成绩。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这个估计，本来是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全国知识分子的估计，我们根据这个估计的精神，对师大的知识分子也作了如上的估计。这一估计，被“文化大革命”推翻了。

2、对知识分子不能进行过火的斗争。为了说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过火斗争问题，先谈一点当时一般的“左”的错误。约1959年初，中央已开始纠正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师大几年来也有一些“左”的错误作法，还未认真纠正，约至1961年特别是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之后，我们才较明显地讲述和纠正师大几年来工作中“左”的错误作法。我在一些会议上说过，师大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过去犯过一系列“左”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争的结果，骨干被打垮了，思想被打乱了。庐山会议反右倾不应当，当时下边主要是“左”，而不是右。师大去年反右倾面宽了，说明我们的政策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教育革命中，打乱了教

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忽视了教学为主的原则。至于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问题较多、较严重。大家说：每次运动，都离不开批判知识分子，批判面广，批判的方式很生硬，有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使广大知识分子伤了心，余痛难忘。我国知识分子本来很少，甘肃就更少，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一面说知识分子很重要，一面又不断地批判知识分子，这是很大的失误。

3、要重视选任和使用知识分子。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而在社会上又有崇高地位的高等学府，没有一批学有专长的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教授，是不可能的。要提高教学质量、增多科学研究成果也是难以办到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当时，师大这类知识分子在兰州各大学来说，是名列前茅的。为了确实办好师大，必须想方设法再增加再培养。因此，学校当时屡订计划：一方面校内自己培养，同时送出校外进修；另一方面争取专家、学者来校执教。几年来，学校培养出大批讲师和一部分副教授、教授。这些同志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同时，我们争取了数名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一时学校声誉很好。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蔑为“招降纳叛”。

培养、争取高级知识分子在校工作很重要，我们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一个是否合理使用的问题。不选任或使用不当，也还不能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我来校之前，学校已经把一部分教授、副教授安排当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们在领导系和提高系的教学质量、进行科学研究、培养教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来之后，除调整选任个别教授担任系主任等职外，其他仍然照旧。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以及行政方面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内外专家、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我们调整和加强了校务委员会，除吸收各系系主任参加外，还吸收了各民主党派

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知名学者参加，加强了校委会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充实了校委会的领导。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外副校长担任，调进一名体育界有名望的党外人士，担任学校副校长，选调一名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当教务长。当时强调要他们有职有权。因此，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在兰州各大学选拔知名非党人士，担任学校重要职务的还很少。当然，现在看来，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 五、要重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学习

各级领导的政治、业务水平的高低，是学校工作成败的关键。我来校之后，逐渐感觉到业务知识对于领导大学的重要意义。越来越认识到，各级领导干部业务知识不足，无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要肩负师大的各级领导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光凭政治，只能做到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能实现业务上的领导。当时师大部、处和系上的领导，除系主任外，多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他们有政治觉悟，有工作经验，工作肯干，吃苦耐劳；但是，文化科学知识偏低，专业知识缺乏。要进一步提高师大的水平，必须从速提高这些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水平。因此，从1960年起，特别从1962年以后，我们一方面重视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努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我提出做什么学什么，讲啥就学啥，由一门钻起，将堡垒一个一个的攻下来。在我们多次强调和安排下，许多干部购置了准备学习和爱好的书籍。并且积极学习业务、学习专业；积极参加教学和科研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指导。比如有的学习《古代汉语》，有的读《史记》，有的读《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毛主席曾提出干部要学《资治通鉴》），有的钻研文学，有的学习书法，等等。在党委、校委机关中，上自负责同志，下至一般干部，形成钻研业务、学习专业的好风气。经过一段时间，有些干部的业务、专业知识学习，

成绩显著。若能坚持数年，学校就会大变。可惜这些正确做法，在“文革”开始后就给革掉了。

以上这几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在师大八年的主要工作和主要经验，不是我全部工作的总结，更不是师大工作的全面总述。但是，可以说是我工作的几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师大八年全面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我这些主要工作和经验，在表述优缺点上，不一定完全恰当。不过，我想对这一段主要工作做一回顾，使自己在重新认识过去工作的成功与失误方面，或许能为今天学校工作的同志提供借鉴。

# 简谈高师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

教育要改革，高师教育更要改革，这已不成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改得快一点、好一点。高师教育改革，早已开始，但是情况极不平衡。有的不但在高师体制上有所改革，而且在教育、教学上也有一些革新；有的只在体制上和某些制度上有所改革，但是，在教育和教学上的改革就极少。当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然而裹足不前，也是不可取的。我认为，高师当前应特别加快教育和教学上改革的步伐，尤其要抓紧一些关键性的环节，加以改革和更新。现提出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一、坚持高师教育培养师资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观

高师的办学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有的强调师范性，有的强调学术性。时至今日，尚无一致的看法。据我所知，目前基本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强调高师的师范性，高师要面向中学。一种是强调高师的学术性，高师要向综合大学看齐。一种是认识到高师在师范性和学术性上的统一性。所有这几种意见，都有自己的不同论点，有积极的、正确的观点，也有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强调师范性的，认为高师全身都是师范性的，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是为了向中等教育提供师资。它的学术性不能离开师范性，不同于一般综合大学。有的甚至为了突出高师的师范性，主张一般系科可以冠以“教育”二字，以别于综合大学。什么是高师的师范性？有一种意见认为，高师的师范性，就是围绕培养中学师资这个目标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总和。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虽然没有明确否定高师的学术性，也没有明确表述高师的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性，或师范性就是它的学术性；不过他

们，讲学术性就削弱了师范性，讲师范性就不需要多少学术性。什么是高师的学术性？有一种意见认为，高师的学术性就表现为若干门学科及其一些活动。强调高师学术性的同志，只讲学术性，不讲师范性，认为高师教育可有可无，学好专攻的几门学科就行了，有了知识，就不愁当不好教师，只要大学毕业，就是合格的高中教师。这种观点，就是想把高等师范和综合大学完全等同起来，把高师办成综合大学。什么是高师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统一性？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高师有师范性的系科专业和非师范性的系科专业存在，它们存在于高师的统一体中。认为学术性是共性，师范性是个性。高师必须首先具有与其它高等院校一样的学术水平，即基础理论要宽厚扎实，这就是它的学术性，其次才是师范性，教育课程及其一些有关活动，就是它的师范性。学术性是师范性的基础。一所高等学校，首先是它的共性，第二位的才是它的个性。没有学术性，纵然突出了师范性，也只能是普通师范教育，而不是高等的师范教育。我认为把学术性和师范性分为第一、第二，首先、其次，一所高校首先是它的共性，第二位的才是它的个性；没有学术性，纵然突出了师范性，也只能是普通师范教育等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认为高师教育即要有学术性，又要有师范性。学术性指高师的文、理各种学科，及其一系列活动；师范性指教育学科，及其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学术性和师范性二者缺一不可。它们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是对立的统一体，所谓统一的，它们有共性，它们互相依存。一方面师范性专业本身有两重性，既有师范性又有学术性，这是一种统一，一种依存。另一方面其他非师范性的各专业，虽然它们本身并无什么师范性，比如数、理、化，设在高师，它们是数、理、化，设在综合、理、工、农、医等院校，它们仍然是数、理、化；然而高师的数、理、化是培养师资的。教师既需要教育科学知识，又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

所以，它们就同师范性的各学科构成了统一体。这又是它们的统一性和依存性。但是，统一体不是混合体，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所谓对立的，就是师范性的学科是职业性的，它本身既有共性（学术性），又有个性（师范性），这是一种对立；而学术性的学科，则属于非职业性的，它们具有共性而无个性（这是相对而言），它们同师范性是对立的，这又是一种对立。因此，固然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但是也不能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学术性和师范性是对立的统一体。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把二者分为第一、第二，首先、其次。否则，就会得出第一、首先重要，第二、其次次要的结论。若要分，我看二者应当都是第一；因为学术性和师范性均甚重要，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培养出的人，无师范性和无学术性，都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因此，我认为高师既要重视教育学科的教学及其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同时又有重视非师范性学科的教学及其有关的各种具体活动。亦即既要重视共性，又要重视个性，二者不能偏废。另外，学术性对于高师是重要的，对于普通师范也同样是重要的。因此，没有学术性，纵然突出了师范性，也只能是普通师范教育的说法，是值得研究的。以我看，当前不少高师在学术性和师范性两方面都做得不够。不但按现行教学计划的要求做得不够，更重要的是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仍然守旧，没有根据八十年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加以改革和更新，而这一点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 二、高师教育未来发展模式的预测

高师将来发展的模式如何？这点很难完全预测，但是，有些问题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比如高师不但不能当成一般综合大学去办，而且一定要发展、要加强；规模要壮大，结构也要相应的合理化和复杂化；它的师范性和学术性要更新，要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的同志提出一种设想，说高师未来不但要肩负培养高中教师、大学教师（现在培养研究生任务



已逐渐多了)，而且还要肩负培养初中、初师以及小学、幼儿园的老师。这就是说要向纵的综合性发展。这种预测是合理的，因为后者的水平要不断地提高，因而它们的教师水平，也不能不不断提高。但是，这是较为长远的事。我认为，最近若干年内，高师应当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主要把高中、大学师资培养工作做好，不应分散力量。还有人有另外一种主张，认为现在高师不但要培养中学教师，还应当培养工、农、林等专科学校的教师，需设置相应系科和专业。我认为高师担负不起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况且目前高师既无工、农、林等专业教师，又无这些方面的设置和教材。再说，高师也不应当办成这样横的综合性的学校。因为，高师本身组织过于庞杂，任务过于错综，也是不好办的。这个工作固然很重要，目前很需要这方面的教师；但是，不应全加在现有高师的身上；应当另外增设工、农、林等师范专业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然，这些学科的知识，作为一个高师的毕业生，也需要有一点。因此，我主张有条件的高师，可以酌量给学生加授一点这些方面的知识，或设置某个专业。但是，不应当较大地改变原来高师的模式。高师目前倒是应该加强教育行政管理专业。没有设置这个专业的高师，急应增设。必要时另设立系科，大量培养这方面的管理人才。目前不少领导教育工作的同志不懂教育，也未学过什么专业，甚至缺乏必要的经验，仍然是外行领导内行；不少主管教育、教学的人，有的没有学过师范，懂一些专业，这是好的。但是，不懂教育行政管理，有点象“瞎子摸鱼”。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否则，要改革教育、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很困难的。因此，加强或增设教育行政管理专业、系科，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是当务之急，不能等闲视之。建议教育行政当局研究。

### 三、改革并加强基础课、专业课设置，实行民主教学

现在高师毕业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文科毕业生未学过理

科，不懂得自然科学；理科毕业的学生未学过文科，不懂得人文科学。不仅如此，本学科毕业的学生，有许多人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也不够扎实。专业知识不雄厚，技能技巧也较差。不少大学生文理不通，错别字屡见，书法更是谈不到。如此水平的高师毕业生，绝难胜任发展和提高中的高中和大学的教学任务。因此，我认为必须果断地改革和加强高师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其教学。我建议试行下列几种方法。

1、改革高师教学计划，调整系科，实施一、二年级不分系科、不分专业，一律为普通班，授以基础知识的教育。到三年级时再分系科、分专业，集中时间，授以专业知识的教育。基础知识课程的内容，应包括文科的文、史、哲的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数、理、化、生的基本知识。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信息化、电脑化的发展趋势，需要考虑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向科学列入基础课程中。先不分系科、不分专业，授给学生基本知识的好处是：学生不管以后学什么专业，都会有较广阔的基础知识，既懂文，又懂理，给学好专业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在学生学完一、二年基础课程之后，要进入系科学习专业。学生进入某个系科，学习某个专业，应由学生自愿选择，学校作必要的指导。这样做可以因材施教，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爱好和个性，学生就愿意学，学得好，优秀人才也必将层出不穷。高师毕业后，不论当中学教师还是当大学教师，或者搞科研工作，都会是一个基础知识雄厚、有专业知识特长的教师和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这样做，比那种报考填志愿、进校定终身的教育制度优越得多。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现象：理科知识较好，并且爱好这门学科的考生，却让学文科；而文科知识较好，并且爱好这门学科的考生，却让学理科。结果学习不安心，成绩不良好，有的学生经常闹专业思想，耽误学习，实际上压抑了人才。这种传统的教育、教学制度，应尽快彻底改革。

2、适当改革和调整现行教学计划，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必修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校必修课，一种是各系各专业的必修课。全校必修课，除政治、教育、体育三科外，加语文一科。这四门为全校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而且必须学好。加语文一科，我认为很重要，一则可以改变那种中国知识分子不精通中国的语文，二则改变那种文理不通，妨碍学好专业的现象。各系各专业的必修课，要适当地精减，要少而精，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必修知识，增加选修课。学生除选修本系的有关学科外，文科学生必须选修理科，理科学生必须选修文科，使学生既有文科知识，又有理科知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交叉化、综合化的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趋向，文科学生兼学理科，理科学生兼学文科，使文、理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必须重视。文科学生，最好选修一门外国语，理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外国语。外文这门学科，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一个大学学生学与不学，关系极其重大。不学就可能成为科学技术上的“科盲”，很难直接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既然重要，为什么不可以定为全校必修课（将来恐怕要这样作）？因为，学生所学专业有别，出校工作不尽相同，外文用法也不一样。因此，暂定为文科学生自愿选修，理科学生必修为好。选修、必修都需要教师指导，需要少而精，量力而行，不能贪多求快。我认为选修办法十分重要，是因材施教的最好方法之一，能加宽学生知识，较大地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充分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能等闲观之。

3、要改革并加强基础课、专业课教学，必须改革教材。高师现有的教材，已经改编过，内容有改进；但是，我认为教材内容陈旧、烦琐、重复的部分，还是不少的，基本未脱离50年代使用的教材的框框。而现代科学技术加速老化，老化周期越变越快，要求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教材守旧现象不下决心改变，要改革教

学就是一句空话。我认为改革、更新教材、应根据下列三原则进行：一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二是厚今薄古，三是少而精。这三个原则，适用于高师所有教材的编写。使用三原则，要特别着眼于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最新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使学生获得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文化知识。古之知识，精华一定要接受；而最迫切需要的是当代的知识，四化建设的知识。当代的大学生更需要当代的知识、四化建设的知识来武装。教材必须少而精，刷去陈旧的、重复的内容，保留最基本的必要的知识，增加最新的文化科学内容，使教材短小精悍。这样的教材，使学生既获得了最基本的、新的科学知识，又大大减轻了繁重负担，能有富余时间，多读一点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读物。

4、急需改革陈旧的、落后的教学方法，代之以能启发学生智力和个性发展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改革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认真研究和实行启发式、教与学并重的教学方法，亦即民主的教学方法。为了启发学生自觉地、主动地学习，开拓学生无穷的智力，发展学生的个性，提高教学质量，不能不改革陈旧的、落后的教学方法，代之以民主的教学方法。既然是教学，就有教的一方，也有学的一方，两者缺一不可。教以教师为主动，学就应以学生为主动，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民主的教学方法。民主的教学方法，一般地应简略讲授，但应视教材情况，需要稍详的就稍详，需要略讲的就略讲。既然教师要讲，就有“注”、“灌”的问题。因此，彻底干净废除“注入式”，恐怕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讲，民主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多自学、多练习，文、理科学生都要如此。在具体教法上，需要详讲的，也要给学生留“举一反三”的余地。需要略讲的，可用“抛砖引玉”的办法。采用启发报告，引言讲授等。在具体学法上，学生在听讲之后，要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之先，学生自己要作充分的准备。这就是看课文、提疑难，针对疑难，找参考材料，然后进行讨论。还可

以有针对性的辅之以各种辩论会、讲演会、座谈会等，以深化对讲授内容的理解。最后根据讨论的情况，教师做总结讲授，或作解答性的讲授。学生对于教师的讲授有意见，可以在讲授之后提出，在教师面前应“当仁不让”。教师应当愉快地对待。

此外，由于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和复杂化，要求教学方法亦要多样化。现在国际流行的（有的国内也有）控制论教学法、电化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可视信息系统教学法等，应多加研究，根据学校的设备条件，灵活地采用，逐渐走上教学方法现代化。

要实行民主的教学方法，必须改革旧的教学方法，“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里首先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喊了多少年要改变“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而改变不了，许多学校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呢？我这里试提出三个原因：一是有些教师没有学过教学法，不懂教学法，他们的老师使用的就是“注入式”、“满堂灌”，所以他们也就沿用这种方法，“习惯成自然”，有的也许学过教学法，有点书本知识；但是，长期走老路，觉得“老路好走”，“新路难行”，于是，与其走新路麻烦，不如走老路省事。二是有些教师思想上就不愿意放弃旧的教学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好，大学教师就应当使用这种方法，就是“传道授业”，就是“老师讲，学生听”，自古已然。三是办学的人，管教育的人，对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因而不抓它。鉴于这种情况，要改变教学方法上的落后状况，首先要领导上重视，然后经常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学、教学方法，同时破除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教师们从思想上认识并接受进步的教学方法，自觉地放弃旧的传统的教学方法。

5、加强高师的科学研究。自从党中央提出重点高等学校要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之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各种科研所、教科室不断成立，也做出了显著成绩，科研成果累累。高师也是这样。不过，我认为一般高师科研单位，

不宜太多，而要重视质量。应当根据学校特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成立若干科研单位，把它办好，办出成绩，绝不要沽名钓誉，广铺摊子，徒具虚名。

高等学校办成两个中心，重点大学已经这样办了。而在条件不太好的一些高师，目前应当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以教学为主，也就是以教学为中心。科学研究应服从教学的需要，绝不应分散力量，勉强搞两个中心，使两者俱伤。科学研究要密切地结合教学，研究教学中提出的学术问题，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既促进了教学，同时也进行了科学研究，使两者均有收益。在队伍建设方面，也应只建立一支队伍，一支队伍双肩挑，它既是教学队伍，又是科研队伍。这样会使教学中提出的学术问题，很自然地反回到科研方面去研究，而研究成果，又可以很快地在教学上去运用，两者完全沟通，顺利促进两者的交相发展。这既可以节省人力，又打破了教学、科研两者的隔离。当然，这就必须减轻教师教学的负担，留出时间，兼顾两方面的工作。我这里所说的科学研究要为教学服务，不是说教学、科研队伍不可以搞非教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必须挤出一定时间，为四化建设服务，承担国家科研任务。

6、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做，才是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必然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和国家建设人才。“文化大革命”之前，在纠正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些偏向之后，高等学校仍适当地分派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进行实习，搞现场教学；从事社会调查，参加阶级斗争；验证所学，锻炼思想。高师大多也是这样做的。并且还按期到中学进行教学实习和毕业见习。当时把这种做法，总的叫做联系社会实际。“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开门办学”，学生下工厂、农场，进行教学和劳动。一些工科大学，提出结合品产进行教学，

废除老三段。这些虽然也算教学联系实际，但是，偏向很大，轻视基础课，轻视理论；不重视课堂教学，不按教学规律教学；而过分强调实践，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时间既长，劳动分量又重，大大地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时间。高师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情况。近几年以来，高师又走到另一面，学生不参加工、农劳动，不进行社会调查，也很少从事其他方面的活动，有关起门来办学的倾向。有些教育工作者不满意这种办学状况，说是封闭式的教学；因此，提出什么“开放式”办学，“开辟第二课堂”等。不管叫什么，一句话，关起门来办学不好，要联系社会实际。我有同感，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我的具体意见是：高师办学，一定要让学生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劳动，参加社会实践。理科学生除在实验室操作外，还要到有关科研单位、工厂、施工场所，进行劳动、实践、调查、访问。文、社科学生要到社会上去，比如中、音、美系学生，可到农村采风、搞写作、写见闻；历史系学生进行历史古迹调查、省史调查，学习司马迁的治史方法；政治系学生出外调查研究人民中间的纠纷、政治执行情况、婚姻习尚；教育系学生到中学、小学、幼儿园去，调查研究如何普及义务教育、如何办中学、幼儿园等。当然，搞教学与实际结合要主次明确，不能本末倒置，学校第一，社会第二，绝不能重蹈过去违犯教育规律的老路。

#### 四、改变“近亲繁殖”，代之以“五湖四海”

我以为现在一些高等学校“近亲繁殖”和“家庭化”的现象比较严重，高师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不改变，会妨碍高师的发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高师“近亲繁殖”和“家庭化”，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1）本校本系毕业生留本校本系当教师。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办的，近年来有加无已。这样作虽然有好处，但是，弊多于利。本系留本系毕业生，不可避免地同一学派留同一学派的人。相继传下去，不同学派的人进不来，就成为封闭式的系科和学校。教师与教师之间，在学术上、教学上就很难有什

么斗争。没有斗争，知识就不容易发展，教学单位也就成了死水一潭。再说留毕业生在本系当教师，往往不是以品学兼优为准则，而是以某人或某老师的好恶为标准，所留学生不定称职。而且还可能形成一种“宗派门风”，对外既封闭又排斥。这就很难提高教学质量。现在有些高校，大概为了克服这种弊病，采取考试办法，成绩好的留校，不好的不留。这不失为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不是根本措施。我所谓的“近亲繁殖”，只是从主流上看的，不是说全部都如此。其实外校毕业生分配来校工作的也有，但这是少数。少数来校毕业生往往不被重用，使之不能大展“鸿图”。这实质上是“近亲繁殖”造成的恶果。（2）照顾教职工子女。

“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照顾的情况较少，人们也不太要求照顾。“文革”之后，照顾的多了，要求照顾的也多起来了。困难大的要求把子女安排在自己的身边（这是应当的），困难小的也要求照顾。有的不但要求照顾他们的子女，而且寻门设法，将他们的亲属也调进学校，把子女亲属都弄到自己的身边或周围，几乎把学校弄成一个“家族社会”。使学校的人事关系、工作关系复杂化。因一事动一家成员，就牵动全家，家与家之间，往往因一事发生矛盾，有些酿成大事，门户之见很深。学校负责人常常因为这些非分之事，占去很多时间。此外，过去高职的校级领导人，有不少同志是由外边派进学校的，有些中干，也是外边调进的。这几年的办法是，主要由学校内部选拔任命，校外调进去的很少。以前派进去的办法是需要的、正确的。现在由学校内部选拔，也有积极意义。“土生土长”，比较了解学校情况。这种内提办法，当然不能说成是“近亲繁殖”；然而，我认为这种作法长期延续下去，也会产生一些弊病，会形成一种封闭式的学风和校风，校际之间的各种优良校风不能交流，弄不好，还会形成一种“山头”和“派性”。因此，不能不注意。

按我的想法，这些情况需要改革，特别是一、二两者，应当



改变。针对上述三种情况，提出三项建议：（1）今后要尽可能少留本系毕业生在本系任教，多从外地外校调进。留校生必须是品学兼优。留校办法，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最后集体讨论决定。逐渐改变“近亲繁殖”，实现“立贤无方”的教师配备制度，把系科办成一个“五湖四海”的、坚强优良的教学集体，提高教学质量。（2）对教职工子女的照顾，要严格把关，家庭确有较大困难，必须子女照顾者，可斟酌安排一个子女在其身边，至于其他亲属、亲戚，概不考虑。以逐渐减少学校“家族化”的倾向。（3）校级领导干部，实行外聘、内选并举办法。同时提倡校际交流，坚决实行聘任制、任期制。这样做，可以使各种学派、校风，各校办教、治校经验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也可避免“山头”、“派性”出现，妨碍学校工作。

#### 五、提倡学生自治自教，改革“注入”管教办法

我以为高师可以提倡学生自治自教（这指思想政治教育）。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出去要当老师，管学生。自治自教要在学校党政指导下进行，不是无政府的自治自教。

提倡高师学生自治自教，我是根据我国逐渐扩大民主和80年代高师学生的思想特点，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虽然对当代高师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做过详尽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是，也接触到一些。特别是看了一些大学对本校学生思想作风的调查研究材料后，觉得提倡学生自治自教，放宽学生民主，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些学校的调查材料说：“多数人关心国家发展前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渴望求知成才，有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关心改革，思想活跃，勤于思考，独立工作和活动能力较强，这是他们的主流和本质。”“显著特点是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为振兴中华、祖国繁荣而献身的决心，能刻苦学习，力争做个对四化有贡献的人。”“认为做一名大学生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愿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努力。”这几

种好的情况，占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当然也有一些落后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在部分学生中存在着胸无大志，安于现状；游离彷徨，萎靡不振；贪玩求乐，荒废学业；谈情说爱，无心读书；纪律松弛，自由散漫，举止粗鲁，拌嘴斗殴；损坏公物，浪费粮食等。这是支流。”鉴于这种情况，我主张提倡高师学生自治自教，亦即实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民主制度。实行学生自治自教，需在学校党政指导下进行。党政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改善领导方法。那么，应如何改善党政领导，如何在党政领导下，实行学生的自治自教制度？

首先谈谈这几年高师管理学生，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况。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党政在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相继建立健全各种制度、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加强和整顿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成立学生部；改善政治课教学，召开学生座谈会，思想工作采取疏导方式等，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我认为工作发展不平衡，成绩尚不够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充分认识和发挥学生潜在的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自己能够教育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主要推行的是传统的“我管你，我教育你”的办法。一句话“注入”的管教。实质上把大学生当成“幼儿园”的儿童来管理来教育，也就是说，只有党政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无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80年代的中国高师学生能不能自己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根据他们的年龄、知识、能力、思想觉悟等情况，完全可以担负起这一任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各大学实行的学生自治自教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此一时耶，彼一时耶，不妨先作试验，然后再作结论。

那么，高师学生如何实行自治自教呢？首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政治思想觉悟的、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领导班子——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设若干委员会，系设分

会，班设支会。其次，主持和组织这样几个方面的活动：（1）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学术的以及各种政策的学习会、讨论会、座谈会报告会、讲座会、讲演会、辩论会、时事会、游艺会等；（2）组织同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勤工俭学，参加学校一些单位的工作和活动，体验实际生活；（3）调解同学中间的纠纷，调查同学违犯纪律情况，了解同学思想行为，并采取友好的民主讨论的方式，加以解决。通过这些民主活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对党对国家各项政策施行的认识；通过这些自觉的活动，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发挥学生潜在的无穷的智慧 and 天才。现在高师学生自治会，恐怕担负不起这个任务，需要调整加强。

学校党政如何指导学生的自治自教活动？按我的想法，总的精神应是：宏观指导，不拘细节。具体办法：（1）经常调查研究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及其变化规律，提出宏观指导措施；（2）召开学生会干部或学生座谈会，或座谈政策，或座谈学生政治思想状况，或讲学校情况，必要时召开学生大会作报告，或请劳模讲话，从正面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3）加强教学中的思想性，教师讲课，一定要联系当前国际、国内有关实际，不要照本宣读。同时要结合学生思想政治实际，进行灵活的讲授，提倡教师既管教，又要管导。政治课教师，更要注意导的方面。

总之，我提出上面五个方面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高师需要在教育、教学上实行民主，在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上提倡自治自教。目的是，企图养成大学生既会读书，又会做事；既会自觉地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又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的各项法令政策。造成既有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又有民主、纪律的生动活泼的高等学府局面。

# 略论江隆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教育思想

——为纪念江隆基同志而作

(一九八六年)

江隆基同志是我党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多年，领导过老区教育工作，直接办过中学，又办过大学；他写过许多教育论文，总结过大量教育经验。因此，他有全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的修养，而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里对江隆基同志这一思想和实践，就我的认识，略加论述。

## 一、“理论与实际一致”在教育上的重要性

江隆基同志所说的理论与实际一致，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所有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江隆基同志认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一贯地、高度地重视这一原则在教育上的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把它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提出“理论与实际一致”是“社会主义教育坚定不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他认为只有坚决执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才能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他对理论与实际一致原则在教学、科研上运用的重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和我们进行的教学工作、科学研究，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服务的，只有教育不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才能达到教育方针、

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目的。因此，江隆基同志重视理论与实际一致在教育工作上的实际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可贵的。他为这一原则在教育工作上的贯彻执行，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 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三方面的意义

1942年，全党实行整风，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江隆基同志在华北联大工作。他在该校整风时，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他在批判了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学习马列主义上的教条主义之后，提出了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三方面的意义。他说：第一、要把国际革命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今后必须坚决地废止静止的、孤立的、抽象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第二、要把革命理论与周围的事变联系起来。对瞬息万变的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引出正确的结论，指导学生从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获得分析、综合与学以致用之经验和能力。第三、要把革命理论和历史实际联系起来，要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研究历史，要学生既懂外国，又懂中国。

江隆基同志提出的理论与实际一致原则的三方面意义，在今天看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1942年整风以前，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全党和各革命根据地工作中有较大的影响。他们不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离开中国革命的实际，教条主义地实行马列主义，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在全党整风中，江隆基同志向全校师生明确具体地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把国际革命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日益高涨，停止对八路军的军费供给，加之日寇加紧围剿各解放区，特别是华北解放区，战情紧张，生活又极困难。在此情况下，了解周围环境，熟悉敌、友、我三方面瞬息变化的情况，

对于指导学校工作、教学联系实际，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理论联系中国历史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其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时教条主义者只知希腊，不知中国。他们指导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者只懂希腊，不懂中国。而江隆基同志提出要把革命理论和历史实际联系起来，要求教师、学生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研究历史，既懂外国，又懂中国，既懂今天，又懂昨天。并且具体要求无论专修科或普通科，都要学习中国通史，至少要把中国近代史弄明白。这对于引导师生重视联系中国历史进行教学，起了重要作用。

### 三、正确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

理论对于革命工作，是极端重要的。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必须重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同样的，书本知识也是重要的，很多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学习。但是，把理论当成教条，则是不对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实践对于革命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也可以说，没有革命的实践，也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可见实践的重要性。因此，不能不重视实践。但是，唯实践论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会成为经验主义，即经验教条。因此，革命导师又教导我们，必须既重视理论知识、书本知识，又重视实践和实际，把两者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毛主席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江隆基同志提出要正确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认为“片面地强调理论或者片面地强调实践，都会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这个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他这一论点的提出，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根据1959年学校实际情况，针锋相对地提出来的。他说：在整风之前，学校教学上最大的缺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不少教师、学生轻视实践，轻视感

性知识，只喜欢闭门读书，不愿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教师讲课，只是抽象说教，纸上谈兵；学生学习，只会背诵公式，玩弄术语。这样的教育，非来一个彻底的变革不可。他接着又说：经过去年（1958年）教育革命，师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现场教学等，基本上扭转了师生过去轻视实践，轻视生产劳动的不良学风；但又出现了一些对理论的意义估计不足和轻视书本知识的现象。迎江隆基同志在这里表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

#### 四、如何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

如何贯彻执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江隆基同志提出了许多方面，这里就他强调的几个主要点，略加叙述。

1、首先要反对教条主义，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学用一致”。他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危害时说：教条主义象一条毒蛇钻进了我们的教学过程，将其毒液浸染了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妨害了教学效果，败坏了学风。他进而又说：要想改变学风，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斩断这条毒蛇，把它们的毒液，从各方面工作中，彻底清洗出去。“只有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一致。”

2、教学的一切措施都要体现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江隆基同志谈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经验时说：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应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他进而又说，有关国家生产建设中的重要资料、生产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要能在教学中有所反映。江隆基同志还强调地提出：“大纲、教材必须反映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确很重要。而计划、大纲、教材中编进近代科学最新成就，尤其重要。江隆基同志的这一见解，不仅对当时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现在教学改革，制订教学

计划、教学大纲以及编写教材，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为了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他还提出必须在教育制度上贯彻“教学一致”与“教导合一”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要力求改进，废止注入式，实行启发式。他说：“教员在上课之前，必须对其教育对象作深入的调查与了解，务使教学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与工作经验联系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要坚决地废止注入的方式，而根据学生的程度与课程的种类，采用启发、研究、实验、探讨、质疑和辩难的方式，以做到讲授具体、切实、生动、明确。”

3、科学研究也要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江隆基同志说：要发挥科学研究促进祖国建设事业的作用，就必须密切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从生产中提出课题，认真调查研究，做出成果，并且要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同时，他还认为科学研究也要和思想斗争实际联系，结合思想斗争实际进行科研和学术探讨，不能为学术而学术。要反对唯心主义的科研方法，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风气。

总之，江隆基同志认为，一切教学、科研过程以及有关制度等，都要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同时，他还认为不论政治学习、专业学习，也不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也都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精神。虽然他说课堂教学过程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但是，他又说这“和认识过程不尽相同，不能硬套认识过程的公式”，而要认真参加社会实践，求得理论与实际一致。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并且认真领导实行。

### 五、“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好处

江隆基同志在1959年写的《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处时说：根据过去一年（1958年）的经验，它至少有四个好处：（1）使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打破关门教学的旧传统。（2）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



来，既可纠正师生脱离生产实际，又可使学生学得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印证和补充。（3）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地结合起来，从而克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反动思想。（4）使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和劳动群众联系，从而培养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克服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江隆基同志这里提出的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四个好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其基本精神和实质，也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好处。因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集中一句话来说：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能办好学校，能提高教学质量，能改造人。也就是“理论与实际一致”，能办好学校，能提高教学质量，能改造人。这就是它们的最大好处。

江隆基同志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而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为了突出他的这一思想，特选出作为主题，略加论述，以表缅怀之忱。

#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

(一九八六年)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新民主主义教育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大众的，就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实行的是这种性质教育。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突出抗日，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国防教育和抗战的教育政策。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说：“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关于抗战的教育政策，毛主席在《论新阶段》这一重要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同时指出，抗战的教育政策是：“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陕甘宁边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国防教育思想与抗战教育政策的原则，具体实施了国防教育，即新民主主义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历来就是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因此，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就具体实施了抗日战争的教育。在课程和教材中，加进了抗日的内容，学生课外、校外活动也都紧密地结合抗战；同时，在教育实施中，结合生产劳动，热烈地进行了大生产运动，普遍地解决了蔬菜问题，做到了粮食半自给。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教育的实施是正确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脱离边区建设的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使之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抗战和建设边区的干部。在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的原则指导下，除原来设立的专门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得到加强外，还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人才，不但解决了边区的需要，而且为解放全国培养和储存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又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以及民教馆、图书馆和剧团等教育形式。为了加速扫除成青年人的文盲，采取了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抗战初期，边区文盲约占总人口的99%，到全国解放前，减少到90%，可见成绩是比较大的。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了过去全系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于是，民办公助的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加强了。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适合农村自然条件和生产情况办学的形式多样化了。这既不妨碍群众的生产劳动，又使大量儿童得以上学，群众称便。

在课程和教学的改革方面，抗战初期的普通教育，政治和抗战的课程及内容较多，而生产方面的很少。1940年以后，照抄外面的较多，适合边区群众实际需要的却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压缩了不必要的课程，删去了不适合边区需要的内容，增加了适合边区建设需要的课程和内容。这样，群众乐意送孩子上学；成青年人也踊跃参加识字组，提高文化。因此，学习内容充实了，学校也比较巩固，较好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结合抗战的实际，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在领导作风上克服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

## 二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之前，高等学校很少。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也只设立过一所红军大学。抗战开始之后，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设立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干部学校、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等。这里只回忆其中几所学校的情况。

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9月，是应当时全国广大青年渴求抗战的理论和方法，以便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愿望而设立的。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以培养抗战与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为宗旨，招生没有党派的限制，只要有志于抗日爱国，就可以入学。它当时名声很大，号召力很强。因此，将管区的广大青年，不断地进入陕甘宁边区到陕公学习。由于学生剧增，乃于1938年在关中设立了陕北公学分校。次年3月，总校迁至关中，与分校合并。此时，学校除设立训练班，继续培养群众工作干部

外，还增办了大学部和研究部，专门培养高级抗日干部和理论工作人才。从陕公成立到1938年底的一年半时间，就培养出6000余名各工作干部。校长为成仿吾，兼教课程。给陕公教课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洛甫、李富春；专家有何干之、王若飞、艾思奇、杨松、吴亮平等。

陕北公学院的学制很灵活，普通班学制为2至4个月，一般为4个月；大学部和研究部均为一年。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根据训练班、大学部、研究部不同的情况，分别设立相应的课程。训练班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知识、时事报告等。课程比重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学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研究部的课程有民主政治、民生经济、民族文化史、国防教育等。研究部还设立了青年训练班，讲授科目是：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游击战争、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要在短时期内给青年们以抗战的必要知识，使他们得到比较深刻的认识。”其教学原则有三：（1）理论与实际联系；（2）少而精；（3）教学一致。陕公的教学方法不单纯灌注，而以自学、讨论与研究为主，即以民主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学员能否求得进步，第一是依靠教员作报告；第二是依靠学员自己学习。学员的主要学习方法是在统一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纪律、有革命竞赛的集体学习。因此，他们的学习空气很活跃，收效也很大。

陕北公学的政治和组织领导原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其目的是，使学校成为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形成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

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和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培养学员自觉遵守纪律，发

扬他们的自动性和创造性。学员按期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学员自己管理自己，实行自治。为此，学校成立了学生总会，每个大队成立分会。学生会内，完全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一切事务。学生总会下设俱乐部，各大队有救亡室，进行各种文艺活动。学生会还派代表参加学校的一切会议。除此以外，学校还有民先队的组织，队员在学员中要起先锋作用。还有文化协会分会，国防教育研究分会等，学员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参加各方面的研究和工。学员课余还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和一定的生产劳动。

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艺组织，先后来到延安。为了发展抗战事业，急需筹办一所培养文艺人才的专门学校。于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鲁迅先生为名的文艺学院诞生了。1940年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在整个抗战阶段，这所学院团结和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为抗日战争，为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要基地。

鲁迅艺术学院先后设立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系。自1938年4月成立到1945年11月的时间里，“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各五届，培养出各专业的学生总数为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62人，美术系147人。”同时，先后还多次举办训练班、短训班，为部队、地方培养了许多文艺工作者。

鲁艺学生按系编制成大队、区队和班组，进行学习。各系的学制比较灵活，最初规定为6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中间要到各根据地或部队实习3个月，实际学制为9个月。后又改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学习，初级阶段按系学习，高级阶段各系又分专业进行，共需8个月。由于需要较高的文艺人才，鲁艺的教学逐渐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发展。1940年鲁艺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

并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专业的学制，除实习外，一律改定为3年。1942年进行了整风。毛泽东同志向鲁艺提出：要向“大鲁艺”学习，亦即向工农兵学习。整风进一步推动了鲁艺的改革。

鲁艺各系各专业的课程设置。文学系开设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名著研究、俄文、创作；美术系开设解剖学、透视学、美术讲座、野外写生、室内写生；音乐系有音乐概念、作曲法、指挥、练耳、视唱、乐器练习；戏剧系设读词、化装术、戏剧概念、排戏、作戏法、表演术。除了专业课程以外，学校特别强调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全校各系各专业的共同必修课。政治理论课设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问题、辩证法；文艺理论课有中国文艺运动、艺术论、苏联文学等。教学时间，专业课和必修课为四与一之比。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必须与战争的需要密切结合，从战争中去学，从实践中去学，教学中聘请了许多著名专家教授，有李富春、杨松、李卓然、艾思奇等教政治；周扬、沙可夫教文艺理论，还有丁玲、张庚、吕骥等等。茅盾也来讲学。有名的教师虽然不少，但是还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因此，主要还是依靠学生自觉的学习。他们在土窑里、草坪上、山崖跟、田埂间进行自学或热烈讨论、排戏、练歌、绘图、写作，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们也进行生产劳动或义务劳动。

中国女子大学，成立于1939年7月，全校学生共有600余人。

女大的教育方针是“以养成具有斗争理论的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即能担负起民族、社会、妇女解放三种伟大的任务。

全校共分八个班，一、二班为妇女班，三、四班为军事训练

班，五、六班为普通班，七班是特别班，八班是高级班。女大学制比较灵活，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无期大学”。根据抗战需要和学生具体情况，规定不同的学习时间。普通班8个月学完课程后，就出外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学习。高级班的学习时间较长，为一年半到两年。因为高级班带研究性质，学生的文化理论水平也较高，因此，需要较长时间以培养高水平的妇女工作干部。女大的课程是根据各班的具体情况和性质规定的。班级中除高级班和特别班外，均为普通班，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问题、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特别班设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高级班设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世界革命史、妇女运动等。还选修俄、英、日、世界语等外国语以及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等职业教育课。

女大的教学采取讲授和自学并举的方法。教员用启发式教学，课前发给学生简明教学提纲，让学生阅读，然后讲授。讲授时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不但使学生懂得理论，而且具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自修是高级班的重要学习方法，“学习的方法就是挤和钻”。女大的教员，许多都是有名教授，他们都是兼职的，在百忙中抽时间讲课。同时，还经常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时事、民运、妇女等方面的报告。另外，还经常请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讲述民众工作、革命历史、中外领袖事迹等。

女大的设备很简陋，在艰苦条件下，学生们不但热烈地学习，而且经常参加农业、修路等劳动，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参加各种政治斗争，提高认识，锤炼自己。

延安自然学院成立于1940年夏，它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近远期兼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分初中、高中、大学三部。初中学制为3年，高中为2



年，大学为3年。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并结合教授实用技术。大学部初设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矿（冶）四个系，以后对物理、化学两个系的课程作了调整，改为机械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教学除侧重于基本知识外，同时也注意了实习和应用，开学不久就办起了机械和化工实习工厂，还制造了一些边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学生下厂调查、实习，丰富了教学内容。

延安大学。1941年9月22日，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干部大学。设三院、二系、一中，即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俄文系、英文系与附中。随着抗战和边区建设形势的发展，学校也不断扩大。1943年4月，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1944年4月，行政学院又并入。经过整顿改编后，成立了三院一系，即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医学系，在校学员达1302人。

延大的教育方针、学制与课程。1944年6月，调整后的延安教育方针是：“（1）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2）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3）本校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4）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5）本校在教学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

立思想与批判的能力。”

延大的学制与课程。行政学院设工学、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自然科学学院设工学、农学、化学三系；鲁迅文艺学院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学制按照实际需要而定；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均为二年，自然科学学院为3年，医学系1至2年。教学的方法采取校内学习与实习兼顾，整个学习时间，校内学习与实习分为六与四之比。

课程编制，分为全校共同课、全院共同课与各系专修课。全校共同课是：边区建设概念、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各院有各院的共同课，各系有各系的专修课，门类颇多。如行政学院，全院的共同课为边区民主建设的现行政策。行政系的专修课是三三制与民主集中制、乡政权工作、干部工作等。教育系的专修课是边区教育文化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和现代中国教育思想。自然科学学院的共同课是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机械系的专修课是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学、工艺学、机械原理及原件、原动机学、建筑学、机械设计、电工学、工厂管理。鲁迅文艺学院的共同课为文艺讲座（包括文学艺术之历史、现状、理论诸问题）；文学系的专修课是中国文学、应用文、文艺现状研究、世界名著选读、写作实习、新闻学，边区教育等。延大请了不少有名的学者、专家任教，许多系主任由政府各厅厅长兼任。

延大的教学与教学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其主要特点是：（1）学用一致，即一面学一面做，从学的过程中去做，从做的过程中去学。就是说教员要积极参加边区有关的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一面直接服务于边区，一面进行研究和教学。学员在学习期间，要下乡实习3个月。（2）自学为主，教学为辅。教授根据课程内容提要讲授，着重提出问题，启发学员研究线索。学员在自学中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3）发扬民主精神。教员有讲学研究

的自由，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讨论，互相批评；学员对教师的讲授可以提出意见和批评。（4）集体互助。提倡教师和学员互相学习，并且组织全校不同情况学员之间的学习上的互助。

延大采取民主的管理制度。在教学上走群众路线。学生在教学的各个过程中都可以参与，可以提出意见；对教师讲课，可以提出批评。在学术研究上，设各种自由讲座，任何不同派别的论谈均可自由发挥。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上，采用民主管理方法，主张学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全校设学生自治会，班有班务会，一切有关学生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均由学生自己讨论提出，学校只居辅导地位。全校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务会议，学生和教员均可选代表参加。学生还可以对校务、教务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还可以自由组织各种政治、学术团体参加各种政治、学术活动。但是，民主管理不等于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学校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如“学生学习生活通则”、“学工人员请假规则”，“学生会会章”等。

延大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因此，劳动生产是延大的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为了把生产搞好，学校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农、工、牧、商四科。在各科的具体指导下，全校师生员工有计划地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承做单衣、单鞋，拆洗棉衣、棉裤，驮盐、烧炭、种粮、喂猪、养鸡、做豆腐等。既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思想，一举两益。在延大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下，许多教员和学生不但当时都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解放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延安作风。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这所学校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由八路军首创的化敌为友的学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有的一所国际统一战线学校，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该校成立于1941年5月15日，1945年8月30日结束。四年间，教育了大批日本士兵。毕业后，他们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

八路军、新四军，从事对日工作。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以“和平、友爱、正义、勤劳、实践为宗旨”，学制为一年，课程设置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各期课程有增有减，不全划一。比如曾经增设过中国问题、日本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列宁主义等。另外，对于文化程度较高、在八路军中受教育较久的学员，还讲授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除教员讲授外，还辅之以讨论，并且经常组织各种研究会，研究国际形势、中日战争问题，学习空气很浓厚。

工农学校的学员还进行生产劳动，成立有农业生产组、木工组、纺线组。还经常到附近农村，帮助农民锄草、收割。在劳动中和农民群众很融洽。当时条件很差，学员们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优待，在生活上同样受到优厚的待遇，有日本饭菜，也有中国饭菜；学员病了，医院精心治疗；衣服破了、脏了，有人帮助缝洗。一句话，衣、食、住、行都优先保证。学员们激动地说“真幸福！”

### 三

在抗日战争以前，边区只有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的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等3所中等学校。抗战开始后，边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中等学校的建设。1937年初在延长成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创立了边区中学。1939年鲁师与边中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边区第一师范）。1940年春，在关中设立了第二师范，在定边设立了第三师范；同年夏，在庆阳成立了陇东中学，接着又创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1941年秋，又成立了鄜县师范。此时，共有中等学校七所，学生1500余名。1943年春，鄜师与延师合并，七校变为六校。1945年4月子长中学成立，抗战结束时，陕甘宁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5年之前，边区中等学校给边区建设和解放战争

培养、输送了毕业和未毕业的干部约3000余人。

边区中等学校教育的方针。边区中等学校分为中学和师范两种，其方针任务基本一致，即为抗战和建设边区培养干部和知识分子。延安中学开办时，提出本校实施国防教育，培养独立工作，寻找方法解决困难、领导群众的抗战建国青年干部。师范的教育方针，1940年《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暂行规程》（以下简称《师范规程》）指出：“边区师范学校以培养新民主主义的地方小学教育师资为宗旨。”1942年《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以下简称《中学规程》）指出：“中学为依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继续小学教育，培养健全的新青年以为从事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及研究高深学术之预备场所。”1943年整风之后，边区中等学校属于干部学校性质就提出来了，而且任务更明确具体。当时教育厅提出边区中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小学师资、地方文化教育干部以及抗战、建设工作中区、乡干部，同时培养一部分进步青年研究高深的科学与技术，故边区中等学校无论中学或师范都带有干部学校性质，担负着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因此，各中等学校除接受小学毕业生外，开办地方干部训练班。边区中等学校的教育方针虽然几经修订，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始终以培养抗战和建设边区的干部为总目标。它合乎边区实际，是必要和正确的。

为了适合抗战和边区的实际，中等学校的学制也进行了几次改革。抗战初期急需干部，修业期限很短，为半年至一年，但不固定。1940年改定为二、二制，即初师、初中和高师、高中各修业二年。1942年又改定为三、二制，把初中与初师学制各延长一年，高师、高中仍旧。这次改订后，边区中等学校的学制基本稳定了。以后，因工作需要，将中学三年制，改为两段制，即前二年为一段，后一年为一段。前一段期满后，即可调出工作，否则第三年仍留学校学习。师范学校中的地干班修业时间为一至二年。

师范班、民族班、职业班则根据学生程度和工作需要而定。

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鲁迅师范的课程和教材，在政治方面采用“抗日统一战线指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军事课中有普通军事知识与技术训练、游击战术，自然常识课以防空防毒与日常卫生常识为主，国文课多选用富有民族思想的文章，地理课则配合抗战、军事讲有关地理知识，中国历史着重讲中国革命史、近百年史，社会科学课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辩证法等。这些课程内容都紧密地结合了抗战，适合抗战初期的需要。但是缺乏联系边区建设和边区人民日常需要的实际内容。1940年《师范规程》对于师范学校课程的规定是：第一学年设公民常识、国文、数学（附带教珠算）、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历史、地理、新文字、美术、音乐、体育，第二学年除设国文、数学、社会科学概论、自然科学概论、美术、音乐、体育外，新增设教育原理、儿童心理、医药卫生、小学教育概论、社会教育概论。这一时期课程的内容与鲁师时不同，加进了教育学科，学校带有师范性质了。但是，不适应边区实际需要的科目产生了，而且科目繁多。1942年边区教育厅对边区中学课程又作了新的规定：“初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公民知识、国文、外国语（英文或俄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学生学习军事看护），体育、劳作两课于课外进行。”高中课程为“社会科学概论、国文、外国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哲学、美术、音乐及军事训练；体育、劳作两科于课外进行。”另外规定：“中学为适应地方建设之实际需要及教学合一起见，得设置若干职业科目，作为必修科或选科。”两个时期的初中课程相较，门类数量上相差不多，但在内容上，前者比较适应边区的实际情况，后者则因门类多而内容繁杂。因此，这时候中等教育的课程和科目内容，带有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倾向。1943

年中等学校整风和1944年有历史意义的边区文教大会之后，中学课程和科目内容重新作了较大的改革，1944年拟定中学、师范三年新课程为：边区建设、国文、数学、史地、自然、政治常识、生产知识、医药知识。新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实际和少而精。三年中只学八门课，学时上也比过去减少了一半。边区建设课包括边区史地、边区政策、边区组织，国文课以养成日常工作中各种实用文字的正确读、写能力为宗旨，数学课以培养财经合作部门需要的会计、统计人才为宗旨，生产知识侧重农业，兼及工业、商业等的初步概念，医药知识教接生、救急、防疫、兽医等简明实用的技术和一些常见的中西药品的性能等。这一时期师范学校的课程在文化教育方面与中学相同，随中学课程的变动而变动。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中等学校课程和科目的改革过程，可以说走过这样的道路：政治重于文教——文教政治并重——文教重于政治。课程和科目内容的改革和执行，基本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但是发生了偏向。偏向有二：其一，表现在有些学校对于旧中学遗留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改造很少，脱离实际；其二，表现在有些学校提出了过高的政治和思想要求，忽视了教育。此二种偏向经过1943年中等学校的整风，特别是经过边区文教大会，得到了纠正，使中等学校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不断向前发展。

边区中等学校实行的是“教导合一”的原则，成立教导处或教导科，统一处理教与导方面的问题，既管教学，又管思想教育和训导。过去实行的是“教导分治”，教务处管教学，训导处管思想工作和训导，各立门户。影响所及，教师只管教不管导，学生学与行也是两样。实行“教导合一”之后，就克服了这种教导分离的现象；克服了教师只管书本教学，不管思想工作的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自由职业者”的作风，学生言行也能做到一致，效果是良好的。民主的教学与训导原则，是启发学生自动学习、研究

和集体讨论。同时，发扬民主与自我教育，提高学生自治能力，学校充分利用学生会的形式，领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使学生养成忠诚、坦白、切实、朴素、实事求是、团结互助的作风和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习惯。在“教导合一”的原则的指导下，各中等学校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训导方法。（1）教学方法。边区当时推行的是国防教育的方法和启发式的方法，但是在实际上中等学校实行的是启发式和注入式并举的教学方法。使用启发式方法，一般的过程是，教师首先从学生日常经验方面引起他们学习教材的动机；其次，让学生自动预习，教师从旁指导；又次，教师指出要点，学生提出质疑；再次，学生自己讨论，练习应用；最后，讲解订正，或作结论。同时，有的教员采用讲演式，兼用问答式；有的教员讲演、问答、辅导掺杂使用。当时把这种教学方法叫作“民主教学”。（2）训导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体训导，教导主任按时集合全体学生讲话，或班主任集合本班学生讲话，报告有关思想教育方面的问题；一种是个别谈话，班主任或教师找有思想问题或行为问题的学生谈话，解决思想问题和校纪问题，两种方法兼用，相辅相成。训导内容各校大体相同，采取政治上指导，使学生养成坚定的政治方向；生活上指导，养成紧张、活泼、艰苦奋斗的作风；技能上指导，训练学生宣传和组织群众的技能，等等。

边区中等学校的学校管理。总的管理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 1、民主管理，通过各种会议来领导。学校的各种会议，教师和学生均派代表出席。学校一般设立四个委员会，一是经济稽核委员会，由教师三人组成，学生代表一人列席，负责审核学校经费；二是干部学习委员会，由校长和教职员三人组成，计划、推动、检查干部学习；三是临时教材编审委员会，由教导主任和教师二人组成，负责教材编审工作；四是生产委员会，由事务主



任、教师二人和学生代表一人组成，负责校内生产劳动与补充供给事宜。另外，校务会、教导会、事务会、教职员和学生代表联席会，教师和学生代表均出席参与商讨。由于实行民主的管理制度，中等学校条件虽然很差，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全校都能上下一心，为完成教育计划而奋斗。

中等学校对于学生在政治、生活、教学等方面的管理，通过学生会自治、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学生会是一个自治机构，也是一个研究和文化活动的团体；它是同学之间团结互助、密切学生与学校行政关系的桥梁；同时要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在这方面，学生会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它在学校居于很重要的地位。

中等学校虽然采取民主管理制度，但是一切仍要按规章制度办事，学生犯了错误，也要批评教育，或按校纪处分。因此，它执行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是民主集中制。

2、生产自给也是中等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1941年边区教育厅关于“生产自给”给各中等学校的指示中指出：“第一，自给自足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工作；第二，它可以打破经济困难；第三，它可以使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来，更是有新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劳动对于中等学校的重要性了。

中等学校的生产劳动，有课余生产，也有停课生产，主要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主要是种各种蔬菜和粮食，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毛、打柴、烧木炭、修理校舍、喂猪、喂鸡等。这里举几个例子，关中师范，1940年打窖洞14孔，开荒100亩，烧木炭15000斤，柴全部自给；三边师范1941年纺毛400斤，打盐300驮，修理房舍许多间；延安师范1943年种菜18垧，收获19万余斤，种谷子、荞麦、麻子96垧，收获61石。通过生产劳动，中等学校大都做到了半自给，改善了学校生活，锻炼了教师和学生。

3、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中等学校一项重要的管理措施。抗战初期，大都是节假日组织学生出外宣传有关抗战的方针、政策。同时，于冬季派出学生到各地开办冬学。平日也要组织群众识字组，进行社会教育。以后逐渐扩大了，学生参加地方上反奸、拥军、减租减息、移民等各种社会活动。寒假中组织工作团，帮助群众写春联，订农户计划，组织秧歌队，向群众宣传政府的法令。由于社会活动的增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锻炼了学生的思想意识。学生对政府的政策法令和群众生活、军队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和敌情观念，群众和学校的关系密切了，重视学校了。因此，报考中等学校的学生空前增多，学校因而巩固了。

#### 四

抗日战争开始之前，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封建迷信盛行，文化教育落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重视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克服了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利用旧房、简陋房解决校舍、教室等，使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初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37年到1941年。这一时期，初等教育着重于学校数量的发展，同时提出提高教学质量。1937年一年时间，就恢复和成立了545所小学，学生10396名，这是一个突飞的发展。1938年增至733所，学生15348名。1939年增至为883所，学生人数达22089名。1940年2月以后，陇东3县（庆阳、合水、镇原）、绥德3县（绥德、清涧、吴堡）和安定、郃县等县区相继归边区管辖，小学剧增至1341所，学生也增加到41458名。1941年春，小学为1198所，学生人数为40366名。这个时期小学教育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是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在政治上、经济

上得到了解放，生产初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在政府的号召下，学校就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了。

第二时期，从1942年—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这一时期，主要是整顿初级小学；实行精简，提高质量。边区教育厅于1941年10月提出整顿小学；同年12月发出整顿小学的指导；1942年根据边区政府关于精兵简政的规定，教育厅又提出精简小学（主要是初小），提高质量。

整顿、精简小学的主要方法是：（1）审查现任教师，有多少合格教师，就开办多少学校。（2）凡确实作特务工作，破坏边区有事实者，及思想落后、品行不端或无教学能力者，一律辞退；无继任者，该校停办。（3）选择人口集中，交通方便，基础较好的小学，修理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领导，改为中心小学。（4）一般小学的在校学生要在25人以上，有单独的教室、宿舍、教员住宿、游艺场所，教室里有黑板和足够的桌凳，否则停办。（5）五里以内的小学尽可能合并，五里以外者取消。经过整顿后，根据29个县市的统计，1942年共有小学723所，占原有小学的60.5%；学生人数为23324人，占原有学生人数的81%。

在整顿、精简的同时，对完小采取了加强领导，提高质量的方法。由于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大量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文化程度低，需要完小给予提高。因此，完小就被特别重视。当时，完小虽未正式定为干部性质的学校，但因工作需要，中途被调出的与日俱增。1941年高小毕业学生总数为1500多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分配作教育和青年工作。从这个数字来看，完小高级班实际上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之前，据延长、甘泉、佳县、赤水、环县、合水等县历届高小毕业生出路看，担任工作和升学的占总数的72%强，回家务农或经商的占28%。因此，边区文教大会才正式决定完小（高级班）为培养干部

的学校。

当时加强对完小的领导、提高完小质量的主要办法是，按规定统一学校组织机构；提拔品学兼优的完小教师和争取外来知识分子到完小工作；完小最低限度要有一个高级班；招收学生要实行考试；建立董事会，聘请当地有威望、热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参加主持；加强学生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认识，利用本地的事物进行教学；集中物力、财力；依照可能参加的人数，扩大校舍，充实设备；加强配备完小教育干部，以政治好、教学能力强作为任用标准。实行这些办法之后，完小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44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8161人。

1938年在普小的基础上建立了模范小学，1941年又在模小中择优建立了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有严格的要求。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规定每个中心小学学生得在30、40、50名以上；校内设备也要齐全。特别要求中心小学要起中心作用，既要组织附近小学教员对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和教学管理的研究和讨论，并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推动他们积极改进学校工作。

这一阶段，由于精简了许多条件差、学生流动多、教师不够格、困难比较大的初级小学，人力、物力、财力能集中于完全小学、中心小学以及较好的普通小学，学校的条件改善了，领导干部加强了，文化科学知识教学增加了，从而教学质量和学校质量有所提高，这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强调有一定人数、一定设备、一定制度、一定组织、一定活动和集中办学，有些地区甚至集中到以区为单位办一所中心小学，这给学生入学造成很大困难，增加了学生家长在经济上的负担。在教学上本想搞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但是，在教学内容上却把一些不适合边区农村的大城市的东西搬上讲台，学非所用的现象仍然存在。发生这些失误，主要还是没有掌握好边区当时的实际，缺乏估计主观力量所致

第三时期，从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到解放战争开始。这一时期，是初等教育改革的阶段。初等教育改革，在边区文教大会以前的1944年4月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时，就已经开始。人们把1944年称之为改革的一年。文教大会就是改革的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为什么要对初等教育进行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教育内容上缺乏边区人民实际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用一些复杂的非边区所必需的内容教育学生，使学生脱离实际，脱离家庭，家长不满意，社会有舆论，不愿送子女上学。二是在办学形式上集中，不同程度地抄袭了旧的一些制度、课程，这也是不适合边区群众的需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关于需要与自愿的讲话，以及边区政府提出的民办公助，就是改革小学的方针。改革的总目标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民。具体目标是新公民至少要学会1500字，会读《群众报》，学会算术，具有初步的卫生常识，和政治常识，具有生产劳动的习惯；在教导方法上，必须使学生深刻理解所学的内容，坚决废除打骂和体罚，培养和奖励学生的自觉自治精神；在办学形式和学制上，分散的农村，一般应以自愿的民办村学为主要形式，同时允许老百姓拥护的好的普小存在。

边区文教大会之后，依据上述原则以及具体目标，开始了大规模的初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在改革过程中，民办小学大量发展，完小、普小也有发展。边区文教大会前，小学1090所（内含民办小学574所），学生23686名；文教大会后，小学增至1281所（缺盐池、吴旗两县），学生增至34202名。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又增至1377所（内含民办小学1057处），学生达34004名（内含民办小学生16797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民办学校显著增加。在公小与民小的比例上，文教大会前，民小约占全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大会后增至为61%；1945年上半年，复增至76%。

民小数量所以增加如此快，除民小本身发展外，有大量的公小转为民办，较大集中的公小，被分散为小型的村小。

改革后，民办学校形式上多样化了。有一揽子学校，娃娃上正日班，妇女上午校，成人上夜校；有按户轮校，按村轮学，冬春两季学校，职业小学、妇女学校等，把学校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劳动教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教育的内容更多的结合农村实际需要。

陕甘宁边区初等教育的实施目的，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法》中规定：“边区小学应依照边区国防教育宗旨及实施原则，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1941年2月1日公布实行的《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又进一步规定：“边区小学教育，应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要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总之，是要儿童在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

边区初等教育实行三、二制，1938年《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中规定，小学学制五年，前三年初级，后二年高级。《小学法》规定“边区小学修业期限为五年，前三年为初级小学，后二年为高级小学，合称为完全小学。”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上，为了适应边区农村情况，对初小学习期限作了灵活的规定。小学教育这样规定：“学校的学制不求一样，一般尚应该废止正规的班级制和学期制。凡学毕规定的教育内容即可作为毕业。但教员须于三年之内保证完成每一学生的学习计划。”民办小学根据群众意见而做决定。

过去小学实行寒暑假制，为了适合边区农村生产的情况，教育厅规定：自1942年起改行年假、麦假、秋假的制度。三种假期约

两个半月的时间。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之后，对于假期制度陆续又作了灵活的规定：小学放麦假、秋假，何时放假，放多少天，由区、乡政府或校董事会决定；年假按照统一规定办理；农村可废除星期日，根据农民需要，规定不定期的生活日，等等。这些适合边区农村的制度，得到了农民的拥护。

边区小学的课程设置。《实施办法》规定初小课程为九门：国语、政治常识、自然常识、算术、体育、音乐、美术、劳作。高小的课程为十一门，增加历史、地理、周会。课程内容，均以抗战为中心。1944年11月1日公布的《边区文教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草案》，对小学教育的目标作了原则的规定：“要为边区培养具有下列条件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民：（1）文化——学会一千五百字以上，读下《群众报》，算术学会加减乘除。（2）常识——具有初步的卫生常识及政治常识。（3）具有生产劳动的习惯”。文教大会之后，小学课程主要是初小课程内容，有了较多的改变和新的创造。在完小，国语增教应用文、日用杂字；算术增加珠算；公民课讲政策法令、减租减息，地理课配合时事，讲世界大战、敌后抗日根据地；自然讲生产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卫生常识。中、普小的国语普遍加授应用文，有的添教二十四节令、父母姓名、附近地名；算术大都添授珠算、斤称歌、度衡量，还有教学算帐。民办学校，一般只教五门课，即识字教育、算术、讲故事、唱歌、游戏。

总的来讲，1940年以前小学课程门类较多，课程内容政治多，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1940年以后，生产教育加多，以科学教育为主。特别是文教大会之后，基本改变了这种状况。

初等教育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边区教育厅相继提出一些原则，经过群众不断地实践和创造，教育厅不断地研究与总结，最后形式了一套比较完全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实施办法》中指出：“国防教育应与抗战的行动密切联系，学习与行动应打

成一片——今天学到的东西，马上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们反对‘死读书’、‘准备救国论’的脱离实际的学习。”这就是说，要理论联系实际。同时提出“以集体活动、自动学习”为教学的最高原则。这种方法，类似启发式。1938年8月15日《关于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中指出，教学上“要彻底废除学生死读书的古老方法”，“要运用国防教育的教育方法，……应实行集体教育，指导学生集体学习，自动的学习，举行集体竞赛，提高学习情绪。”当时边区小学背诵、死读书的现象普遍存在，针对这种现象，提出废除古老的教学方法，是必要的。1940年《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中，对小学提出五条教学法：（1）集体的自动的学习是教学法最高的原则。（2）应注重实践，可以实际活动为教学中心，把学习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3）教学应该是有计划地进行。（4）应该经常举行集体竞赛。（5）应该采取“即知即传”的办法。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各校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各小学采取民主的，即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学生自己集体讨论和议决各种生活规约，集体地执行，集体地进行自我批评，使学生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当时提出，学校要军事化。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管理只采取帮助和指导。为了学生有组织的自己管理自己，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少先队和儿童团，还有军事训练组织等。学生会一方面积极开展自己的活动，另一方面切实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学生在学生会的领导下，建立了生活检讨会，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少小学教师不在学校，学生也能管理自己，把学校生活、学习等方面管理得有条不紊，学生和教师的关系非常融洽。

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也是小学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每周规定一定的时间，组织学生种瓜种菜，养成儿童、青年的劳动观念。同时，组织学生进行抗战民主、扫除文盲，破除



迷信、讲究卫生的宣传，协助当地政府进行优待抗属的工作和做小先生领导识字班、夜校、半日班等工作。边区各小学在开展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好办法，收到了丰硕的成果。如绥德分区提出实行学校和劳动、社会、家庭三结合。与劳动结合中，男生捻毛线、种瓜菜、种棉花，女生捻毛线、做针线；与社会结合中，提倡“小先生”制，在娃娃变工队教识字，给老百姓代写路条、书信等；与家庭结合中，学生回家后，要帮助家庭担水、扫地、算帐等。由于开展了这些活动，各校除粮食以外，在蔬菜方面大都做到了自给，有的学校粮食可以半自给。这样便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改善了学校的生活。

## 五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如同初等教育一样，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主要发展数量，同时提高质量。

1937年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提出要把边区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等口号，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提出，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实施办法》提出：在人口比较多的乡村、城市，组织俱乐部，利用各种方法，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1940年《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强调指出：在各村、各乡小学内和小学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识字组、大众黑板、

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在自卫军内进行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社教工作。

在上述一系列规定、决定和具体布置之后，边区社会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年冬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619处，学生10337人。初步取得了重大成绩，1938年继续办冬学、夜校、半日校等。这年办起冬学723所，学生达12824人。为了使社会教育和小学衔接起来，特于冬学结束时，把冬学中的儿童转入小学，妇女转到夜校，成、青年男子动员到识字组或夜校继续学习。这年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共发展到1558处，人数共计25063名。1939年提出当年消灭30000文盲，因而，社会教育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本年识字班、半日校、夜校、冬学共开办5232处，学员为53266人。1940年，这4种组织又有发展，达到5469处，学生为59953人。1941年提出社教组织主要用新文字消灭文盲，通过新文字学汉字。这一年，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共3940处，人数为47071人。从这些不完全的数字看，识字组织发展较快，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较大的作用。

第二时期，方针是整顿巩固，充实内容。

社教组织在发展初期，即1938年就提出一面发展，一面整顿和充实内容。1939年教育厅提出继续整顿社教组织，并使之巩固。要求把对象固定，不使一个组织，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过于活动。办法是（1）定期举行测验，检查识字进度。

（2）举行毕业式，夜校、半夜校6个月一期，分高初两级，每期毕业要举行毕业式。（3）实行奖励。1941年教育厅又提出加强社会教育，继续整顿识字组织，奖励好的，取消有名无实的；妇女组和妇纺组结合进行；夜校要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开办等。就在这些正规要求下，社教在不断地发展中，又不断地进行了整顿

和充实。同年又提出推行新文字教育，开办新文字冬学。这对消灭文盲，提高教育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1942年精简政策的要求下，社教又进行了较大的整顿，取消了有名无实的识字组。因此，社教识字组织数量大减。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在试行民办社教的工作中，社教数字又有些回升。党和政府比较重视冬学。认为用冬学消灭文盲，收效较大，因此，冬学发展比较稳定，无大落现象。

第三时期，民办社教，按照需要自愿办学。

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是民办社教，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不脱离生产的社会教育。1944年4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中提出，在民办公助方针之下，将来应做到每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在村学的协助下办冬学、夜校、识字组，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毛泽东同志于10月30日的边区文教大会上作了题为《文教统一战线方针》——新形式联合旧形式反对共同敌人，按群众的需要与自愿进行工作的重要讲话。他说：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比较集中比较正规的中小学，而且要有分散的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识字组。又说，一定要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要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或历史教条出发。要因时、因地制宜，不应勉强搬用。如果群众在客观上虽有此需要，但在他们主观上尚无此种觉悟，则领导者与工作人员应该耐心等待，直到经过自己的工作使群众有了觉悟，因而愿意实行之时，才去实行，决不应该强迫命令。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就只会流于形式主义而失损。毛主席这次重要讲话，对于文教大会和以后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边区文教大会对于边区教育方针，做了重要决议。决议指出，进行不脱离生产的社会教育，其主要目标是消灭不脱离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成、青年男子、35岁以下的成、青年妇女；其步骤是首

先着重消灭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和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文盲，然后其他；其据点是各地学校、县以下各级政府，合作社以及模范变工队，也应成为推广识字运动的据点，根据需要与可能，组织读报识字、夜校和冬学，使冬学与夜校、识字组联系起来，以免一曝十寒。在社教形式上要多样化，广泛开展。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文教大会决议的原则指导下，展开了社教的改革和建立工作。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发展到3007处，学员301013人（冬学数尚未计算在内）。由于有些基层领导同志对于需要与自愿、民办公助有片面的了解，采取自由主义，放弃领导，因此，社教组织数字曾一度下降，后趋稳定。在整顿改造中，社教形式比以前更加多样化了，与农村生产、生活更紧密地结合了。除原来几种基本形式（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外，新产生出几种轮学。有的是教员巡回教学，学生不动，有的是学生轮流去听课，教员坐教；有的是学生、教员一齐轮。还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识字组，以小學生为基础成立的失学儿童识字组，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识字教育，专门的妇女识字组，也有以识字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的学校。社教的教育内容也多样化了。

在这三个时期中，边区的图书馆、俱乐部、民众教育馆和剧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37年教育厅就提出建立俱乐部，指出俱乐部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文化、娱乐等工作的场所。1938年又提出在人口较多的乡村、城市组织俱乐部，向群众进行识字、读报等工作。1939年教育厅提出，民众教育馆是社教工作的中心堡垒，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剧团。1940年周扬厅长报告指出，剧团应统一领导。同年《实施原则》又提出戏剧实施原则数条：应有鼓动宣传力量，力求地方化，力求简单灵便。党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也提出设立俱乐部、民众教育馆和开展剧团工作的问题。1941年教育厅训令，要求没有成

立民教馆的县份，当年达到每县一处。同年，教育厅又提出加强并充实剧团工作，提出剧团既是剧团，又是工作团，不仅要深入民间演出，还要组织民间娱乐活动。大型剧团可几县联合成立，成立剧团要经教育厅批准。同时提出民教馆要登记图书，增添设备，活动方式要多样化等。1942年教育厅提出统一边区地方剧团的领导，剧团要小而精，话剧地方化，旧形式新内容的剧也要利用等。

历年来，边区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剧团和俱乐部在上述各项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不断的发展、整顿、精简和充实工作，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根据历年不完整的统计，1938年各地俱乐部已有431处；1941年民众教育馆发展到25处；图书馆、阅览室10处，其中包括教育厅直接领导的藏书较多、较正规，工作较好的鲁迅图书馆；剧团10个，其中有教育厅直接领导的抗战剧团、绥德的民众剧团、关中的“八一剧团”、定边的“七七剧团”、庆阳的农村剧校，还有中央领导的平剧院、文工团等。民众教育馆经过整顿充实之后，一般工作都比较好。馆内除备有图书、阅览游艺等设备和活动外，还进行时事宣传、社会宣传，组织群众识字，办黑板报，为群众代笔，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群众卫生工作，组织领导地方剧团，改造地方民间旧艺人等。另外，许多民教馆还创造了许多新形式，有的在集日为群众讲时事、说书，常常是“高朋满座”；有的去赶庙会，创立“文化棚”，向群众宣传；有的给群众代写诉状、保状、书信、合同、对联；有的设立“文化包”，帮助群众送信，向普小、民小推销文具、课本；有的代办军民书店，替机关、学校代购书籍，代订报纸，代买课本，过年推销年画。剧团的工作也是很活跃的，颇受群众欢迎。比如教育厅领导的抗战剧团，成立于1935年6月，原叫列宁剧团，后改名西北工农剧团，原来团员很少，大都为农村小孩，多不识字，以后逐渐发展，原只有话剧、活报、歌剧之类，后增加

舞蹈等，道具、设备简单。但是演出活动很广，不只在中央和边区各县巡回演出，而且远出演出，颇受机关、部队、农村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边区社会教育的课程。在社教形式中，冬学、夜校比较正规，课程比较齐全，其他识字组的课程则比较灵活，多种多样。从发展情况看1937年《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民众教育的基本课程为四类：文化课，最低限度能用汉字看标语、口号，填写自己的履历表，能用新文字学汉字及学自然和社会常识；政治课，最低限度能了解抗日的纲领和特区民主自由的特点，及特区阶级关系的变化；自然课，最低限度能了解特区农业经济的一般知识和日常的科学知识；社会课，最低限度了解人类社会的特点，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关系、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国家和国际与个人的关系。依据这些原则，社教组织课程逐渐作了具体规定。1937年发出的《冬学须知》提出冬学课程有军事、国语、政治、唱歌、珠算、抗战常识。1938年《实施办法》规定，文字课要能看和写简单的书信文件，先学新文字，再通过新文字学汉字；要懂得统一战线及目前的抗战形势；自然课要懂防空、防毒、救护及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这个规定虽然不具体，但要求较实际。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决定，冬学以国语、政治、常识为基本课程。1940年又在《实施原则（草案）》中规定冬学课程除识字外，加政治、自然、军事和唱歌课。往后几年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强调冬学以识字课为主，冬学的中心目的是扫除文盲。文教大会《决议草案》提出社教的目标，是要消灭边区不脱离生产的文盲，使他们能学会1000字，读下《群众报》，同时还懂得初步的卫生常识。从以上冬学课程变化看，由繁到简，由强调政治到强调识字。再看夜校、识字组的课程。在历届“实施”、“原则”、“条例”等中，对夜校、识字组课程都作了原则的或具体的规定。历年的课程是这样，1938

年夜校课程与1938年冬学课程相同，即文化、政治、自然和唱歌。识字组课程以国事、政治为主。未明确提出识字要求。1939年《条例》规定，夜校以国语、常识、算术为基本课程。半日校与夜校同，上课在白天。识字组的课程为识字；识字班除识字外，与又学唱歌、讲时事。1940年《实施原则》规定，夜校课程与冬学课程相同。识字组课程主要是识字，不分科目编制，各项常识均纳入识字课本中，作综合的教学，另加政治一课。以后各社教组织的课程，无大的变化。到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时，决议草案又作了统一的规定，主要是识字，未分各具体门类。

从以上各社教组织课程的变化看，冬学与夜校基本相同，识字组与识字班基本相同。课程门类由繁到简，由政治重于文化，到识字为主，或用常识为副，逐渐走上符合边区实际的需要。

边区社教组织的学制、教材和教学活动。学制，冬学以3个月为一期；夜校半年为一期；半日校（半日班）1年为一期，期满毕业。识字组一般不定学制，只求完成一定的识字任务。教材均由教育厅编辑印发。冬学识字课本有《冬学课本》、《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等。其它识字组织的课本有《新百家姓》、《新千字文》等，还有地方上、社教教师自己编写的补充教材等等。

社教组织的教导活动。冬学有专任教师担任教学，按文化程度分班进行，全天上课和自习。也组织学习小组，集体学习，共同讨论。教师讲授，实行简单的启发式教学。识字教学要求“四会”（会认、会写、会讲、会用）。学习上还要求竞赛。在生活管理上采取自卫军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养成集体意识和行动纪律化。夜校教学比较有组织，不派专任教师，教学由当地小学教师或机关工作人员担任，多数由小学教师担任。也是实行分班教学，或分组教学，组织学习竞赛。在生活上要求过集体生活，养成民主习惯。识字班以组为单位进行教学，组由三、五人或七、八人

组成。教学采取“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初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丈夫教婆姨的，儿子教父亲的，弟弟教哥哥的各地均有。有的一面学习，一面就在教人，“热蒸现卖”，“即知即传”。而较普遍的是采用小先生制，由小先生担任识字组教学。小先生大都由学校小学生担任。总而言之，冬学、夜校、半日班、识字组教学方式、方法，多种多样，经验很丰富。边区文教大会之前和以后，社教教学与农村、市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因此教学方式方法更多样化。这里以冬学为例来说，总起来有几种新形式：1、分散经营与分时教学，这种冬学采用五种教学形式：（1）每天分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轮流教学；（2）住在组长附近的小组，由组长负责上午或下午去集中教，或个别教；（3）单人独户或娃娃小不能离家，由组长上门去教；（4）家庭有人识字，就由家里人教。三人以上成立家庭小组。由组长定期检查；（5）家里人抽出一人去识字，识字后回去教另一人。2、以分散经营为主要的教学有三种形式：（1）轮流教学的分散形式：轮教员即教员轮流到各组长家里去教。教员到后，击鼓为号，大家即来组长家炕上学习，叫做“热炕冬学”；轮学生，教员把学生按地区编成若干小组，依次若干天轮流来教员处学习，每次一天；教员、学生都轮流，每到一个教学点，住若干时日教学，又转到他村，依次反复。这是一种流动集中的旧轮法。（2）直接与生产组织结合的分教教学。这有四种形式：按业务性质分组教。搞运输的，出发时“领学”，沿路学习。搞手工业的，上午劳动，下午学习；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放羊娃娃，清早来“领字”，揽羊时学习；与妇纺结合教，一面教妇女学习纺线，一面教识字，叫妇纺冬学；作坊主把学徒组织来学习，隔夜一次，叫做作坊冬学。还有家庭冬学，教员和学生都是一个家里的人，学和教都很方便。（3）以分时教学为主的教學形式。如一揽子冬学，这是综合性的村学组织形式，适合于



较大的村庄，以男女成、青年儿童为对象，各种各样的人无所不包。以分时集体教学为主，有整日班、半日班、夜校、识字组、个别教等。男子夜间学习，妇女半天学习，这些均归冬学统一领导。3、集中与分散互相变换形式的教学，一是随着气候变化教学形式。比如天气比较暖和就集中教学，固定地点；天气冷了集中不便，就改为教员送上门去学习。一是配合群众生产，变动组织形式。初冬生产较忙，实行个别教学。啥时来啥时教；天气冷了生产不太忙，或分为早班、晚班学习，或分为午班、晚班学习。完全依据群众的意愿来教学，颇受大家拥护。4、集中的形式。在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原则下，采取集中形式办冬学。在一定的地点、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一定的教室中进行教学。这种形式只要是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成立起来的，能办好，学习效果也好，比分散形式收效大。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是有很大成绩的，它培养了数以千千万万的各类抗战建国的优秀干部，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既承袭了中外古今某些优良的办学传统，而且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合乎人民需要的做法。它的基本方针、政策与好的实践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对于往后的教育实施，也必然会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因此，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章。

# 略论徐特立的教育本质、对象和目的观

(一九八六年)

徐特立是我党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他知识非常渊博，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无所不知。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更是丰富和具有特色的。至于他的为人品德和作风，十分高尚，至今为我们所敬仰。最近将《徐特立教育文集》读了一遍，受教育不浅，现就他论教育的本质、对象和目的思想，略述已见。

## 一、教育的本质观

徐特立论教育本质，我认为可以分为一般的教育本质和特殊的教育本质。现将这个分法，加以阐述。

1、教育的一般本质。教育是什么？这是教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回答也就各异。我国后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活”。这都是从封建思想或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论教育本质的，他们不懂得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未能揭示出教育的真正本质。徐特立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在论述“一定的社会形式下的教育本质”时说：“教育的作用是按一定的社会形式，培养一定的人格”<sup>①</sup>。徐特立虽然讲的是一定社会的教育的本质，但是，实质上说明了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形式。他在论述一般的教育对象时又说：“教育的对象，当然是人类，而不是动物。”接着又说：人的要求，“受一定的社会形态及个人的一定社会地位所制约，……都受着一定的经济范畴和一定的伦理范畴所规定。”他这里是讲教育的一般对象，不是直接

讲教育的本质；但是，他说明了人是社会的人，教育是培养人，从而教育也应是社会的。因此，可以说，他的教育的一般本质，揭示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是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sup>①</sup>。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也说：“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sup>②</sup>。这些论点，都可以说明教育的一般本质问题。从狭义而论，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谓之教育。现代科学技术迅速进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促使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多赖科学技术人才的不断出现，而科学技术人才之所以能够不断出现，就是依赖于教育的不断发展。从这里就看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密切关系。因此，现在人们说教育是生产力，是有道理的。这又给教育加上了一层科学的、社会的性质。徐特立已于60年代末去世，当然不可能论述到这个方面。

2、教育的特殊本质。徐特立说：“教育的作用是按一定的社会形式，培养一定的人格；为一定的社会服务。”这就是说，教育又有其特殊的本质。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产物，又为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阶级服务。因此，它又有历史性和阶级性。人类社会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因此，教育也就有各种不同的特殊性质。奴隶社会的教育产生于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于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亦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教育是一定的社会的产物。当然，这是就教育的基本特性而言。教育有一般的本质，并且其中属于科学技术和具体方法等部分，我认为不同社会，可以互用。徐特立对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下的教育本质”，有过科学的、精辟的论述。也就是说，

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的特殊本质，作过精辟的论述，为了说明徐特立的论点，先从经济、政治谈起。徐特立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所需要的教育，就是建筑在它的基础上，或者推进社会更向前发展，或者挽救它的死亡”。封建社会的教育，建立在封建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属于“封建的小生产”（徐特立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广大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就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它为地主阶级所掌握，并为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和培养人才服务。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教”。徐特立说：“孔子就是封建的典型的教育家。‘五四’以前，他的教育学说在中国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基础上的教育，按照徐特立的论述，就是“所提倡的教育，主要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而一般的文化教育，他只作为业余性的课程”。徐特立在这里说的是儒家对一般群众的教育。孔子的政治和教育方针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sup>④</sup>。因此，他的愚民，是使群众服服帖帖地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对一般群众片面实行“伦理教育”。伦理教育，亦即尊亲事君的教育。按徐特立所说，就是盲目服从的教育。《论语》上说：“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sup>⑤</sup>。这也就是徐特立所说的“评定学习的成绩是看事君和事亲如何，只要对事君和事亲有舍身竭力的行动表现，无论他曾否学习，就肯定他是学习了”。封建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因而，地主阶级实行的是阶级教育。这种教育带有两重性，即上面所说对群众片面实行一种伦理教育，而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则实行一种学会统治群众的教育，即对贵族子弟和士大夫除进行德行伦理教育

外，还有学文、强调文化教育。亦即徐特立说的除德行教育外，还有“言语、文学、政事三个科目”。也就是《论语》上说的：孔子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sup>①</sup>。当然，儒家对于群众也进行“文教”，如前边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先行而后学文，是摆在次要地位上的学文。儒家对于成人实行“四教”。

《论语》上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sup>②</sup>。这种教育，把“文”放在前，“行”放在次，据说这与对弟子（群众）进行教育，把“行”放在前，“文”放在后不同。但是，不论把“文”放在前或放在后，其对群众不重视“文学”教育则一也。由此看来，封建社会的教育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它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

现在谈徐特立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教育特殊本质问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教育，是建立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之上的。要说明这个社会的教育特殊本质，也必先说明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如何？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sup>③</sup>。又说：

“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sup>④</sup>。在政治上，它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依附帝国主义。腐败的清朝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允许其在中国内地设立学堂，开办学校，进行文化侵略。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封建的、传统的教育不能不被破坏，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教育应时产生。徐特立对于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教育特殊本质，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孔子时代的纯封建的教育学说也就在这百年的过程中，开始暴露出它和时代的矛盾，以至到它的没落”。为了改善不适应现状的教育制度，各派学者不断提出一

些主张。徐特立说：“所以魏默生提出在思想方面要去昧患去虚患。去昧患就是反对愚民教育，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学说是相反的。去虚患就要提倡实利主义，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学说是相反的”。魏默生即魏源，清朝思想家、文学家。他和龚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他对当时的教育不满，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改革主张，要用经学来解决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用“去昧患去虚患”改良教育。但是，未能得以实现。正如徐特立所说：“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不是一个时期及二三人力量所能突破的”。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之后，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也就是徐特立所论述的戊戌维新以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这个纲领，“一半是封建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特殊本质。1900年庚子之后，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按照徐特立论述的是：“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尊君尊孔是封建的，尚公、尚武、尚实是资本主义的”。这就是说：迫于形式，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教育方面加以改革，废科举，办学校，以维持其统治。一方面沿袭传统的、封建的尊君尊孔的教育，一方面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兴办实业教育等。这进一步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的特殊本质。徐特立说这些教育的纲领和宗旨，“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性”。到了“五四”运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并未根本变化，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明显，因而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无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将要出现的新局面。徐

特立对这一新的形势作了最科学的阐述，他说：“五四运动，又进到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表现的很为明显。资产阶级的学者提出民主与科学，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劳工神圣’和唯物主义。这两种思想教育的主张，正是表现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斗争的序幕”。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概括。到了1927年4月12日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实行法西斯专政，实行党化教育，提倡封建的“四维八德”，实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企图长久维持其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什么？毛泽东在同一著作中说：“中国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他又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具体讲，‘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四种经济构成。就在这样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不同与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施，具体反映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徐特立说：“我们今天政协的文化教育政策，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的产物”。总而言之，社会性质变了，教育的特殊本质也就随之变了。这就是徐特立所说的“一定的社会形势下的教育本质”。

## 二、教育的对象观

教育本质的两重性，决定教育对象的两重性。教育的对象，按徐特立的论述，亦可分为一般的教育对象和特定的教育对象。一般的教育对象由一般的教育本质来决定，特定的教育对象，则由教育的特殊本质来决定。徐特立在论教育对象时，科学地提出了“一般的教育对象”和“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对象”问题。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对象，我把他叫作特定的教育对象。徐特立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对象，作了“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分析。也就是阐明了各社会特定的教育对象问题。我们以徐特立的这一分析推论，既然有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特定的教育对象，当然也会有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特定的教育对象。这就是说，教育既有一般的对象，又有特定的对象。现在就这两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1、一般的教育对象。徐特立在“一般的教育对象”标题下说：“教育的对象，当然是人类，而不是动物”。这就不但从侧面揭示出教育的本质，而且直接揭示出教育的一般对象和教育对象的共同性，也就是揭示出一般教育对象是人。这从广义上讲，不论怎样结构的社会，有阶级或无阶级的社会，它们的教育对象都是人类，而不是动物。人是会思维、有意识的，而动物则反是。徐特立说：“中国有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固然是唯心的看法，但也反映出一定的现象”。当然，对于动物虽不能施行教育，而可以进行“训”，因为它具有下意识，会模仿，模仿人给它教的动作，但这不能叫作教育。因此，教育只能对人类施行，而不能对动物施行。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教育是社会的现象。人类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正如徐特立进一步说的，“我们研究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和学习心理，不应该单纯的以自然人类为对象，而应该以社会人类为对象”。又说：“我们研究儿童心理和学习心理，应该从社会矛盾中加以分析”。徐特立的这



些论述，就说明了人是社会的人。他还用费尔巴哈的一句话，来证明他的论点。这句话是：“人类在宫殿中所想与在陋巷中所想不是一样”。因此，人类是社会的人类。又正如徐特立所说：

“即单纯的人口法则，也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社会的法则”。我们这里再引一段梁启超论教育的对象，来说明徐特立的教育对象观。梁启超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中论述教育的目的时，说到教育的对象问题。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sup>④</sup>。可见，梁启超也说教育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动植物。他认为人是有意识，而动植物是无意识的。他这个论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说野蛮人活动无意识，这是不正确的。

2、特定的教育对象。徐特立在叙述“一定的社会形势下的教育本质”时，论述了一定的社会形式下的教育对象，也就是主要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对象问题。如前徐特立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对一般人主要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伦理教育，而对于士大夫除德行伦理外，还有言语、文学、政事教育。这说明前者是一般人，即劳动者的“小人”，后者是“士大夫”。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对象有两种人，即对立阶级的两种人。两种人受着两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教育。徐特立把封建社会的教育对象放在封建社会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中，作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阶层性。各级官学，均为大小官员的子弟所占据，“小人”不得问津。历代私学，虽无等级的限制，人人可以入学，但是，由于学费的限制，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是难以上学的。只有家庭较富裕的子弟，也许是“小人”，才可以入学。孔子自己就办私学。他规定要交“束修”后才可入学。如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sup>⑤</sup>。能交

“束修”的，恐怕多是富有者，穷苦农民子弟是难以上学的。因此，他虽然提出“有教无类”的进步教育方针，因学费的限制，不但当时难以彻彻执行，就是历代封建王朝亦不可能执行。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对象，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对象完全不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就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很广泛，即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和民众教育，除过地主富农分子外，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入学。也实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属于干部教育，当然也是免费教育。徐特立把当时的教育称之为人民的教育，认为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非常正确的。全国解放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因而也就施行人民教育。这时候，人民的涵义较之解放前更加广泛，包括四个阶级，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都是受教育的对象。徐特立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对象，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他更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有阶级存在和阶级差别。但是，这时的阶级存在和阶级差别与旧社会的情况不同。因此，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徐特立更具体地说：“今天，我们应该给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他早年就热爱贫寒家庭的学生，主张平民教育，学校向贫苦民众开门。这是很可贵的。他在这时候，特别强调要给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理由的。因为在旧社会，有机会受教育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而广大工农群众的子女被关在学校门外，妇女受几重压迫，更无求学的机会、而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应给广大工农群众和妇女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徐特立重视广大工农群众和妇女的教育，是一种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当然，他主张给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以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只是强调而已，并无轻视和其他人民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他首先就说要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因此在全国解放初期，各级各类在校学生的成分，与解放前大不一样。工农家庭出身学生的比例占着绝大部分，其他家庭成员的学生因绝对人口数少，自然占的比例较小，但也有发展。徐特立重视人民教育和重视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的主张，得以初步实现。这就是人民教育的优越性。

为了给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徐特立还提出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教育形式，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在失学的年青和成人方面。要有各种的学习形式，如补习的、函授的、业余的、分散的，集中的等等”。又说：“在普通教育方面，尤其是小学，要有全日的、半日的、以及二部的、三部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教育实施的设想，完全适合中国分散的农村和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工作的情况。这是徐特立多年教育实践的宝贵经验，部分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实施教育的有效措施。徐特立又说：“至于专门学校，吸收工农分子，应该特为之设预备学校和预备科，预备班，以预备专门技术方面必要的科学知识”。工农分子也应该受专门教育，学习专门科学技术知识，这在解放初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设想。这一设想，在解放初期的教育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当时，专门成立了工农技术学校，吸收工农干部入学，培养了大批工农知识分子。徐特立还特别强调在少数民族中采取适当教育形式，进行教育。他说，封建朝代由于大汉族主义，不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其形式是各个民族不同的”。他又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间，不独文化程度有各种差别，而且经济条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有民族的差别性。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民族形式”。徐特立办学，总是考虑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他对汉民族教育的形式，是这种主张；对少数民族教育形式的主张更是这样。他这种办教育的主张，不但适用于当时，

而且对于现在，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教育的目的观

教育是有目的的对人类施行的一种社会活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目的；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徐特立先生在论教育目的时，批评了旧教育的目的论，说它们是愚民教育，培养顺民的教育。我们试从历史上看一看，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对人施行孔教。孔教的目的，约可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培养“作官”。如孔子弟子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sup>⑫</sup>。反复学习，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孔子自己也说：“学也，禄在其中矣”<sup>⑬</sup>。学习的目的，就是求得官禄。一是“谋道”。这种道，当然是“儒道”，或者是“周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sup>⑭</sup>。这是他的理想，只要得道，“朝闻道夕死可矣”<sup>⑮</sup>。必要时，为了“卫道”，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见他们对道的重视。一是“教民”。孔子强调对“小人”施行伦理教育，目的使老百姓成为“顺民”，顺民“则易使也”。也就是达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目的。一是“得民心”。孟子是孔子的三传弟子，儒教的主要继承者。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得民心”。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用一般的政治手段不如用教育手段有效。如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sup>⑯</sup>。要巩固统治，得民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得民心，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手段。孟子确实抓住了“得民心”的秘诀。孟子重用“五伦”，即重用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和朋友的教育，亦即用伦理道德的教育以得民心。总之，儒家的教育目的是“作官”、“谋道”、“教民”、“得民心”。一句话，就是徐特立所说的培养愚民、顺民。这种教育统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还有一种教育目的论。他们拟以教育改

变“人性”。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用教育改“善”。有的认为“人性”是“善”的，可以变恶，只有用教育改变其恶性，恢复为“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性观”。还有一种人性无善恶论。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sup>⑩</sup>。这种人性无善恶的观点，只要施之以教育就可以引到东或西，达到所期目的。这种论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改变人性的教育目的观，还是以儒家的“仁义”为轴心的，目的还是孟子说的“得民心”，亦即培养顺民。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势力打进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会。教育的目的，随社会的变化、教育特殊本质的变化而变化。即如前边徐特立所说的：“孔子时代的纯封建的教育学说也就在这百年的过程中，开始暴露它和时代的矛盾”。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半封建，一半资本主义”的教育学说出现了。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了实行他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他们的教育学说。如梁启超提出兴办学校为立国之本，极力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他说：“欲兴学校，培养人才以强中国，维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sup>⑪</sup>。同时，他极力主张应有正确的教育目的。他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一种“特色之国民”或“新民”。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培养汉奸之才和开奴隶之智的错误的教育目的论。认为这种人才、民智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他也反对传统的养士教育，认为除了“升官发财”，“谋他日衣食富贵之路”，别无什么用处。梁启超的这种教育目的论，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进步要求”。迨至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才确定中国统一的教育宗旨为：“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

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sup>⑨</sup>。这就是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宗旨，其意思是要达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所需要的“实用”、“通才”之目的。当然也是愚民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学者要求科学与民主，其目的是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这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有其进步意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并参加“勤工俭学”，他们认识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重要”性，号召“农人工人大联合起来”，号召“知识青年打破知识阶级，做那些农人工人解放事业”<sup>⑩</sup>。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目的、读书目的，就是要“做那些农人工人解放事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更有其进步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集中地论述徐特立的教育目的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徐特立说这是真正的科学的教育，“科学就能够提高人民的自觉，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加深人民的迷惘”。他进一步又说：“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而不是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他在另一个地方反对惩罚学生时又说：“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这就是说，徐特立认为我们的教育和教育目的与资本主义的不同。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革命的、自觉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是培养国民，而资本主义的教育是加深人民的迷惘的，是培养顺民的。他强调培养自觉的人民，坚决反对盲从，反对无理的服从，反对培养顺民。徐特立的教育目的观，是完全适合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要求，也完全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非常可贵的。

徐特立对教育目的总的论述是：培养国民，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那么，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其目的又为了什么？按徐特立的阐述，其目的就是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他说：“我们为着完成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任务而教育后代”。过去我们的教育主要为了革命，比如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的教育，就是这样。当然也为了建设。全国解放初期，教育主要为了建设，当然，也为了革命。徐特立这里提出教育后代，因为他是在教师节对教师讲话，实际上要教育全体国民。总结起来讲，徐特立总的教育目的观，就是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培养教育高度自觉的全国人民。

以上是就徐特立的总的教育目的观而谈的。徐特立当时还提出具体教育目的。他1949年6月“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篇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项教育宗旨，宗旨大意是：

（1）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与新教育。（2）对于外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它。（3）团结知识分子，应当不分阶级、信仰和党派，和一切知识分子很好地团结起来。我的理解，徐特立这里讲的三项教育宗旨，就是三项教育目的。这三项教育宗旨或目的，不是出自随便象想的，而是他根据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科学的、正确的。正如徐特立自己所说：这些教育宗旨，“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材料，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从教育书上摘抄下来，凭瞎子空想出来的”，“以免脱离实际，不能达到所规定的宗旨”。徐特立办教育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实际。

徐特立的实际精神非常突出，他事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出发。从分析实际、分析历史，得出结论。他说自己惯用“归纳法”。我们说他善用“归纳法”。他从来不离开历史实际讲问题，从来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他讲演、讲课丝毫没

有教条味。徐特立是使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他的教育本质、教育对象和教育目的的。这就是我的结论。

**注：**

- ① 凡是徐特立的话，都是引自《徐特立教育文集》一书《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讲座》文中。
-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教育》文中。
- ③ 《中国近代教育史》145页。
- ④ 《论语·泰伯第八》。
- ⑤ 《论语·学而第一》。
- ⑥ 《论语·先进第十一》。
- ⑦ 《论语·述而第七》。
- ⑧ 《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 ⑨ 同上。
- ⑩ 《中国近代教育史》145页。
- ⑪ 《论语·述而第七》。
- ⑫ 《论语·子张第十九》。
- ⑬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⑭ 同上
- ⑮ 《论语·里仁第四》。
- ⑯ 《孟子·离娄上》。
- ⑰ 《孟子·告子上》。
- ⑱ 《中国近代教育史》144页。
- ⑲ 同上198页。
- ⑳ 《中国现代教育史》35页。



# 谈谈徐特立教书育人的 教育思想和实践

(一九八七年)

徐特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我国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不但是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实践家，而且是一位颇有独到见解的教育理论家。他教育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又是极其丰富的，不但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现在的教育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仅就徐特立教书育人的思想和实践，谈谈个人的意见。

## 一、教师应为先进人物

当好一个光荣的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师，是很不容易的，不是随便一个有点知识的人就可以当好的。徐特立指出：教师必须是先进分子或模范人物。他说：作“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徐特立教育文集》288页，以下简称徐教文）或者“是一个模范人物。”（同前205页）什么是“先进分子”？徐老说：教师“自身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徐特立文集》626页，以下简称徐文）什么是“模范人物”？徐老说：教书育人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同前，495页），“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前）徐老认为：教师还要热爱学生，亲近学生，了解学生。总起来说，一个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又有广阔的文理知识，忠诚教育事业，并且能够教书育人的人，才是一个最好的教师。因此，徐老主张：“学师范，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正因为这样，就需要学习、思想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人来投考师

范。”（徐教文295页）所有这些，不是对于教师的要求太高了吗？我认为不高，对教师必须要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人知识，育人进步。学生时代，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道德品质、性格爱好等形成的极为重要的阶段，也是知识增长、提高的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时候的青年、少年、儿童的性格，可塑性很大，摹仿性很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徐老说：一定要“知道青年的特性，青年的特性如素丝，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在这种不定型的性质下，青年工作的责任就特别重大。”（徐文537页）因此，作为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他们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作风以及知识，甚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对学生发生较大的影响。一个言行端正，忠于职守，知识渊博，教诲有方和言行一致的教师，一定在教育学生上会收到积极的良好的效果，会出优秀的人才。否则，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误人子弟，甚至贻害国家。

徐老希望教师热爱教育工作和安心教师岗位，把教师当成革命的、神圣的职责。他说：“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材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

（徐教文259页）他又说：“教书是一种很愉快的事业，你越教就会越爱自己的事业。当你看到你教出来的学生一批批地走向生活，为社会做出贡献时，你会多么高兴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这里不也包含着你的一份辛勤的成绩在里面吗？”

（同前，295—296页）因此，徐老谆谆希望教师说：“我希望你们一生都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徐文283页）能够做到以上那些，就不愧为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的最佳教师，最好师表。

徐特立是那样的要求教师，而他自己如何呢？他不仅是有创造能力的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又是最好的德、智、体俱全的师表。

是“先进人物”，“模范教师”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寻求光明，由爱国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他只读过几年蒙馆，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留学，去日本考察过教育；但是，主要还是自学成才的。他知识渊博，熟知典籍，谢老（觉哉）在《奉答徐老自寿诗》中说：“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你精教育学，尤深研数理。”徐老一生从事教育领导工作，同时又是一位好教师。他由教蒙馆而小学、中学和大学，无不受到欢迎。他尤喜欢教小学，在师范学校时，还兼做小学教学和领导工作。他勤学好问，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在他70大寿时，被党中央誉为“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早就在给徐老一封信上说：“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愿意继续地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过去所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无不说他是“一代尊师”，的确如此。所有这些赞颂，徐老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试以徐老为镜，看看我国当前教师质量状况。现在我国的教师队伍很庞大，堪称为“先进人物”，“模范教师”者当不乏人；但是无容讳言，非常不齐。大学毕业教大学，中学毕业教中学，小学毕业教小学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越到下层这种状况越突出。师范毕业学生不愿当教师的情况，迄今仍很普遍。有极少数教师道德败坏，品质恶劣。近几年来，教师队伍质量虽有所改善，但是，我认为这种改善，还赶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仍存在不少问题，急待改革。

## 二、教师应是“经师”与“人师”相结合

徐特立非常重视既教书又教人，更强调教书很重要，育人更重要。他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徐教文295页）为什么？因为是“教育后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同前）这些话说得非常好。知识对一个人说来

很重要，不能不重视；但是，培养出的人仅仅有知识，而为人思想品质不好，那就是教育上的大失败。他谆谆不断地告诉大家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他以古之“经师”、“人师”为例，说明教书育人分离的缺陷，而要“经师”和“人师”合一。他说：“教师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徐文495页）徐老接着解释说，中国过去教经书中的知识的称经师，现在是教科学知识，为了容易记，所以袭用了这个名称。经师和人师，是古时对教师的称谓，其弊病是教导分离的一种分工，是教书的不管教人，教人的又不管教书的一种教风。我们向来主张教导合一，不主张分离。延安时代的学校就是这样作的。徐老接着说：“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同前）徐老在这里讲的是教师要有两种人格，也就是两种品质。同时也说明了培养人的教育，要重视“方向”，重视“品质”，也就是说，要重视青年学生的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缺一不可。而品德教育尤其重要。因此，人称教书育人为教学原则，我认为应当成为教育原则，它不应当仅使用在某一教学环节，或某一个教学阶段，而应当贯彻在全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明确这点，并按此去做。学校领导更要重视这点，要把它作为学校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去抓。

徐特立教人家那样做，而他自己也正是那样做的。他是最好的“经师”与“人师”结合的典范，也就是教书育人的师表。他当教师既教科学知识，又教思想教育。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他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放在领先地位。1906年春他应聘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兼教地理、历史、国文、数学等课程。

因他知识渊博，教学负责，方法又好，受到学生欢迎。此时他民主革命思想强烈，在教课时，常向学生宣传民族革命的意义。1913年至1919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师，教学认真负责，讲课时最爱讲古往今来先进人物的言行，启发学生觉悟。他以后不论讲课还是作报告，都是这样做的。

徐特立主张人家那样做，他自己做得更好。而我们现在的教师，双肩挑的到处都有，凡是模范教师，都能那样做的。他们的教育成绩，人人称颂。教育工作就是仰赖教师队伍，教学能否培养出好人才，主要也是靠教师，当然是靠好教师。因此，德才兼备和教书育人的教师越多，则我国的教育成就就越大。可惜，我们现在还有不少教师不是那样的。教科学知识的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管思想品德的也很少关心学生的知识教育。前者认为后者是后者的事；后者认为前者是前者的事。这是今天存在的教导分离的“经师”与“人师”。虽然多年来党政总是提出，管教的要管导，管导的要管教；但是，改变很慢。近年来，党政又强调提出“教书育人”的问题，当会得到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重视。

### 三、言教身教 身教重于言教

言教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对于教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特立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同前）孔子重视身教，他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这是子贡认为言教重要。孔子无言，他就没有什么传述的。孔子接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十七》）这可能是孔子寓意说：身教重要。所有这些说法，都说明身教重于言教。言教是既要教书又要教人，而身教比较起来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教师首先要具备较好的科学知识给学生传授，才谈得上是一位教师。但是，教师不光是教书，还要教人，而教人也要有教人的知识，即具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这样，才可能达到不仅仅能给学生传授

科学知识，还可能教育后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人。教师仅仅言教是不够的，还必须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则，在与学生接触中起表率作用。徐老指出：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思想、言行、品德修养和教学工作的表现上，应成为学生的表率。这就是说，教师在言论和行为上也要有双重人格。身教重于言教，一个教师言行不一，说的多、说的好，而做得少、做得不好，就起不到教育学生的作用。相反，还会起反作用。而一个教师说的多、说的好，做得也多、也好，就会起到更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说：“‘以身作则，……这是中国解放区特色之一。’毛泽东就是以身作则的表率。孔子是身正的典范，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由此可见，‘身正’与‘身不正’，对于教育学生关系是很大的。‘身正’就能‘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包含着十分深刻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师还有现实意义。身教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不仅古圣人是那样说的，那样做的，而千千万万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只是说身教的重要性，而不是否定言教的重要性。”

徐老是一位“言教身教”的典范。他自认为是一个“身教主义者。”我们从他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可以看到他处处表现出身教的事迹。他早年在长沙办学校时，自己没有财产，可是还要办，用什么办法？用“以身作则”的办法。他说：“小学不收学费，师范收费减少到一般私立学校之下。改良教法，自己做刻苦的模范，这样来发动教员和学生爱校的情绪，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和人力上物质上的一切帮助。”（徐文107页）由此学校办得很好。1924年长沙女师刚成立，学校困难很多，徐老担任女师校长，并兼任教员和学校工友，每日除白天教课，晚上在煤油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和补习功课外，还要打铃、扫地，十分辛苦。学生和教职员在徐老辛勤教育和克勤克俭精神的感召下，都能不计较物质条件

困难而认真学习和工作，全校洋溢着和谐活跃的气氛，大家都热爱这所学校。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办起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徐老于1941年任院长，由于国民党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种条件都十分困难，生活艰苦，所有党政军民机关都是如此。当时，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自然科学学院也不例外，还缺乏科学仪器设备，谈不上有亮堂的教室。砖头就是凳子，双膝充当课桌，锅烟涂墙就是黑板，鸡毛树枝当笔，树皮当纸。教师3人合住一室，学生8—10人挤在一个窑洞。吃饭很少细粮，小米也不多。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徐老向全院师生讲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要革命，不吃饭当然不行。但我们有远大的革命理想，不是物质的奴隶，而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物质的主人。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是怎样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早日求得民族、阶级的解放。因此，即使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我们也不会被压倒，也绝不消极等待，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条件，克服困难，用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徐老言教身教，身体力行，给全院师生做出了榜样。因为他年近古稀，学校在生活上要尽量照顾他，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总是和师生们生活在一起。他是院长，按规定可以单独住一个窑洞，可是他不住，并且说：“大家住的都很挤，为什么让我一个住呢？”他硬和青年教师三个人睡在一个炕上。晚上办公、学习，他可以单独用一盏灯；但是为节省灯油，一定要三个人共用一盏。他一天除忙于校务外，还要抽出时间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当时，自然科学学院的大部分师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成年，对学院的艰苦生活，开始都有些不习惯，但是，有徐老这样的老院长、老同志作表率，言行一致，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大家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并且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学校办出了成绩。（以上自然科学学院

情况，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3）一书）

联系到我们现在学校的教师，就我耳闻目睹的情况看，一部分大学教辅人员、中年教师、中学教师与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教学负担重，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工资低，很辛苦。教师中间，有不少人能言教身教，以身作则，带动学校教师教好课；带动学生学好功课。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谈不到把言教和身教结合起来。就教书看他们还是好的，但就教人看就比较差，应力求改进。前面已经说过，还有极少数教师不能为人师表，给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 四、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是形容一个好教师风格的最佳语言，千古流传不衰。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第九》）颜渊颂扬孔子有次序的、善于诱导人的高尚品德，并且博他以文，约他以礼。《论语》上孔子自己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第七》）这就是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他自己特有的。毛泽东曾说过：“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然后才能教人，而教人才可能“诲人不倦”。徐特立强调教师要虚心学习，他说：“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徐文257页）而且他主张“无分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样要向他们学习。”（同前）他为了说明学习的重要性，举出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例。为了说明学习旧知识的重要性，又举苏东坡的诗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还引证革命导师马克思“博览群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徐老不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而且授人以如何学习的方法和



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强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说：“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同前495页）“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同前）这是教诲学生的前提。既然师生关系是同志关系，平等关系，那就应当以平等关系、同志关系来对待。因此，徐老主张对学生用说服和感化的办法，即用道理说服，用人格感化的办法，解决学生的缺点和错误，而不主张压服，更不主张处罚。他说：“学生之所以触犯纪律、不道德，有的是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同前355页）有的是是非不分，“自以为合于真理”（同前），故坚持己见。如果单纯地进行惩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同前），“使学生渐成奴性”（同前）；一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同前），“必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同前）因此，“惩戒方法以不用为是。”（同前）徐老倡导的感化教育和说服教育、疏导教育，是要求教师对犯错误的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不宜抱敌对态度。”（同前）使之达到教育之目的；从爱护学生观点出发，送温暖给学生，像慈母般地对待学生，提高其觉悟，达到分清其是非之目的。如此说来，教师对于学生要严格，还是要放任？徐老主张对学生要严格不要严厉，要纪律不要放任。他说：“教师应该严格，不要严厉，严厉是封建的，如体罚等，那是使教师变成了统治者，而学生则变成了被统治者。”（同前495页）而“放松自流，乃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同前）如何反对学生的放松自流，他进一步指出：“用教育批评的方式和他谈话，采取同志的态度帮助他教育他。”（同前）总起来说，徐老的一套教导方法，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循循善诱和诲人不倦的教导法。

徐老自己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典范，也是学而不厌的典范。《孟子》上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这说明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就是圣人。按此标准看，徐老当然是“当今一圣人”。（朱德语）我们从他一生实际活动和人们对他的评价看，确实如此。1925年至1927年，徐老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俗称稻田师范）校长时，就很关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除教课外，还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经常检查学生的伙食，询问她们能不能吃饱。当气候变化时，要她们加减衣服。因此，同学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妈妈和外婆一样，毫无师生的隔阂，同学们感激徐老对她们的关怀，就经常叫他“徐外婆”。慢慢地“徐外婆”这个称号传遍了长沙市。谢觉哉贺徐老七十寿文云：“听到你的许多事实，使我感动很深的，是你的‘徐二外婆’‘徐二叫化’的外号。你对青年男女象外婆对外孙子一样的母爱——纯真而又勇毅的母亲；你把所有及劳动所得，悉数供献于社会，而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子生活；这不是寻常人可能的。”（《当今一圣人》）徐老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对教书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校外反映他什么课都能教，只有音乐不行，因为他缺一个门牙，唱歌漏气。有的教师缺课，不管什么课，他都尽义务代上。因为他学问渊博，不但可以代上，而且教得好，颇受学生欢迎，誉满全市。“他对于教人，是‘孜孜不倦’的，自己兼课很多，真所谓‘席不暇暖’；尤其对于学生的成全，有足述者，有因家庭关系而辍学的，他必尽量开导其父兄，使之继续求学；有因家贫而难继续求学的，求之于先生，他必尽力设法，甚至从自己的薪金中津贴一部分，……实使人最敬爱之。”（杨立山怀念徐文）徐老不光在长沙办学，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到处都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时，依然是这样。他亲自给大家教政治课，作时事政策报告。讲课不仅仅给大家传授知识，并教如何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讲课深入浅出，极为形象，使人一听就懂。当时科学院分住在几个山头，年近古稀的徐老，经常爬山越岭，到各

系、班驻地去讲课，了解学生情况，不怕泞泥，打着赤足去跑。他还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常于夜间辅导他们学习高等数学、哲学、历史等课。他作报告、讲话时，不拿讲义、讲稿，一讲就是几个钟头。但他犹以自己知识不足，一直到他晚年，仍手不释卷。毛泽东称赞他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人。续范亭《寿徐老》诗云：“滔滔不绝如江汉，不贵多言贵实干；唯物理论辩证观，先生早已到彼岸。”（《当今一圣人》）这些对徐老的赞誉，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反映了徐老的实际。

以徐老作榜样，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恐怕许多人比之都有逊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大家苟能忠于职守，为学生服务。孜孜不倦地“善诱”、“诲人”，何患我国的教育搞不好。

李维汉说徐老是“德高望重，一代完人。”由于我对徐老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掌握有限，故不能全面阐述，仅通过这篇短文，做一初步的研究。

# 试析徐特立的教学论

(一九八七年)

徐特立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非常丰富，是一份甚为珍贵的教育财富。特别在教学任务、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方面，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丰富多采。

## 一、论教学任务

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是分不开的。教学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教学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教学任务中都要明显地表达出来。因而阐述教学任务是十分重要的。现就徐特立在有关教学任务中所揭示出的几个方面，概括如下：

1、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徐老很重视的一个教学任务。他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特别是他在这方面的亲身实践很为宝贵。他说：“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育人，教育后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徐特立教育文集》295页，以下简称徐教文）徐老在这里揭示出了教学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教人有知识很重要，不能忽视；但是，教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其重要。教出来的人光有知识，品德不佳，是教育的失败。当然，教出来的人光是品德好，知识很欠缺，也不能说是教育的成功。因此，需要双方兼顾，以品德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徐老为了进一步阐明教书育人的重要意义，以古之“经师”与“人师”之分工为管教管导的不合理来加以说明。他指出：“教师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德，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

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徐特立文集》495页,以下简称徐文)经师和人师制度是行之于古时的,不适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它们的弊病是把教书育人分裂开来,教书不管育人,育人不管教书。徐老认为,我们现在的教师要两种人格合而为一。他说:“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同前)这是非常正确的。他自己是这方面的典范。至于言教身教,更是他的教育、教学实践上的显著特点。

2、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相结合。徐老主张知识、技能兼到。既要教给学生知识,又要教给技能,使学生既深熟知识,又懂技能。

在教知识上,徐老指出教学要重视基本知识的传授。他说:“教育是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教育不要。”(徐特立1946年读书笔记)徐老这里所说的要解决问题的教育,就是要教给学生基本知识,而这基本知识就是能解决问题的知识。他强调说:“我们要用基本知识解放学生的头脑,而统治阶级要用有害的、繁难的东西来困累学生的头脑。”(同前)徐老说的统治阶级,当然是指剥削者的统治阶级。我们不能用反动统治阶级的办法来教育学生。徐老指出:“在学校里的学习,只能够得到基本的知识,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出发点的知识,入门的知识。”(《讲演录》1951年4月11日)因为学校里学习时间有限,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完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能择其要者学习。因为还有个实践问题,光学校教育不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学得更好。因此,徐老指出学校只教给学生基本知识的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加之“科学越发展,人类学习的负担越重,必须很好地精简课程,着重基本知识”,“对于某些具体方面,可以不知,不能不知其要。”(同前1949年12月)再说,不注意教给学生基本知识,学生抓不住基本东西,则害处是很大的。徐老说:“抓不到基本的东西,对于问题把握不定。”(1946年读书笔记)他以看报纸为例,说明没有基本知识就看不清前途。他说:

“看报如没有基本的知识，就会随一时波动而看不见一定的前途。”（同前）

在教技能上。徐特立不但强调对学生基本知识的教育，同时又强调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的教育，并且很重视“做”和“行”。他说：“学生求知，学而不知是没有用到行动里去，没有真知。这是一个负担，所谓书生，即学而不知，乃无用之别名，儒家之流。”（1950年10月7日讲授笔记《谈学习》。转引自吉多智、李国光《徐特立的自然科学教育理论》一文）徐老不是孤立地强调对学生进行技能的教育，而是在强调对学生进行基本知识教育的同时强调技能培养的。他有一句名言：“知识技能兼到，言之即能行之。”（转引自金杰《徐特立的课程论》一文）他不赞成“重知识而轻技能”（同前），也不赞成重技能而轻知识。他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行不通。”（《徐特立文集》251页）因此，徐老主张“学科和术科的亲密合作，脑与手的亲密合作。”（同前413页）亦即“知识技能兼到。”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徐老非常重视培养人的创造性，多次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教育应该强调创造性、革命性。”（徐教文82页）“人之所以高出其他动物，比动物伟大，就在于能够创造条件，改变环境，改变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的奴隶。”（同前270页）1957年当毛泽东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徐老明确指出：“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同前261页）我们常说用革命精神进行工作，按徐老的论述，革命精神就是创造性。他说：“所谓革命精神，就是创造性，要懂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创造，要前进就不能坐着等待，就要去创造。”（同前280页）革命精神就是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也要培养学生的革命性。革命性越强的学生，他们的创造性也就会越强。徐老从正面阐述、强调了创造性的重要意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必

须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他又从反面强调了没有创造性或缺乏创造性的害处，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缺乏创造性就会成为一个“少顽固”，他说：“假设‘少顽固’太多，就是新社会的莫大障碍。”如何发挥青年学生的创造性？按徐老的论述，解放思想是重要的一环。他说：“我们也要进行思想解放，从自以为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思想顽固还不如思想混乱较好，少年老成还不如少年荒唐较好。”

我以为，要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确实需要解放青年的思想，从自以为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然而更重要是要解放教育领导和教师们的思想。因为障碍培养青年学生创造性的，主要是这些人。这些人的思想不解放，一切都谈不到。现实情况如何呢？笔者兹引一段学校工作同志的话：“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指徐老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知何故，……在学校教育中，也未能堂堂正正地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唯书’、‘唯上’、‘听话’、‘驯服’的学生，倒成为值得称赞的对象了。这个恶果，直到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后，人们才感叹地发现，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储备好，动手能力差；纵向深入好，横向综合差；常规设计好，研究开发差；技术工作好，经营管理能力差。”（引自徐厚道《论徐特立关于培养创造性的思想》一文）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还要青年学生自己努力去追求，这就是自己要“立志攻关”，促成创造性。徐老指出：“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徐教文261页）克服困难，就能创造。他说：“要创造就要克服困难。”（同前280页）“不克服困难，就没有创造。”（同前270页）因此，使学生能克服困难，还要学校安排学生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不能让学生长年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徐老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们给青年安排一条轻便的道路，他们只需饭来张嘴，上课就念书，什么也不管，这样我

们会害了青年，会使聪明的人也变成了傻瓜。”（徐文587页）

4、学以致用。学的目的是为了用，教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用。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是为教学而教学。教与学的目的是是一致的。因此，教学就必须有的放矢，教以致用；学习也必须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徐特立非常重视学以致用。他反对学习脱离实际，教学脱离需要。他在谈我国的教育宗旨和任务时说：“在完成任任务上来说，我们是学以致用，不是无的放矢。”（同前371页）要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就必须有的放矢，即依据客观实际需要来教学。不针对实际需要，或笼统地按实际需要教学，都不能达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只能是无的放矢。其结果就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外，为了达到学以致用，徐老还主张“从用中去学。”（同前586页）他说：“古人说‘学以致用’是对的，但还应补充一句，就是‘从用中学’。”（转引自《怀念徐特立同志》一文第85页）总起来讲，徐老既重视学，又重视用，学与用要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完成教学的任务。

## 二、论教学原则

徐特立的教学经验很丰富。他从经验中提炼出了许多宝贵的教学原则，这里揭示如下：

1、思想性与知识性相结合原则。徐老特别强调思想教育与知识教学相结合，知识教学不能离开思想性而单独进行。他指出：“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同前391页）徐老的通过各科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教育，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自己学习的论点，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不赞成从外面灌输，或单纯的说教。他在说明通过各科教学贯彻思想性之后接着就说：“只是不要从外面灌输。”（同前）如何通过各种教学贯彻思想教育？徐老在讲数学与政治思想教育联系时说：“数



学是否受政治与社会支配呢？当然是。譬如数学中的应用问题要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改变。又如我们的炮兵为了应用数学时就可以直接学高深的数学。”（同前507页）徐老这里肯定了数学受政治与社会的支配，并且举例以明之，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把方法放在数学里解决问题，数学是服从政治的。……关于数学的政治问题，我正在写还没写出来。”由此可见，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数学问题，而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徐老明确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生硬的在算学里讲述。”（同前514页）徐老关于数学与政治问题的著作，可惜我们没有看到，十分遗憾。他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改进数学；但是又说：“此乃长期工作，不可过速。”

（同前）把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各科教学中，处理数学问题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处理其他自然科学教学问题，同样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词句，教社会科学也应当如此。

2、理论与实际联系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是教育上的重要原则，也是教学上的重要原则。历史上唯理论派和唯经验论派，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各执一端。而徐特立则以辩证的观点，正确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首先，他（指徐老）一贯强调实践或实际的重要性。如他在对《费尔巴哈论纲》一书的高度评价（共九条）中几乎全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说：‘（一）主观的自动的实践优于客观的坐待事物到来的感觉；（二）污秽犹太人大众性的实践对于人类的认识，优于费尔巴哈高尚人的理论行为；用思维不能解决真理的争论，只有用实践才能证明真理，解决真理的争论；……（六）神秘主义的一切神秘，在人类实践中找到合理的说明……’但同时他也从不轻视理论。他说：‘如果说理论根本就无用，这是严重的错误。问题只是理论的来源及理论是否还生活着的问题；如果理论停止它的生命了，那么理论就要落后于事实。或者成为反动的东西。’‘只要是理论

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或在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无限生命力，这种理论就能在行动前指导行动，在行动后正确的做出行动的总结’。这就指明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即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检验理论。”（引自赵锡成《教学思想辩证法的光辉典范》一文）引文中的话，对理论、对实践的真谛讲得特别深刻。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作了科学的阐述，给教学中执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指明了方向。在教学中如何具体理论联系实际，依据徐老的观点，提出三个方面要津：

（1）要把实践的结果转化为公式。不是为实践而实践，而是要从实践提高到理论，以使用理论再指导实践。因此，徐老虽重视教学实践，但是，他反对教学只停止在实践，停止在对实际材料的罗列上。他说：“我反对教儿童的数学在实物计算时，不把他们计算的结果转化为公式，因为从实物计算转化为公式，则公式具体化了。同时公式是数学中绝对必要的东西，最好使儿童在实物计算中彻底了解数学公式。”（转引自赵锡成《教学思想辩证法的光辉典范》一文）徐老这里所谓的“由实物计算转化为数学公式”，就是由实践提升到理论，不要停止在实践上。要使儿童懂得如何由实践到理论，由具体到抽象。使儿童所学融会贯通，易于了解和掌握，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2）要把所讲知识与学生生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教学要从学生经验或与学生有关联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要从原则出发，使所教知识学生易于接受和了解。徐老指出：“一切高深的理论，中间也有常识的部分，不应该害怕难了解，只要它与学生的生活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徐教文166页）他又指出：“尤其是与学者的生活直接利害关系的地方，不独易于认识，而且能够认识得特别深刻。”（同前167页）他进一步举例说：“常见不识字的木工，也知道两平行线确定一平面，直角三角形的底除斜边，即得斜线的倾斜角

度，就已有三角的基础。初级小学毕业或修业的学生，比之文盲的木工，并不会更难了解高深科学，主要的就是看这种理论是否他们已经在生活中不知不觉的行动着。”（同前166页）由此可见，只要教师的教学得法，能结合学生的实际，从学生所熟知、所亲身的生活，或有利害关系的方面出发教学，再深再难的知识，也能为学生所接受，所理解。

（3）要从与所讲知识有关的实地实物观察入手。徐老说：“教学最好是从实地实物的观察入手。这就要把乡土和学校周围的事物补充到一般的教科书里去，使教科书与学者生活联系起来。”（同前167页）这样就地联系实际的教，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会增加学生爱乡土、爱祖国的品德教育，还会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他又说，把乡土和学校周围事物补充到教材中去的办法，“只要有科学知识的人加以适当的运用，便是最切合实际的教科书，最能收到教学效果的教科书。”（同前）他曾批评旧时代一位中学教师时说：“校园里的蒲公英正开着一片金黄色鲜花，而教室里的教师却在死啃教科书上关于蒲公英的一课，绘图、抄笔记，口讲指画，累得舌敝唇焦，头昏眼花，而学生仍莫明其妙。最后唉声叹气地对学生说：‘可惜本地没有蒲公英供你们观察’。”“象这样毫无实际科学常识的书呆子，如何教得科学？”（同前）这样的脱离实际、毫无实际科学常识的教师，过去有，现在也许不多了，但是教师脱离实际的教，现在恐怕还是不少的。

3、典、显、浅相结合原则。徐特立说：典、显、浅三方面的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传下来的经验。”（徐文498页）“原来的意思，也是对教初学的人说的。”（同前497页）经过徐老多年教育工作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概括，丰富了典、显、浅的内容，赋予了时代的意义。他把它称之为大众化的一般教学方法。

典。徐老指出：“典就是有根据的东西，即是有事实根据的

东西。如有时我们喊‘典故’，‘典故’是过去的事实。如喊典型，典型的東西也是一个事实。如喊法典，法典是个规律。解决问题，要有根据，有根据的，是唯物主义的，没有根据，则是唯心主义的。有根据有事实的东西，大众容易懂，也就容易大众化。”

（同前）徐老对典的解释，深刻而又具体，使人看了很明白，也易于执行。典是有根据的事物，教师讲课要根据事实来阐明，不能故弄玄虚。水有源，树有根。教师讲典，要讲出来龙去脉。这样的教学，学生容易接受，会收良好的效果。

显。徐老指出：“所谓显，就是教的东西要是明显的，大众周知的，大众经常遇到的，普遍存在的，显著的。凡是明显的东西，是不待研究、不待分析就清楚的东西，眼一看耳一听就能明了理解的东西。”（同前）徐老对显的释义，再通俗不过了。也就是说：他要求教师讲的知识要“五的”。一是明显的，二是大众周知的，三是大众经常遇到的，四是普遍存在的，五是显著的。按“五的”教学，未有不成功。

浅。徐老指出：“我们之所谓浅，不是肤浅之浅，不是停止在常识方面，而是由浅入深，由常识到科学。”（同前）由此可知，徐老的观点是从浅起步，不停止在浅上，不停止在常识上，而是要把“浅”、“常识”作为起点，由“浅”、“常识”到深，到科学。他进一步阐述说：“由浅入深，由粗入细，由近到远，由感性到理性。”（同前）“是大众能够接受的。”（同前）如果停止在“浅”，停止在“常识”上，就失去了教学的意义，就会使学生厌烦而打瞌睡。正如徐老所说：“假如长期停止在常识方面，则会使学生不感兴趣。”（同前）徐老进而阐述道：“科学不是浅的东西，那么学科学起初就不能从‘科学’出发，而是要从常识出发，从原始的东西出发，因为从科学出发就深了，”学者不容易接受，因此，必须从常识出发，“把常识科学化。”

（同前）但是，他反对“一切无基础知识的跳跃。”总起来说，

徐老之所谓浅，是从浅开始，不停止在浅。要进，但不能突进。就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学不躐等”。

总之，徐老赋予新内容的典、显、浅的教学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教师如能遵循此原则教学，一定会收到最佳的效果。当然，我们不应当停止在徐老的基础上，而应当继续研究，发扬光大。要发扬光大，还需要在我们的教学中反复实践，以便取得新的经验，进一步总结和创新。

4、对象化原则。对象化，就是教学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徐老把这种教学称之为大众化，也就是适合大众的意思。他说：“所谓科学大众化，不仅是量的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必须适合大众的要求和接受的程度。”（同前384、385页）这就是说，大众化的教学，要适合大众的要求和接受能力。大家要求什么就讲什么，大众不需要的或已知的，教师就不要讲，或不要多讲，否则，就收不到应得的效果。对象接受程度如何，对教学亦很重要。所谓程度，就是指对象已具有的文化水平。教师讲课要适合对象的文化水平，超过或不及对象的文化程度，就不能引起对象的兴趣，同样不能收到良好效果。对象的经验如何，对于施教也极为重要。即有无符合教学内容的经验，对于教学的成功与否也有重要意义。教师应当针对学生这些情况，进行教学。徐老早年就指出：“教授儿童读本中的政治课，只能教具体的事实，而事实要是儿童政治生活中包含着的，并且要当着政治生活需要时讲授。如果某种政治问题是儿童经常遇着的，有他的经验基础，那么，教授不必拘定在政治活动需要的时间。”（《苏区资料》（五）7页）在适合对象化的教学上，徐老还指出学者的年龄和学历问题，他说：“教与学都要适合当时……受教育者个人年龄与学历的情况。”（徐文410页）这样做，就使教学的对象化更加具体化。教师教学，要根据学者年龄的特征和学历的特点进行。一般教育学，大都重视学生的年龄、心理、生理发展状

况在教学上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提出对象的学历，特别是对对象的经验在教学上的重要性。而徐老强调了这些方面，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5、以简驭繁原则。徐特立很重视以简驭繁传授知识的原则。提倡“掌握以简驭繁的基本原理”，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对只教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强调给学生丰富的知识，不问目的，不讲效果，弄得学生负担很重，不能掌握以简驭繁的基本原理，不能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同前593页）如何才能做到以简驭繁，徐老提倡给学生教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基本原则，达到以简驭繁的目的。他说：“我们要分别基本知识，充足知识和常识，分别原则和技术，了解基本知识了解原则才能以简驭繁。”（同前391、398页）要达到此目的，还需要教给学生“各种工作很必需的知识，普通的必要的基本知识。”

（同前594页）但是，他反对教给学生繁琐的知识。他说：给学生“所谓普通的必要的基本知识，不是繁琐的知识，而是对于从事各种工作都很必需的以简驭繁的知识。”（同前）徐老进一步明确指出：要能得到以简驭繁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还必须注意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树立这种世界观，还是不能很好地达到以简驭繁的目的。他说：“在学习普通知识当中，要特别注意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方向。不树立这种世界观，这种方向，就不能得到以简驭繁的基本知识，不能真正形成系统知识。”（同前）徐老以马克思写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与列宁写社会主义形式为例，说明以简驭繁的作法和好处。他说：“马克思在《哲学之贫困》中写到‘手推的磨子，给我们以封建主的社会；蒸汽力的磨，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同前402页）又说：“列宁写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只写苏维埃加电气化。”（同前）比喻贴切，寓意很深，浅显易懂。徐老自己教学经验丰富，以简驭繁是他教学经验的科学总

结。他是以简驭繁传授科学知识，传授高深理论的典范。他的以简驭繁的教学原则极为宝贵。我们看到的《教育学》，很少触及到这一重要原则，大有宣传、继承和发扬的必要。

6、批判性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三大作风之一。在一切工作上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推动工作前进。徐特立高度重视批判性原则在教学以及师生之间的运用。他说：“在教学中不要不受学生的批评，要好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同前514页）这是在教学上贯彻民主的主张，值得高度重视。又说：“批判的工作，就是教学中的实践工作。”（同前501页）我认为这个实践在教学上很重要。徐老主张在思想教育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学生达到高度自觉的认识客观。他说：“通过他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高度的自觉和对于客观的认识。”

（同前391页）通过学生自己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教育自己，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学校教育中，长期使用思想教育办法，多是注重注入的灌输的办法，很少采用民主的办法、讨论的办法进行。因而思想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徐老还主张在读书中的批判，反对把作文和读书机械的分开。他说：“在读书中进行批判也等于作文的工作。我们不要把作文和读书机械的分开来，一切读书都要加上创造批判的工作。”（同前501页）徐老说读书批判等于作文，这有很深的道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特别强调师生对于课本的批判，认为这是教学上极为重要的一环。他说：“使学者能够进行对教科书的批判，给以删削与补充。这种教法，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采用，因为它恰好给教者和学者提供了共同批判的资料。从反面启发了智慧的源泉。”

（同前414页）徐老又说：“课本纵令有许多种，其中不合目的、不合内容的，按标准增减修改，师生共同加以讨论，加以批判，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以从批判中得到活的知识。”（同前416页）由此可见，徐老对师生共同批判教科书而获益处的重视。徐

老还特别重视教育实习上的批判和互相批判。他说：“教育方法常与其他科学方法一样，未到工作岗位前要经过实习。实习就是到实际工作中去工作，它与到社会中去工作不同的就是有教师作指导和实习批评。”（同前409页）徐老接着指出其好处是，“这种批评能够把书上得来的教条主义加以改变。”（同前）没有这种批评的坏处是，“教育上没有这种批评，过去教的东西那就经过长期的工作摸索，才能了解，所以实习批评就可把摸索的时间缩短，把工作效能提高。”（同前）因此他强调指出，不作实习批评，就不要教教育课。他说：“我一生搞教育，办师范学校，不到实习批评不教教育课。”（同前410页）总的讲起来，徐老主张的教学批判性原则，是高度民主的教学原则，其总的目的是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养成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同前），“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同前391页），“从反面启发了智慧的源泉。”而不进行教学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徐老加重语气的说：“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法，则无须乎谈教育。害怕批评的教育家，就是最好和他少接近，或者根本取消马克思主义去投降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好了。”（同前410页）因此，为了很好地在教学上特别是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能力上，“更应广泛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与批评的作风。”（同前）

7、教学相长原则。徐特立很重视教学相长，主要在教与学和师与生的关系上使用这一原则。“教学相长”，这是《礼记·学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教学上，古今多缘用。其原意，《学记》是这样记载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兑命》曰‘教学半’其此之谓乎。”“对这段话的理解曾有分歧，有的认



为是专指教师而言，教中遇到困惑之处，才感到学识不足，更加努力进修、提高。也有的认为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说的，教师教学生，学生也可以促进教师提高。从原文看，恐怕是前一种理解较合原意，后一种理解属引伸的意思。”（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对“教学相长”原意的理解，我赞同《简明中国教育史》作者的看法。因为理解不同，在作法上也就有异。不过，我认为前一种理解也好，后一种理解也好，在教学过程中，两种都可行之于教师自己或师生之间，不要偏废。因为两种同时并用，对于教师自己和师生双方都有益处。徐特立也使用教学相长这句话，他主要是在师生关系上说的。他说：“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或‘教学相长。’”（同前495页）徐老释“教学半”是：“教者学者各负一半责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所谓教师本位或学生本位之对立。”（同前）他进而又论述了“教学相长”的要义和好处。他说：“教学相长，在教和学的当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同前）不但如此，实际上他无论在自己的教和学上，或者在他和学生的关系上，都是贯彻教学相长的典范，创造性地发挥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今我国的学校，在贯彻教学相长这一原则上问题还很多。我以为在当前教学改革中，要继承和发扬教学相长这一宝贵遗产。

### 三、论教学方法

徐特立对于教学方法有精深的研究，出人的见解，特别是对于各科教学法有很高的造诣。可惜我们看到他的原著很少。现在就他对几种教学法、教学方式的评论和否定与肯定，以及他对语文教学法的论述，作扼要的阐述。

1、对几种教学法、教学方式的评论和否定与肯定。徐老指出：“一切方法都是被本质决定的，所以不同的本质就被不同的方法所表现。”（同前407页）那么，资产阶级的各种教学方法，“虽然

在教育上是不同的方法的表现，实际上这些方法只是它自己不同的本质被表现。”（同前408页）徐老所论述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是指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自学辅导式及启发式等。他具体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教学方法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反映，以及它们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他说：“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有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自学辅导式及启发式等等。这些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它否定了封建的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并淘汰了注入式，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活本位主义。这些转变，不能否认它的进步性，但只是资产阶级有限的民主主义在教育上的反映，所以它们虽从教师本位转到学生本位，却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同前）徐老对以上几种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的评论，非常公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指出它的进步性，又指出它的局限性，这是徐老对于资产阶级教学方法总的评述。他进一步对这几种方法分别作了更具体的评论。在评论这些方法之前，他首先对于封建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作了评述。对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压后也作了评介。

注入式。徐特立认为注入式是封建的。他对于注入式的涵义首先解释说：“注入式就是先生讲，学生听。就是不与学生商量，强迫学生接受，把学生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也照着书去灌输，不管学生听不听，是照样的念下去，这是片面的东西，是封建的旧式的教学方式。”（同前498页）但是，徐老并没有全面否定它，而是以辩证的观点，对它又有肯定。他说：“但是我们还不是在一切场合否定注入式。”（同前）在哪些场合不否定注入式？他举例说：“比如技术课程，在动手时，是要教师示范，这种示范就是注入式的。又如学习一个没有经过特殊的历史问题，那就要先做报告，然后再讨论，这种报告就是注入式的。”（同前）由此可见，注入式的教学法虽是封建的，但还是有用处的，不能完全抛弃。实际上现在使用注入式教学的，还是相当普遍的。这

就说明，教学还是离不开它的。但是，有些教育学中总是否定注入式，徐老认为这是不对的“在一般课本上总是否定注入式，在实习过程中发现有不少的问题是非用注入式不可的。”（同前409页）

启发式。徐老说：“启发式，一般的解释为问答式，先生问，学生答。”他进而批评说：“这也是旧式的东西，因为这种方式还是以先生为主体去启发，而不是学生奋发。”（同前498页）这就是说，启发式的方法还是以教师为本位的，这就是它的毛病的所在。但是，怎样的方法才好呢？徐老说：“我们是要学生很热情，造成学生热情的学习环境，要学生自动，这样的方法才是好的。”（同前）徐老仍没有笼统地否定启发式，他用辩证的观点对启发式作了科学的评价。他说：“启发式我们不能绝对否认，有时先生要启发学生一些东西，以造成学生学习的热情，使学生自动，这样的启发还是必要的。”（同前）

自学辅导法。徐老指出自学辅导法的特点“即学生本位主义，教师是被动的，不是领导的。”（同前）他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同前）徐老在指出自学辅导法的特点和它产生的政治背景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缺点“教员不要计划，不要组织和设备。教师不搞这些东西，这样，教员就变成了尾巴主义。”（同前）但是，徐老对于自学辅导法，也没有全面地否定它，仍是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地评价它。他主要赞成学生在自学辅导中自修，而否定教师在其中的不负责任，不作领导的毛病。他说：我的这些说法，“并不是否认学生自修，而是反对教师不负责，不加强领导。”（同前）

设计教学法。关于设计教学法的特点徐特立指出：“设计教学法，就是拿一个具体问题，用设计来解决。在设计中，需要哪一种知识，需要哪一种科学，就教哪一种知识，教哪一种科学。”（同前）徐老在指出设计教学法的特点之后，又客观地指出了它的缺点：“这样教科学就变成了手工业方式，就是不要科学系统，

把科学系统全部打乱，这是妨碍科学的进步的，这样点滴的做，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同前498—499页）徐老对于设计教学法，采取了批判的否定与肯定。也就是说，他反对用设计来作为教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反对在学校里应用设计，认为学校用设计还是必需的。他说：“学校里有些什么问题，有时是可以设计的，比如我们布置一个会场要设计，出一个壁报，也要设计。这就是把科学运用到实际方面去，而不是用设计来作为教科学的方法。反对设计教学法，如果连一切实际应用的设计都反对，那是不对的，否定了一个问题，但不能在一切地方都加以否定。”

（同前499页）如果把学生送到社会实际中去设计，是联系了社会实际的设计，这是必须的；而在学校教学中设计，则是脱离社会实际的，是不对的。他说：“设计教学法不是实际社会工作的设计，不是把学生送到社会去进行设计，而是把假定的社会移到学校中来进行设计，这种设计，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同前409页）

道尔顿制。徐特立指出，道尔顿制是一般研究工作的方法，大学的研究方法。它的特点是“先生出题目，学生去研究，如按学分来学习的方法等。这种方法有时把问题一个一个单独去学习，这本来是一般研究工作的方法。”（同前499页）“是自动的学习。”（同前408页）“是……大学的研究方法。”（同前499页）从徐老指出道尔顿制的特点来看，它是研究的方法，它的好处是自动的学习，适用于大学的学习方法。这是肯定。但是，徐老也有否定。他说：“道尔顿制，这是在小学中搬用大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用在大众教育中是很不相宜的。”（同前）道尔顿制在学校使用，缺乏社会经济联系，若只限于自然科学方面，是用之不当。徐老说：“拘束在学校的学习，其工作拘束在研究室和实验室；附属在学校内的工场和农场，只限于自然科学一面的实验和实习，不是社会生产的工场和农场，缺乏经济的联系。”

(同前408页)由此可见,徐老对于道尔顿制本身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也还是肯定的;只是对道尔顿制使用不当,提出了异议和批评,我认为是公道的。

实物教学,也叫直观教学,也有叫演示法的。徐特立指出:“实物教学,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方法。”因为“提倡实物教学的人,容易否定文字、符号、公式的重要性,但是否定了这些东西,就不能进到科学。”(同前499页)教学的目的,就是要由认识实物而进到科学;由常识进到理论。而停止在实物,或停止在常识,教学就没有达到目的。科学是带有抽象性的,依靠抽象力才能达到,而不借助文字、符号、公式,是不成功的。徐老举了两个例子以说明运用文字、符号、公式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的价值说,乃是看不见,闻不到的东西,那只有靠抽象力。”又说:“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没有公式、符号是不成功的。”(同前)但是,徐老并没有否定实物教学的必要性,而只是不同意用实物教学否定在教学时运用文字、符号、公式的重要性。徐老提出实物教学的七条办法,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教学工程。他说:“关于实物教学,我举出下列的一系列的方法:(1)是用语言文字作工具;(2)把语言文字加以具体化,那就是由语言文字到图画;(3)再到模型;(4)再到标本;(5)再到实物;(6)到实物产地,叫做实地。”(同前)说到这里,徐老对于教学到产地考察的重要性作了说明。他说:“因为实物不过是脱离了它的产地的实物,它是加了人工保护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停止在实物教学,则对于实物产生的实际环境就不会了解。…所以实物不如实地。”(同前)接着徐老又提出第七个办法。他说:“(7)从实地来改造这个实物,这就变成了实习,要彻底的了解,必须达到最后的实践—实习,学习才算完成。”(同前)由此看来,徐老把实物教学必须走的过程,有系统地拖了出来。与其说是七条办法,无宁说是实物教学的不可

分割的七个环节。这是徐老对于实物教学的发展和创新。

最后徐特立说：“所有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移植到中国革命的土地上来，当然会起质的变化，也需要随着革命的条件起质的变化。”（同前409页）我以为资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移植在我国土地上要起质的变化，徐老已经给我们开创了道路。问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能很好地加以研究、继承和发扬。

3. 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方法，徐特立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革命的方法，应当使用它。徐老对于教学做合一方法的含义做了说明。他说：“陶行知把知和行看成是由这一个转变为另一个，就是行知合一论。教和学是要把准备做的事弄个明白，没末教学就是知，做就是行。教学做合一也就是知行合一，于是有教学做合一论。”（同前350页）徐老在说明含义之后，对它又作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可以断言教育的本质和方法是受同一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式决定的。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无疑义的是中国革命条件下的产物。陶先生主要的方法一教、学、做合一，是革命的方法，是以群众为学生即以群众为教师的方式。”（同前408页）徐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训练干部的几个要点》中提出：“要用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同前146页）

2. 对“国文教授之研究”。国文教授之研究，是徐特立的各科教学法成果之一。这是徐老早期的研究成果。其他各科教学法的成果，我没有看到，因此，现只能据他“国文教授之研究”作扼要的阐述。

（1）国文教授之要旨。对于这个问题，徐老提出四点：第一，知普通的语言。他说：“欲求言文一致，当统一读音，及事物之名称。”徐老主张言文一致，事物的名和实应当沟通，欲达此目的，首先应当统一读音。第二，知日常的文字文章。他说：“文字即形声训诂，文章即文法修辞法。”徐老主张小学的文字文章

以日常生活为限，不宜“过雅过俗”。文章要用字精当，组织有序，故须重视文法。他说：“用字虽精当，而语句篇章之组织失序，亦不足以达意，故文法尚焉。”文章有言情述理以及各种体裁之别，因此，必须注重修辞法。他说：“文章意义有言情述理之殊，组织有骈文、散文之别，与世酬答，亦随地异体，故修辞法尚焉。”第三，养成表彰正确思想的能力。他说：“学问至能发表，则实有诸己，旁通触类，左宜右有，运用不穷。”徐老主张读书要做劄记，记所得著所疑。他说：“绩学之士，读书必有劄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矣。”徐老称赞读书寓于著述之中的方法。他说：“近人读书多寓于著述中，往往取古人书补之、广之、续之，或辑其佚说，或求其义例，故著一书而群书皆通。”徐老赞扬读书寓于著述之中的论点，非常宝贵。确实是“著一书而群书皆通”。至于小学生读书著述，当然不能与绩学之士相比；但是，简单的集字联句等总是可以做到的。徐老说：“小学生徒虽读书无几，不能言著述，然集字集句可也。”“长篇表记，短篇引申可也。”“口之所言，以笔书之可也。”所有这些，均是养成表彰思想能力的方法。然而，不仅如此。“讲书、属文、写字之类，皆发表之事。”都是养成思想能力的好方法。第四，启发其德智。徐老主张小学国文的教学目的，应当是有补于儿童身心的日常使用，并且内容既要有文字的教授，又要有义理的教授。二者不能缺一。他说：“小学国文，以有补于身心日用为要。凡实业、家事、法制、经济、及古人嘉言懿行，皆当附于国文教授，且文不附义理教授，则智识只得文字一部分而失之偏。”这就是说，徐老注重智德并重的小学国文教学。他进一步指出：“盖离训话义理而言文章，必流于浮滑滥调，或芜杂不精确。”这就是说，文章贵乎载道。

(2) 教材选择的标准。徐特立对此问题，提出两个方面：

第一，形式，分字体、成语和文体。对字体，他说：“字体，分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因为文章的内容不同，所以分别使用正、通、俗三体。成语，他说：“成语：辞以达意，杜撰则难期共喻，故成语尚焉。”徐老分出成语的用法有五类：俗语：“言文一致，……演说词及白话小说用之，小学教科书不宜采入。”平语：“无俗语之陋，绮语之夸，科学叙述及书札笺疏类用之。”术语：“意义含有一定条件，为各学科专有之语，……小学教科书可选用。”绮语：“意义蕴藉或新奇，读之有余味者。诗歌等文用之，小学教科书选用宜极少。”略语：“省略修饰语，仅存表属性之简形者。”古书中如士大夫省略为士夫，今之簿记表册多用之，小学教科书当不宜采用。文体，徐老分为五种：即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和日用文。对这五种文体的基本含义，他也作了简洁的说明。“记事文：记述天然物、人工物之大小多寡位置形色等静的状态之文，初学年多用此体。”“叙事文：记述事务经历之文；传记、历史、小说、日记等属之。”“说明文：解释事理之文，如科学之讲义，经史之传注，……初等三年以后，适用此体。”“议论文：对于命题，主张自己之意见，立证以实之之文，高等科可选用。”“日用文：契约、书牒……属于应用文，初等科三年级以后，适用此体。”第二内容，徐老分为三类：以教训为主者，以知识为主者和以趣味为主者。以教训为主者，他说“关于修身的材料：由童话传说进于抽象教训，出之以有趣味之文，使之于不知不识间而被陶冶。”“国民性养成材料：如童话之类，多选本国固有者。”以知识为主者，徐老说“关于历史材料：国民传说及代表各时代之人物事项及著名之遗物。”“关于地理的材料：山川城市乡村……之通名，及都会交通……之主要者。”“关于理科的材料：天然物，……简单器械，人身生理等极普通而直接关系生活者，但不可以用普通说明法，致流于干燥。”还有关于实业材料和关于国民材料等，不再多举。以趣味为主者，徐老说“文字的材料：诗歌及其他有辞采之文。”“兴味之



材料：童话及隐谜等趣味丰富不失教育本旨者。”

(3) 读法。徐特立在读法部分中详叙了直观教授、字句解释、义理说明法、诵读法、文法教授和修辞教授六个问题。

第一，直观教授。徐老说，要“教授生徒熟知之事物。”教授要达到的目的，是“以醒觉其注意，发动其觉官，练习其思考及言语，使形式、实质，并收实效。”直观教授又分教材和教法。教材要选用生徒充分直观之物，“编为有系统之目录，使前后联络，但程度不可太深，须授以极普通之点。”教法要先搜辑实物标本图画，继则进行教学。“初观察全体概要，授以名称；次指摘要点，详细观察；次结合以言语，以便记忆。”

第二，字句解释。字句解释徐老分八法，即换言法、举例法、比喻法、直观法、溯源法、分解法、比较法和定义法。他指出：“换言法：换以同一意义生徒已知之语句。”如人的名号互易，草木鸟兽的异名等，“皆比义也”；“举例法：抽象字句；引证以释之，谓之举例法。”“如释果以桃、梨为例”等，“盖解释义意，不可向壁虚造也”；“比喻法，以类似之物解释之，谓之比喻法。”凡是不常见的事物，不容易知道的，用此法释之；“直观法：以实物标本图画解释之也”；“溯源法：说明事物文字之来历、典故，谓之溯源法。”说明事物，不能不溯源，不能望文生义。“不溯源而望文生义则承伪袭误不可究诘。”在溯源方面，徐老又指出两种：字形溯源和字音溯源。字形溯源有单体、合体之分。字音为双声迭韵之总名；“分解法：凡解释成语，宜先分解而后总释。”但是“事物名称多有不可分解者，不可强分致蹈支离之弊”；“比较法：以特征相比较解释之法。解释疑似语句及类似事物，或同类中区别种类皆用此法”；“定义法：举属性解释之之法。”

第三，义理说明法。义理说明法，又分作两法：器械的说明和应用的说明。徐老指出：器械说明有直解和意解。直解，以口

语逐字逐句叙述其形式；意解，不顾读本的顺序和字句，但述其内容大意。又指出：应用说明，如“甲引申原文意义之说明，为说明格言、条约等简洁文之法。予以类似事实发表本题，使意义充实。”“丑反对题旨，自述意见。”

第四，诵读法。诵读法分默读法和音读法。徐老指出，“默读法：以自己之理解为目的，按教师指示范围。”指示要点是：“文章大意之探索。发见新出文字及语句，摘记一段或全篇之要项。”又指出：“音读法：谋自己及他人双方之理解，其种类如左”：机械诵读，逐字逐句读之，以理解字音为目的；理解读法，句读正确，意义明了，以理解意义为目的；审美诵读：分抑扬缓急，以促感情奋兴为目的；范读，教师或优等生示范，适用于困难文句及低年生；齐读：全级齐读，使多数生徒活动；轮谈，各组轮谈；个谈，便于矫正误点。

第五，文法教授。文法教授分附带的教授、特别教授、教授之程度、词性教授要项和文章教授五点。附带的教授，“于读法缀法，随时说明文章之成分及辞性，不必预定一文法上系统教授之”；特别教授，“以特定之时间，授以语法上系统的智识”；教授之程度，“初等科附带教授，高等科特别教授”；词性教授要项，“品词之名称、定义、分类及识别练习”；文章教授，“授主语、宾语、说明语、补足语、修饰语等大体之意义。”

第六，修辞教授。修辞教授分命意、布局、用笔和遣词四个方面。命意者，“对于事物之意见，为取材、布局、遣辞之标准。”徐老引证《文赋》说：“意不称物，非支离即挂漏，不能得物之真相”，故命意尚薄。命意分主意和宾意。主意，“分解事物、探索要义，以我之所主张定与夺。事写其独到处，物状其独异处。”宾意，引征故事，以相反者二事对举，“盖单举一事，则似偶合；对举二事，则证辩之力厚。”“是非曲直，皆相对的非绝对的，故叙事防挂漏，论事防偏见，论人防以一眚掩大德，故引

事须反正对举，论人须功罪对举，论事须是非对举，须并合诸有关系事项旁证，由罪中寻出功，由恶中寻出善，由现在之是补出未来过去之不必然，由甲处之非补乙、丙、丁处之不尽然，则是非曲直成为相对的，语语持平，不致招反对者之驳诘矣”。布局者，“立一篇铺叙次第，如前之提伏中之关锁，后之结应及散整间行寄正错出等，皆谓之布局。”“日本小学教授文章布局，有进步、散列、前括、后括、两括五者。”“文章结构分起承转合，起揭一篇大意，承则引证铺叙，转则转到本意，合则收束全篇或全段。”依此作文之利弊是：“初学区别段落，便于揣摩，用意颇善，惟承其流者，遂专以此教授生徒，于训诂义理绝不研究，致使生徒选字造句无一精当者，敷衍成篇，语皆浮泛”。用笔者，“用笔之法，一曰偶以厚势，一曰奇以行气。”“偶之种类有三：第一曰迭句，……第二曰递句，……首句之末，即次句之首，以相同之语句相递者；……第三曰对句，对句者以相反之句夹写，……以高对深，以大对小……。”“奇之种类有三：第一曰撇笔、顺笔、转笔，凡意义变换必用此笔以醒之；第二曰收笔，凡解释前文或总括前文，使不为歇后语，使文气不散漫必用此笔；第三曰起笔及提笔，以一二语说明大意，以为后发挥之根据须用此笔，但文贵引事据理直起挺接，不可有起笔提笔之痕迹。”遣词，遣词之要者有三：精确、婉曲、美丽。精确者，“精则无重复错杂之弊”，尝见时文有述事项纷杂者，曰头绪纷繁，曰千端万绪，曰端绪茫然，强分三条，实止一意，此重复之弊也。婉曲者，“君子心存谦牧，不为溢美、溢恶之言，而有回护原情，自责商榷等口吻。”美丽，分博喻、夸饰、奇警和重义。博喻分虚实、类似、异语。虚实是“以具体名词代抽象名词；凡虚字实用，皆属此类。”类似是“动词形容词皆借类似者相比况。”异语是“以常语易雅语，……但不可用废弃于时之语。”夸饰是“言过于事物之实际。”奇警，“探原立论，见解异于常人者曰奇警。”

但是，文不能出于常情之外，重义，“一语含二以上之意义。”

（以上引语，均见徐老《国文教授之研究》一文）

徐老之《国文教授之研究》并未写完，非常可惜。我的阐述，也只好到此为止。徐老对教学法深有研究，仅从对各派教学法之评论以及对国文教授之研究来看，已足称之为“一家之言”。

# 徐特立的课程与教材论初探

(一九八七年)

徐特立对于课程、科目、教材和课本使用，曾作过详尽的论述，是他一生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深刻的总结。下面从他论述到的几个主要方面，试作阐述。

## 一、论课程和科目

徐特立认为，课程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要以三个原则作标准制订课程。这三个原则是：“教与学都要适合当时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个人年龄与学历的情况，以及时间不浪费，思想不混乱。”（《徐特立文集》410页，以下简称徐文）徐老说的三个原则标准，实际包括五个内容。依此三者或五个内容，把教学的科目和进程制订为课程。徐老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学进程中，教学科目的划分犹如树木枝叶的生长状况。他说：“由主干而粗枝，而细枝，而群叶，而群脉。”（同上，411页）这就是说，由于各类学校教学要求的不同，所以就要由不分科到分科、到再分科。按照徐老的具体说法：“不分科的普通常识是教学的出发点。对于最初受教育的人，是要把它各方面的原始经验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科学常识，然后在这一科学常识的基础上，逐渐分化为若干必修的科目和随意的科目；至于科目之最细密，最高度的分化，那就是专门学校和大学的课程了。”（同前）依据教学科目划分的发展状况，徐老提出由小学到大学五种科目具体的分类：“一、不分科的百科全书课。初级小学一年级有这种办法。曾见之于德国和法国。二、小学分为自然、社会及劳作等三个科目。曾见之于苏联小学校。三、初级小学以修身、国语、算术、体操为必修科目，自然和社会包含在国语内，唱歌、图画、手工列入随意科目中，曾见之于日本小学校。

四、中等学校也有并数科为一科的办法，如混合数学及博物、理、化等数科的办法。五、中等以上的学校，都是以一科分为若干专科。”（同前）根据这个教学科目的划分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由合到分的分科法。徐老指出，这是人为的分科法，可以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无不变的分科法，但也有一定的分科道理，不是胡乱凑合的。他说：“事物的发展，一般的是由统一向分裂和分化转化；自然的规律与历史的规律（即人为的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这里看出没有固定不变的分科法，也不无规律的、绝对分自由的科法；并且两个极端的分科中也有中间事物作媒介。”（同前）徐老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出：“科学分类，是为着专门化，以便于研究，越专门就越细分。至于开始学习的学生就不能孤立的攻击一点，而是从全面的联系去了解一点。但目的不是全面的。”（同前，416页）至于托儿所和幼稚园，则是“最低的一个步骤，只是生活中必须的活动”，“并不教科学和文学，但日常生活就是课程。”（同前，411、412页）这就是说，初学者的学科，以联系学习为宜，不必分科。托儿所、幼稚园的生活就是它的课程。而初学以上者，就应当逐渐分科目了。徐老这里讲幼稚园不教科学和文学的观点，今天来讲，似不适宜。

按照徐老的论述，教与学还有学科与术科伴随发展和互相帮助的问题。因此，在课程制订上要妥为安排。他说：“一切生活，一切行动，不停止在当然上，而需要了解其所以然。一切知识和技术，都要通过脑的分析和集体的讨论，并经过手的试行，得到一定效果。这就是学科和术科的亲密合作，脑与手的亲密合作。”

（同前，413页）因此，徐老反对学科和术科分离，反对只向单方面发展。他说：“只向一方面发展，造成半身不遂的、畸形发展的国民。一切畸形发展，就会失掉发展的可能性。”（同前）至于学科和术科的合理安排，分量多寡，何者为主，这要看学校的性质来定。他指出：“各种不同的学校，都有它的一定教学任务。”

如技工学校应以术科为主，学科应该只作术科的说明；普通学校以学科为主，术科只作学科有力的助手。至于哲理，只应该替学科服务，不是为学哲学而学哲学；只有大学校，哲理才有独立的地位。”（同前）徐老很重视手、脑并用，做与学的统一。在学科与术科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强调这一点的。

在课程安排的问题上，徐老还指明了常识转化为科学的问题。教学就是要把常识转化为初步的科学，不能停止在原始的常识上，若如此，就失去了教学的意义了。他说：“纯从劳动中所得的知识，只是常识。所谓教与学，就是要把常识转化为初步的科学，即对于第一本质的认识、第一形态和第一运动的认识及不甚精确的数量认识，个别的分析与原始的综合都是必要的。停止在原始的常识，就没有教学的意义了。”（同前，412页）但是，徐老又指出：不能越过初步的科学而“一跃到严密的科学，就会脱离学者的生活太远了，成为幻想，成为一种不能透过脑来分析、透过手来实现的科学。”（同前）离开学者生活范围太远的科学，当然是科学。但是，这是高深的科学，没有经过学者脑子的分析，又没有经过学者之手的操作。高深科学虽然是科学，然而，学者消化不了，也就没有教学的意义了。因此，徐老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口号是：不害怕科学难了解，而停止在常识上；也不离开常识，跳跃到科学领域；只是紧靠着常识，利用常识，转化为科学，反对一切无基本知识的跳跃。”（同前）

## 二、论教材编写与课本的活用

徐老对编写教材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对课本的使用，有精采的论述。

1. 教材编写。徐特立领导编写教材和亲自动笔编写教材颇多。因而他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这里就他的编写原则和编写方法，扼要地加以阐述。

编写原则。（1）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相结合的原则。1948

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写了一套小学国语课本，送请徐特立审阅，他指出课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知识全面性与计划性不够，这是自辛亥以来国语教科书的通病，我们要克服这种弊病。他说：“各册相互之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决定。”

（同前365页）徐老这种编写教材的主张是一贯的，他早年就是这样主张的。1933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在一本编印的小学语文教材上指出，课本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分别。（引自金杰《徐特立的课程论》一文）（2）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原则。徐老对学生既重视思想教育，又重视知识教育，两者要紧密结合，其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说：“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种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同前391页）他又说：“从年纪极小的儿童起，就开始指示给他们自然现象的起源”，“就使儿童自己去观察植物、昆虫、鸟类等等发生和发展的演变，以正确的认识事物与现象相互之联系，推演出简单的规律性。”（同前）这样做，就在小学“各等级的国语、自然、地理、算术等课程中”，“已经打下了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同前）这就是说，在各门课程中，换言之也就是在各科教材中，既要贯彻各类科学知识，又要贯彻政治理论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唯物世界观。为了丰富知识内容和思想内容，使知识性和思想性广深的结合起来，徐老进一步指出：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点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象百科全书；从简到繁，体现认识规律；内容丰富，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注重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



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转引自金杰《徐特立的课程论》一文）思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编写教材的原则，也是徐老的一贯主张，在苏维埃时代他就是这样做的。在江西苏区时，“除详细规定儿童必须的基本知识的课程外，一切课本都要采取实际教材。”（同前）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第四章科目规定：“前三年的科目为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但国语的课目中要包括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等；游艺也须与国语、算术及政治、劳动教育有密切联系。”（同前）这就是说，政治思想要寓于各种课程和教材中。（3）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相结合原则。徐特立主张“知识技能兼到，言之即能行之”，不赞成“重知识轻技能”，也不赞成重技能而轻知识。他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徐文251页）当然，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专门技术，也必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徐老指出：“文化学习应给以一般的基本的知识，……技术学习应给以专门的知识。”（同前341页）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基本事业的知识，现代不可少的知识，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同前371页）徐老这里强调了基本知识和专门技能，特别强调了基本事业的知识 and 现代不可缺少的知识的教学，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徐老不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的话，是引证列宁的。我们这里再补引列宁的一段话。列宁说：“旧学校里，采取那青年人死记十分之九无用而十分之一歪曲的一大堆知识的办法，……这种知识，困累了人的头脑。”由此可见，教材突出知识重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学校教材中，如象列宁和徐老所说的弊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大学，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学校教学改革，尤应注意教材的改革。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同样是徐老的一贯主张。全国解放初期，徐老在讲课程、科目和教材时，又深刻地阐明了“学科和术科的亲密合作，脑与手

的亲密合作”的关系问题（同前413页）；注重课程、科目和教材中的学科和术科结合问题。（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徐老早就指出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并且运用这一原则指导编写教材。他说：“理论不与实际结合，就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实际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经验综合。”（同前448页）徐老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课程和教科书要民族化。他说：“过去我们大学采用的外国课本虽然是科学的，但不是民族的，不独其内容不切合中国实际，而其文字也是外国的，所以内容与形式都带着买办性。这就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同前384页）买办性，缺乏民族性，都是理论脱离实际问题。因此，他强调提出教材要民族化。徐老进一步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搬来不适合我们的条件，也是无益的。”（同前489页）也就是说，异国社会主义的东西是异国的民族化，同样是缺乏我国的民族性，机械搬运，也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此，也要强调民族化。同时，他还主张“整理民族的史料”，使我们的教材，“能够看出民族的特点，民族的血肉关系。”（同前423页）使之民族化，实际化，课程、教材能很好的为培养我国建设人才服务。

编写方法。（1）充分掌握材料。徐特立认为制订课程标准很重要。有了课程标准就可以按此编写课本或找材料讲授。他说：“有了课程标准，就可按标准找材料，按标准分科目、分程序。如果用课本的话，就按标准去编，如果不用课本的话，教员可按标准去找材料”（同前416页）讲授。材料来源很广，“遍地是黄金”。徐老说：“材料来源很多，如：优秀遗产、现今材料、新经验、新资料，浩如烟海，只要明眼人，‘遍地是教材’。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去编写教材。”（引自金杰《徐特立的课程论》一文）收集到的材料，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还有个取舍问题，或整理问题。徐老对于材料整理，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第二是现今还存在的典型的历史形态和残余

的社会形式及地下发掘的资料；第三根据实在的事实加以类推。”

（徐文398页）这三个标准，是徐老提出的史料整理和搜集的标准，同样也用于一般教材的整理和搜集。（2）运用阶级观点剖析资料。运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以及剖析资料、史料问题，是徐特立的一个突出思想，他说：“理性的基础是阶级性的。”（同前504页）又说：“阶级观点、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也成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及研究科学的一个工具。”（同前503页）既然“理性”的基础是阶级性，那么教材编写也必须贯彻阶级性；既然阶级观点、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科学的一个工具，那末当然也是编写教材的出发点和工具。徐老指出：每一个人的理性，会因客观形势动荡、变化而起变化。但是，他又指出：“应该知道阶级的感性作用是基础的。”（同前504页）“阶级的意识总是基础的。”（同前）因此，徐老认为，对于史料的整理和搜集，也必须以阶级观点为基础。他说：“对过去的历史审查，要看史料是从何阶级所供给的，不能说我的史料有来源，不加以审查，而盲目的使用。”（同前400页）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的阶级观点不同，对于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写法，甚至歪曲。比如，徐老说：“辛亥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四十年，参加革命的人现还有些存在，而历史事实，就已经有许多歪曲。”

（同前）因此，史料来源，材料出处，不加以审查，盲目使用，就会使“自己主观上虽然不歪曲历史事实，而实际上被反动派利用，是替反动派写了辩护史。”（同前）由此可见，运用阶级观点剖析资料和编写教材是十分重要的。（3）贯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在徐老的教育思想中占有十分显著和重要的地位，巧妙地贯串在他的一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对于编写教材，也是如此。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

程”（同前391页）和教材中去。又说：“用唯物的历史观宇宙观加以观察、分析、寻找出一般的规律，做为解决这一个个别问题的原则。”（同前）但是，使用唯物史观要有灵活性，要轻重缓急得宜，要详略适当，要原则具体得当。徐老说：“使用唯物史观，要活的使用，不是搬整套，而是有轻重缓急之别。”（同前402页）他举出马克思写唯物史观和列宁写社会主义，是灵活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他说：“下层基础，马克思有时写得很详，写成一个非常庞大的著述。”（同前）这意思是说，马克思写唯物史观是有重点的，该详就详。又说：“列宁写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只写苏维埃加电气化，马克思在《哲学之贫困》中写到‘手推的磨子，给我们以封建主的社会，蒸汽力的磨，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同前）这也就是说，马、列写社会形式虽很简单；但是，很明确地给人们一个封建社会是怎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怎样的。把两个不同的社会用简洁的写法，就基本分清了。教材编写需要有重点，但是，也要全面。徐老说：还必须“留意全面性”，“必须全面注意到。”（同前）对于具体材料的分析，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还要既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反面。要辩证的看，不能形而上学的看。徐老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单看正面，还要看反面。这种从反面用脑看问题，名为‘反思’或‘反省’，从正面看，又从反面看，叫做辩证的看问题或矛盾的看问题。”（同前504、505页）同时，编写的教材，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编写，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反对主观性。徐老正确地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错误的要向真理投降。而检查真理的标准，则是历史的考验，群众的考验和自己的考验。”（同前451页）换句话说，就是实践的考验。为什么？因为“实践是检查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一个标准尺度。”（同前501页）（4）去空、去杂、去孤和

典、显、浅，是徐老的教学原则，也是徐老编写教材的方法。从编写教材角度来谈，徐老主张用大众化的方法。他说：“我们的大众化，是大众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同前 388 页）那么，大众化的基本方法是什么？他精辟地指出：大众化的基本方法，就是去空、去杂和去孤的“三去”法。这三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徐老深刻地做了界说。他说：“所谓空，是没有事实的理论，或没有与理论结合的，又没有原则处理的，与原则无关的事实。所谓杂，是没有联系的知识，无生命的东西，非科学的东西。所谓孤，是单纯化的，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来源去路。这些正是庸俗化的虚伪的东西，大众化是毫不留情绝对摒弃的。”（同前）以徐老对教材编写的主张来看，我们现用各级学校的教材，空、杂、孤的内容恐怕是不少的。教学改革，教材改革，似应毫不留情地全部摒弃掉，以免困累广大青年学生的头脑。徐老又精辟地指出另一个大众化的方法是典、显、浅。他说：“所谓大众化，要用中国教学的一句老话，叫做典、显、浅。”（同前 497 页）对典、显、浅的涵义，徐老也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典就是有根据的东西，即有事实根据的东西；所谓显，就是明显的东西；浅，深入浅出，不是肤浅的浅。（同前）典、显、浅是徐老的教学原则，也是徐老编写教材的方法。（5）根据学生年龄和学历的特点编写教材，学生的年龄和学历的特点，是徐老的教学原则，也是他的编写教材的方法之一。他说：教与学要适合“受教育者个人年龄与学历的情况。”（同前 410 页）徐老提出年龄和学历两个条件，作为教学和编写教材的原则和方法，是抓住了重要的特点。一般教育学，注意到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很少提出学历这个问题，而徐老提出这个问题，确对教学和编写教材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学生年龄、学历特点编写教材，是徐老早就惯用的方法。如《苏区资料》这样说：“这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

能力编写教材，设置课程。用心理学、生理学的观点编写教材的方法，在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里就强调了。后来，根据学生特点编写教材的方法，徐特立在理论上作了发挥，他指出：“学龄前儿童‘开始学少数文字，不能利用读本学知识，而依靠用语言学知识。另一方面还不能靠读本间接得到科学知识，还要家庭和学校范围内从直接的常识加以整理，作读书的准备，全面性的，一个轮廓性的知识应先于细描的知识。’高年级学生底抽象思维能力是比较发达的，经验和科学知识是比较有准备。因此，对于物体加以特征的分析，比较概括，得出规律，制定定义和定理，作概念的内包和外延。”（徐特立在五十年代初，对《教育学》上册第103页所作的读书眉批。转引自金杰“徐特立的课程论”一文）

2、课本的活用。徐特立认为课本应当活用，不应当限制得很死。最要紧的是制定课程标准、教学要目，以至教学细则。他说：“课程标准是典型的规定，不许降低，上升是自由的，但要在规定时间完毕。”（徐文416页）徐老认为，只要有了课程标准，有课本无课本都可以进行教学。他说：“如果用课本的话，就按标准去编；如果不用课本的话，教员可按标准去找材料”（同前）教学。他又指出：只要有课程标准，纵令有许多不合适的教科书，也可以按标准修改，进行教学。他说：“教学的目的已定，内容已决，程度已定，课本纵令有许多种，其中不合目的、不合内容的，按标准增减修改，师生共同加以讨论，加以批判，就是很坏的教科书也可从批判中得到活的知识，比之国定课本机械地遵守，其收效有质的区别。”（同前）徐老认为灵活的使用各种课本，较之机械的使用国定课本要好，因为“国定课本把教材都限死了。”（同前）他这里说的是机械地使用把教材都限制死了的国定课本，就会使教学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过来讲，如果教员能够灵活地使用把教材限死了的国定课本，那不是也可以

收到较高的教学质量吗？因此，对于国定课本不应当机械地使用，而应当灵活地使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于自编教材，也应当灵活地使用，不应当机械地使用。徐老举出他在法国留学时，看见法国的小学多样性的使用课本的实例，说明教学效果良好。他说：“我曾在离巴黎二十公里的一个中学学法文，看见他们的小学生上生物课，教师用的课本与学生的课本不同，而每一个学生的课本也不一致，同时每一个学生同时拿二种以上的课本。”（同前417页）他接着评结说：“课本多样，以便比较作参考。教学的课程标准一致，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得到同归。”（同前）因此，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灵活使用课本的好处。他说：“采用的课本，无论好坏，即令是坏的，也可在师生共同的讨论中，加以删削和补充。这样，师生都成为课本的审查者和编辑者。较之把课本神圣化，使学生都不用脑，对于学习的成就必然是可惊的。”（同前）

这里还需要谈谈乡土教材问题。徐老十分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唯物的教材，就是乡土教材。”（同前414页）这里他用了三个“最”字，可见其重视了。为什么是三个“最”呢？他说：“哪怕是一个小村子，抬头看，就有天，低头看，就有地。这虽然是局部的天地，而把它作为教学上研究的出发点，是已经足够的了。尤其是与学者的生活直接利害关系的地方，不独易于认识，而且能认识得特别深刻。”（同前）徐老引证了一个例子，说明从本地出发研究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我在延安时，曾见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宇宙知识的文章，写得太深。我问他：为何不从延安出发？他说：从延安出发，怎么能讲宇宙观？我说：延安是否有天，延安是否有地？如果是有的话，那就可以从延安出发以讲宇宙观。”（同前）徐老进一步指出乡土教材对于教学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遍地是黄金，只要明眼人。遍地是教材，只要有科学知识的人加以

适当的运用，便是最切合实际的教科书，最能收到教学效果的教科书。”（同前）徐老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不是局限于乡土教材，停止于乡土教材，而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教学的出发点。他高瞻远瞩的是，要从认识乡土而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认识宇宙。他说：要“鼓励青年以及一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研究地方乡土为出发点，进而认识本国，认识世界，认识整个宇宙。”

（同前415）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徐老重视乡土教材，是有很深的哲理的。



# 谈谈徐特立论教师和学生

(一九八七年)

徐特立深刻地全面地论述了教师的作用、地位、任务，以及对教师的基本要求。论述得很严格，也很亲切感人。对于学生的论述也颇周详，关怀备至。他用新的观点论述师与生的关系，详尽周到，颇有独到之处。他的这些论述与一些教育学的教条味、一般化有原则的差别。

## 一、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是什么样的关系？抽象地讲，教师与学生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讲，按徐老的说法，在封建社会里，师生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传与受的关系，教顺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一般教育学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因而，师生关系不够清楚。而徐特立明确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并且将其置于教育学的重要位置上。

1、教师与学生是平等关系，同志关系。徐老说：“虽然劳动大众今天掌握了政权，但他们和过去的统治阶级不同。”又说：教师和学生“虽然还有某种程度的阶层对立，但教师是知识劳动者，和学生没有经济上的对立。”（《徐特立教育文集》205页，以下简称徐教文）因此，“这种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是同志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同前）师生关系虽然是平等的、同志的关系，没有经济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学生要尊敬教师。徐老说：“教师是同志中的领导者，因此，就要尊重教师。”（同前）这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旧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关

系，而是新的同志式的领导关系。因此，在处理师生关系时，就要按照同志关系、平等关系来对待。离开这一前提来处理师生关系中的问题，那就是错误的，徐老认为那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

2、用民主精神处理师生关系。教师是同志关系中的领导者，学生要尊重教师；学生是同志关系中的被领导者，教师亦应爱护学生。所以，学生要在这个前提下对待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善意地提出建议或批评，而不应当采取对立或不尊重的态度。教师亦要在这个前提下对待学生，处理学生的学习和纪律问题。徐老指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

（同前116页）徐老“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的论点，是很重要的。片面注入，不是注错，就是教条式的说教，不能解决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就是采用注入的办法，虽然效果不佳，现在仍然基本沿用，未能改变这一传统作法。学生为什么违犯纪律，有各种情况和原因，要处理好这一问题，教师就要事先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才能处理得当。徐老说：“学生之不守纪律的原因，或者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事后常常忏悔；或者出于自以为合乎于真理，合于人情，坚持自己的意见。前者不必惩罚也可能自己认错，后者在没有把事情弄清以前，单纯的加惩罚，那么就只有两个前途：其一，就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另一，就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前者必使学生渐成奴性，后者必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同前）因此，教师以不随便使用惩戒为宜。“如果学生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在精神上受了惩戒。”（同前）如果学生所犯的纪律严重，

态度又不好，屡教不改，也要从爱护的观点、挽救的观点出发处理，决不可持敌对的态度。徐老指出：“如果在事实上有加惩戒的必要，必然是屡戒不悛重犯相同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和当事人共同商讨惩戒的办法，以示爱护他和转变他的诚意，切不宜抱敌对的态度。在惩戒中是更使感情弄好而不是弄坏。”（同前）徐老这种对待学生民主的观点，是他多年来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珍贵经验。我们现在对学生的管理，如果能继承和发扬徐老这种民主的方法，何患学生思想工作做不好。

3、教师与学生合作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既包括“教”，又包括“学”。教是教师的活动，学是学生的活动。两方能够协调活动，则教学工作就不难搞好。徐老说：“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教者学者各负一半责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所谓教师本位或学生本位之对立）。”（同前205页）因此，他明确提出：教师和学生合作做教学工作。他说：“我们这个工作是从教育过程中来进行的，于是就要有教者和学者来做这个工作，教者和学者合作来做这个工作。”（同前204页）在此意义上来说，教师和学生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是同教学上的朋友关系。徐老说：“我和你们是同一职业的朋友。”（转引自张义文《徐特立论教师与学生》一文）既然如此，师与生在教学中、科研中就应当平等地讨论和研究问题，学生在教学、科研中当仁不让于老师。但是，教师是教学上的领导者，学生是被领导者。因此，“教学半”，不是绝对地平分，而是教师在教学行政和教学业务等方面，要多做点工作。正如徐老指出的那样：“教师是领导者，不是平等分工之一半”，因此教师要多搞点工作。（徐教文205页）从一般意义上讲，在教学上教师是教者，学生是学者；但是按徐老的说法，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学生要向教师学习，教师也应当向学生学习。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听过徐老的讲课，徐老是他的先生。1937年1月毛泽东《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

信》的祝寿词上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徐老向别人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英明领袖，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他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听过我讲的课，但这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终身之师。”（同前278页）唐朝大文豪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说》）对师生情况，确应如此看。在一定意义上说，先生可当学生，学生也可以当先生。在师生关系问题上，徐老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辩证地看待师生关系。韩愈在此问题上，也有点辩证法思想。我们现在有些教师，把教与学绝对地分开，把师与生也绝对地对立起来。教就是教，学就是学；先生就是先生，学生就是学生；就是先生讲学生听。在形式逻辑上讲是对的，但是以辩证法来衡量，则未必是对的。要搞好教学，必须拆除师与生之间绝对对立的这条鸿沟，以利共同合作。

## 二、论教师

1、教师的作用。教师在教育战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校教学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教师，要办教育，便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好的教师，要办好学校，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普通常识，是大家所共知的。唐朝的韩愈就很重视教师的作用。他在《师说》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教师的观点。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师之重要，无师就无人传道，无人授业，无人解惑。当然，因为时代不同，教师所传的“道”和所授之“业”亦会不同。古人论师的很多，说明师的作用重要。除韩愈而外，荀子就是这样的。荀子明确地把天、地、君、亲、师并称。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荀子·

礼论篇》第十九)你看,荀子把师的地位和作用提得多么高!无师就恶治,荀子的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但说明了师之重要性,而且间接说明了教育之重要性。徐特立对于教师的作用,也极为重视,把师之位置估量得很高。他说:“教师是在教育工作者中占主要地位者”(徐教文126页),“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材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同前295页)关于教师在教育上的作用,远的事实不说,就以我国解放后的事实来看,几十年来,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学生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给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建设人才,支援了国家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这里教师付出了十分辛勤的劳动,起了卓越的作用。

2、教师的地位。社会制度不同,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亦有不同。在剥削阶级社会里,教师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比较低。尽管他们为剥削阶级服务,培养人材,传播文化,但是,也很难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曾说:“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443页)尔时,资本主义社会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旧社会上流传着“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谚语。不过,在一般老百姓眼中,教师还是受尊敬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教师的社会地位,与马克思时代不完全相同,但是,比较起来,还是低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教师的待遇就不一样。教师,称尊为人民教师,其政治地位是由国家确定的。由于人民当家作主了,人

民的政治地位是高的，教师是人民，当然政治地位也是高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提高中。列宁曾说：“应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78页）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徐特立非常重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使之能够安心并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他强调指出：“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要受到社会的尊重，使他把做教师看成是终身的事业，干到底。职位低，但是社会地位高，政治待遇高，这是没有问题的，职位和地位有时不一致也是可以的。可以职位不调，即他仍是小学教师，使他成为小学教育的职业家。”（徐教文206页）徐老这里虽说的是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要提高，但是按其精神来说，应包括所有教师的社会地位都要提高的问题，不过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更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人数多，职位低，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值得特别强调。再说，小学教师是基础教育工作者，工作既重要又艰苦。徐老说：“从人类知识能力道德出发来看小学教师的地位，小学教师是掌握人类的基础教育者。为着爱护儿童，必须爱护小学教师。”（同前244页）徐老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尖锐地指出不重视教育和不重视小学教师的流弊。他说：“边区在历史上是文化落后的区域。父母对于子女既不知教又不知养，儿童的死亡率特别大，失学的儿童特别多，小学教师不为农村所尊重，因此，文化落后不只是限于现在的成年和青年，而且贻害及将来的新社会。今日的儿童转眼即青年，稍不注意就难补救了。”（同前56页）至于我国教师的政治地位，如前所述，已经由国家规定了。徐老说：“关于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一般的说，就是人民的政治地位。人民的政治地位是由国家的地位决定的。我

们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成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奴仆，人民没有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处理自己的事业。今天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翁，这是人民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上，是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一员，有权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斗争，这是我们国家的权利，同时是每个人的政治地位。但这种政治地位，不是过去旧社会个人的政治地位。既然每个人都有了政治地位，如果说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这是不合逻辑的，并且是旧社会的观点。”

（同前254页）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了政治地位，不应当说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如果争取个人的政治地位，这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同前）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徐老指出：“小学教师是基层教育工作者，是最接近基层的群众，他们的政治水平要比一般人民提高一步，应该争取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地位。”（同前）人民教师已有政治地位，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问题的，有改进的必要。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人民教师是崇高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少教师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府官员，参予国家的管理；许多教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教师被授予“特级教师”、“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胜利进行，教师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将会不断地得到提高。当然，现在不重视教育的倾向仍然存在，轻视教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然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总会逐渐克服的。

3、对教师的要求。徐特立对教师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肯切的。从教师的德、才，以及如何做教师，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我们在这里扼要地把它叙述出来。

(1) 教师应当是先进分子。徐特立指出：作“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同前288页）或者“是一个模范人物。”（同前205页）教师是做教育工作的人，自应是一个先进分子，或者是一个模范人物。什么是先进分子？什么是模范人物？徐老在《论国民公德》一文中提出“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能够做到“五爱”，当然是模范人物或先进分子。教师是公民，自应有五爱的道德，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是先进分子或模范人物的一般标准。教师是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对其更当有具体的要求。徐老对教师如何要求？他说：教师“自身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徐文626页）“热爱自己的专业，专心致志，钻研业务”，对培养好学生有高度的责任感。（同前）又说：“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同前495页）徐老说的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就是指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师，教师应是有学问的人。总起来讲，除五爱外，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又有广阔的科学知识，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能够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师，才是“先进分子”或“模范人物”。而教师应当力争成为“先进分子”或“模范人物”。因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具备了那样的条件，才能教育好下一代，才能传播好人类文化。徐老是教师中的“先进分子”、“模范人物”的典型代表。他青年时期就是一个从事并热爱教育事业的爱国主义者，以后由爱国主义的教育工作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者。

(2) 教师要热爱教育事业。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一个教师的前提。教师首先要热爱教育，才能办好教育、教好书，如果不热爱教育，一切都谈不到。徐特立说：“教书是一种很愉快的事业，你越教就越爱自己的事业。”（徐教文295页）徐老希望教师们把教师职务当成终身的事业，一辈子就做教师，不要再



考虑别的。他说：“把做教师看成是终身的事业，干到底。”（同前206页）“我希望你们一生都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同前288页）为了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当好教师，教师就要有巩固的专业思想，热爱自己的职业。徐老说：“我认为小学教师，应有专业思想。”（同前255页）当然，一切教师都应有专业思想，因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需要广大群众参加，使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而这种教育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

（同前）当然也要落到全部教师身上。同时，教师们还要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研究不能光靠书本，还要实践。这样才能当好一个较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巩固专业思想，最终才能有所成就。徐老说：“当然并不是只有学师范的人才能教书。可是一个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的教师，教起书来总要比较好些。”（同前295页）因此，他又指出：“我希望你们钻研教育科学。学习不能只学课本，把知识在实践中运用起来，才能丰富它。你们如果在教育科学中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创造，就是专家了。”（同前288页）这就是说，光会教书不算合格专家，在教育科学中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创造，才算专家。徐老干了一辈子教育，热爱教育，尤其热心当教师，十分关心小学教育。他学问渊博，尤精教育学科，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上的创见，被誉为“当今一圣人”。中国历史上热爱教育和教师工作，并且在教育学说上有成就的，孔子亦是个典范。二千余年来，他的教育思想不衰，与此不无关系。

（3）教师要既教书又育人。徐老在谈教师和学生关系时，讲到教师的人格问题。他说：“首先就要谈教师的人格问题，因为教师是领导者，所以不能不谈教师的人格。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

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同前205页）人师与经师要二者合一，也就是说，一个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教书和育人不能分离。教书育人二事，要合在每个教师身上。两种人格合二为一，这才是教师的完全人格。徐老就是合二事在一身的典范，两种人格合一的代表。

（4）教师要订出可行的教学计划。徐老强调教师有计划地进行教学。他认为计划不能是空的。为了订好计划，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他说：“教师是领导者，……因此教师要了解情况，了解学生个人的情况，学生家庭的情况，学校的情况，地方情况等，来决定计划。没有计划是不能算领导的，这个计划不是空的。”为了使计划不是空的，正确可行，还要把计划拿去和各有关方面商量。他说：“有时要到学生家中去商量，和政府，和地方上商量。”（同前）计划要按年、按月、按周、按天订出。他说：“计划有一年之计，一月之计，也有一天一天的计划。”（同前206页）计划订出之后，要按计划完成，不能积压。这样才算是教师的工作和领导。他说：“计划了之后，就要按期完成这个计划，一天完成一天的计划，一周完成一周的计划。不要积累，如果积累了，就要在后面补上，这就叫做领导，也是教师的工作。”（同前）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不同，作法也有区别；但是要搞好教育和教学，要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对学生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订出必要可行的计划，则都是必须的。

4、教师的待遇。教师的待遇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待遇，一是物质待遇。这两方面的待遇都是至关重要的，都应特别关注。徐特立极重视教师这两方面的待遇问题。他领导教育工作多年，一贯如此。解放战争时期，他给小学教师写过一封信，劝他们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就讲到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当时因在极端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无法照顾教师的生活，但是，徐老却很关怀他们。他说：“小学教师的职务是以教育服务

于社会,自己一身已交给了公家,那么,为公即是为私。小学教师在土地改革后,当百分之八十人口生活提高时,小学教师的待遇也应提高,但在目前残酷的内战时期,……就无法用更多的注意力照顾成千成万的小学教师。”(同前121页)因为小学教师数量很大,加之条件极端困难,所以,关心小学教师生活,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徐老就是用这样的心肠关怀小学教师生活的。虽然如此,徐老进一步明确指出:“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提高时,必须制订优待小学教师的条例,如年功加俸,特别加俸,即老时的退休金,死后的遗族抚助金一类的条例。”(同前122页)在残酷战争环境中,徐老犹不忘小学教师的生活,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全国解放后,1951年徐老又提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问题。他说:“使他的经济生活相对的提高,并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同前206页)又说:小学教师“职位低,……政治待遇高,这是没有问题的,职位和地位有时不一致也是可以的。”(同前)一般教师的生活要有保证,而对于优秀教师和好的小学教师,更应当优先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徐老强调指出:“小学教师教得好的,有的可以拿中学教员的薪,而仍任小学教师的职,政治待遇可以提高一级。”(同前)为了使教师生活有保证,鼓励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徐老又再次提出年功加俸等一系列的照顾教师问题。他说:“还有年功加俸及特别加俸,如国家经费不够,学生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同前)又说:“对于照顾教师的生活方面,可以发动学生赠送教师一点东西,如送几个鸡子给他,请他吃顿饭,送他几斤蔬菜,来帮助教师。一个学生送一斤蔬菜,五十个学生,就有五十斤蔬菜,教师一个月的吃菜就不成问题,使教师安心工作。”(同前)徐老这一套关心教师的办法,有些是老解放区困难时期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作,既解决了教师的生活问题,还密切了师生关系,从而也使教师安心教书,办好学校。

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对优待教师有规定，不一定再按老解放区实行过的这套办法去做。但是，徐老关心教师的用心是可贵的。徐老讲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主要是针对小学教师，特别是针对农村小学教师讲的。因为小学教师的数量很大，在待遇上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他就反复强调对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然而，其关怀小学教师的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教师。

### 三、论学生

徐特立对于青年学生有许多精采的论述，他非常喜爱青年学生。对于青年学生的长处和短处有正确的评估，并对他们热忱地提出要求，指出他们所负的责任，并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1、对青年学生的评估。要引导青年学生前进，首先要对他们有个正确的评估，然后才能做到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使其健康地成长。徐特立早年就指出：“青年需要向各方面发展，应该保持他天真活泼进取的态度永远不衰。”（同前47页）徐老指出青年有天真、活泼、进取的特点，教育工作者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引导并发挥他们的这些特点。在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徐老又指出：“青年是热心求知识的，同时又是好劳动的。”（同前238页）徐老这里又指出青年的两个特点：一是求知欲强，一是爱好劳动。这又是教育工作者应当注意的问题。徐老还指出：“青年们一般是热情高，志愿大。”（同前246页）徐老这里又指出青年的热情高、志愿大的特点，这又是教育工作者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上面所谓的特点，就是青年学生的优点。徐老为了具体说明青年学生的优点就曾指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青年学生热情高，有敢于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精神的特点。他说：

“就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号召下，中国开展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青

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赵家楼一把火，就是象征着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火焰。这把火立即蔓延到全国，蔓延到各个阶层，掀起了革命的新高潮。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我当时非常感动，受到很大的鼓舞。我想，青年学生能够这样关怀国家的命运，不怕流血牺牲，敢于起来向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宣战，正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大有前途，大有希望。”（同前267页）他又举出：“黄花岗”、“五·四”、“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的青年学生的向敌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他说：“一切乌烟瘴气长期包围着的中国被黄花岗的青年，‘五四’的青年，‘一二·九’、‘一二·一六’的青年以自己的生命来冲锋陷阵，前仆后继，百数十年来总是再接再厉，而瘴气和光明的搏斗目前已是整个的相持阶段了。”以上这些，就是徐老指出的青年学生的特点或优点。

徐老既指出青年学生的优点，又指出他们的缺点或不足之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过青年人不应有的几种性格。他说：“一切固定性、偏执性、早熟性都是不应有的。如果谨慎是必需的，但超过了敢说敢做的态度就会成为一个‘少顽固’。老顽固并不足惜，因为他是一个快进坟墓的东西，为害也不久，假设‘少顽固’太多，就是新社会莫大的障碍。”（同前47页）这就是说，青年学生必要的谨慎是需要的，但是，固定性、偏执性、早熟性则是不应当有的，而成为“少顽固”则为害更大。徐老又指出：“年轻的人，……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古代的状元，无一有学问者，就因为他自以为状元了。自以为是，就是主观主义。”（同前248页）这就是说，年轻人不能有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缺点。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就会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不但害了自己，也对国家无益。徐老还指出青年学生的工作经验少，锻炼不够的缺点。他说：青年们“工作经验少，在初次踏上工作的岗位上，不免与过去一切生活习惯发生矛盾，这自然要表现他

们在思想上有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作与生活有些困难的情况，甚至对工作不安心，更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初从学校出来的青年，骤然离开学校到机关服务，终日忙碌，业余学习时间很少，甚至有的要服务于极单纯的抄写工作或收发工作，这与文化学习或少直接联系，有时觉得不够满意，就随便说出不合理的言词，不免影响到工作情绪，在工作上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一方面。”

（同前246页）青年学生可能有好高骛远的情况，以为自己知识、有能力，眼高手低，遇到不合自己愿望的事情和工作，就会发生一些不满的情绪和言词，这主要是青年人没有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而出现的现象，当然不能说是他们的本性所使然。但是，总是缺点，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引导和教育他们，克服这些缺点。

2、青年学生的责任。青年人要充分了解新时代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是什么，并且要勇敢地肩负起这重大责任。徐特立说：青年一代“应该了解历史赋予自己的任务，了解自己肩上的责任。新陈代谢是一个客观规律，青年一代总是要替代老年一代的。”（同前301页）老一代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的革命工作，推翻了三座大山，全国解放了。解放初，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等待着全国青年知识者来肩负，来工作。徐老详尽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和斗争，拿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我们国家地方大，人口多，要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时期能够办到的事，农田水利，电气化，机械化，也不是几十年能完全搞好的，六亿五千万人民，许多人不识字，不少少数民族解放前连文字都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困难。”（同前）紧接着徐老又说：“应该告诉青年同志，要准备挑重担子，而且要时时准备挑更重的担子。”这是国内的任务，晓示青年要关注，要准备挑重担子。而更重大的是国际任务，青年的国际担子。因此，徐老指出青年学生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紧接着又说：“我

的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脑子里应该时时装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下定决心，遵循毛主席指引的路线，”“把国家建设搞得更加繁荣富强，创造更好的条件去帮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同前302页）为此，徐老又指出青年一代要认真地锻炼自己，继承历史赋予的重大任务，接好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他说：“青年一代应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加强自己的锻炼，接好老一代革命的班，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开创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业。”（同前）

3、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徐特立要求学生，要在“读书、思想、劳动、体质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同前277页）并且要求青年学生，“以学好，思想好，劳动好，身体好，作为行动口号”，奋勇前进。青年学生正在成长的时候，各方面都正在打基础的时候，诸方面的均衡发展是很必须的。徐老说：“愿你们有恒心，坚持下去，为献身社会主义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同前）徐老首先指出青年学生的学习问题，他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给予青年学生的任务谈起，然后讲到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习’”。（同前245页）为什么要特别重视青年的学习？“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基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基于电气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来改造和恢复农业和工业。’我们要知道‘电气化事业中，不识字的人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仅仅是识字还不够’；‘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气应用到工业、农业以及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每个人必须学会这点，必须教导整个劳动青年后辈都学会这点’（列宁：《青年团底任务》），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应更清楚地认识这一任务。”（同前）徐老进而强调指出：青年学生要学习、爱学习，但要持之以恒，要把学习和成功联系在一起，要有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他说：“学习对每个人都不可缺少，对青年人尤为重要。对青年来说，

学习最重要是一个‘恒’字。……要刻苦钻研,要坚持,持之以恒,……在学习上想走捷径的人学不会,应该将‘学习’与‘成功’连结在一起,即是不学成功不罢休。”(同前281页)徐老要求青年在学习上持之以恒和学习要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的论点是极为宝贵的。他进一步指出,青年学生的思想要好。在这个问题上,他集中讲到青年学生的道德教养问题,也就是“五爱”的教养问题,亦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问题。我们要求学校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五爱”教育,学生亦要争取当五爱的模范。徐老还强调向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而五爱教育就是现今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具体化。徐老指出,青年学生学习好、思想好,就会前途无量。他说:“一个人如果思想好,学习热情,又肯用脑,对各种事物比较关心,那他的进步是很快的,所学得的知识也会不断增加。这样的青年,无论学什么都好,都会有成绩,有前途。”(同前296页)徐老要求青年学生爱劳动、参加劳动,对此他讲得很多,千遍百遍地讲。参加劳动既可以锻炼思想,又可以增加知识,还会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验证所学知识。他曾送给青年学生两句话:“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同前258页)在说到身体好时,徐老十分重视和强调青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而好的身体凭锻炼。有好的身体,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办事,否则还要拖累国家。他说:“一个人的身体,决不是个人的,要把它看作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凡是有志为社会出力,为国家成大事的青年,一定要十分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这必须从年轻时期就打好基础,随时随地在锻炼身体。假如年轻不爱护身体,不注意锻炼,成人以后,见识广了,学问多了,正是到了大有可为的时期,正是人民需要你尽义务的时候,你身体却未老先衰,不能胜任工作了,多么可惜。这样你不仅不能替社会服务,还给社会背包袱,严格说,这是对人民不负责。”(同前281、282页)徐老这样语重心长地



要青年学生爱护自己的身体，经常锻炼，青年们就不能充耳不闻。徐老把青年人的身体强弱与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思想，是很可贵的。为了保证儿童和青年人的身体健康，在这个时期对他们的保健很重要。徐老早就指出：“儿童和青年均是发育时期，一生的健康或疾病基本上决定于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应该有经常的体格检查、身重、身长、目力等检查设备，最容易的首先举行。”（同前94页）最后，总结起来讲，徐老认为要青年学生读书好，思想好，劳动好，体质好，必须经过长期教育和锻炼，才能获得。

4、对青年学生的希望。徐特立对于青年学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听党的话，抱更大的志气、更大的理想。他说：“可爱的青少年学友们”，要“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同前277页）“要听党的话，不断鼓足干劲，随时代前进。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十分幸福的。你们应该珍惜现在美好的时光，奔向和创造幸福的前程。”（同前）青年的理想是什么？徐老进一步指出：“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刻苦钻研，热爱劳动，红专并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接替老年一代，把革命红旗插向胜利的高峰——共产主义。”（同前278、279页）徐老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他多次论述到学生要胜过先生，后代超过前代，“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25年至1927年徐老任湖南第一女师校长时，他就在《校中百咏》中说：“我愿诸生青出蓝”，鼓励学生上进。1959年，徐老和青年学生谈投考师范问题时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这是他既鼓励教师要教好学生，又勉励学生积极上进。徐老还认为现时青少年学生所处的条件优越，应该多做贡献，应该超过前代。他说：“青少年学友们：你们的条件胜过我们，贡献也应该多，应该一代胜过一代。”（同前279页）徐老多次论述到我们的事业，“任重道远”，老年人已

经或正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严重的任务正期待着后一代人进行和完成。他引证毛泽东的话鼓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同前）徐老为了让青少年学生牢记他的话，他不厌其烦地说：“重说一遍，你们应当比前代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负更大的责任，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兴旺！”（同前）

## 附录：

# 掌握客观规律是做好工作的关键

(一九五三年)

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承认客观规律这一观点，应当很好地运用在我们的每一项革命的实践中。为了正确地使用这一观点，必须首先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有些同志口头上虽然承认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但是，在执行工作中或处理某种事件上，却往往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强调自己的工作的重要，人家的工作不重要，要求这样，要求那样。愿做这个工作，不愿做那个工作；而不从全局出发，或不从国家整个利益出发。这种思想和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否认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以主观代替客观，以个人所想代替全体意志。这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我们应当反对。抱有唯心思想和认识的同志，十有七、八把工作做不好，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是简单急躁，就是悲观失望。另一种：有一些同志，不独口头上承认客观存在，而且在工作实践中也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但是，他们往往为客观存在所吓倒，缺乏改变客观情况的勇气和热情。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工作的放任自流，不负责任，徘徊观望，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因而其所做工作无生气。

我们不但要在口头上承认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性，而且要养

成善于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和认识客观规律，从而逐渐掌握它和运用它，做好工作。

认识客观规律，学会科学的工作方法，不仅仅是每一个领导者的责任，而且也是一切革命工作同志所需要的。因为不论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好，从事普通工作的同志也好，执行工作都不能离开客观，都不能不与客观发生关系。因此，都不能不重视客观规律和学习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们要重视，并且要善于认识、善于学习和善于运用。

## 二

实践是具体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途径，不努力实践，就不能有感性认识，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更谈不到灵活地掌握它。因此，要勇于实践，不断地参加业务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实践。

调查研究是实践的最好方法之一，也是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渠道。调查就是承认客观存在，并承认它的规律性。主观主义者轻视调查，就是调查也是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先入为主，合乎自己意志的就调查，不合乎自己意志的就不调查。这种调查实际上是否认客观存在和客观的规律性。虽调查而无益，或者还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调查，而主张毫无成见的向客观调查，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这样的调查，才是真正的调查工作，也才能真正地认识客观的规律性。

调查的目的为了研究，为了找出客观规律，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光调查不研究，就失去调查的意义，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当然，光研究不调查，在概念中转圈子，同样难以找出客观规律，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调查和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一种辩证关系。调查是承认客观存在，收集资料只得到感性知识，

而研究才能发现客观规律，才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现在关于调查研究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有些部门的同志经常进行调查，调查的材料成堆成捆，不为不多。但是调查之后，却不去好好研究，或根本不去研究，把辛勤所得的调查材料轻率处理，或束之高阁。这种调查，实际上等于不调查，等于不承认客观规律，徒劳无益。另一种是有些同志从事研究工作，但是，他们很少去实际调查。研究不是建立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之上，而是单凭看报告，翻书本。这虽然必要，但不够，与活生生的实际脱节。这种研究，就很难真正发现工作的具体规律。因此，我们不赞成这两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要进行调查，就必须进行研究；要进行研究，也必须进行调查，把调查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 三

典型试办也是实践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也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最好方法之一。现在各个部门有这样的典型试办，有那样的典型试办，有各种各样的典型试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客观规律，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典型试办，已经成为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但是，根据现在实际情况看，典型试办有两种结果，有的典型试办成功了，有的典型试办却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试办，所以成功了；而后者则反是。两种典型试办，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可见调查研究之重要。因此，典型试办也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没有周密的调查研究，虽进行典型试办，也很难得到成功的结果。

### 四

客观规律是事物本身本质的东西，是一种内在关系，即内在

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可以认识的。恩格斯说，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能认识的事物。但是，不可知论者是反对这种科学见解的，认为客观规律是不能认识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必须反对不可知论。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感到没办法，但是又不愿意去实践，去找窍门，工作方式方法老一套。这种情况，虽然与哲学上的不可知论有区别，但是在客观上得出的结果，却与不可知论者一样，不能认识事物。因此，我们要反对工作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知论。而反对不可知论的最好方法，就是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走马观花”地了解事物，虽然是必要的，但只能认识事物的外部现象，所得的知识是感性知识；“下马观花”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事物，所得知识才会是理性的、规律的。因此，“走马观花”不如“下马观花”。我们要多提倡“下马观花”，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

## 五

调查研究是要找事物的内部联系，而事物内部联系是必然的和固定的，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和那样的。正如斯大林所说：客观法则不能改造的，我们只能发现它、认识它、依靠它和掌握它。要发现、认识、依靠和掌握客观法则，必须首先学习科学理论，并且学会对科学理论的灵活运用。一句话，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不是机械的搬运，不能超脱时间、地点和条件，而是必须把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做好自己的工作。

## 比、学、赶、帮的辩证法

(一九六四年)

比、学、赶、帮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开展，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学、赶、帮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它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产物，通过比、学、赶、帮运动，可以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思想水平，提高工作积极性，从而就可以做好各项工作，提高各项工作效率，不断地全面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大大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持久地但又是实事求是地继续开展这个运动。

比、学、赶、帮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只有把比、学、赶、帮作辩证的了解，才能很好地指挥这个运动，并收到良好的效果。比、学、赶、帮是矛盾的统一体。四者之间，比居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学、赶、帮则居服从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比的工作做了，才好做学、赶、帮的工作。当然，学、赶、帮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因为，在比的前提下，进行学、赶、帮活动，那末，学、赶、帮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变化，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这时候，学、赶、帮就成为主动的，在学、赶、帮的推动下，不能不又做新的比的工作。假若不做新的比的工作，就不可能再有目的地进行学、赶、帮的活动，而要进行，也只是“瞎子摸鱼”，无目的地进行，收不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搞革命是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我们搞具体

工作，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过世界，但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这里说的，也是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问题。要改变世界，必先解释世界。要解决矛盾，也必先认识矛盾。不先解释世界，就无从改变世界；同样地不先认识矛盾，也就无从解决矛盾。当然，解释世界，认识矛盾，是为了改变世界，解决矛盾；如果不为改变世界，解决矛盾，而解释世界，认识矛盾，那就是为解释而解释，为认识而认识。马克思上述的那句名言，是说明哲学家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同时也是对只解释世界，而不进行改变世界的那些清淡哲学家的批评。比、学、赶、帮的比，是比较的比，也就是认识矛盾，分析矛盾的过程。而学、赶、帮则是用不同的方式解决矛盾的过程。因此，只有比的工作做了，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学、赶、帮的工作。比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

比和学、赶、帮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学、赶、帮也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着的。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的社论，就讲了学、帮的关系问题，它说：“帮中有学，学中有帮。”这是很辩证的说法。我们反对把学、帮的关系做形而上学的理解，亦即把学和帮的关系绝对化，学中无帮，帮中无学。帮和赶的关系，也可以作类似的理解。固然帮是说的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帮助后进人员、后进单位、后进地区的问题；赶是说的后进人员、后进单位、后进地区赶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的问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赶中有帮；但在某种意义，即从先进中的个别落后因素，对后进个别先进因素上来讲，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帮中有赶。学和赶一般地说是个平行的关系，即学是学先进、赶也是赶先进。但是学者和赶者有一个数量的差别，亦即优劣的差别；因而向先进学的人和赶先进的人，也有一个相互之间学和赶的关系问题在内。



上边讲了比、学、赶、帮的辩证关系问题，下边分别讲一讲比、学、赶、帮本身的辩证问题。

比，是找矛盾，找差别的问题。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是，不比就不能明显地看出不齐的问题来，一比就可以看得分明。俗语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比较的情况下，不论就大范围来讲，还是就小范围来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总是会基本分为三种状态的，即先进、中间、后进三种状态。在工业战线上如此，农业战线上如此，文教战线上如此，学校里的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这三类状态的区分，是比较而言，相对而言；但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也有绝对的意义。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认为事物的区别是相对的，是非、美丑、善恶、大小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差别。任何事物都有其“是”的一方面，也都有其“非”的一方面。如他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就这一点讲，是有辩证的思想的。但是，庄子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不承认相对中有绝对，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得出了万物都没有什么差别的绝对的结论。如他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所谓先进、中间、后进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先进、中间、后进在一定的界限内是先进、中间、后进，这是绝对的；但是，出了一定的界限，就只有相对的意义了。譬如说，这个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在这个县、专区来说是先进的，但在全国来说，就不一定是先进的了。这个中间的，在这个单位、地区是中间的，但和别的地区、单位比较，不一定就是中间的，后进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所谓是相对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说，事物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一个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不可能一切都先进，总会有一些中间或落

后的东西。相反地，一个后进的人、后进的单位、后进的地区，也不会一切都是落后的，总会有一些先进或中间的因素。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正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的问题》一文中所说：“一分为二以及吾人对其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一分为二，即先进和落后，优点和缺点，等等，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但是，一里边的二，不会是平均存在和发展的，总是一个占着优势，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也总有一个占着劣势，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先进其所以先进，就是因为先进成分在它的中间占着主导的地位，占着优势或绝对优势，而落后成分则居服从地位，居劣势或绝对劣势；落后其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落后成分在它的中间占居主导地位，占优势或绝对优势；而先进成分则居服从地位，居劣势或绝对劣势。

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互相转化着。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譬如，落后转化为中间，中间转化为先进，或者先进转化为落后，等等。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老子讲事物的转化；但他讲的事物转化是无条件的。他的事物转化思想的局限性，就在这里。一个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如果不停留在原来的地位，而是“精益求精”，“锦上添花”；那末就可以长期保持先进地位。而如果骄傲自满，满足于已有的先进，那末，“物极必反”，就会转化为中间状态，甚至落后状态。中间和落后的，也是如此，如果力争上游，就可以变中间、落后为先进。而如果不求上进，自暴自弃，甘居中、下游，那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游会变成下游，下游会变成下下游。这就是事物转化的辩证法。

在开展比较的过程中，应当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决

不夸大，也不缩小。比是主要的比先进，比优点。与先进比，与人家的优点比，就可以看出自己的后进和缺点，后进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以便采取措施，有目的、有计划地学和赶。但是，先进的也要善于和后进的比，看出自己的落后因素，后进中的积极成分，以学习后进中的积极因素，克服自己的落后成分。比就不能以己之长，比他人之短，若以自己的长处，比他人的短处，就会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只看见人家的短处，看不见人家的长处，这就无法学先进、赶先进；无法克服自己的缺点，变后进为先进，变缺点为优点。比主要和人家比将来，看谁将来的发展前途大，看谁将来能为党为国家办更多的事。但是，也要善于和人家比过去，过去人家进步快，自己进步慢，那末自己就要快马加鞭，急起直追。如果，过去人家进步慢，而自己进步快，那末自己就应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达到比的目的，还必须克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游思想。要善于比上，这就是说，要善于看出上方的长处，虚心地看出自己的缺点。同时，也要善于比下，这就是说，不是看到比下有余的地方，而是要看到比下不足的地方。这样就会使自己改变中游思想，力争上游。

学，是解决矛盾，解决先进和后进之间的矛盾问题。首先要在比的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学的工作。但也可以在比的过程中学，学的过程中再比。以此循环往复不已。比和学的问题，在每一循环的内容上，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学，主要是学先进，学习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的先进事迹。如在一个学校中，若果有教学、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人物，有培养师资工作做得好的先进人物，有先进教研组等，那就要广为宣传他（它）们的先进事迹，让家喻户晓，大家学习。先进中当然主要是先进的东西，但也一定会有后进的东西，先进中有落后，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需要善于运用毛主席

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先进的东西学过来，把落后的抛弃，而绝不能不加分析地一齐接收过来。但是，也要善于学习中间和后进人员、中间和后进地区的某些积极因素。绝不能因为他（它）们是中间和后进，而加以轻视，一概否定，不去学习。后进中有先进，这是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比如一个落后人员，他总会有某些积极的地方。后进单位、地区也如此。

学，主要是学先进；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地互相学习的过程。因为，事物总的情况固然是先进、中间、后进三种状态，按两头小中间大来说，先进是少数；但是，先进中不会五个指头一般齐，也必然可分为先进的、中间的、后进的三种情况。中间的、后进的两种状态中的情况也必然如此。因此，实际情况是较为复杂的。学习是多数人向最先进的少数人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多数人你学我，我学你，错综复杂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学，是学习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的长处，克服个人、本单位、本地区的缺点；弥补个人、本单位、本地区的不足。同时，也是发挥个人、本单位、本地区的长处。因此，绝不能学习人家的缺点，改变自己的长处。这样的事情是很奇怪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和同志在现实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的。例如有些同志，缺乏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会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爱挥霍，讲排场，而有些思想不健康的同志就看样子。有些认识水平较低的同志，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把不甚妥当的东西当成成熟的东西去学习。

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持之以恒，学而不厌；决不能“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相反地，操之过急，想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开展学习上，必须反对两种妨碍学习活动的有害思想，这就是：既反对不愿向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地区学习的妄自尊大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必须反对不

求上进，安于现状的思想。只有塞、止这两种不良的现象，大争、互学的局面才能够更进一步地大流大行。

赶，也是解决矛盾，也是解决先进和后进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后进人员、单位、地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赶是后进赶先进。先进后进之间的距离较远，赶就意味着要走快一点，慢吞吞是不行的，而要兼程前进。因此，必须很好地发挥主导方面的后进主观能动性，同时，必须克服后进思想上的“先进虽好、高不可攀”的消极情绪，采取有效措施，付诸实现，才能缩短和消灭先进和落后之间的距离，后进赶上先进。

工作总是分为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而常常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先进部分是小头，落后部分也是小头。但是，落后部分虽然是小头，而这个“小头”对一个“大单位、大地区”来说，并不是极少数人、或极少部分的问题，因而就值得注意。同时，事物的分界是相对的，如上所述，就先进、中间、后进各个部分内部来说，也都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别，并不是铁板一块。因而也都有后进赶先进的问题。如此说来，后进赶先进，更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问题。因而就值得特别注意。其所以值得注意，就是因为把后进部分转化为先进部分，不单纯是后进变先进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党的各行各业工作的发展，对于促进先进的更先进、转变中间的为先进会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领导部门的任务是，抓两头，带中间。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论语》上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庄稼汉问孔子一个问题，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孔子抓两头认识事物，这个方法合乎辩证规律。我们是用抓两头的方法，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要使先进的更加先进，落后的赶上先进。落后的转化为先进的条件，主要是后进内部因素的变化，后进部分的主导作用。但是，外因也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说，领导上的领导、帮助、督促、检查、

鼓励等，是不能忽视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又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目前在有些领导部门的工作中，领导的作用发挥不够，心中无数，因而，也就不能提出有效措施，抓后进，带中间，促先进，而常常是一揽子抓法，不区别对待。也有这样的领导，对于先进人物、先进部分、先进单位，注意较多，如对重点单位的经费、人力等，安排较充分，这无疑又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非重点单位或后进单位，就注意得很不够，这就很不应该。对于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注意好的，忽略差的，这当然是不应当的。或者有些部门也注意后进单位和人员的问题，但常常采取的办法不够完善，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指责多，耐心帮助说服少。这种办法同样不对头。这些，都是不了解变后进为先进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不了解促进先进的更加先进的另一面，是要带动后进的也要前进，不了解抓两头是促进各行各业大发展的课题。这些都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必须克服。

帮，也是解决矛盾的问题，解决先进和后进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先进居于主导地位，必须使先进者发挥较大的主动作用，才有助于变后进为先进，首先，帮后进要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人人有责，把助人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要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乐善好施”，诲人不倦，不感到帮助别人进步是自己的负担，而是极大的快乐；再次，要懂得帮人也是个辩证法问题，帮助人家进步，就是帮助自己进步，当先生也是当学生，学生有收获，先生也会有收获。常言说，“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就是这个道理；最后，要不怕后进人员、后进单位超过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对己是光荣的，对党对国家是有益的。只有在先进人物、先

进单位方面做好了这些工作，才能很好开展先进帮后进的工作。当然，后进人员、后进单位，也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迎头赶上，才能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

但是，当前在帮的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学校里，某些青老教师关系还不够正常，主要是有些老教师感到青年教师不尊重自己，不好进行培养，因此，缺乏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的精神。青年教师不虚心受教，是不对的；但是，老年教师以此放弃自己的职责，也是不适当的。这个问题，应当逐渐加以解决。

总之，比、学、赶、帮是一个完整的辩证统一体，缺一不可。因此，只有把四者的具体活动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且统统抓好，才能很好地完成比、学、赶、帮的任务。同时，开展比、学、赶、帮，在进行的方式方法方面，不应当千篇一律，唱一个调子，而应当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样，对于健康地开展这个活动是有好处的。

## 赵普和吕蒙正荐贤二、三事

(一九八五年)

赵普和吕蒙正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位历史人物，而他们的敢直言、荐贤才，则恐不为大家所全知。

赵普事宋太祖、太宗两朝，三次为相，出入三十多年。太祖时，独相十年。他“刚毅果断，能以天下为己任，宋初在朝位者未有其比。”他谏净颇多，所谏无不从，深得太祖的赏识。吕蒙正在宋太宗、真宗时，曾三次任宰相，人称其有器量，质厚宽简，不结党与，遇事敢言。“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帝嘉其无隐。”同僚咸称其伉直。赵普、吕蒙正二人，均以敢直言、荐贤才著称。他们对于创立、稳定和发展宋之朝政，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在他们推荐贤才上谈二、三事。

赵普说他自己“惭无致主之能，但有荐贤之志，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某官，太祖不采纳；次日他“复奏之”，又不用；又次日“更奏之”。太祖甚怒，“裂其奏投诸地。”赵普并不惊恐，“颜色自若”，慢慢地拾起奏章而归。归后将奏章补缀好，“复奏如初”。这时候太祖觉悟了，很快认可了赵普的奏谏，委任某人作某官。事后证明，某人作某官，以称职闻名。

同时，又有人有才立过功，应当迁升官职，可是太祖“素嫌其人”，不给升官，而赵普则力争。太祖又发怒了，说：“朕不与迁官，将奈何？”赵普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不听，拂衣而去，赵普尾随。太祖入宫，赵普之于宫门外，长时间不去。结果，太祖不得不从其请。



太宗时，有张某者为工部侍郎，“公私识者，尽谓当才。”其才能，赵普极为赞赏。可是，岁月未久，却被降职出为外任。赵普知道后，就为张某事上奏疏，申正义，鸣不平。他说：张“素蕴机谋，兼全德义，从来差遣，未尽器能，虑淹经国之才，弗副济时之用，如当重要，必立殊功。又说：张某“德义，素为乡里所推，中外卿士无出其右。”疏上，帝纳其言，任命张某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事实证明，颇称其职。真宗时，张升任宰相。

吕蒙正亦“能任人”。这是宋太宗对吕的评语。一次，宋太宗曾欲选人使朔方。谕中书选人。吕蒙正提名送上，太宗不允许。过几日，太宗三次问吕蒙正人选，吕三次以原提人名对。太宗大怒，投其书于地，曰：“卿何执邪！”吕蒙正徐徐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他坚持说：“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家事。”此时，“同列皆惕息不敢动。”吕蒙正却“撝笏俛而拾其书，徐怀之而下。”太宗退朝之后，对左右说：“是翁气量我不如。”不久卒用其人。后得悉，果然称职。于是，太宗越发知道吕蒙正能任用人。

从此二、三事中，可以看出赵普和吕蒙正推荐贤才的决心、耐心和伉直。不辞风险，坚持己见，不达目的不休。党中央号召退到二、三线的老同志荐贤任能。赵普和吕蒙正坚决荐贤的做法，或许不可以借鉴，但是，他们积极荐贤、爱才的精神，则是值得效法的。

# 简论唐太宗的用人与纳谏

(一九八六年)

在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出现了被封建史家所溢美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也因此被树为封建帝王的楷模。

“贞观之治”的形成，固然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项措施的得宜，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唐太宗，能够知人善任，从谏如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 一、知人善任，用人唯贤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sup>①</sup>所以他治理国政，十分注意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他的方法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主动求贤，不拘一格。唐太宗重视访求有才德的人治理国家，屡次要求宰相“助朕求贤”。如贞观二年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才”。<sup>②</sup>这一年，太宗批评右仆射封德彝未能举贤时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封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不是没有贤才，“但患遗而不知耳。”<sup>③</sup>督促臣下要用心搜罗。他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就提拔他当了待御史。太宗求才迫切，担心公卿大臣既不知贤，自己又不可能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曾打算“令人自举”，以开贤路。虽因臣下反对而作罢，但他不拘一格，网罗人才的想法还是对的。

2、才德兼备的用人标准。唐太宗认为，择官用人必须十分慎重。他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深知“用得正人，为善者

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的道理，他很赞成魏征的观点，“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sup>④</sup>把才德兼备作为用人的标准。贞观十二年，张昌令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太宗很器重。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不予录取，举朝莫知其故，及奏第，太宗怪无二人名，师旦解释说：“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太宗善其言，<sup>⑤</sup>虽借此二人才，也不能不割爱。太宗还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sup>⑥</sup>可见他是比较重视才德兼备的。

3、“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以广开才路。魏征在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时，曾策划消灭秦王李世民，建成失败后，太宗重其才，引为谋臣，“不可一日离左右”。贞观六年，太宗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讎，不谓今日得此同宴”。太宗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sup>⑦</sup>李建成的其它部下如薛万彻兄弟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李勣、程知节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寄以心腹。

对于近亲旧属，只要真有才能，唐太宗也能不避非议，加以重用。贞观三年，太宗以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太宗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sup>⑧</sup>从他对于一般亲旧的态度来看，这话不假，如贞观元年曾有人建议说，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唯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sup>⑨</sup>贞观三年，又有濮州刺史庞相寿自陈尝在秦王幕府。太宗本怜之，想使其还旧任。魏征谏：“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

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纳之，对相寿说：

“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任，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sup>⑩</sup>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sup>⑪</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确实是推行着“用人唯贤”的路线。

4、知人善任，取其所长。唐太宗善于知人，也善于用人，能够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各得其所。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房玄龄和杜如晦，同心殉国，史称贤相。唐太宗能够充分发挥他们为相的作用。他认为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他每与玄龄谋事时必曰：“非如晦不能决。”等到如晦来到一表态，卒用玄龄之策。“相须而成，俾无悔事”。太宗用人，舍短求长，不问细过。贞观十年他向群臣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sup>⑫</sup>到贞观二十年，宋公萧瑀性狷介，与同僚多不合，尝言房玄龄和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太宗批评说：“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sup>⑬</sup>看人看大处，不求全责备，不以小害大。太宗在这点上是很正确的。

太宗对其他大臣，也是这样。能指出他们的优缺点，令其发挥所长，克服缺点。他对身边的臣僚都有细致的了解和比较客观的评价。如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领兵攻战，非他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缺乏的是骨鲠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于和解人；而事他三十年，没有净言进谏。杨师道性行纯和，没有愆违；而性情怯懦，办事不够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富丽多彩，而持论恒远，自意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然其尚许

诺，私于朋友。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也坚正，写事忠诚等等。④这些评断大都恰切中肯。唯其知人，所以能作到善任。

5、亲贤臣，远佞人。太宗善于任用贤相良臣。除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外，还重用魏征、长孙无忌、褚遂良、王珪、虞世南、马周、李靖、徐懋功等。亲近他们，和他们经常谈论国事，研讨经籍，议论古今帝王得失，君臣和谐如一人。柳芳赞房玄龄、杜如晦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⑤

唐太宗不仅亲近忠臣，热爱直臣，而且远佞人，深恶佞人的危害。贞观初太宗就对侍臣谈谗佞之徒的危害，提醒臣僚们注意。他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姦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迷惑。”“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前史云：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⑥贞观十六年，太宗批评宇文士及为佞人。他尝止树下，爱之，宇文士及誉而巳。他严肃地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渐愧而退。

太宗远佞人，不信谗言。贞观中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曰：“魏征，昔吾之讎，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竟不问魏征，遽斩所告者。尉迟敬德，原属刘武周、宋金刚部，宋战败，敬德投唐，有人疑他将要叛离，说不如杀之。太宗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⑦贞观十六年，太宗在和谏议大夫褚遂良谈史书帝之善恶时，又重述他不信谗言的决心。他说：“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答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说：“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

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奔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sup>④</sup>

貞觀二十年庚辰，唐太宗和侍臣們談論為何自古帝王能平定中夏，却不能服戎狄，自己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時說：他成功止由五事。這五事是：“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惡正直，陰謀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為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sup>⑤</sup>這段話比較客觀，可以說是唐太宗任賢使能的基本總結，很值得借鑒。

## 二、虛心納諫

納諫是唐太宗理政治國的一個重要部分。

太宗認為納諫極為重要。因為諫諍若明鏡，可以照出自己的缺點、錯誤，從而得以改正。貞觀元年他嘗對公卿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太宗惟恐侍臣們不諫諍，故反復強調納諫的重要，說納諫則興，拒諫則亡。他自己也常以自古帝王不納諫而亡為戒。貞觀六年，他對侍臣說，他近來決事，不能如法令，而大家不執奏時說：“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sup>⑥</sup>貞觀十六年，太宗又以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的故事，自己不理解而問褚遂良說：“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太宗大悟，深然其說，並云：“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

欲无危亡，得乎？”<sup>①</sup>同年戊辰，魏征薨，太宗思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sup>②</sup>唐太宗重视纳谏，也就时时注意培养谏诤的风气。他的做法主要有三点：

1、求谏或导谏。唐太宗经常讲“唯惧不终”，希望臣下“谏争”，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诱导。如经常组织大臣讨论朝事，广泛征求意见，择善而从。在贞观之前，他面定功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邑时，就征求群臣有什么意见，说：“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淮南王神通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根据事实，指出他这种说法不对。太宗曰：“竇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闥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sup>③</sup>淮南王倾服。贞观元年，太宗询问为人君者如何才能明于事理，为什么会暗于事理于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对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sup>④</sup>太宗深善其言而纳之。

太宗每见人奏事，深恐奏事者惶恐而不敢谏，所以辞色温和，导之使谏，冀闻规谏，知政教得失。但是，却常常达不到目的，不知为什么？贞观七年他就问魏征说：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为什么？魏征说：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且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太宗由是接见群臣，辞色愈加温和。太宗为了打破谏者怕谏不听而获罪的顾虑，反复向侍臣们说：“所谏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贞观十五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朝臣都不论事，不知为什么？魏征回答说：“人才之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不虑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说：“诚如卿

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sup>⑤</sup>

太宗虽然能和颜悦色求谏，说明不合自己意志，亦不算忤旨。但是，他对谏者却好面加穷诘，故谏者有顾虑，多顺旨，不敢犯颜，他不知为什么，贞观十八年壬子，他恐怕塞忠谏之路，故对待臣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刘洎说：“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渐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sup>⑥</sup>太宗方知谏者多顺旨，不敢犯颜之故，深深自责。

唐太宗好文学而敏辩，他与群臣言事，多引古今以折之，群臣多不能对。这样，也就杜塞了谏诤之路，但他不自知。刘洎上书谏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敷（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秦政好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比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太宗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表示愿意“虚怀以改。”<sup>⑦</sup>

2、虚心纳谏。唐太宗在贞观之初能导之使谏，和悦纳谏，唯恐谏者不谏。自己也能虚心纳谏，知过即改。

贞观初太宗与王珪宴语，有美人侍侧。此本庐江王瑗之姬，瑗反而败，籍没入宫。太宗说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哉？王珪对曰：“今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悟，称为至善，遂令以美人还其亲族。<sup>⑧</sup>贞观二年，太宗曾得佳鹞，自臂于怀，望见魏征来了，匿于怀中，征奏事甚久不止，鹞竟死于怀中。太宗静心纳谏，可以说至矣。贞观十年，魏王泰有宠于



太宗，有人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太宗发怒，召三品以上让之，魏征正色谏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太宗高兴地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征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乃容易乎？”②贞观十一年，太宗行幸显仁宫，官吏因缺储侍受到太宗的谴责。魏征谏曰：“陛下以储侍遣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太宗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此，对长孙无忌等说：“朕昔过此，买饭而食，馑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③贞观二十年，房玄龄曾因微过归第，太宗纳褚遂良之谏而召回。褚遂良疏云：“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缙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太宗遂即召还玄龄。不久，玄龄又避位还家，太宗亲幸其第，载玄龄还宫。④太宗虚心纳谏的事例甚多。所举已足以说明太宗纳谏之诚，可谓虚怀之至。

3、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面折廷争。太宗常对群臣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又说：“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之女年十六七，容色姝丽，当时莫有能及者。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拟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谏曰：“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⑤太宗闻之大惊，即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令女还旧夫。当时，人莫不称叹。听直谏，知不对，即行改正。一向受人称叹，可谓得人心。贞观四年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疏谏曰：“陛下役

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对玄素说：

“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sup>④</sup>太宗以其言诚有理，乃罢役，并且说：“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谏谏。”这些非常逆耳之言，太宗犹能听而改之，并能给以较高的评价，可谓历代贤明皇帝之楷模。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又称颂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宜即行之。唯魏征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德未厚耶？华夏未安耶？远夷未慕耶？符瑞未至耶？年谷未登耶？”魏征答曰：功高、德厚、华安、远慕、瑞至、年登。太宗说既然如此，何为不可？魏征回答说：

“陛下功高而民未怀惠。德厚而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籙罗犹密。积岁稔而仓廩尚虚。而且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所以不能再加重人民负担。”太宗称善，乃罢东封，并称魏征为忠臣。群臣敢于面折廷争，犯颜直谏者在当时固不乏人，但是，魏征确为最突出之一人。此魏征之忠直与太宗之明智，概可见矣。魏征说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祿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sup>⑤</sup>太宗嘉其忠直，以魏征之谏，衡魏征之行，魏征确不失为一大良臣。

唐太宗还主张极谏，并引导臣下极谏。他对侍臣们说：他常恐怕因为自己喜怒而妄行赏罚，所以希望公等极谏。贞观初，太宗以隋为戒对公卿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sup>⑥</sup>贞观五年，太宗又以古来帝王因暴虐而亡为戒，要求房玄龄等对他极谏。他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

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sup>①</sup>贞观六年，太宗以古来入臣立忠之事召虞世南等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情规谏。”“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sup>②</sup>太宗能以亡国帝王为鉴，以隋炀帝拒谏而丧为戒，在正是他的明智处。唐太宗能够导之极谏，采纳极谏，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确保李唐王朝万世一系，永不倾覆，唐太宗不仅自己纳谏、导谏，也要求对太子极谏。贞观七年，太宗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这样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走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谏！”<sup>③</sup>因为太宗要求对太子极谏，故太子李治即位初亦能纳谏。当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高宗能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在永徽之时，百姓安乐，当时人称有贞观之遗风。正因为太宗要求对太子极谏，所以李治当太子时，亦能以极谏对太宗。贞观十八年，太宗怒苑西监穆裕，命令在朝堂斩之。当时唐高宗为太子，遯犯颜进谏，太宗气消乃罢。他感慨地说：“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sup>④</sup>可见当时朝廷内外已经形成谏诤的风气。

正因为唐太宗能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虚己待人，肯于纳谏的政治作风，才有贞观年间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政治空气比较活跃的局面，各种利国便民的措施才得以提出和施行。所以说，用人与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 注 释

①②③⑤⑥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贞观政要》。

①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资治通鉴》。

⑩⑪⑫《胡荅易知录》。

## 后 记

本集除序言、代绪和后记三篇外，收入教育论文三十三篇，教育论文以外的有关哲学、历史论文四篇，共三十七篇。收入的教育论文，按发表时间编目。主要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不可能写什么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教育文章，现在只将收集到的三篇编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教育短文，因当时戎马倥偬，又没有保存文稿的习惯，时隔久远，连一篇也未能找到收入，颇为遗憾。另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以及最近几年，还写有数十篇有关理论和历史方面的论文，因本集是教育论文集，所以只选择了四篇，作为附录编入。

本集收入的几十篇教育论文，其类别包括大、中、小学和社会教育。就文体说，约分四种：第一种是属于当时教育工作的需要的，或是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第二种是属于教育工作总结方面的；第三种是属于回忆教育工作性质的；第四种是属于教育研究性质的。总起来讲，各个年代所写的论文，都反映了当时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际，反映了时代精神。

所选入的教育论文，都有它写作时候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这里举出若干篇论文，略加说明。全国解放之初，高等师范教育特别重要。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为了在西北区贯彻会议精神，写了《加强高等师范教育的领导》一文（1953年）；当时，高等学校思想工作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一切思想工作活动和制度，才开始进行和建立，尚无经验。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特召开了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作了题为《关于西北区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4年）；同时面对全国的各级各类学校广泛的发展，县、区、乡教育更是迅速的发展的现实，而县级教育领导部门的

组织机构却不健全，干部领导水平偏低，而且县级党政领导部门有注重中心工作，忽视教育工作的偏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写了《论目前加强县教育领导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一文(1955年)。此后的1957年和1958年期间，全国农业大发展，农民强烈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小学生要求升中学，因而，开办职业学校，特别是大量开办农业中学，更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了。当时，江浙一带，农业中学逐渐发展，为了促进全国农业中学的发展，发表了《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一文(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师范教育历来不被人重视，全国解放之后，也是这样，青年学生多半不愿意报考师范院校，而愿报考理工院校。这种思想在当时很突出，妨碍发展师范教育以解决奇缺的中、小学师资。为了克服这一现象，发表了有关号召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的《重大而光荣的事业》(1959年)等文章。教育革命之后的1962年，甘肃师大(今改为西北师大)学生中表现出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所抬头。为了克服这种现象，使学生懂得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从而理好教学秩序，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1964年，大学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校活动门类很多，教师讲课，也不尽得当。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学生负担太重，要精简课程。他说：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方法是错误的。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特在本校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调查证明，学生的负担确实很重，教师讲课，也不甚得法，因此，就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大会，做了题为《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的报告。1979年，因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加强经济建设工作，因此，甘肃工业大学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经济建设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政工干部对政治工作没有光荣感，不安心。为了克服轻视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贯彻执行“四个坚持”的政治思想教育，顺利地将学校工作

由主要搞运动转移到以学为主的轨道上来，特召开了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在结束时作了题为《改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最近几年进行教育改革，这是客观的需要。大家都谈高师改革，我对高师教育改革也有些想法，所以发表了《简谈高师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1986年）。

另外编进去的几篇论文，《对于过去教育上的经验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总结教育经验》等，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做好工作而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在短短的八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也产生过教条主义的弊病，这在当时总结经验时，已做了批判和纠正。回忆起来，也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因为不够突出，所以当时未做过批判和总结。到1950年时，为了正确地继承老区教育的经验，去粗取精，所以应约写了《对于过去教育上的经验主义的批判》一文；全国解放后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到1952年西北区已进行过三年。为了总结经验，并开展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工作，特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一文；1958年，全国学校进行教育革命，在甘肃师范大学当然也进行了。但是，师大教育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究竟如何？需要有一个总结，以期统一思想认识，肯定成绩，吸取经验，于是就个人的认识，发表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总结教育经验》一文（1960年）。此文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观点是否正确，当时未听到有人提出异议。1986年所写《回顾我在甘肃师大工作的主要经验》一文，是继前文对我在师大的主要工作的总述。

关于收进集子中的几篇回忆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写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这方面资料遗失多，全国解放后，大家系统论述的也不够多。近几年来，一批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老同志，都想把当时的教育工作回顾一番，并在

此基础上，写出一批教育书籍来。大家感到老区的教育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应该认真整理继承。它在党的教育史上应该占有重要席位。因此，陕甘宁三省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教育编审委员会，着手编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北京党史研究机关也组织编写《陕甘宁边区丛书》，其中教育占一重要部分。因此，写了《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工作回顾》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教育》两文。前文原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而写的，后又作为编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参考资料。后者系邀写论文，拟编入《陕甘宁边区丛书》总集中。回忆文章，系记述当时教育实况，实质上也是属于教育工作经验的总结。

编入集内的徐特立教育思想等几篇论文，是属于教育研究性质的。近几年来国内教育界的许多同志，提倡研究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召开徐特立教育思想讨论会，编写徐特立教育书籍，出版刊物等。在此影响下，我陆续写出了几篇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论文，也收入本集内。

其他论文，亦都有当时具体写作背景，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本集的出版，承蒙甘肃省教育厅和西北师范大学党政的大力支持，教育厅副厅长赵近科的热忱安排；刘景乾、张汝珍、费昌仁三同志的精心整理材料。这里均深表感谢。刘开瑜同志为本集出版，翻阅了许多旧日发表的文章，并进行抄写、复印等工作，亦表谢意。

李之钦

1988年3月

